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朱可夫元帅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译者的话

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把二十多亿人口卷入战争，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苏德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受了严峻考验，在粉碎德国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1918年参加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中屡立战功，从一名士兵逐级晋升为苏联元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一直是苏军最高统帅部成员。1942年8月起直到战争结束，担任副最高统帅，多次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被派往前线，并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方百军的司令员。他在计划、准备和指挥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柏林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被国内外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

战后，朱可夫担任首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德国苏军占领区最高行政长官。1946年春，朱可夫回国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后调到敖德萨军区、乌拉尔军区任司令员。

1953年春以后，朱可夫又接连担任要职。1955年2月出任国防部长，1957年6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7年10月，朱可夫被赫鲁晓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8年3月被迫退休。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朱可夫得以恢复名誉，1974年6月病逝。

本书作者小奥托·普雷斯顿·钱尼博士曾任美军驻东德与苏军联络的联络官。他广泛引用苏联和西方的资料，介绍了朱可夫从士兵到元帅直到退休的经历，着重叙述了朱可夫参与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历次重大战役的计划、准备和实施的情况。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作者对某些事件的描述、对美苏关系等有他自己的看法，望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

本书是根据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Zhukov》一书翻译的。为节省篇幅起见，译者对与朱可夫生平关系不大的部分作了一些删节。原书将引语出处集中附在最后，为阅读方便，翻译时仅择其要者注在当页，其中凡注明中文版页数者，均系按原注查出。

1983年3月

第一章 早期的经历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公元1896年12月2日出生在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的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他父亲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是个穷鞋匠，母亲乌斯金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在一家农场干活。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的身世：

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百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青苔和杂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子。屋子有两个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人说。原来这儿住着一个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摆脱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百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上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个皮匠学手艺。

后来，他同我们讲起过，在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以后，又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伊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伊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道，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逐出莫斯科。从那时起，直到1921年去世，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就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穷的人家。父亲和母亲结婚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俩都是第二次结婚，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强力壮，是因为她父亲——我的外祖父阿尔捷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用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把马拉个屁股蹲儿。

由于家里太穷，朱可夫的母亲不得不另外找些活干。每年春夏和早秋季节，她在地里拼命干活。晚秋，她就到县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替人把食品杂货运送到乌戈德厂村的商人那里。运一趟能挣一个卢布到一个卢布零二十戈比。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这是多么微薄的工资啊！扣除马料钱、店钱、饭钱、修鞋钱等等，已经剩不下几个钱了。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都是这样子干的。她们把幼小的孩子丢下给年迈的奶奶、爷爷照管，自己不顾道路泥泞，也不管天寒地冻，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谢尔普霍夫等地给别人运货。

我们村大多数农民生活都很苦。他们的地又少又瘠薄。田间劳动主要是由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来干。男人们则去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做零活。但他们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少有人口袋里装着许多钱回村来的。

当然，我们村里也有富有的农民——富农。他们生活得不坏；住的是宽敞舒适的房子，院子里牛、羊、鸡、鸭成群，粮仓里堆满了米和面。这些人家的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进最好的学校。我们村里的贫苦农民多半为这些人干活，但报酬极其微薄，有时给点粮食，有时给点饲料，有时只给点种籽。

我们这些贫农家的孩子，都亲眼看见过妈妈们的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她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她们从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给我们带点小面包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

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都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孩子怎么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疲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

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村公墓。

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那一年，朱可夫一家又遭到另一场灾难。屋顶因朽坏而坍塌了，不得不搬家。“必须离开这里。”朱可夫的父亲说：“不然我们都会被砸死的。现在天气暖和，我们住到草棚里去，至于以后，到时候再说。说不定有人会租一间温室或者茅屋给我们住。”

朱可夫的父亲砌了一眼小炉灶，全家人都在草棚里住下。朱·可夫的母亲提议把母牛牵去卖了，买木料盖房子，可是她丈夫不同意，说那样的话，他们就只剩下一匹老马了。过了不久，朱可夫的父亲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到一套小房架。邻居们帮忙把它运回来，不到 11 月就把房子盖好了，是用新稻草铺的房顶。朱可夫回忆说。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

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安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1902 年冬，我已七岁了。这年冬天，我们家的日子十分困难。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 12 月中旬。父母亲挣来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团结友爱的传统。

小朱可夫在邻村——韦利奇科沃村的一所教会小学念了七年书，学习成绩优异，还上过荣誉名册。再继续求学，他家里供他不起了，于是这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就被送到他的一个在莫斯科当皮货商的舅舅皮利欣那里当了学徒。到十大岁时，朱可夫的手艺已经学成了。那几年，因为朱可夫常常往返于莫斯科和他的家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之间，对这一片平坦的、到处是树林的地区的地形十分熟悉，在 1941 年秋季关键的日子里，这对他是非常有用的。

朱可夫在皮和欣的作坊里干活期间，尽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徒的活儿又很累，但他仍旧继续学习，主要是利用晚上和节假日。1913 年，他参加了市立中学全部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

当朱可夫跟一个名叫玛丽亚的莫斯科少女相识以后，便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初恋。这对情侣本打算要结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1915 年 7 月，宣布征召 1896 年出生的青年入伍。格奥尔基同玛丽亚告别，再回家乡去告别父母，顺便帮家里收庄稼。

1915 年 8 月 7 日，十九岁的朱可夫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应征入伍了。他被选进骑兵部队，他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一向很喜欢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朱可夫被送到卡卢加，编进预备骑兵第 5 团的预备步兵第 189

营。1915 年 9 月，他随同这个团调到乌克兰，该团被编入著名的骑兵第 10 师。1916 年春季，他所在的部队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部队了。

这时候，有三十名骑兵被选送去培养当军士，朱可夫也被选上了。1916 年 8 月初，训练结束，他又回到骑兵第 10 师，这时该师已调到哈尔科夫附近。

在奔赴前线途中，朱可夫乘坐的火车开到一条侧线上停下来，为运送一个步兵师上前线的另一列火车让路。医务列车则从前线往回开，也停在这个车站上。朱可夫从伤兵们那里了解到，俄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很差。

朱可夫的团队的番号是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 10 团。部队到达文尼察西南的卡格涅次波多尔斯克，开始接收马匹时，遭到敌机空袭。敌机丢了几颗小炸弹，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朱可夫说，这是他的第一次战斗洗礼。

这时第 10 师开到德涅斯特河岸，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9 月初，该师在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集结，主要作为步兵参加战斗，因为这里的地形不能使用骑兵发动进攻。部队损失很大，进攻终于失败了。当时已向德国人宣战的盟国罗马尼亚的军队，由于没有做好准备，也遭受了很大损失。

1916 年 10 月，朱可夫遭遇了一次地雷爆炸，被从马上掀下来摔成脑震荡，因而被送回哈尔科夫治疗。出院以后，他仍感到不适，听力很不好。这一次，他没有回前线，医务委员会派他去担任部队训练工作。这时候，他已经获得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受伤得的，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国军官得的。

1917 年 2 月 27 日清晨，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紧急集合，开到巴拉克列亚城。士兵们对这次将要执行什么任务摸不着头脑，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他们看见公路上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连长们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一个高个子的军人走过来，向士兵们大声宣布，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也不再为资本家和地主卖命了。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土地和自由。这位军人在结束演说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士兵们作出了响应，也都欢呼“乌拉！”，并且同示威者们混合到一起了。朱可夫很快得知，他的连长和其他军官都被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委员会逮捕了。各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待士兵委员会的命令。第二天，来了一位军官，命令连队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全连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连士兵委员会主席。

3 月初，有个准尉到连队来向士兵们讲演，讲演结束时要求士兵们支持临时政府，支持继续进行战争。愤怒的士兵们进行了一次表决，表明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所以，朱可夫说，他们团的苏维埃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了。

5 月，连士兵委员会决定把士兵遣散回家，给他们发了退伍证明书，但鼓励他们随身带着自己的枪支弹药。朱可夫拿到退伍证明书以后得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正在到处搜捕他，所以他不得不在巴拉克列亚城和拉格尔村躲藏了好几个星期。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所以决定把连队遣散，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篡夺了团苏维埃的领导权。——译者注

1917 年 11 月 30 日，他终于回到莫斯科，这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这年 12 月和第二年的 1 月，朱可夫是在乡下同父母在一起。2 月初他决定参加赤卫队，但他忽然得了重病——斑疹伤寒，4 月又患了回归热。直到半年以后，他的身体才复原，能够去参加红军了。1918 年 8 月，他志愿参加了莫斯科骑兵第 1 师骑兵第 4 团。

1918 年秋，朱可夫加入了前军士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的骑兵旅。这个旅是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指挥下的那个师的两个旅之一。在国内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朱可夫都在布琼尼的骑兵部队中服役，同它一起历尽沧桑。作为这支深受约瑟夫·斯大林赞赏的精锐部队的一员，他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它在战时和战后的各项活动。

布琼尼也是骑兵出身，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成绩卓著，后来很快成为国内战争中最负盛名的英雄人物之一。他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是在 1918 年 7 月，当时他回答了斯涅萨列夫将军向他提出的一些有关战术方面的问题，从容不迫，对答如流。同月，在制定一次骑兵进袭计划时，布琼尼与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相识。那次进袭后来证明是极为成功的。虽然布琼尼以后的业绩不那么辉煌，可是在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人。朱可夫曾在布琼尼的部队中服役这一事实，对他这个年轻的军人的迅速晋升是大有帮助的。

k·E·伏罗希洛夫——红军著名将领，第一批被晋升为苏联元帅的五人之一。1921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26 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结束后，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1969 年逝世。——译者注

1918 年冬季，红军和白军开始加强各自的军队，为第二年春夏的战役作准备。随着同盟国 1918 年 11 月垮台，力量对比转而有利于布尔什维克了。但是，俄国南部的白军仍构成很大威胁。那里有三个集团军，即顿河集团军、志愿兵集团军和高加索集团军，它们都已摆好发动进攻的阵式。白军 1919 年的几次战役的目标是对莫斯科和彼得堡进行合围进攻。邓尼金将军的军队预定要扫清北高加索，挺进到乌克兰，同从东面进攻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西伯利亚军会合。

1919 年初，高尔察克的军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迫使红军退往伏尔加河。四五月间，新组建的波兰集团军攻进了俄国西部，而白军将领尼古拉·尤登尼奇则在西北部向彼得全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决定首先打击高尔察克。为此，把东部战线划分成北部军队集群和南部军队集群，并任命足智多谋的米哈伊尔·伏龙芝指挥南部军队集群。这个包含有第 1、第 4 和第 5 集团军的军群，把进攻矛头指向了乌拉尔山脉西麓的重镇马法。经过激烈战斗，伏龙芝的部队于 6 月在取了该城。

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骑兵第 1 师，是伏龙芝指挥的集群中的一支部队。该师在乌拉尔斯克附近的希波沃车站的接近地上，首次投入战斗，不久又调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同白军作战。8 月，整个骑兵团调到弗拉基米罗夫卡车站。

这期间，朱可夫已经是骑兵连里苏联共产党的同情者小组的成员，被作为党的发展对象来培养。朱可夫回忆说：“当时发展党员是没有预备期的。”党的同情者小组只有五个人，但是团党委书记和国政委每周到他们这里来两次，谈国内和国际形势，谈党为加强红军所采取的措施等。1919 年 3 月五日，朱可夫被吸收入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许多事情我都记

不得了，但我被吸收入党的那一天，我终生难忘。”

1919年9月，察里津（1925年后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一带爆发了激烈战斗。在扎普拉夫诺耶和阿赫土巴之间的一次白刃战中，朱可夫的左脚和左肋被手榴弹炸伤，再次被送进医院。

朱可夫出院后，获准休养一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探望了父母。当他回到部队，到军事委员会请求派他去作战部队时，领导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把他派到特韦尔的一个后备营，因为他受伤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20年1月，他被派到梁赞省斯塔罗日洛沃骑兵训练班学习。这是一个专门造就指挥员的训练班，学员主要是从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中选拔的。朱可夫兼任了第1学员骑兵连的司务长。

1920年7月，骑兵训练班结业，朱可夫晋升为军官，被派到莫斯科继续深造。他在莫斯科期间得悉他的恋人玛丽亚已经跟别人结婚了。此后，他再也没碰见过她

朱可夫后来同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姑娘相识并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女儿艾拉和埃拉。前者获法学副博士学位，嫁给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当飞行员儿子，后者嫁给了克利门特·E·伏罗希洛夫的孙子。见《苏联画报》1956年9月号。——原书注

当时，朱可夫的经历开始引起红军领导人的注意。后来，正是他们帮助他沿着行伍的阶梯步步高升。朱可夫在布琼尼率领的骑兵中参加作战期间，伏罗希洛夫和伏龙芝，甚至斯大林，无疑都注意到朱可夫才能。斯大林当时担任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则是俄国最杰出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理论和红军建军基本原则，就是在他的协助下形成和制订的。

8月，朱可夫所在的学员混成团部署到高加索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当时弗兰格尔已经加强了他们最后的据点——克里米亚和相邻的黑海地区的白军。

8月中旬，弗兰格尔组织了三支登陆部队向红军进攻，而朱可夫所在的部队被派去同乌拉卡伊将军指挥的白军作战。乌拉卡伊攻占了季莫舍夫斯卡亚以后，很有可能同红军第9集团军后方的反苏维埃游击队会合。B·M·吉蒂斯和T·K·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高加索司令都，把第9集团军投入战斗，阻击乌拉卡伊的军队。到9月10日终于打退了弗兰格尔军队的进攻。10月12日，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临时和平条约的签订，乃是弗兰格尔自军末日的开始。因为他们已得不到波兰的援助，在数量上处于1比4的劣势。红军于10月28日再次向弗兰格尔军队发动进攻，11月16日占领刻赤。弗兰格尔将其残部撤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的战事便渐渐结束了。

约翰·埃里克森著《苏军最高指挥部：军事政治史，1918—1941》，第97页—第102页，亦参阅T·戈雷洛夫著《粉碎弗兰格尔》，载《苏联军事评论》杂志，1970年10月号，第42页—第45页。——原书注（约翰·埃里克森为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军事问题作家。——译者注）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团没有参加最后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战役。那时到处都很需要军校学员，所以一些训练成绩最好的学员提前毕业，去补充在与弗兰格尔军队作战中有大量指挥人员伤亡的骑兵部队。其他学员奉命追击逃到高加索山区的白匪。后来朱可夫得知，他们在山里遭到伏击，损失严重。

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学员被派往骑兵第14独立旅。该旅当时部署在诺沃热列利耶夫斯卡亚车站附近，继续肃清已经孤立无援的乌拉卡伊的残余

部队和当地匪徒。朱可夫来到骑兵第1团，这个团是由一位顿河哥萨克老战士、素有“勇敢的指挥员”和“剑客”之名的A·A·安德烈耶夫指挥的。朱可夫被派去当排长。他向全排战士自我介绍说：“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咱们以后走着瞧吧。可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马和战斗装备，并同每个人认识一下。”

朱可夫的团长提醒他说，战士们常拿有些军官穿的红裤子取笑。朱可夫对全排战士说，他知道他们不喜欢红裤子，但这裤子是苏维埃政权发的，是革命的象征。几天以后，朱可夫率领这个排投入了肃清滨海地区残匪的战斗。敌军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他的排无一伤亡。朱可夫回忆说：“这次战斗以后，战士中再也没有人谈论我的红裤子了。”

朱可夫不久被提升为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1920年12月末，整个独立旅调到沃罗涅日省去镇压富农暴动和肃清科列斯尼科夫率领的一股匪徒。这伙匪徒被粉碎了，残余分子逃到坦博夫省，同以安东诺夫为头子的富农——社会革命党匪徒汇合了。安东诺夫一度曾是当地民团的头子，他对苏维埃的土地政策非常不满。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博夫省清匪司令部，清剿安东诺夫的部队。1921年3月1日，坦博夫司令部共有三万二千五百名步兵和近八千名骑兵。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奉命指挥这支人数众多的部队。5月，同安东诺夫军队展开激战。尽管骑兵第14独立旅进行了顽强战斗，但未能全歼匪军。匪军残部向奔萨方向逃窜，后来才被全歼。安东诺夫军队的彻底失败，标志着对共产党的有组织的抵抗的结束，虽然直到1921年夏，N·N·乌鲍列维奇指挥的部队仍在追剿小股叛匪。

M·H·图哈切夫斯基——红军著名将领和军事理论家，是第一批被晋升为苏联元帅的五个人之一。——译者注

战争结束以后，朱可夫决定继续留在军队。尽管在和平时期，晋升是比较慢的，但朱可夫的晋升比大多数人都快。从1922年6月到1923年3月，他在萨马骑兵第7师第38团的一个连任连长，随后任该师第40团的副团长。1923年4月，他被任命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

1924年，共产党开始改造红军，以提高其战斗效能，并采用军事科学的新发明。这次军事改革的关键人物乃是伏龙芝将军。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后，着手提拔在国内战争中曾积极参加战斗的年轻指挥员来代替上层的一些保守的军官。到1924年年底，红军经过改组和复员，已从五百五十万人减少到五十六万二千人。

包括朱可夫在内的许多指挥员认识到这次改革的必要性，并利用了这次改革所提供的学习和晋升的机会。国内战争结束后的十年期间，朱可夫曾数次到深造班学习。1924年至1925年期间，他曾在列宁格勒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深造。他的同班同学中有N·X·巴格拉米扬、A·N·叶廖缅科和R·R·罗科索夫斯基——他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将领。从1929年到1930年春，朱可夫曾在著名的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军官进修班进修。其余的时间，一直担任第39团团长。

虽然一些苏联人士否认，但至少有一名德国将军证实朱可夫在1922年德苏签订腊帕洛协定以后的时期里，曾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过。腊帕洛协定——1922年苏德之间签订的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宣布废除赔款，建立经济合作和政治联系。——译者注

当时德国一心想要报仇雪恨，修改凡尔赛和约条款。在这个愿望驱使下，他们在发展现代军事思想方面走在最前面。由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军队开始使用两种新式武器——坦克和飞机，原有的军事概念和军事原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对许多国家来说，吸收和掌握坦克和飞机已证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对于德国来说却并非如此。去过德国的苏联人对于德国的理论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回国以后，大力主张红军采用这些新武器。他们的主张得到当时任陆海军副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赞助。这位年轻的、卓越的将领对于德国人的军事效能很赞赏。二十年代末期，他曾亲自观看过德军的军事演习。——原书注

T·R·朱可夫在柏林学习成绩优良。德国军官们回忆说，他和他的俄国朋友们都喜欢“高声谈笑”，吃过晚饭以后要喝很多酒。可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朱可夫交过手的 F·W·冯·梅伦廷将军写道：“在军界，人们都非常清楚，朱可夫没有浪费他的时间。” F·W·冯·梅伦廷少将曾任进攻苏联的德军坦克第 48 军参谋长。诺曼底登陆后，他被调到西部的 G 集团军群任参谋长。1945 年 5 月 3 日被美军俘虏。被俘时，任坦克第 5 集团军参谋长。——原书注

在德国，朱可夫接触到新德意志军队头号理论家汉斯·冯·赛克特将军的学说。这位德国将军强调在突破作战中使用装甲部队。冯·赛克特提出的以快速运动的机械化部队为基础的闪电战战术，给朱可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回到苏联后，成为红军推行机械化和现代化的主要支持者。

关于朱可夫是否曾在柏林受训的问题，证据是互相矛盾的。不过，不管他是否去过，他象许多其他苏联军官一样，受到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原书注

第二章 坦克战专家

T·K·朱可夫为提高自己的军事技术和领导艺术所作的努力，对于他在武装部队中的迅速晋升，起了很大作用。苏联传记作家 H·斯维特利申记述朱可夫的成长过程时指出：“T·R·朱可夫的杰出的指挥才能、他为自己的文化程度坚持不懈地、刻苦地学习，以及他对他的部队的战斗准备和政治准备的关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28 年，朱可夫指挥萨马骑兵第 1 师第 39 团，担任师长的是有才干的 n·Q·塞尔基奇。塞尔基奇师长在给朱可夫做的鉴定报告中写道：“一名精力充沛的、果断的指挥员。”

由于他在部队的教育和战斗训练方面的工作，使全团在各个方面都已达到所要求的水平……他作为一名团长和单一首长，受过极好的训练，应提前晋升旅长。”

n·Q·塞尔基奇 1896 年生于南斯拉夫，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1932 年从伏龙芝学院毕业后，指挥骑兵第 4 军，1935 年至 1937 年指挥骑兵第 3 军（白俄罗斯军区）。1936 年当选为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见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 年 8 月号。——原书注

斯维特利申在《从士兵到元帅——为纪念 T·K·朱可夫七十寿辰而作》

一文中说这份鉴定报告引自朱可夫的个人档案。——原书注

提一提“单一首长制”是有意义的。单一首长制原则是1925年在苏联武装部队中实行的。苏联对这个原则所下的定义是：“单一首长制，就是把一个兵团、部队或分队的军事、政治、行政管理以及后勤工作的全部权力和责任集中在指挥员一人手中。1925年以前，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在军事单位中形成了双重指挥系统，一切指令和作战命令必须由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两个人签字才行。

在朱可夫担任骑兵团团长期间，苏联组建了第一批坦克团，而朱可夫的团队则被选从事这种新武器的试验。对于他的成功和他后来在苏军指挥系统中扶摇直上的情形，·鲁斯兰诺夫作过第一手的观察。他指出，朱可夫从团长一直升到红军总参谋长，然后又升任全国武装部队副统帅，总共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他指出：

·鲁斯兰诺夫是一位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苏联驻德国占领军中服务，1948年移居西德。他于1955年曾为在纽约出版的俄文杂志《社会主义通报》写过两篇介绍朱可夫生平的文章。他声明：“我要写的只限于我亲眼看到的朱可夫三十年代在白俄罗斯军区当坦克团团长期间的情形，只限于我的那些曾在蒙古哈勒欣河战役期间，在朱可夫手下担任低级军官的私交对我讲述的情况，以及曾任朱可夫私人副官二十年的M少校给我披露的一些内情。对朱可夫战前调到莫斯科以后的情况，以及他在战争期间的情形，我是不大了解的。”——原书注

朱可夫升得这样快，光说是因为他的能力强，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苏军将领中，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乏精明强干的军事领导人。可是，他们不是在叶若夫主持的大清洗的年代里死于狱中，便是担任着较低级的次要职务。因此，朱可夫平步青云还有别的原因，这些原因必须从有利于朱可夫的前途的历史条件中去找。在当时，这些历史条件是存在的。叶若夫——1937年肃反期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译者注

鲁斯兰诺夫提到的“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红军的基本体制、它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以及图哈切夫斯基被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应算作一个条件，但大战开始之时，朱可夫已被擢升到军事阶梯的高层，他此后的晋升已成定局。红军的机械化和摩托化是早就开始了的，但在希特勒上台以后，整个计划加快了。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是以向东扩张（“东进”）为基础的，而克里姆林宫十分清楚这对苏联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便加紧实行军队现代化。

德国的冯·赛克特将军的军事哲学，引起了苏军领导人，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极大注意。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仍然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因此，效法德国，把布琼尼的前骑兵集团军的各骑兵师机械化，是非常自然的。机械化工作首先从白俄罗斯军区的骑兵军开始。每个师预定配备一个快速坦克团。因为这次试验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试验，两个坦克团的团长必须是出色的军官。莫斯科（就是说，斯大林本人）决定了最后人选。朱可夫和另外一名优秀团长·T·帕夫洛夫被选中了。

据鲁斯兰诺夫说，有些人认为斯大林不会亲自过问任命朱可夫当团长这样的小事。

鲁斯兰诺夫认为，恰恰相反，“斯大林与众不同及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对于在他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细微末节，往往是很细小的事情非常注意”。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鲁斯兰诺夫举了一些例子，其中包括斯大林十

分关心瓦列里·契卡洛夫、T·Q·巴伊杜科夫、A·B·别利亚科夫 1937 年从莫斯科经由北极直达美国的飞行。斯大林指示兵器设计师瓦西里·A·杰格佳廖夫设计一种新式机关枪，以及斯大林曾亲自过问的其他问题等等。

朱可夫仍然必须经受一场严峻的实际考验：他必须组建他的新团队，必须在克里姆林宫的睽睽目光之下带好它，还要解决好肯定会产生种种问题。困难是很多的，一切都是新的，因此他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的直觉，而不是勤务手册。坦克是一部复杂的机器，因而对于一支使用坦克的部队来说，后勤供应、保养、作战等细节，都必须给予特别的考虑。此外，参谋工作、通讯、后方行政管理也都是重大的课题。朱可夫“十分明了人们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于是他以非凡的热情和事业心投入了工作。他对于自己的主要任务了如指掌，这一事实本身确保了他后来的成功”。

鲁斯兰诺夫著《朱可夫元帅》，载《俄国评论》杂志，第 15 卷（1956 年 4 月），第 128 页。——原书注

朱可夫不得不去培养新型的士兵——坦克手，对此，鲁斯兰诺夫写道：

身为这样一个团的团长，担子是非常重的。朱可夫很快就成了团队的中心人物。创新精神、领导和管理，样样都出自于他。凡事他必亲自过目，所以他熟悉全盘情况。只有在必须解决有关参谋事务的时候，他才呆在团部。其余时间他离开团部，到下面去亲自查看团队生活的各个方百。他既观察、学习，又去教授别人。他以一种罕见的耐心和自制去完成这些任务，而且严格要求下级必须坚持始终地、井井有条和深思熟虑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从不大吼大叫或训斥任何人。没有人看见他发过脾气或者暴跳如雷。这对于他的部下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可是，倘若经劝诫无效，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一个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如果为了部队的利益必须这样做的话。

朱可夫实行的原则是：“如果你不会，我们教给你；如果你不想学，我们就强迫你去学。”

朱可夫领导有方，毫不留情地坚持要部下全力以赴，以及他对细微末节的注意（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质，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一位要求高的、严格的、坚韧不拔的指挥员），在他的军事生涯的早期就开始表现出来了。举几个例子或许有助于说明他当时和以后的成就。朱可夫禁止任何人穿工作服离开车间，或离开车库和坦克停车场到外面去；任何时候都必须穿规定的制服。野外训练返回之后，不管时间有多晚，必须立即洗刷战斗车辆。而且，朱可夫坚持要求全团每个人必须把皮鞋擦得亮亮的。

当战斗车辆野外演习回来的时候，洗车用的专用台子已经搭好，而且每次作业结束时，朱可夫总要来看看。他背着手，一声不响地查看工作进展情况。他要亲自考察他的部下，特别是军官们，一旦他确信有谁不称职，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他就让他离开这支部队。鲁斯兰诺夫指出：

大多数人不愿离开这个团，因为在朱可夫指挥下执行任务，要比在其他人指挥下执行任务容易些。人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处事公道的指挥员。他怎样要求下级，也就怎样要求自己，决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是份内该做的事，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他都要去做。他常常夜里出去视察，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头，立即要部下纠正，或者把没有干好的事情重新再干一遍，即使正值午夜也罢。

一天晚上，有个坦克连战术演习结束后返回驻地，已是午夜时分了。战士们个个精疲力尽。于是连长要求车场值日军官允许他们把胡乱刷洗过的

坦克停到车场里去，讲好第二天早晨再来彻底清洗。值日军官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虽然他心里十分清楚团长是禁止这样做的。

大约一小时以后，朱可夫来到车场检查车辆。值日军官开始找理由为坦克没洗干净辩解，说什么坦克手们演习完毕以后实在是太累了。朱可夫生气了，对他说道：

乐意帮助同志，是一个很值得赞扬的品质，可是，你瞧，你并不是帮助他们，正相反，你不执行指示，而且促使他们违犯了军纪、军令。我跟你一样清楚地知道，战士们很疲劳了，他们确实有困难，可是，你瞧，他们被征召入伍，就是要使他们受到训练，为能应付战争，为能经受住战争的艰辛和严峻考验作好准备。演习的疲劳——跟战时我们将会遇到的情形相比，不过是娃娃们的游戏罢了。我应当解除你的职务，再给你军纪处罚，不过作为例外，我今天不这样做，党组织将审查你的行为，宣布对你的处分。这样大概会对你有所帮助，然后我们看看再怎么处理你。

朱可夫讲完以后，命令连长、营长负责组织人把坦克洗干净，完成任务以后向他报告。两小时以后，任务完成了。朱可夫命令全连去休息，但他把连长、营长留下来。接着朱可夫再一次检查坦克。当他要走的时候，口过头来对连长说：“我得到的印象是，你当连长还不够成熟。你好好想想吧，然后趁着还不晚的时候，把你自己的意见告诉我。

下次你再这样干，就不会这么便宜你了。我警告你！”

朱可夫用各种具有说服力的办法提醒部下执行各项命令。他提醒他的官兵不要忘记擦皮鞋或靴子的办法真灵，以致后来没有哪个人忘记擦鞋。

有一次，在警卫队列上，朱可夫听取了值日军官的报告，然后决定检查一下这些将参加值勤的警卫战士们的军容。他对每个战士的军容都很满意，只有一名战士例外，因为他的靴子擦得不好。朱可夫问新任值日军官对这个战士的靴子有何感想。值日军官没有回答，而是命令这个战士说说他为什么没把靴子擦亮。朱可夫打断他的话说：“我问的是你，不是问他。我不想听他回答，而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解释一番，靴子是不会干净的！”值日军官很尴尬，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朱可夫接着用较为缓和的口气说：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重要的问题不是靴子没擦干净，而是你对这件事不重视。他可能是忘了擦靴子，可你还是应当要求战士们在出去值勤之前擦好靴子。事情糟就糟在除了团长以外，全团显然没有别人能帮他擦擦靴子了。

朱可夫命令副官拿来一只凳子和擦鞋工具，接着要那个战士把一只脚放到凳子上。

朱可夫聚精会神地看了看靴子，该怎样擦才擦得亮，然后开始替战士擦起来。几分钟以后，这只靴子变得锃亮了。朱可夫把刷子递给战士，要他擦另一只靴子，擦好以后，跟值日军官一起到团部报告，把靴子给团长看看。这个战士很下功夫地把另一只靴子擦好了。值日军官和警卫队长，把两只靴子仔细比了又比，然后前往团部让朱可夫看靴子。

这次事件在全团官兵中间引起许多笑声和议论，可是从那以后，战士们擦鞋更用心了。

大家原来都以为会对擦鞋问题下一道严厉的命令，可是什么命令也没下。鲁斯兰诺夫写道，

这样，朱可夫在全团逐步建立起井井有条的气氛。全团官兵对他并不惧怕，但却都感觉得到他的存在的力量。他们依赖他，而又往往意识不到是

依赖他。

功夫不负苦心人。指挥官们尽心竭力，终于取得了优异成绩。朱可夫的团不论是参加演习，还是接受检阅，都名列前茅。这一切，总部首长都看在眼里。红军各部队没有不知道这个团的。军事学院的学员们也到他的团里来实习。这支部队常常参加有总参谋部代表到场观看的训练演习，还给各国武官和外国贵宾进行表演。当时，白俄罗斯军区的报纸——红军《真理报》开始大量报道朱可夫的事迹。它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扼要介绍朱可夫的军事经历和他在国内战争中的功勋，赞誉他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党的无限忠诚。

朱可夫经受住了对他的考验。

1930年5月，在指挥第39团将近七年之后，朱可夫升任骑兵第二旅旅长，对他的赞扬也越来越多了。骑兵第7师师长K·K·罗科索夫斯基写了一份赞扬备至的鉴定报告：朱可夫的这个旅属于萨马骑兵第7师。该旅共有两个团，即第39团和第40团。第7师所在的军，从1925年2月到1929年是由C·R·铁木辛哥指挥的，此后是由I·Q·塞尔基奇指挥的。

——原书注

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建立了亲密的持久的友谊。1966年12月，这两位老战士（他们俩都在这个月庆祝了自己的七十寿辰）在纪念莫斯科会战二十五周年的仪式上一同照了相。有趣的是，两个人当年都当过国防部长——朱可夫在莫斯科，罗科索夫斯基在华沙。——原书注

一位坚毅果断的指挥员。他富有创新精神，并善于把这种创新精神应用于本职工作。

他严守纪律，他要求严格并坚持始终。在军事方面，他是训练有素的。他喜欢研究军事问题，不断提高自己。在一年的时间里，由于他对骑兵旅的战斗训练领导有方，该旅不但在操练和战术射击上，而且在全面发展上，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罗科索夫斯基在鉴定报告的末尾建议提升朱可夫担任机械化兵团司令员之职。

见斯维特利申著《从士兵到元帅》，第32页。——原书注

1931年2月，朱可夫被任命为布琼尼将军的助手。布琼尼将军从1924年到1929年的十三年间，一直担任红军骑兵监察部部长。1933年3月，朱可夫被指派为骑兵第4师师长。

在国内战争年代，这个师一直是布琼尼的骑兵第1集团军中最优秀的部队之一。这时，它是白俄罗斯军区的一支部队，而白俄罗斯军区是苏联最重要的军区之一，也是培养未来战争的领导人的一个训练场所。在军区花名册上，有一些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被证明是最优秀的军事领导人。C·R·铁木辛哥任军长；朱可夫、N·C·科涅夫、B·S·索科洛夫斯基都是师长。N·X·巴格拉米扬、M·B·扎哈罗夫、P·R·马利诺夫斯基、B·B·库拉索夫、A·V·波克罗夫斯基也都被派到这个重要的军区里任职。

朱可夫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在苏联报刊上出现。1935年，他同其他一些人一起指责图哈切夫斯基对红军的演习指挥不当。翌年，他被任命为支持斯大林的新宪法草案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在这期间，朱可夫和红军参谋长B·M·沙波什尼科夫试图说服红军最高领导层相信，坦克在现代战场上能够独立作战——也就是说，这种强有力的新武器不要分散到行动缓慢的各个步兵部队去，从而削弱了它的力量。

朱可夫关于在现代战争中如何使用装甲部队的主张，只是暂时占了上风，因为斯大林后来接受了解散大规模坦克部队的主张。只是在 1941 年，红军面临惨败危险的时候，才证明朱可夫的看法是正确的。

朱可夫担任师长职务成绩卓著，他的师在战斗训练和政治训练中表现优异。H·斯维特利申在为朱可夫写的传记《从士兵到元帅》中指出：“由于在这方面取得巨大成绩，T·K·朱可夫于 1936 年荣获政府的最高奖赏——列宁勋章。”朱可夫在谈到他担任师长职务时说，参加在白俄罗斯军区，在两位杰出的苏维埃军事将领 A·N·叶果罗夫和 N·乌鲍列维奇领导下，常常举行的军事演习和指挥与参谋训练，对于扩大他的作战视野、形成他的理论观点和指挥素质帮助极大。

叶果罗夫 1931 年任红军参谋长，1937 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乌鲍列维奇当时是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原书注

第三章 国外的使命

朱可夫任骑兵师长期间，西班牙爆发了内战。不久，他受命在这场冲突中担当一个角色。斯大林本不想介入这场战争，因为它跟苏联相隔千里，涉及的又是一个苏联没有派驻正式代表的政府。但是法西斯国家一意孤行，硬要去干涉这场战争。这就使斯大林确信：假如他不果断地采取行动，叛乱分子就会很快取得胜利，而这就意味着法国将被法西斯国家所包围，甚至可能意味着法国国内正日益增长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也将获胜，结果会使西方对德国的本来就软弱无力的抵抗。更进一步削弱下去。斯大林明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德国向东侵略的道路也就扫清了。

经过一番犹豫之后，苏联领导人决定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干预。前美国驻俄国大使乔治·凯南写道：“这项决定既已作出，他们就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和精力将其付诸行动。”

苏联对西班牙的干预，使朱可夫及其战友能够在战斗中验证红军的装甲战理论，并让俄国坦克一试身手。1966 年，也就是在这些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之后，苏联人在谈到这次援助的时候说：“在战前的年代里，坦克部队同整个苏联红军一起得到了发展和完善，更充分地作好了战斗准备。在那些年代，他们取得了相当多的作战经验。在西班牙战场上、在哈桑湖、在哈勒欣河、在芬兰的森林中——这些地方都是我国坦克部队经受严峻考验的见证。”

《在陆军部队的前卫中》，载苏联《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 15 期（1966 年 8 月），第 39 页。——原书注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于 1936 年秋派遣朱可夫前往西班牙，作为苏联的主要军事观察员之一。同他一起前往的人都是出类拔萃之辈。未来的国防部长 P·R·马利诺夫斯基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名鼎鼎的精明强干的炮兵指挥员 H·H·沃罗诺夫也都去了。苏联驻西班牙军事代表团起初是由 N·别尔津率领的，红军的全部活动都由他负责。战争初期，杰出的坦克专家之一 T·帕夫洛夫也在西班牙，时间大概是从 1936 年秋到 1937 年夏。帕夫洛夫是负责坦克作战的首长，有位观察家觉得他似乎经常在他的司令部里撰写关于他的指战员和坦克作战情况的长篇报告，尽管他费了很多心血，但他对于装甲作

战所作的结论是不正确的。由于在伊比利亚半岛战斗中出现的问题，他认定，在现代战场上坦克无法单独作战。后来他得以说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相信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尽管朱可夫提出了反对意见。红军的被称作“摩托机械化军”的大型坦克部队（每个军约有五百辆坦克）被解散了。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所作的许多努力付诸东流。坦克被降低到只起步兵支援武器作用，坦克部队被编成一些单独的坦克营附属于步兵部队。理查德·劳特巴奇著《这些人是俄国人》，第124页。——原书注

休·托马斯说，帕夫洛夫将军在斯大林面前采取这种立场，也许是要避免被指责为已经失势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理论的钦佩者。见休·托马斯著《西班牙内战》，第615页。——原书注

虽然可以得到的资料没有表明朱可夫在西班牙呆了多久，但他至少是从1936年秋呆到1937年初夏。苏联派驻西班牙的首席情报军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回忆说，他在1937年期间见过朱可夫好几次，而且苏联早年的一部影片里也有朱可夫1936年在巴塞罗那向国际纵队的一批志愿人员发表演讲的镜头。奥尔洛夫进一步指出，朱可夫的职务是最高指挥部的观察员。

苏联在西班牙参战，不仅仅是派遣了观察员，而且派出了由正规部队组成的有组织的部队。图哈切夫斯基对此是反对的，他认为把红军种种不完善的情况暴露出来是鲁莽之举。在苏联坦克部队开到战场以后，红军的作战大多是由坦克部队来完成的。

苏联装甲部队参加了一系列残酷的战斗，有时打得很出色，但也时常吃败仗，损失了一些人员和兵器。不久，德国和意大利进一步扩大了它们的干涉的规模，莫斯科认识到只有大量增加援助，才能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然而西方国家表明，它们之中有的是不愿意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哪怕一点点援助，有的则无能为力。同时，苏联政府也担心可能同轴心国发生战争。于是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终于遭到失败。

这场战争使朱可夫和他的战友们汲取了许多宝贵教训。他们试用了新武器，研究了现代战术一些有争论的概念是否可行。坦克虽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过短时间试用之后，被誉为有前途的武器，但它在快速机动的作战行动中的效果，大体上说仍然是没有经过检验的。西班牙战争提供了这种机会，而朱可夫、帕夫洛夫、A·罗特米斯特罗夫、科涅夫等人前往那里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朱可夫回国以后，接受了新的任命——担任骑兵第3军军长。他担任此职共七个月时间。A·罗特米斯特罗夫——

苏联红军装甲部队高级军官，卫国战争中历任装甲部队旅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员和苏联陆军装甲坦克兵副司令员等职，1962年晋升为装甲坦克兵主帅。——译者注

1938年初，他担任骑兵第6军军长，不久便升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夏天，根据总部的命令，并得到斯大林本人的同意，他离开这个职务，同苏联的一个军事代表团一起，被派往中国去观察日本的战略和战术。这也许不是他第一次东方之行。据说他在二十年代初期，曾同“加林”（B·R·布留赫尔将军的化名）一起到中国去过。布留赫尔——苏联红军将领，第一批被晋升为苏联元帅的五人之一。——译者注

F·F·刘著《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29》，第6、第20、第167页——原书注

这次旅行是苏联卷入中日战争的产物。1937年7月7日，日本进攻北

京以南的芦沟桥，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了。8月2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同意“互相间不单独或同另一个或几个国家联合侵略对方”。到1938年，随着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国联盟的迅速形成，莫斯科开始认为中日战争可以使苏联免遭来自东方的进攻。南京陷落后，日军向武汉推进，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建立了比较密切和友好的关系。

1937年底，第一批苏联飞行员来到中国。接着又派来了一些教官和更多的飞行员、地勤技术人员、炮兵专家、坦克专家和工程师。1938年夏，二十一名苏联高级军官来华。

这一批杰出人物中包括朱可夫、B·N·崔可夫（后来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Q·巴季茨基（后来晋升为苏联元帅）。

苏联在华军事人员不久便达到了一千人，虽然苏联飞行员参加空战相当多，但顾问们大多被派到战地指挥部，在技术问题上提供咨询，不做日常参谋工作，或者在坦克和炮兵训练中心，以及伊宁的航空学校任职。一些苏联军事专家（大概包括朱可夫在内）有时在参谋学院讲课，还有一些人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担任顾问。但在三十年代后期，苏联军事顾问的影响从未达到1924年到1927年间达到过的那样重要的程度。蒋介石说得明白，他指望他们在技术方面提供咨询，而不是制订战略计划。但是有几次，苏联人确实参加了作战计划的制订。苏联驻中国总顾问A·N·切列潘科夫师长协助为一次大规模反攻准备了预备队。1939年秋，在长沙附近打了一次胜仗，苏联人参与制订作战计划，起了重要作用。但大体上说，高级苏联顾问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发挥，因此他们不久就都离开了，只有一个人留下来担任驻华武官兼蒋介石的总顾问，此人就是R·N·崔可夫。

德国1941年进攻苏联时，他正担任此职。鲍罗廷著《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937—1941》，第159页——第160页。——原书注

在中国几乎无用武之地的朱可夫，不久即接到一项更紧急的委任。苏联当时曾一再声明，红军将保卫西伯利亚和外蒙古的领土。日本决心试试这个声明是不是当真的。苏联驻远东的武装部队将要受到考验。斯大林又一次把重大的责任放在他所信赖的T·K·朱可夫身上。

第四章 哈桑湖和哈勒欣河战役

战争悄悄地逼近欧洲，而在远东，日本人也越来越胆大妄为，所以俄国对于自身边境的安全，愈发忧心忡忡了。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阻止侵略的步骤：在沿陆地边界一带挖壕筑垒；沿江沿海，则为沿岸火炮和自动武器修筑火力阵地；在边境地区修建仓库、机场和公路。苏联对它的远东边界尤为担心。所以在此以前就组建了远东方面军，建立了太平洋舰队。1936年3月，苏联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互助条约。

一个时期以来，日本人一直在试探苏联红军的实力，而且往往是超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危机的时候进行试探。1936年共发生三十三起边界冲突，此后又发生多起。这段时间，苏联似乎专心致志应付欧洲事态（慕尼黑危机

和德国的备战)。于是日本决定在满蒙边境对俄国的军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试探。然而，日本发动的侵略，已远远超出一次试探行动的范围了。日本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是想借此提高日本军队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声威”。此外，日本领导人还希望把苏联同中国隔开，从而切断援助通道。

1938年夏，苏联红军占领了阿穆尔河中的两个小岛，日本人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他们撤走。克里姆林宫答复说，这些岛屿属于俄国，并援引早年的俄中条约为证。当双方同意谁都不向有争议领土派出军队时，这次事件似乎平息了。可是，两天以后，日本人派出分遣队在两个岛上登陆。7月中旬，苏联派出小股部队登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扎奥泽尔纳亚山和别齐缅纳亚山。后者距太平洋海岸约六英里，距符拉迪沃斯托克九十三英里。红军指挥部担心日军占领这两个高地，从而对波谢特港造成严重威胁，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7月29日，日满军队发动进攻，在哈桑湖地区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充分利用了对守军极为不利的地形条件——交通线很难防守，守军据守的两个山头背后是哈桑湖，同苏联据守的其余地区隔离开来。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

日军刚一行动，远东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布留赫尔使命令驻波谢特地区步兵第40师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从这个师抽出两个加强营派往别齐缅纳亚山和扎奥泽尔纳亚山。很快爆发了激烈战斗。苏联方面于8月初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布留赫尔把哈桑湖战斗交给远东军区参谋长格奥尔基·什捷伦军长直接指挥，他本人立即开始策划一次进攻。8月6日首先对高地进行了轰炸和密集炮轰，然后苏联步兵发动攻击。8月9日，在双方遭到沉重伤亡之后，战斗实际上停止下来，日军放弃了对有争议领土的占领。翌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来到莫斯科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提议进行谈判。

哈桑湖一战，暴露了苏联远东第1集团军部队动员状况和各级指挥部及参谋工作的种种严重缺点。1938年11月，在伏罗希洛夫指出某些缺陷之后，国防人民委员都总军事委员会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来改善远东部队的战备状态，增强了边界安全。

然而日军并没有因为形势变得对自己不利而罢休。1939年5月，再次爆发了敌对行动。

日本人声称，七百名外蒙古牧民侵犯了哈勒欣河边界。苏联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战役是对俄国实力的新的试探，同时包藏着日本对苏联后贝加尔地区和远东的领土野心。

日军为了集结兵力，着手提高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铁路线的运输能力，并开始修建一条与蒙古边界平行的从索伦到甘珠尔庙的新铁路。他们决定夺取哈勒欣河东岸的蒙古领土。河东岸这块地区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防守力量薄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哨所距边界十二到十八英里，而且附近没有蒙古正规军。根据互助条约驻在蒙古的红军第57特别军的部队，距这块岌岌可危的地区约三百英里。日军立即投入紧张的训练。4月月中，派遣一支特遣队前往哈勒欣河绘制地形图。5月初，日军飞行员开始在蒙古领空进行侦察飞行。

1939年5月11日。日军发动进攻。地面部队袭击了边境检查站，空军则轰炸了山峦起伏的边境上的一支警戒部队。到5月14日，大约三百名日本骑兵已前出至哈勒欣河。派去收复边境的蒙古边防部队被敌机打散。苏联政府为履行它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互助条约，命令驻蒙苏军保卫两国边界。

到 5 月底，日军指挥部在哈勒欣河东岸集结了一支拥有一千“六百多名步兵、九百名骑兵、一小批装甲车和四十架飞机的兵力。蒙军将其骑兵第 6 师调到前沿，而苏军则从坦克第 11 旅调去一个步兵机枪营，加强一个装甲车连、一个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其他蒙军和苏军部队正开往作战地区。

5 月 28 日，日军发动突击，企图从两翼包抄苏蒙军，从后面实施攻击，切断他们返回哈勒欣河渡口的后路。数量上占优势的日军，开头压得苏蒙军步步后退，但很快就被苏军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连挡住了。当晚，苏军步兵第 149 团乘卡车陆续抵达，旋即投入战斗。战斗持续整整一夜。5 月 29 日晨，苏蒙军队发动反击，激战一整天，把日军赶回边界。

两天激战中，击毙了四百名日军官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 1 卷，第 236 页—第 238 页。——原书注

6 月初，朱可夫抵达前线，接管了部队指挥权。7 月的头几天，日军开始集结部队，准备发动一次新攻势。这时候日军兵力约三万八千人，得到一百三十五辆坦克、十辆装甲车和二百二十五架飞机的支援。而保卫哈勒欣河东岸一条四十六英里长的正面的，只有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一名苏蒙军。苏军的装甲车辆较多，共有一百八十六辆坦克、二百二十六辆装甲车，这给朱可夫提供了一次极好机会，来检验苏联坦克的效能，检验各种战术的效果。

日军在拥有三倍于苏军的兵力优势的引诱下，企图包围并歼灭哈勒欣河东岸的苏蒙军队。作战计划规定，用一支强大的部队绕到守军左翼，偷渡哈勒欣河，夺占巴英查岗山，从背后实施攻击。这次攻势是 7 月 2 日发动的。步兵和坦克得以楔进苏蒙军阵地，一直进抵河边，才被阻止。7 月 2 日夜间，日军陆续偷渡到河西岸，次日晨完成了部队的调动。日军在很快占领下一个目标——巴英查岗山以后，继续向南开进，大有包围东岸苏蒙军之势。

朱可夫猜到了敌人的图谋，决定发动一次三管齐下的反突击，即：坦克第 11 旅从北面攻击日军，摩托步兵第 24 团从西北进攻，而装甲第 7 旅从南面进攻。苏军的打击非常突然，日军士兵乱作一团。反突击的效果，为一名日军士官所证实。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

日军三面被包围，但仍死守阵地，拼命企图保住巴英查岗山。他们 7 月 4 日的反扑被红军空军和炮兵部队所粉碎。当晚，苏蒙军各部队对巴英查岗山发动总攻。第二天下午，日军的抵抗被最后粉碎。敌人开始撤退，并企图撤过哈勒欣河，朱可夫投入坦克部队追击敌人。因为日军修的唯一一座浮桥已被炸毁，许多日军官兵在企图泅水送命时溺死水中。

日军暂时受挫，开始策划新的行动。经过两个半月作战之后，苏军指挥部认识到，由于兵力不足，只能进行长期的防御战，此外别无他法，到头来取得最后胜利的很可能是日本人。对此，约翰·埃里克森写道：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从内陆调来部队，并改组指挥部。朱可夫军长看来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被任命为第 1 集团军群司令员，肩负起彻底打败日军的重任。他对这一任务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只能胜，不能败。大批援兵陆续开来，加强了朱可夫的军队。但是，朱可夫有他自己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使他后来成为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总是等到自己掌握了相当大的优势才发动反攻。按发动反攻那天计算，他的兵力与日军相比的优势是：步兵 1.5 比 1、机枪 1.7 比 1、火炮 2 比 1，飞机也是 2 比 1，而坦克则拥有四倍的优势。8 月，苏军拼死拼活地进行对日反攻的准备。到 8 月 18 日，朱可夫几

乎全部准备就绪了。朱可夫写道，他为了进行这次战役所需的物资数量是：炮兵弹药一万八千吨、航空兵弹药六千五百吨、各种燃油、滑油一万五千吨、各种食物四千吨、燃料四千吨，以及其他材料四千吨。这些物资都是沿着一条四百多英里的土路从后方运来的。见朱可夫著《回忆与思考》中文版上册，269页—270页。——原书注

在柴可夫指挥这次战役的时候，苏联同百方国家的谈判以及与此同时对德国人的试探，也在1939年夏天进入了关键阶段。

司令部经过改组，全部苏蒙军都归朱可夫军长指挥。此后又为远东苏军调来增援部队，这两件事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鲁斯兰诺夫写道。

哈勒欣河战役的意义不可低估。当时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次战役的结局。它关系到苏联的国际威信，而且这也是在实战条件下检验新武器装备和新战术的难得的机会。朱可夫深知这项任务也是对他的能力的检验。因此他必须能经得起这次检验。

到8月1日为止，日本人已调来了步兵第7师和第23师（均为全员）三个重炮团、三个骑兵团，还有伪满洲国的一个步兵旅。他们的步兵第14旅也从满洲里抵达；他们还把步兵第1师的所有防坦克炮兵连悉数调到哈勒欣河地域。日军还加强了空军力量，并从旅顺要塞派出一支重炮部队。日军总兵力（包括伪满军在内）为七万五千人，装备着三百零四挺重机枪、五百门多人操作的火炮、一百八十二辆坦克、三百到五百架飞机。8月10日，集结起来的各部队组成日军第6集团军，由获洲立兵将军指挥。他们预定，8月24日在日军占领的桥头堡整个43英里的正面发动总攻，并已修好了出击阵地。

朱可夫开始制订一项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突击敌军两翼，从南面和北面合围守敌，并在敌接军赶到之前迅速歼灭之。补给问题使局面变得复杂了，因为最近的火车站离前线四百六十多英里。在朱可夫领导下，第1集团军群的领导干部们制订了一个由坦克、大炮、飞机和步兵互相配合的协同作战计划。苏蒙军的任务很明确：准备并实施一次决定性反攻，实现全歼侵犯边界之日军的目标。但是，苏蒙军的兵力不足以实施这一战役，因此把一些新部队从大后方调到了哈勒欣河。其中有步兵第82师和第57师、步兵第152师的一个团、坦克第6旅和空降兵第212旅以及一些炮兵团和通信部队等。飞机数目增加到五百一十五架。这些援军的到来，使苏蒙军指挥部掌握了对日军的数量优势。

有趣的是（这也显示了朱可夫的特点），朱可夫采取了一些深思熟虑的迷惑敌人的措施：

为了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到苏蒙军的真实意图，广泛使用了假情报。用无线电发送了有关修筑防御工事和询问施工设备状况的假消息。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模拟打桩的声响，造成正在大修防御工事的逼真假象。部队的调动一概在夜间进行。

夜间出动轰炸机进行轰炸并使用小口径火器连续进行射击，以掩盖坦克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的嘈杂声。总攻前一连十几天，若干辆已拆除了消音器的坦克，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人越来越对苏蒙军车辆的响声习以为常，这样就会在苏蒙军进攻时完全摸不准方向。为此目的，我军的飞机还不分昼夜不断地出动袭击敌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1卷，第240页—第241页。——原书注

朱可夫甚至采取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做法，就是散发《战士防御须知》小册子，将其投到敌方阵地。他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防御阵地。把卡车的消音器拆掉，以掩护坦克的调动。飞行员进行特别侦察飞行以侦察地形，同时派出夜间巡逻队摸清敌方阵地的位置。为了帮助他进行监督和联络，朱可夫在参谋部里配备十二名联络军官。在他准备下令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已经把三十五个步兵营、二十个骑兵连、四百九十八辆坦克悄悄部署到出发地域。坦克当中还有一些新式坦克——T - 34 型的前身。

为了实施包围计划，朱可夫建立了三个集群，即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

南部集群编成内有：步兵第 57 师、坦克第 6 旅、蒙古骑兵第 8 师、摩托装甲第 8 旅、坦克第 11 旅的两个坦克营、一个自行火炮营、防坦克第 37 营和一个喷火坦克连。北部集群的编成内有：坦克第 11 旅、摩托装甲第 7 旅、步兵第 36 师第 601 团、蒙古骑兵第 6 师和防坦克第 87 营。中央集群的编成内有：步兵第 36 师和第 82 师、步兵机枪第 5 旅和两个炮兵团。朱可夫的预备队是摩托装甲第 9 旅和空降兵第 212 旅。

日军打算 8 月 24 日发动攻势，朱可夫则比日军提前四天，于 8 月 20 日抢先动手。这天凌晨 5 时 45 分，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对日军防御前沿、对其就近的预备队以及日军炮兵阵地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空袭。接着在经过炮火准备之后，朱可夫命令部队全线冲击。一名日军士兵的日记证实了这次可怕的突然袭击。他写道：

“炮弹遮天盖地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察所用尽一切办法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结果，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在这次反击中，有一位观察家亲眼目睹了朱可夫所表现的领导能力，后来他向鲁斯兰诺夫作了这样的描述：

朱可夫命令他的一个师进攻日军坚固筑垒阵地，整个战役的结局取决于这次进攻的胜败。可是，这个师败下阵来，损失惨重，而且被敌方人力压得不能动弹。师长打电话报告情况，并请求新的指示。朱可夫命令他再次发起进攻。过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拿起话筒，要这位师长接电话。当朱可夫得知他还没把部队拉上去时，便问：“你到底能不能开始进攻！”师长小心翼翼地表示没有把握。于是朱可夫说：“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叫你的参谋长接电话。”朱可夫又向参谋长提出同样问题。参谋长作了肯定的回答。朱可夫说：“我现在任命你担任师长。”但是参谋长也未能重新发动进攻。当他向朱可夫报告以后，听到了同样的命令：“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朱可夫派他的一名参谋去指挥这个师，而且派出炮兵加强了这支部队，并给予空中支援。

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终于攻克了敌军阵地。他所制订的反攻计划的其余各阶段也都取得了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段故事流传很广。作为斯大林的解决问题的能手，他不断地被派往各地去处理重大而紧急的事态。他很快得到了这样的名声：他是一个对下级行动迟缓、犹豫不决或反应迟钝不能容忍的说一不二的指挥员。在那些充满危险的岁月，对于讲客气、拍肩膀那一套，他是无暇顾及的。下面将会看到，N·巴托夫、A·别洛夫以及其他一些战友后来都谈到朱可夫对他们的态度是严厉的。

朱可夫还开始表现出另一种品质。他在强大的压力下，能够保持沉着

镇定，同时表现出对战局的发展胸有成竹。美国军事记者理查德·劳特巴奇所描写的朱可夫在哈勒欣河战役中的一次表现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写道：

在蒙古草原上一座名叫哈马尔达巴的灰绿色的山岗上，有一座墙壁很厚、而且一大半埋在地市的碉堡。在碉堡里，一群苏联军事记者围坐在一架很旧的铁炉子周围休息。

一位体格健壮、肩膀很宽、方头大脸的男人，大步流星走进来，加入了这个非正式集会的圈子。记者们尊敬地向他打招呼，称他“将军同志”。这位将军同志刚刚洗过晨浴就来了，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的情绪好极了，一面换衣服，一面同记者交谈。

突然，两名红军侦察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屋来。他们十分焦急地报告说，日军正在集结大部队，显然是要准备进行一次反突击。记者们马上振作起精神，以为将军同志一定会慷慨激昂、干脆利落、简洁明瞭地下达命令。可是，将军听了这个消息，显出泰然自若的神态。他一边穿制服，一边不动声色地告诉侦察员说，这样一种反突击是完全不可能今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发动一次有效的攻击。

他的话立即使碉堡里的气氛为之一变。侦察员们在纳闷，他们自己的眼睛怎么会看错了呢，而记者们则纳闷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听错了呢。大家都觉得十二分放心。既然将军说了，那么他说的是决不会错的。

总攻的第一天，南部集群打了大胜仗。到8月20日，北部集群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到达坚固筑垒的帕列次高地的山巅，但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被迫后撤。

苏蒙军在第一天战果的基础上，继续在日军防线内顽强战斗。在南部集群的地段上，坦克第6旅和摩托装甲第8旅包围了敌军侧翼，8月21日占领了在海拉斯台音河（哈勒欣河的一个支流）南岸活动的日军后方的地域。这一天，南部集群的步兵部队深深楔入敌人主要防御地区，歼灭了敌人就近部署的战术预备队，占领了若干炮兵阵地。但是，战斗打得很艰苦，每个火力点都要强攻夺取，有时候还要出动喷火坦克。苏联飞机特别活跃，积极地支援地面部队。仅8月21日一天，轰炸机就出动二百五十六架次，投下了九十多吨炸弹。

8月23日，北部集群得到空降兵第212旅的加强，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夺占了帕列次高地。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六百名日军士兵毙命，战壕里、掩蔽部里，横七竖八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

朱可夫的合围计划只用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接着便开始了歼灭被围日军的战斗。8月26日，日军的一次解困企图被打退，主要是靠坦克第6旅打退的。8月27日，日军的突围企图也被粉碎了。空军部队成功地阻止了敌人向作战地区调集新的预备队。仅8月24日和25日两天，苏军飞机出动了二百一十八架次，进行了十次空战，击毁日机七十四架。

朱可夫是个急性子，他不允许采取将敌人团团围困，迫使其投降的消极办法，而是发动一系列进攻，不断地消灭敌人。南部集群承担主攻任务。它在8月27日发动的进攻，成功地夺取了沙山和绿色高地，扫清了海拉斯台音河南岸。与此同时，从背后和两侧对雷米佐夫高地发动了进攻，但直到8月31日才终于占领了这个地区。

在这次攻势的最后阶段，朱可夫再次表明他是个足智多谋的将领。海拉斯台青河很浅位而且到处是泥淖，敌军指望它能够保护雷米佐夫高地的南

翼。但是，使日军沮丧的是，朱可夫命令工兵部队趁黑夜加固了河床，使苏军坦克部队可以从这个方向发动进攻。

一天夜间，苏军坦克突然冲过河来，粉碎了日军防御，并开始巧妙地肃清孤立的抵抗据点。到6月31日晨，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已经全部被肃清。

只要对这个地区从5月到9月的整个作战行动进台一次估计，就一定会看到。朱可夫是组织这次反攻和使苏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主要推动者。事实已经证明，他是一个严格安求部下执行他的命令的指挥员，可是，如果他确信能够达到预定目标，他也能够把严格性同战术灵活性结合起来。他的这种能力，表现在他能够集中具有战术优势的兵力上，表现在他的大胆的、成功的合围计划上，表现在他歼灭被围之敌所采取的进攻性的、但却是随机应变的方法上，表现在他组织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协同作战和正确地调配现代化武器，以及结合实际情况决定进攻手段等方面。凡此种种，其结果乃是苏军的全面胜利。

如果苏联方面公布的数字是可信的，那么只要比较一下双方伤亡数字，就能换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朱可夫作为一个指挥员的才干。在整个战役中，苏军的伤亡是一万人，而日军则损失了五万二千到五万五千人。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1卷，第241页—第244页。——原书注

1939年9月15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方，日本为一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协议，要求9月16日以前停止哈勒欣河地域的一切战斗行动。双方同意交换战俘，并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哈勒欣河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之间的边界。日本当局似乎受到一次痛苦的教训，于是双方都采取步骤来维持和平。从1941年4月1日，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企图从中破坏），直到1945年苏联出兵满洲以前，两国一直避免进攻对方。

打败日本军队以后，苏联人开始大谈特谈苏联已拥有成功地使用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协同作战的新型军队。日本人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们不了解苏联已将其摩托化部队装备到何种程度”，而且这一出乎意料的事态发展使他们大为震惊。尤其是这次战役，已向日本人证明。苏联大多数地面部队，特别是炮兵和装甲兵，在火力和机械化程度方面远比日军优越。后勤方面也是引人注目的。日本人对于苏联向距离铁路终点站四百多英里的战场输送并储存作战物资的能力感到十分惊讶。“苏联军队摈弃了沙皇旧军队的因袭守旧的一套作战方法，已经表明它能够依据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改变战术”。

T·H·谢沃斯季亚诺夫著《哈勒欣河事变时期日本军步和外交的失败》，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7年8月号，第63页—第64页。——原书注

林三郎著《皇军：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军队》，第15页。——原书注

另一个出人意料之处是苏联人就地取材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先前的战斗中，俄国坦克很容易被日军象投手榴弹那样投出的汽油燃烧瓶击中着火。不久以后，苏联人开始用柴油作燃料，而且在坦克外面罩上铁丝网，这两项措施就使燃烧瓶不大会击中这些坦克了。但是，俄国军队并没有丧失它传统的著名品质，特别是它的顽强精神。日本人评论说：“苏军比原来预料的还要顽强。”

尽管朱可夫使用装甲部队打了胜仗，但苏联人发现 T - 26 型和 T - 28 型坦克有某些缺点和缺陷。此后，苏联研究设计了一个新的装甲车辆序列，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 T - 34 型坦克。

朱可夫经受住了哈勒欣河战役的严峻考验。他和他的部队表现出比预料的还要顽强，而且一些军事理论和装备在实战条件下得到切实的应用。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备受嘉奖和礼遇。斯大林怀着感激的心情，亲自向他表示祝贺，他还荣获了苏联英雄称号。

H·斯维特利申写道：

在 T·K·朱可夫指挥的这第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中，他显示了他的领导能力——组织战役并在短时间内彻底打败一个强大敌人的能力。苏联政府自豪地赞誉朱可夫的成就。

1940 年 6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命令，提前晋升朱可夫为大将军衔。不久，他被任命为苏联最大的军区之——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

可是，朱可夫从远东回到莫斯科也遇到一件使他非常失望的事。长久以来，他一直确信，坦克能够在战场上起独立的作用。同炮兵和摩托化步兵协同作战，坦克能够进行纵深突破，从而能够打乱敌人的部署，冲破它的防御。在哈勒欣河地区，他没有允许他的装甲部队单独作战去夺取孤立的据点，但他的坦克部队在航空火力的支援下，比较深入地突进了日军的防御阵地。他回到莫斯科时，发现红军指挥部要把七个机械化军全部解散，把坦克配属到各个独立步兵营作为支援武器。

尽管朱可夫和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表示反对，这一决定还是付诸实施了，因为装甲战专家帕夫洛夫以苏联坦克在西班牙表现很糟为依据，说眼斯大林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相信了坦克在现代战场上不能独立作战的论点。后来，只是在德国坦克部队在西方取得引人注目的战绩，证明装甲部队能够独立作战以后，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的观点才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时苏联军事计划人员面临着非常紧迫的任务：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来重建大型的坦克集群，因而没有多少时间去解决种种训练问题和为这些新的坦克兵团提供装备的问题。

第五章 暴风雨前夜

朱可夫大败日军凯旋莫斯科之时，欧洲时局已经发展到爆发危机的严重地步。1938 年 2 月，希特勒警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舒施尼格说：“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那么法国呢？……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一个月以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摇摇晃晃、声音隆隆地越过了边界”，但在途中，不少装甲车辆发生故障，很狼狈了一阵子以后，才占领了维也纳。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国人确信英法不会介入，便入侵了“慕尼黑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完成了对这个年轻国家的肢解。接着，希特勒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东方。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版，第 1 卷《风云紧急》，上部，第

2 分册，第 388 页和 400 页。——译者注

事态在急速发展着。希特勒在 4 月 27 日的一次讲话中，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废除德国同波兰的互不侵犯条约。

在斯大林发表了苏联不想为西方国家“火中取栗”的著名讲话以后不久，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于 8 月 23 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德苏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一份“秘密附加议定书”中，德国人和苏联人在东欧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波兰，势力范围是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界的。但是，在条约签字八天之后，德军就向波兰发动了进攻。到 9 月中旬，德军已占领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大片地区。苏联领导人为保护本国利益，不得不比原来预料的更加仓卒地采取行动。所以，苏联军队于 9 月 17 日越过了波兰—苏联边界。

欧洲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正值朱可夫在蒙古边境大获全胜之时。哈勒欣河战役结束，朱可夫回来担任了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苏联军队攻入波兰的十二天战役，“解放了”一千二百多万人民，占领了十九万平方英里土地。它是由集团军司令员（二级）M·科瓦廖夫指挥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由集团军司令员（一级）C·R·铁木辛哥指挥的乌克兰方面军进行的。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朱可夫未能按时去就任新职务，因而也就未能有效地参加这次短暂的战役。

朱可夫在远东取得的经验，无疑在红军领导人 1939 年底制订的新的野战条例中得到了反映。新条例是以下述前提为基础的，即各兵种协同作战，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首要条件。只有使用这种办法，才能在敌人的防御纵深内打败敌人。条例强调了部队再补给和后方勤务的重要性，就象强调缜密的作战计划、不间断地控制部队以及出其不意的必要性一样。既然许多指挥员对于恰当地使用预备队、对于梯次配置原则、对于作战编成问题似乎都很不熟悉，新的条例中自然就阐述了这些课题。师的进攻正面稍微作了变动。

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加强师的平均正面宽度减少到三千三百码。第一梯队步兵营进攻正面规定为四百五十到六百五十码，比“1936 年条例”规定的大约六百五十码到一千一百码有所减少。研究小组研究了远东的作战之后，强调指出，每英里正面必须配备有效数量的火炮。不包括远程武器在内，火炮数量从三十门至三十五门增加到三十五至六十门。

虽然人们为了制订“1939 年条例”费了很多心血，但这个条例始终未能公诸于世。因为欧洲发生的军事事态已使它大大落后于形势，不得不彻底地重新加以研究。苏芬战争结束后，在布琼尼元帅的监督下，重又着手制订条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再次推迟了。

1938 年 4 月，苏联开始向芬兰施加压力，要它允许苏联在芬兰的苏尔萨尔岛构筑工事。

1939 年 10 月，双方重新恢复谈判时，苏联代表说，鉴于欧洲战争，不能允许敌人有机会进入芬兰湾。为了保护列宁格勒，边界的位置必须予以改变。芬兰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于是谈判破裂。

莫洛托夫警告说：“我们文职官员无法再去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该让宰方行使他们的发言权了。”

在苏联向芬兰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宣传攻势，并指责芬兰人向苏军发射若干发炮弹以后，红军于 1939 年 11 月 30 日开进了芬兰。

战争最初几周，芬兰人使苏军遭受了重大伤亡，R·A·麦列茨科夫将军的

攻势进展缓慢。红军在芬兰未能迅速赢得胜利，暴露了苏联军事机构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坦克兵、炮兵、步兵之间缺乏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曾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那种配合。但是，12月28日苏军重新编组了各集团军，下达了新指示。1940年2月初，俄国的攻势终于开始形成。2月11日，苏军粉碎了曼纳海姆防线的一些地段。芬兰的防御逐步瓦解。3月12日，精疲力尽的芬兰人认输了。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朱可夫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总参谋长，暂时代替生病的沙波什尼科夫。

在“冬季战争”（参加这次战争的红军部队达一百二十万人）结束以后，苏联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这次战争中暴露出来的许多缺点。伏罗希洛夫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后，中央决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总军事委员会会议。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以及参加过这次战争的师长和高级军官、各军区、各军事学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于1940年4月14日到17日举行，作出了一系列结论。从步兵部队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武器装备以及在严寒条件下如何恰当地使用它们了解甚少。需要更多的自动武器和迫击炮。需要更好的通讯设备，特别是无线电通信设备，是必不可少的。部队的编制也不能令人满意。步兵师机动性差，后方勤务的指挥很困难。开始时，步兵不会穿滑雪板打仗，只是在仗打起来以后，才组建了滑雪特别营、滑雪工兵部队和马拉雪橇医疗队、运输队。在芬兰作战的经验还表明，必须有更好的冬装、更好的车辆预热器和掩体用火炉。机动运输部队也被证明是组织得不好的，备件供应不上。筑路部队不能满足需要，交通指挥勤务也不足。

不可宽恕的错误之一是，司令部未能查明卡累利阿—芬兰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未能查明芬兰军队的编制、武器、训练和装备情况。红军军官对于曼纳海姆防线的位置及其筑垒情况，只有很一般的了解。对于如何攻克钢筋混凝土工事缺乏经验。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以及在波兰所取得的经验，没有传达给这些部队。步兵部队的教练搞得很差。没有教练步兵班和步兵排掌握在堑壕和在森林中作战的基本要领，没有教练它们掌握包围战术以及侦察和伪装的要点。

会议的结论说，在芬兰取得的胜利，使苏军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过高的牺牲。苏军的武器、部队的编制、训练和教练工作，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进。斯大林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讲了话，激励与会者研究现代战争，要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总军事委员会责成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研制新武器和作战装备，以取代陈旧过时的武器装备。总军事委员会特别要求制造出更好的飞机、更好的坦克和更好的通信设备。

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要对部队的训练、管理和编制作重大的改革。制定了步兵、装甲兵、炮兵和特种部队的编制与装备表。

委员会的另一项决议恢复了原来实行过的将军军衔和元帅军衔。朱可夫、麦列茨科夫和 N·B·丘列涅夫被任命为大将。铁木辛哥被任命为元帅，并接替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而伏罗希洛夫则被提升为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

朱可夫晋级以后，受命指挥兵多将广的基辅特别军区。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评价说：“朱可夫接替铁木辛哥的职务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劳特巴奇写道：

朱可夫在基辅任职期间，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行政管理才能。他花费了很多精力，根据同日军作战和苏芬战争的经验，草拟了改革红军的各种计划。从这时起，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负责人，同时也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而崭露头角。他的指示，是出自一个充满自信并深知自己已被上司授予全权的人的指示。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希望他参与领导，而他也是这样做的。

朱可夫讲话变得放线了。他竟指扬起各军种中的政治委员制来了。他青告说，要打胜仗，不仅要靠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也要靠红军指挥员的辛勤工作。朱可夫的地位提高了，他的能力也已表现出来，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朱可夫讲话为什么越来越大胆。如果他认为他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他肯定是不敢指摘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的。

无论如何，人们又重新谈论起“单一首长制”这个题目了，而朱可夫则是最主要的和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之一。苏军在 1918 年至 1942 年曾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三次实行“单一首长制”。

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的时间分别是 1918 年、1937 年和 1941 年；三次实行“单一首长制”的时间是 1925 年、1940 年和 1942 年。——原书注

朱可夫指责说，许多高级指挥人员未能很好地训练较年轻的军官。他要求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军事史和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军事传统。他最后警告说，已经复杂化的国际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提醒人们要警惕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可能出现的“诡计”。他的听众知道他指的是德国人。朱可夫懂得苏联必须通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来争取时间，但他私下总是预言苏德之间必定会发生战争。他主张使俄国西部的红军部队保持全面动员状态，以便使部队在敌人发动进攻时不致措手不及。

1940 年 6 月 28 日，苏联军队在朱可夫指挥下分两个梯队开进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第一梯队是机动部队，由坦克部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第二梯队则是由一些步兵师组成的。虽然罗马尼亚军队接到命令，要他们有条不紊地后撤，但仍有许多士兵放下武器。

6 月 30 日，红军部队到达普鲁特河岸，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很快就被苏联控制了，朱可夫在切尔诺夫策建立了司令部。在夏季晚些时候，仍然指挥着基辅特别军区的朱可夫得到了他的奖赏；他作为军区的代表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比萨拉比亚当时同于罗马尼亚。北布科维纳，当时除最北都一小部分属于波兰外，亦属罗马尼亚。——译者注

1940 年 12 月到 1941 年 1 月初，最高指挥部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接着进行了图上军事演习。据叶廖缅科元帅说，这次会议“对于提高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在战术、战役学、战略、各兵种的进攻战和防御战方面的训练水平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得到了斯大林和整个国防机构的关心。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审查 1940 年的全部军事和政治准备情况和本年度任务的组织安排。总参谋长 R·A·麦列茨科夫大将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影响战斗训练的一系列问题的报告，特别指出了步兵的机动能力问题。他在谈到防御能力时，对于苏军指挥人员仍然未能表现出估量战局和组织战场情报工作的能力表示遗憾。他特别赞扬了朱可夫的基辅特别军区的炮兵部队。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就提高红军训练水平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其

中一共有二十八名将军提出了建议。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探讨军事艺术的理论问题。会上作了五个非常适时的报告，其中包括朱可夫所作的《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

朱可夫的报告，特别是他对于大规模使用机动部队的论述，引起了与会者很多有益的讨论。最高指挥部的人员，对朱可夫所做的结论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意见，他们关注的是这种作战的细节，例如用于扩大突破的集群的编成、战斗序列的结构、地域宽度、摩托化部队投入突破口的时间、摩托化部队同空军的协调，以及机械化部队在敌军防御的战役纵深独立作战时对部队的控制和后勤支援问题等等。这样，会议接受了朱可夫关于机动部队作战问题的广泛的理论，并且用了很多精力来制定此种作战的细节。

这次会议于1941年1月11日结束。会议结束后，在国防人民委员C·R·铁木辛哥领导下，又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对抗军事演习。朱可夫应邀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的基本目的，是要帮助参加者掌握战略性作战行动的原则；确定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战场；教练高级指挥人员在复杂的条件下，对各种情况进行估量并作出决定；就大规模使用炮兵部队、坦克大部队和空中力量的现代进攻战役如何实施，统一人们的认识。

A·N·叶廖缅科著《战争初期》，第34页—第35页。——原书注

演习的参加者之一M·N·卡扎科夫在他回忆录中写道，实际上进行了两次演习，一次是在西方方向，另一次是在西南方向。一方（东方）是由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I·P·帕夫洛夫和B·E·克利莫夫斯基指挥的。对立一方的军队由朱可夫和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司令员I·H·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双方都煞费苦心企图用突击部队实施深远突破，以便击败敌方重兵集团。在演习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双方都未能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提供足够的兵力。依靠削弱战线上战斗不激烈的地段的部队，才使主攻方向上的兵力占有优势。

M·N·卡扎科夫回忆录《昔日会战图》。第60页—第61页。以下引语亦引自该书。——原书注

演习结束后，出现了“某种不正常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演习结果不是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者总参谋部来讲评，而是由参加者本人，即T·R·朱可夫和I·P·帕夫洛夫来讲评。讲评结束，军区司令员们准备立即离开莫斯科，可是所有的人突然于五月13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进行了第二次讲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委员都出席了。其中，军方的代表有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各军种司令员和一些军区的司令员。麦列茨科夫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特别受到重视，开会地点就是一个证明，而且所有与会者对作为这次军事演习的结果而将采取的防御措施极为关心。卡扎科夫说，可惜的是，麦列茨科夫的报告缺乏条理，前后不连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各种材料未能完全准备妥当。麦列茨科夫试图凭记忆来作报告，所以有好几次他的结论和建议脱离了实际情况。他对野战条例草案的解释也招致批评。譬如，他说：

在起草野战条例时，我们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即我们一个师同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个师相比，要强大得多，因此在发生遭遇战时，它毫无疑问能够打败德军一个师。

在防御时也一样，我们一个师将能够打退敌军两三个师的冲击。在进攻时，我们一个半师将攻克敌军一个师的防御阵地。

当表列茨科夫开始叙述刚刚结束的两次演习中的第一次演习时，特别是当他说到拥有六十到六十五个师的东方（红方）成功地突破了西方（蓝方）及其五十五个师的防御时，在座的人都不安起来。斯大林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兵力优势这么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此处似有误。据朱可夫回忆录说，他当时被指定为演习中的“蓝方”（西方），假定是发动进攻的德军一方。帕夫洛夫被指定为演习中的“红方”（东方），假定是进行防御的红军一方。双方兵力是：西方六十多个师，东方五十多个师。演习结果是红方失利。朱可夫还指出，这次演习的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非常相象。——译者注

麦列茨科夫的回答不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回答。他说：东方部队从战线上“战事较少的”地段抽调部队，使它获得了“局部”兵力优势。

斯大林立即反驳道：“在我们这个使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时代，‘局部’兵力优势不能保证进攻一方获胜；实施防御的敌军，拥有同样的机动手段可供使用，能够在短时间内变更部署，加强遭到威胁的地段的兵力，这样也就抵消了进攻者建立的‘局部’优势。”

当麦列茨科夫开始叙述第二次演习时，斯大林用挖苦的语调问道：“唔，这一次谁胜了呢？可能‘红方’又胜了吧？”

表列茨科夫企图避免直接回答问题，毫无说服力地说什么在军事演习中不会出现明确的胜负，讲评人只是估量一下双方的行动是否正确。卡扎科夫回忆说：“这一招未能奏效。”麦列茨科夫被告知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还是想知道参加演习的哪一方是胜利者。”表列茨科夫未能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报告完毕以后，斯大林讲了话。他的话直截了当，切中要害：

可能，在条例的宣传材料中应该写上我们一个师在遭遇战中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师。而在进攻时，一个半师能突破他们一个整师的防御。可是在在座的这些人的圈子里，在未来的方面军司令员们和集团军司令员们面前，就必须讲讲实际的能力是怎样的。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令人十分难堪的插曲。副国防人民委员 T·N·库利克在会上发言，要求把一个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一万八千人，要求用马匹牵引（炮车）。在一问一答中，暴露出他对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的无知。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他，并对铁木辛哥说。

“只要对于摩托化和机械化存在着如此混乱的看法，你们就不会有摩托化和机械化。现代战争是一场摩托化的还争——在陆地、在空中、在水上和水下都是如此。”

卡扎科夫写道，斯大林对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这批评就象一只飞去来器，击中别人，又飞回来击中了他自己”，因为1939年11月21日作出解散坦克军的决定时，斯大林也参与了决策。

在朱可夫、帕夫洛夫等人发言以后，会议宣告结束。会议参加者的心情可说是苦乐参半——他们对于红军进一步机械化的前景感到满意，为总参谋部的报告感到难堪。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傍晚，苏联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命，朱可夫担任了总参谋长，而 M·基尔波诺斯上将接替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麦列茨科夫被调到作战训练部，显然是对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前表现

糟糕的惩罚。朱可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以后，再一次得到了荣誉——1941年2月，他当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更加恶化了。朱可夫立即着手加速实施由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发起的对军事机构的改组，清除不称职的军官，谴责他所看到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普遍地提高了全军的状况。

1941年3月8日，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更明确地规定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内部分工。对苏联红军的领导，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通过总参谋部（朱可夫）和若干个总部来实施。朱可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因而他不仅领导总参谋部，而且负责监督通讯部、燃料供应部、空防部以及总参谋学院。此外，准许两名副人民委员——朱可夫和布琼尼直接去见政府领导人，洽谈有关国防机构的种种问题。

这年2月23日，恰逢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朱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述了红军取得的进步。他写道：“人员、武器、军事思想——这是一支军队的三个基本要素。”他还指出红军现在正迅速充实这些要素。关于哈勒欣河战役，朱可夫说，苏联军队在那里经受了“严峻的长时间的考验”。他说，芬兰战役，是一次严重考验，而粉碎曼纳海姆防线，“是迄今为止通过大规模强攻，”突破现代化永久筑垒地域的唯一战例。”然而，朱可夫并未一味赞扬，他也提到一些缺点，他说：

可是，我们如果让胜利迷住了眼睛，对于我们在士兵训练方面已经暴露出来的缺点视而不见，那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这些缺点是由于训练方法中普遍存在的因循守旧和墨守陈规造成的。在战争的初始阶段，这些缺点显露出来，自然就对作战产生了有害影响。 劳特巴奇著《这些人都是俄国人》，第127页—第129页。——原书注

朱可夫在指出1940年8月恢复了军官“单一首长制”之后，进一步强调了单一指挥的必要性。他想方设法扩大指挥员的权限，提高他们的权威，进一步加强军纪。他极其重视官兵之间的良好关系，强调指出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他警告说：“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我们周围激烈地进行着。由于我们重建了军事训练制度，我们取得一些不容置疑的成绩。训练是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我们提高了我军的战术水平。可是，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自满自足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同上。——原书注

在此期间，希特勒对斯大林越来越绝望了。虽然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会见里宾特洛甫时，提到了苏联打算占领比萨拉比亚，但他没有提到苏联也打算占领布科维纳。希特勒对事态演变很不满，因而德苏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了。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率代表团到达柏林，这是一位苏联政治家首次访问纳粹德国。

莫洛托夫说，俄国希望德国停止在芬兰的一切军事行动，承认苏联在巴尔干的利益以及在波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基地…… 乔治·凯南著《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与西方》，第339页—第343页。

——原书注

陪同苏联代表团前往柏林的两名翻译之一瓦连金·别列日科夫在《新世界》杂志上著文描述了这次访问。他写道：莫洛托夫问希特勒为什么向罗马尼亚派遣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为什么不同苏联政府商量（1939年条约

规定，在涉及双方利益的重要问题上要进行磋商）。而且，为什么德军开进了芬兰？别列日科夫说，这些话就象给这位“元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甚至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好一阵子，可以看见他脸上露出一副窘态”。希特勒镇静下来以后才说，派代表团去罗马尼亚是应安东奈斯库政府的邀请去训练罗马尼亚军队的。至于芬兰，德军不打算留在那里，而是假道芬兰去挪威。莫洛托夫反驳说，作为那种代表团来说，在罗马尼亚的德国部队太多了，而在芬兰，德军并未继续前进，显然是准备长期留驻的。

第二天，莫洛托夫继续追问芬兰问题，因而会谈越来越激烈了。莫洛托夫坚持要讨论希特勒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使这位“元首”恼怒了。所以当他提出要德意两国作出保证的时候，希特勒终于忍不住大喊大叫起来。后来会谈重新开始时（会谈是在里宾特洛甫的安全可靠的掩蔽部里举行的，因为当时正发生一次空袭），这位苏联代表又追问，关于德国在罗马尼亚和芬兰驻军背后的目的，什么时候能够作出解释。这时里宾特洛甫毫不掩饰他的愤怒，回答说，如果苏联继续关心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应当通过通常的外交途径来讨论它们。第二天俄国人离开了柏林。里宾特洛甫是到车站为他们送行的唯一高级官员。

两周以后，即1940年11月26日，苏联政府在给柏林的一项外交照会中重申了它的要求。对于这项照会，德国未予答复，相反，在几周以后，即在1940年12月18日，怒不可遏的希特勒下达了一项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的命令。命令开头是这样的：“德国武装部队必须作好准备……在一次迅猛的战役中摧毁苏维埃俄国。”

实际上，希特勒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作出了关于进攻苏联的决定，而苏联在1940年秋天的顽固态度，只是使他确信他必须着手实行他的计划而已。据里宾特洛甫说。自从1938年以来，希特勒就担心英美对德国开战，而一旦俄国同它们联合起来结成一个联盟，德国将面临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困境。因此，这位“元首”决意向苏联发动进攻，坚信他能够在几个月之内处理掉俄国这个威胁。可是，希特勒仍然忧心忡忡，他的外长里宾特洛甫记载了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不晓得，一旦我们真的不得不开通向东方的大门时，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力量。”里宾特洛甫著《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第240页。——原书注

从1939年8月14日到1942年9月24日，担任德国陆军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曾一直记私人战时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希特勒作出跟俄国交战决定的情形的明确记载：1939年10月18日，“元首”向他的陆军下达指示说，已被征服的波兰领土应该看作是“德军未来的军事行动的集结地域”。过了若干星期以后，希特勒又鼓动他的一些迟疑不决的将军们向西进攻，说只有德军在那里（即在西欧）获得了自由，他才能够去攻打俄国。1940年7月，哈尔德写道：希特勒认为，如果德军不进攻英国的话，这年秋天就可以进攻苏俄。这位“元首”指示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为入侵苏联作好准备。

7月31日，在贝格霍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向他的陆军首脑们首次宣布了他的关于进攻俄国的决定。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记录了这位“元首”讲话的哈尔德的日记表明，随着入侵英国的前景正在消失，希特勒不仅作出了在1941年春进攻苏联的明确决定，而且还制定出他的主要战略目标：“英国的希望寄托在俄国和美国身上。如果使寄托在俄国身上的这种希望破灭，

那么寄托在美国身上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因为俄国被消灭就会大大增强日本在远东的实力。”希特勒确信，英国继续作战的顽强决定是以苏联最终将参战为依据的。希特勒接着说道：

英国出现了某种怪事！英国人眼看就要完全倒下去了。可现在他们又重新站立起来。

我们截听到他们的谈话。俄国对西欧迅速发生的事态感到烦恼和不安。

俄国只需向英国暗示一下，它不希望看到德国过份强大，那么英国就象一个溺水的人。将重新燃起这样的希望，即整个战局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一定会完全改观。

可是，倘若俄国被摧毁，英国最后的希望也就破灭了。那时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各国的主人。

决定：鉴于上述种种考虑，必须在 1941 年春消灭俄国。

越早摧毁俄国越好。 弗朗茨·哈尔德著《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私人战时日记》。——原书注

双方开始为在军事上摊牌而进行秘密准备。德国借报部门在边境一带积极活动。苏联人士说，从 1939 年 10 月到 1941 年 6 月，德国侦察机在整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上空飞行达五百多次。苏联最高指挥部严禁边防部队向入侵的飞机开火，显然是由于担心酿成爆炸性的边界事件而被德国指责为挑衅。

苏联的计划执行得太小心、太缓慢了，因而苏联的军事机构未能作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这是谁的疏忽呢？苏联的说法是，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在近期内”不会撕毁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他把德国为发动进攻而进行的种种准备仅仅看作是一种挑衅。他觉得，苏联人如果对德国人在边界上的活动作出反应，那么希特勒就有了借口来撕毁条约并向俄国发动进攻。据《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说，斯大林心里非常担心刺激希特勒，以致“当边境地区的一些军区的司令员们要求授权他们把部队部署到边界一带的防御阵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准备时，他们的要求都被他拒绝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还斥责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说他们“不大明了正在发展变化的军事—战略形势，未能得出应当得出的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武装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结论。”

然而，在确定责任的时候，人们必须记住斯大林是不肯相信希特勒会很快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的。1941 年 4 月，丘吉尔警告莫斯科说，德国将发动进攻，但这个警告未能奏效。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的表现是前后一贯的。他显然希望，只要他坚持要求德国人讲信用，他就能使苏联在 1941 年免遭战祸。

还有一些人曾对负责的苏联官员发出过警告。在那些紧张的月份里，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的瓦连金·别列日科夫回忆说，4 月底他应邀出席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杰斐逊·帕特森的一次鸡尾酒会。帕特森在打过招呼之后，表示希望别列日科夫会见出席酒会的一位客人。接着把一位德国空军少校介绍给别列日科夫。

接近傍晚时分，当少校同别列日科夫两人单独呆在一起，离其他宾客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这位德国军官对他说：“有件事帕特森希望我告诉你。实标上，我不是到这里来休假的。我的中队被从北非召回来，昨天我们接到命令要调到东线，到罗兹地区去。也许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我知道

还有许多别的部队最近也被调到贵国边界地区。

我不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个人不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出什么事。当然，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机密。”别列日科夫大吃一惊，但他首先表示感谢他提供这个情报，然后说他认为德国将会遵守在不侵犯条约。别列日科夫先写道：“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挑拨”不过，他到底还是在苏联大使用的例行通报中向国内报告了这次谈话。见瓦连金·别列日科夫著《希特勒入侵前夕》。——原书注

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和他在军事机构中的同事们不愿就希特勒的意图问题，去同斯大林争辩是并不奇怪的。

二十五年以后，朱可夫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承认他本来应该尽一切力量来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眼看就要发生的事态。他对为他写传记的作家H·斯维特利申上校说：“也许我没有用足以使人信服的方式向斯大林证明使我军进入战斗准备的必要性，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推卸我的责任。”但他知道。即使他那样做，也是徒劳的，所以赶忙补充一句：“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他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朱可夫只能设法说服，但最后决定当然还是由斯大林来作的。

对于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缜密研究的亚历山大·沃思说，斯大林确信同纳粹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1942年爆发，苏联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使德国不在1941年秋季以前发动进攻，到了秋季，德国就是想要在这一年入侵也来不及了。见亚历山大·沃思著《俄国在战争中，1941—1945》，第122页—第123页。——原书注

事实上，红军在1941年春夏所进行的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准备工作，正是在朱可夫当了总参谋长以后——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说，对总参谋部的批评有哪一条是有根有据的，那就是总参谋部的成员们只是埋头研究不久前才结束的芬兰战役的经验，而对于1939年和1940年欧洲战事的进程没有给予足够密切的注意。实际上，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的六个月期间，在军队领导人的看法中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苏联元帅N·X·巴格拉米扬写道：

一派入，一味地试图用国内战争和西班牙事件的有色眼镜来观察未来的战争……另一派人，虽然从西欧发生的战争中得出了正确结论，显然希望预先采取措施阻止事变的发生……这些人试图按照红军最早能在1942年才会拥有的兵力和装备来制订作战计划。

试问倘若战争马上就打响，那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巴格拉米扬写道。T·R·朱可夫一直专心致志地对德国的威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抱着一种紧迫感来采取行动。有一次，朱可夫对巴格拉米扬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些不仅在指挥诸兵种合成部队方面。而且在战役问题上训练有素的指挥员。”

那是1940年9月，巴格拉米扬被朱可夫召到基辅验别军区。从一他俩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受训算起，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巴格拉米扬描写了他与朱可夫的重逢，准确地勾划了这位已经肩负起如此重任的人的一些特点。他写道：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的样子没怎么变。他确实仍旧非常壮实，他的头发略微稀疏了些，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于是乎他面部的表情也显得更加严肃了。然而，在这十五年中。他的成就比他的同班同学都大得多。但他的成就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在战前岁月里扶摇直上的所有杰出军事指挥员当中，他无疑是最有才干和最有天赋的。我们一起在列宁格勒受训期间，在所有同学当中，他是出类拔萃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具有达到确定目标的钢铁般

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具有独到的见解。在我们进行演练的时候，他常常是出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问题而使大家感到惊异。他的决定总是引起很大争议，而他通常总是能够用新奇的逻辑来论证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很了解他的才能，所以我对他在军事上的业绩并不感到目外，而他的业绩即使在当年来说也是引人注目的。与战前时期的一些军事领导人不同，T·R·朱可夫不仅具有在经受军事上严峻考验的岁月里一个军事指挥员不可缺少的军事才能，而且具有坚定的性格，他对那些敷衍塞责的人是决不留情的。可是，由于他的杰出的思想和高度的智慧，他对部下的要求虽严，但极少象当时很多军事首长和样动辄采取怒气冲冲的粗暴态度。只是对于那些无所事事之辈来说。他才是个可怕的人。”见 N·x·巴格拉米扬著《作战部长的笔记》，苏联《军事史杂志》，1967 年 1 月号，第 55 页—第 56 页。——原书注

另一个问题，是保卫 1939 年和 1940 年取得的领土问题。这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有关军事当局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在新的边界沿线修建筑垒地域和野战阵地的工程。直到 1941 年夏，还远远没有竣工。埃里克森写道：

关于苏联防御不充分的状况，有人把一部分责任归咎于朱可夫。人们怀疑这样做是否公正，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为一些军事问题确定正确的解决办法，总要遇到一些严重的、令人生畏的障碍，况且朱可夫到底有多少自由行动的余地，也难以估计。清楚的是，苏军指挥部已着手重新组织西部边境的防御——这个边境如今是从巴伦支海到黑海，共有五个军区，即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三个特别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分别是里加、明斯克和基辅。

其他一些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本应修建更多的前沿机场，在整个地区本应建立更多的通讯枢纽都。自从边界有了调整以来；宽轨铁路虽已延长到新边界，但运输能力仍然很低。另外，有些地段，只是到 1941 年春，才开始修建钢筋混凝土永备发射点。

到 1941 年 4 月底，苏联人意识到，德军已开始在俄国边界集结军队。5 月，朱可夫的报告向苏军各部门和各集团军发出警告：“整个 3 月和 4 月，德军统帅部一直紧张地把部队从西线和德国中部地区调到邻接苏联边界的地区。”他的这番话的含义是很明显的。

朱可夫和总参谋部制订出一项苏联西部边界详尽的防御计划。这项计划划分了每个集团军的防区，而且划出了第一梯队每个师的防线。除了苏芬边界的最北段，部队仅仅掩护一些孤立的地段以外，沿整个边境组成了一个统一的防御体系。每个集团军的所有步兵师都部署在边界附近，通常是部署成一条线，担负打退敌人进攻的任务。每个集团军的第二梯队的编成内，有一个机械化军，其任务是消灭突破边界阵地的任何敌军。

5 月，朱可夫命令一部分红军集中到比较靠近边境的地区。但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部队调动缓慢。各条铁路按照和平时期的时刻表运行，有些指挥员似乎缺乏必要的紧迫感。

朱可夫和总参谋部 5 月制订的计划，要求在发布动员令后几天之内迅速增援边境各军区。计划曾设想，在开始动员到战争爆发之前将会有一段时间。

5 月计划规定，边境军区部队中的一部分，将作为边境地区的掩护部队。这些部队，由每个军区的第一梯队的诸兵种合成部队编成，规定它们要进行

顽强抵抗，以掩护全国动员的实施和国家主力部队的战略集中。部署主力部队的防线，离开边界一定距离。敌人如果突破了防御，一防守部队将转而采取阻滞行动或实行机动防御。这种作战行动的目的在于在每道防线上尽可能长久地阻滞敌人。在两条防线之间，将采取设置障碍、破坏桥梁，以及小股部队的伏击等办法来减慢敌人的推进。到战争爆发前夕，各军区已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兵力被编入担任掩护的集团军中，而这些集团军，将沿整个边界大体均匀地部署在六十到九十五英里的纵深。其余部队则部署在离边界大约三百一十英里的地方。

按照朱可夫的计划，从帕兰加到多瑙河口一千二百四十英里的边界，将用九个掩护集团军来防守，由四十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构成第一线。每个师负责大约三十英里的正面。在有天然屏障（森林茂密的喀尔巴阡山脉、普鲁特河和多瑙河）的那些地段，步兵师的防御正面宽度达六十到七十五英里（应当强调指出，当时苏联军事研究部门已经确定，一个师的防御宽度应为五到七点五英里，而上述加宽了的正面宽度，却是在这之后决定的）。总参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事先构筑边界防御阵地，在敌人一旦造成威胁时就可以进入阵地。在这之前，用作掩护的部队将驻扎在离边界距离不等的兵营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斯大林继续无视关于德军将发动进攻的警告。

从 1939 年起担任海军人民委员的 H·T·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就要爆发之前的那些关键性的日子。他写道：“关于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意图，到 1941 年初就开始不断有情报泄漏给我们了。这个情报，起初是十分含糊的，可是后来就肯定得多了，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尽管德军统帅部煞费苦心，但它要掩藏它从巴伦支海到波斯普鲁斯海峡的漫长正面上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作的种种准备，是掩藏不住的。” H·T·库兹涅佐夫著《战争爆发之前》，载苏联《国际事务》杂志，1967 年 1 月号，第 99 页—第 100 页。以了引语亦引自该文。——原书注

库兹涅佐夫说，1941 年 2 月他向政府报告说，对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德国卖给俄国的、已部分装配完毕的“吕佐夫号”巡洋舰。德国人推迟了供应部件的日期。斯大林细心地听完库兹涅佐夫的汇报后，要他随时把情况报告克里姆林宫，还说苏联驻德国代表的行动已经受到限制。

6 月中，即在战争爆发前夕，库兹涅佐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说，在俄国各港口的德国商船数目正在迅速减少，这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进一步证据。

库兹涅佐夫写道：“可是仍然没有下达指示。”他描述了斯大林在和平时期最后几小时所采取的行动，同时说明朱可夫和总参谋部也不是无所事事。他写道：

备战不是单纯地储存装备。要想打退可能遭到的进攻，必须事先制订出作战计划，并把这些计划告诉那些将要执行计划的人……斯大林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我相信他考虑过。我认为他坚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肯定战争要么在西面，要么在东面爆发。也可能在东西两面同时爆发。我们把军队同时集中在西面和东面，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东西两面的边界都构筑了工事。1940 年底和 1941 年初，高级指挥官的调动也表明正在进行战争准备。从整体来说，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早就开始进行准备了，而且一贯地、有针对性地进行着。

当时斯大林已经有了疑心别人的毛病，对于即将发生的战争应该怎样打，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那些将要参加作战的人。他对于可能发生冲突的日期，也估计错了。

他以为还有时间。所以当事态急转直下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把他的主张变成明确的战略计划和具体行动计划了。而且，从 1939 年到 1941 年这段期间，这种计划恰恰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倘若能够准确而详尽地制订出计划，本来是可以利用这些计划对部队和舰队进行训练和准备的。

库兹涅佐夫说，斯大林在军事事务方面的权成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方面，人人都坚信斯大林最明了情况，需要的时候，他将作出必要的决定。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又妨碍了他周围的人自己去思索；并坦率而果断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海军中。大家都确信，既然没有下达指示，那就是说眼下战争不大可能爆发。

库兹涅佐夫批评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员，抱怨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总是忙得不亦乐乎，连出席舰队关于作战问题的会议都没有时间。他对朱可夫特别有意见，他说：

从朱可夫当了总参谋长以后，我们同总参的关系不能说是融洽的。我认为同总参谋部保持联系特别重要，这也是由于斯大林依靠总参机构来处理军事问题的缘故，而这就意味着斯大林有关海军的指示和指令也下达给总参……我去了好几次要见朱可夫，可是都没见着。他的举止相当傲慢，而且根本不肯下功夫去研究海军的问题。

虽说这位海军元帅很尊敬担任野战司令员时的朱可夫，但对他担任总参谋长时的表现却印象不佳。他说。“本来应该早得多地发现朱可夫从性格上说不适合作参谋工作。”库兹涅佐夫的批评也许太过分了。朱可夫情绪急躁、容易发火，很可能是由于他常常不如意和他在工作上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造成的。还必须记住，斯大林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控制极严，象朱可夫那样精力充沛、性格倔强的指挥员，对此一定会感到恼火的。库兹涅佐夫也说：“对予各军事机关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职权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且“斯大林拥有无限权力，整个军事事务完全控制在他手里。”这种说法无意中为朱可夫的举止找到了解释。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工作，无论哪一位红军领导人，看来都不大可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

正在迅速发展的事态的其他几个方面的情况。也值得提一提。驻在塔什干的 M·N·卡扎科夫将军 6 月 11 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他在飞往莫斯科途中，看见下面满载着军队的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全都向西北方向开行。他知道他指挥的军区没有向苏联其他地区调动部队，所以他猜测这些部队是从东西伯利亚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调来的。

到达总参谋部大楼以后，卡扎科夫从外贝加尔军区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员 M·R·卢金那里得知，卢金的集团军正沿铁路调到西部去。此后几天，卡扎科夫看见身穿野战制服的其他几位集团军司令员。他可以肯定这些部队不是去参加演习的，因为如果举行演习的话，他一定会知情。卡扎科夫被要求再呆几天时间。以便解决同他的军区的作战计划有关的一些问题。

“当时，”他回忆说：“我不能不注意到总参谋部越来越繁忙。那时担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的格拉西缅科中将同他的参谋长一起来到总参。接着乌拉尔军区司令员 R·A·叶尔沙科夫中将也来了。卡扎科夫找到 A·M·华西列夫斯基上将，后者告诉他，芬兰军队已经在实行动员，德军已经沿着苏联边境集结。

卡扎科夫直截了当地问道：“同德国法西斯打仗，什么时候会打起来呢？”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今后十五天到二十天当中，要是不打起来就算不错啦。”

从这些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和苏军最高指挥部知道同德国打仗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没有把情况充分通报给西部边界一线的各部队，甚至放任它们产生一种心安理得的情绪。对苏联人来说，这场战争可能不具有战略突然性，但是在战术上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一些俄国人叙述了他们在战争前夕在西部边界上的经历，其中就有当时在边境部队中任上校的 N·N·费久宁斯基将军。他回忆说，6月18日，边防分队的一名指挥官打电话向他报告说：“上校同志。一名德国士兵刚刚投奔到我们这边来了。他报告了非常重要的情报。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相信他。可是他谈的情况非常非常重要。”“你们等着，我马上去。”费久宁斯基下了这道命令以后立即动身前往边境。

到达分队司令部后。费久宁斯基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德国士兵。这个德国兵对翻译说，他因为喝醉了酒，揍了一名军官，他害怕被枪毙，所以逃到苏联人这边来。他说：“战争不久就要开始了。”他告诉他们说，6月22日凌晨之时，“德军将在德苏边界全线发动进攻。

这位年轻的德国兵发现人们露出怀疑的神情，便千方百计要使苏联军官们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上校，”他说，“到了6月22日早晨5点钟，你们如果得到欺骗了你们，你们枪毙到好了。”当费久宁斯基把这个情报报告给第5集团军司令员时，这位将军懒洋洋地答道，“不必相信挑拨。”而且没有必要向部队发警报，因为“这种警报将是一场虚惊。” N·N·费久宁斯基著《闻警而奋起》，第10页—第14页。——原书法

卡扎科夫将军于6月21日夜到达设在塔什干的司令部。接着他用了几个小时时间报告他此行的情况。当他准备休息的时候，值日军官派人来找他。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打来了一个重要电话。信息是简短的：“开始了！”

第六章 巴巴罗萨计划

在德军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一天，当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到现场侦察地形的时候，他确信红军“对于我们的意图毫无所知”。布格河苏联那一侧河岸上的各个支撑点无人守卫，而且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苏联在加强其筑垒阵地方面几乎毫无进展。

实际上，古德里安认为实现突然袭击的前景是极好的，一以致于他甚至怀疑是否还有必要进行预定的炮火准备。 海因茨·古德里安——德军将领，记录进攻苏联时任坦克集群司令官，后任集团军司令官，1944年任东线总司令。1945年5月被盟军俘虏。——译者注

6月21日夜10时，在德军步兵某师服役的一名捷克共产党人，在利沃夫地区偷越了国境。他警告俄国人说，德军计划翌日凌晨3时发动进攻。这个情报通过指挥系统逐级上报到莫斯科，因而浪费了宝贵时间。

“直到6月21日，在收到关于德军将于6月22日深夜至6月23日凌晨向我国发动进攻的无可辩驳的情报以后，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评论

说。“苏联政府才决定警告边境各军区司令部和海军各舰队司令部注意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使武装部队进入战斗准备。”该书指出：“使武装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是在6月22日零时30分发布的。然而，由于通讯设备遭到破坏，许多负责人只是在德军发动进攻之后才获悉了这个命令的内容。

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部队，受命在拂晓前占领边界一带的筑垒地域，并把全部飞机分散到各个简易机场。

德国人出色地执行了他们的战略计划。在1940年完成了在西欧的作战行动以后，他们开始把部队调到东普鲁士和波兰。到1941年5月，德军沿俄国国境已集结了差不多七十个师。苏军在其西部边界也部署了大约七十个师，但其中许多师仍然缺乏必不可少的武器装备

5月25日，德国的几条铁路线转入按他和的运行时刻表运行，每昼夜开行大约一百列军用列车。到6月初，三个集团军群已经摆好向苏联发动进攻的阵势：中央集团军群由费多尔·冯·柏克元帅指挥；北方集团军群山威廉·冯·利布元帅指挥。南方集团军群由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

中央集团军群从卢布林—苏瓦乌基一线出击，承担了主要任务，即消灭白俄罗斯的苏军，然后向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发动大规模强攻。这个集团军群的编成内有五个集团军，其中有两个坦克集团军。北方集团军群有三个集团军，内有一个坦克集团军，它们从苏瓦乌基——波罗的海一线出动，目标是粉碎波罗的海各国的苏军，并同曼纳海姆元帅指挥的芬兰军队配合，攻占列宁格勒。切断通向摩尔曼斯克的交通线。南方集团军群位于卢布林和喀尔巴阡山之间，任务是向基辅总方向发动大规模强攻。同北方集团军群一样，它拥有三个集团军，内有一个是坦克集团军。它的南翼，由安东奈斯库元帅的罗马尼亚军队和里特尔·冯·朔贝特将军的德军第11集团军来掩护。

海因茨·古德里安著《装甲部队领导人》，第145页—第150页。——原书注

轴心国方面总兵力约为一百四十个师，组成三个突击集群，部署在苏联国境上。一般说来，它们的装备精良，特别是坦克较好（约三千五百辆），并得到三千九百架飞机的支援。苏联方面，总兵力约一百个师，分布在北起摩尔曼斯克北部的巴伦支海，南至黑海的多瑙河口的国境线。此外，约有六十个师正从边境军区的内陆地区调来增援边境各部队。（德军）进攻前不久，朱可夫开始从内地调集五个集团军以便编成最高指挥部预备队，打算用它来进行一次反攻，可是这些部队用即将成为根场的地区还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一十英里。

这就是德军进攻前夕的军事形势。

通过外交途径把德国的意图通知给苏联政府一举，是突如其来的，对于（德国）那样的政权来说，这也是可以想象的。

4月22日凌晨3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收到一份电报，命令他去会见莫洛托夫，通报如下的信息：苏军在德国边界附近集结已经到了柏林认为它无法容忍的地步，因此不得不采取适当对策莫洛托夫闻听此言，大为震惊，意识到德国人已经向他宣战，至于苏军集结之说则“纯属无稽之谈”。况且，德国政府如果觉得苏军的驻扎是对它的冒犯，它本来可以向苏联政府发出一项用会，这就足以使苏联撤出它的军队了。可是德国没有这样做，而是不顾种种可怕的后果，发动了一场战争。莫洛托夫最后向来访者说了这么一句凄

枪的话：“谅必我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类似的。场面在柏林重演了一番——里宾特洛甫把德国的“防御措施”通知了苏联使节。古斯塔夫·希尔杰与文尔贝雷德·迈耶合著《不相容的盟国——德苏关系史回顾，1918—1941》，第336页，——原书注

这样，6月22日，也就是当年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前两天，希特勒的军队蜂拥越过国境，发动了突然袭击，致使边界沿线苏军各部队纷纷报告说：“我们遭到轰击！我们怎么办？”据德国元帅贡特尔·冯·克卢格的参谋长贡特尔·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说，他们从苏军总部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一定是发疯了。你们报告情况为什么不用密码？”贡特尔·布卢门特里特著《莫斯科》，载弗雷丁与理查森合编的《致命的决定》，第69页。

——原书注

对于德军的集结迟迟才采取对策，因而造成了混乱。而朱可夫在最后一刻下达的使苏军进入全面战斗准备的命令，可能使这种混乱局面变得更加严重了。许多部队的司令部收到此项命令已为时过晚，还有一些部队的司令部，刚刚来得及把部队拉到公路上排好队伍，反倒成了空袭和迅速推进的德军装甲兵团逐一歼灭的现成目标。例如，基辅特别军区直到6月22日晨3时至6时，即在战争开始以后。还没有接到通知。一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属下的第48步兵师，正在从里加前往边境途中，在离边界约十八英里的地方突然遭到空袭和突破边界防御的德国地面部队的进攻。这个师差不多已被全部消灭。

苏联飞机未能及时疏散到紧急简易机场，因而大部分飞机在其永久性基地上迅速被击毁。实际上，西部特别军区的大多数空勤人员都在短期休假，他们甚至未能回去保卫他们的基地。苏联方面承认，在西部军区，飞机损失尤为严重，从而使德军立即掌握了这个地区的制空权。

担负掩护边境任务的其他部队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利布的集团军税的对面。第5师的主力部队还呆在距国境三十一英里的兵营中，而第126师则位于远离国境四十三英里的地方。此外，西部军区和基辅军区的许多军、师的炮兵部队，正在远离它们所要支援的部队的火炮打靶场进行训练。基辅军区的防务部队，正在明斯克附近参加训练，离司令部几乎有二百五十英里。在作战计划中，预定起重要作用的其他部队，还在敷设通讯线路。

进攻的那天凌晨，德军拥有九十三个师可供使用，他们把大部兵力部署在普里皮亚特河以北。苏军各师则分散在一条长得多的战线上，而且有些部队尚未进入阵地。因此，轴心国军队在每个选定的正面上与苏军相比的兵力优势，从2.5比1到更大的倍数不等。

例如，在蒂尔锡特地区，苏军第125步兵师，负责掩护二十五英里宽的正面，必到德军整个坦克第4集群的进攻。这个集群的第一梯队由三个坦克师和两个步兵师组成，第二梯队则由三个摩托化师组成，因而一举攻占了这个地段。苏军用了几天时间才调来四个师，企图堵住这个缺口。在其他地段，红军各部队也未能及时抵达作战地域参加战斗。因此，总的说来，它们无法完成1941年苏联边境防御计划中指派给它们的任务。

在战争的晕初时刻，由于遭到空袭和炮击。红军的通讯线路大部被破坏，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守军的困难和混乱状况。各级指挥机关不能把命令下达到它统辖的陷入惊慌失措的部队。反过来，防守边境的各部队告急的消息也无法传送到上级司令部。德军最初的炮兵弹幕射击开始以后，德军突击部

队和侦察部队便破坏了边界沿线的带刺铁丝网，消灭了或许可以较早地报告情况的苏军哨兵和观察所。攻击的突然性对德军来说几乎是圆满的，以致整个正面上对于进攻者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桥梁都被完好无损地攻占了。

担负炸桥任务的苏军岗哨，还没来得及引爆爆破炸药，就被歼灭了。随后苏军曾企图轰炸这些桥梁，但遭到惨重损失。在某一地段，仅在一天之

内就有六十四架实施攻击的苏联飞机被击落。埃里希·冯·曼施泰因著《失去的胜利》（安东尼·鲍威尔英译），第182页—第186页。——原书注

从参加这次作战的人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德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们的目标——仿佛象进行军事演习一般。弗朗茨·哈尔德日记6月82日的2段记载是不动声色的陈述的杰作：“敌人被德军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他们的部队没有作出防御战斗部署。边界地区的部队在各自的防区内分得很散。国境线本身绝大部分地段的警戒是薄弱的。”

在分析德军在战争初始阶段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原因时，苏联历史学家们常常提出一些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例如他们说红军“缺乏进行现代战争的足够的经验”。他们忽略了在西班牙、中国、哈桑湖、哈勒欣河、芬兰以及波兰的战役。然而他们当中有一位直言不讳的历史学家提出了跟他的同行们相对立的想法。他说：

“在战前的岁月里，坦克部队同整个苏联红军一起，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准备。在那些岁月里，他们取得相当多的作战经验。在西班牙观标上、在哈桑湖、在哈勒欣河、在芬兰的森林中——这些地方都是我国坦克部队经受严峻考验的见证。”

《在陆军部队的前卫中》，载苏联《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第15期（1966年8月），第39页。——原书注

苏联的历史学家们还把红军随后继续遭受挫败，归咎于1941年没有开辟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他们说，在进攻苏联的时刻，德军地面部队在欧洲的作战行动已经停止，因此德国能够集中其兵力入侵俄国。可是人们发现丘吉尔的话是有道理的。他在1941年写给呆在古比雪夫的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的一封信中评论了第二战场的论点。他写道：“俄国人无权责备我们，他们是自作自受……”

克里普斯爵士当时担任英国驻苏联大使。

——译者注

然而，关于红军初期失利的另一个切实的原因，乃是1941年夏季军队手中的新式武器数量太少。实际上，装配线上生产出来的武器中，有许多武器胜过德军的武器。苏联历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是中肯的。他们说：“新式装备和武器刚刚开始送到部队手里，官兵们还没有熟练地掌握它们。”例如，苏联人研制并生产了一种出色的新式坦克，并把它们配备给部队。这种坦克比德国的无论哪一种坦克都优越。据古德里安说，1941年春，希特勒特地下个准许一个苏联军事代表团参观新建的德国坦克学校和坦克工厂，什么都给他们看，不要隐瞒。可是俄国军官们不肯相信。潘策尔-IV坦克是德国最重型的坦克，一再指责德国人把最新式的坦克赐起来不给他们看，违反了希特勒关于让他们全面参观的命令。苏联人很执拗。以致德国军工部门和制造厂的官员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红军已经研制出比德军更优良的、更重型的坦克。古德里安写道：“1941年7月底，俄国的T-34型坦克在前线露面，俄国新型坦克之谜终于解开了。”

苏联历史学家们对于红军最初和随后遭受挫折所列举的其他原因也都是确实的，即清洗造成的迟迟无法消除的影响，武装部队正处在进行改组的过程中，最后是工业企业向东撤退造成的减产。

对于战争初期损失惨重的主要责任，人们一直归咎于斯大林，说他忽视了来自多方面的警告，过分担心激怒德国人。同时，人们还认为朱可夫也要承担都分责任。但是苏联的战史书籍在某些方面替朱可夫作了辩护。虽然没有指名，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的第一卷，重复了朱可夫提出的关于使用装甲部队的概念，提到他曾请求斯大林保留大型机械化集群而没有成功等情况。书中说，红军本来应该利用在西班牙、哈桑湖、哈勒欣河以及同芬兰的战争中取得的经验。

苏联最高指挥部得知 1939 年和 1940 年德国坦克兵团在波兰和法国作战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以后，不得不把重建坦克师作为当务之急。但是正当它仓促地重组坦克部队的时候，红军就遭到了德军的进攻，于是建立五十个坦克师的长远计划被打断了。尚未完全组建完毕的坦克部队不得不勉强投入战斗。不出所料，这些坦克部队，如同大多数出后给各步兵师的独立坦克营一样，很快被击溃和消灭。苏联坦克部队无法同德国坦克师相匹敌，后者虽然数量上居于劣势，但活动半径大、突击力强。到 1941 年底，苏军坦克兵团不是打光了，就是因为损失严重而不得不重新改编。

面对德军席卷边境地区的严酷现实，苏联急忙从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提高整个国防机构的效能。第一项步骤是 6 月 23 日采取的。苏联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建立了统帅部，国防人民委员侯本辛哥被任命为主席。委员有斯大林、朱可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库兹涅佐夫。统帅部负责领导武装部队的全部军事活动。两天以后，统帅部建立了预备队集团军群，由苏联元的布琼尼指挥。以朱可夫为首的总参谋部隶属于统帅部，作为统帅部赖以制订作战计划和获取情报的机构。据朱可夫回忆录说，统帅部于当年 7 月 10 日被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斯大林任主席，成员有莫洛托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沙波什尼科夫和朱可夫。8 月 8 日，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译者注

7 月 3 日，斯大林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由国防委员会集中掌握全部领导权力。该委员会最早的成员有斯大林（主席）、莫洛托夫（副主席）、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国防委员会成了苏联的军事、政治、工业的最高战略指挥部。它初期发布的一些指令，规定了全国应付紧急状态的种种对策的主要原则。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焦土政策和尽可能地把工业东迁的决定。在军事方面，把整个战线划分为三大区段，即三个方向，并各自成立指挥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下放了指挥权。伏罗希洛夫任西北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任西方方向总司令，布琼尼任西南方向总司令。在政治方面，废除了“单一首长制”原则。并于 7 月 16 日重新设立了军事委员。

轴心国部队已经深入到俄国内陆。据布卢门特里特将军说，德军的推进非常迅速，以致德军步兵部队为了跟上其他部队而大吃苦头。他写道：

一天当中要行军二十五英里，无论怎么说也是不寻常的，况且道路又非常糟。在那些个星期里，一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始终是纷纷向后撤退的俄国大队人马和穷追不舍的德军步兵部队扬起的遮天蔽日的尘烟。气候十分炎热，忽而又下起一阵雨，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可是等到太阳出来，道路很快又被烤干，行走起来仍旧尘土飞扬。

6月27日，德军进抵明斯克市郊，完成了对苏联大部队的合围。这块被围地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斯克——比亚韦斯托克孤立地区。德军装甲部队指挥官希望继续向莫斯科挺进，把消灭这个孤立地区的苏军的任务留给尾随而来的步兵军团。于是，6月30日，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批准装甲部队向第聂伯河推进。但这时希特勒的干预其事。下令动用一切可用的部队，来消灭这个孤立地区，在接到进一步退却以前不得继续东进。

陷入这块孤立地区的苏军部队奋力突围，此举为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争取了喘息时间，从而能够在斯摩棱斯克地域集中兵力。6月27日。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命令苏军占领从拉脱维亚的克拉斯拉瓦到杰斯纳河、波洛茨克筑垒地域，经维切布斯克和奥尔沙，再沿第聂伯河到洛耶夫（戈麦尔以南约三十七英里）一线。一从布琼尼领导的统帅部预备队抽调部队组成了一个集团军群，其编成内有第20、第21和第22集团军，共计二十八个师。

为了加强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的地区的防御，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并从内陆各军区的第二战略梯队调来了增援部队。在主要防线以东一百三十到一百五十英里，在湿利多沃—别雷伊—第聂伯河上游—耶尔尼亚—沿杰斯纳河到茹科夫卡和洛普什（勃良斯克西南）一线组织了第二条防线。守卫这两条防线的责任交给了铁木辛哥元帅，他既是西方方向总司令，又是西方方面军的司令员，从而保证了防御的统一指挥。他还可以指望从边界地区撤退下来的第3、第4、第10和第13集团军的援助。铁木辛哥企图据守别列津河，但还没等他建立起有效的防御，德军就已渡过了这条河。统帅部至少拨出三十七个师给铁木辛哥，以便防守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可是有些部队没有到达，因为它们在别的地方投入交战而逐渐消耗殆尽了。

德军迟迟无法消灭明斯克——比亚韦斯托克孤立地区的苏军，这种延迟对于德军装甲集群的指挥官们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因此，尽管最高当局作出了决定，古德里安还是说服了他的上司克卢格相信了继续向前推进的必要性。最后，终于得到批准，并于7月10日夜到11日凌晨在若干地点渡过了第聂伯河。渡河过程中德军遭受的损失很小。苏联防御部队仅在局部地段上成功地阻止了德军渡河。例如，在奥尔沙附近，德军第17坦克师被迫从它的登陆场后撤，把渡河地点改在科雷斯。可是，实际情况仍然是苏军统帅部没有足够的时间把部队有效地集结到第聂伯河沿岸，结果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仅仅部署了不超过二十四师的部队，因而德军突破这条河并没有遇到严重困难。

到7月20日，德军坦克第2和第3集群向前推进了一百七十五英里以上，攻占了奥尔沙、斯摩棱斯克、耶尔尼亚和克里切夫诸城。苏军的反击被打退。而在紧接着进行的战斗中，苏军第16和第20集团军被包围在第聂伯河西岸。至此，斯摩棱斯克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苏军组织的新的反击终于成功地阻止了德军的推进，而且第16和第20集团军也终于突出重围，撤退到第聂伯河东岸。7月23日，耶尔尼亚附近的反突击尤为猛烈。到7月26日，苏军先头部队已经突入第聂伯河北岸的斯摩棱斯克的登陆场。猛烈的反击一直继续到8月的第一周。7月30日一天，苏军部队向耶尔尼亚发动了不下十三次冲击，然而都没有成功。德军于8月1日重新开始向罗斯拉夫尔推进，在这次战斗中，苏军第28集团军被包围，遭到惨重损失，集团军司令R·R·卡格洛夫阵亡。

很明显，在苏军这首次获得成功的协调一致的防御作战过程中，统帅部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它坚持不懈地要求各级司令员更好地指挥作战部队。7月30日，莫扎伊斯克防线各预备集团军（不包括第29和第30集团军，因为它们已经在西方方面军作战）。组成预备队方面军。朱可夫获准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出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毫无疑问，这个方面军的有效的防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朱可夫的坚强领导。

朱可夫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员是由于，次争论促成的。7月29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说，不得不放弃基辅，并在耶尔尼亚突出部组织一次反突击，以免德军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斯大林质问说，怎么能把基辅交给敌人，真是胡说八道！朱可夫忍不住反驳道。“如果你认为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末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并把我派到前线去。”几小时以后，朱可夫便获准动身去指挥预备队方面军。

尽管苏军在阻滞德军推进方面获得了成功，但仍很明显的是，苏军在组织和实施进攻作战方面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缺点。一些突击集群力量比较薄弱，每个集群只有三四个师的兵力，而且投入作战的正面过宽，友邻部队之间未能协同配合；未能进行远距离侦察。进攻时间上也未能加以配合。航空火力支援和炮兵支援也很薄弱。在各个进攻方向上没有取得兵力上的优势。许多指挥员缺乏组织进攻作战所必需的经验，一有不少在1936年和1937年担任团长的军官，如今指挥着集团军，甚至担任方面军副司令员，而以前担任过师长的人，如今则指挥着整个方面军。

德军的推进遭到阻滞以后的一段时期，对德国人来说是一段犹豫不决的时期。苏联防御的顽强程度肯定是他们没有料到的。而且，希特勒对于进攻列宁格勒、莫斯科或乌克兰这三个目标的先后顺序似乎一直踌躇不决。有时候还把这三者同时作为主要目标。

前线指挥官们强调莫斯科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们确信进攻莫斯科是唯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但却毫无结果。德国“元首”终于在8月4日前往中央集团军群指挥部所在地新博里索夫。冯·柏克元帅扼要报告了前线指挥官们关于继续向莫斯科推进的意见。希特勒提出把列宁格勒作为主要目标，但关于下一个目标是莫斯科还是乌克兰，没有作出决定。

乌克兰的经济资源，对于希特勒显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此外，他认为除掉克里米亚“这个被用来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苏联‘航空母舰’”是十分重要的。可是一他还表示希望在冬季来临时占领莫斯科和哈尔科夫。

古德里安著《装甲部队领导人和第180页、第190页。--原书注

可以肯定。这些表示跟战争最初几周那种洋洋得意的预言已经大不相同了，苏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顽强防御，严重地破坏了希特勒的时间表，并且动摇了他早日结束这次会战的信心。实际上，希特勒就古德里安1997年写的一本书所讲的那段出人意外的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讲的，希特勒说：“倘若我当时知道你在你的书中列举的关于俄国坦克实力的数字实际上是正确的。那么——我相信——我是决不会发动这场战争的。”古

德里安著《装甲部队领导人和第180页、第190页。——原书注

8月23日，终于作出了决定：乌克兰被选定为主要目标。在集团军群指挥部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无论是列宁格勒战役。还是莫斯科战役都不进行了，当前的目标应该是夺取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古德里安被推选前往希特勒设在东普鲁士的总部，去向他当面阐述前

线指挥官们的看法。然而，这位元首在他的随从人员当中所占的支配地位。使得古德里安不可能得到他曾期望得到的支持。他意识到，继续讨论下去是毫无用处的，于是只好尽其所能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等待已久的“元首”的指令于8月底发布：

冬季尚未来临之前必须达到的主要目标，不是夺取莫斯科，而是在南方占领克里米亚、占领顿涅茨的工业区和煤炭产区，同时孤立俄国在高加索的石油产区。而在北方，则要包围列宁格勒并同芬兰军队会合。

只有在把列宁格勒“紧紧包围”，同时中央集团军群摧毁从北面保卫基辅的苏军第6集团军以后，才允许部队向铁木辛哥集群发动进攻。8月15日，从中央集团军群抽出了一个坦克师、两个摩托化师去支援利布的北方集团军群，以对付苏军在旧鲁萨附近的猛烈反击。这样一来，德军在两个半星期之内无所作为，向莫斯科方向的推进完全停顿下来。机警的朱可夫首先察觉到敌军战略目标的这种变化，立即报告给斯大林。

8月的头几天，古德里安曾打算向莫斯科方向发动进攻，但终于决定把矛头装向南方。

以消除苏军中央方面军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右翼的威胁。两位苏联军事史学家的叙述如下。

中央集团军群的部分军队转向南方方向一事，并未逃过苏军指挥部的眼睛。8月18日，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向最高统帅报告如下：“敌人获悉我已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集结大批兵力……所以暂时放弃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转入对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积极防御，而把所有的快速突击力量和坦克部队用来对中央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作战。敌人的企图可能是：粉碎中央方面军、进抵切尔尼戈夫——料诺托普——普里卢基地区，从后方实施突击以粉碎西南方面军。” B·伊凡诺夫与R·切列穆欣著《评一书》，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5年6月号，第74页—第75页。——原书注

为了挫败这一图谋，朱可夫建议在动良斯克地区集结一支强大的部队，用以对敌之侧翼实施突击。当天，他收到最高统帅部的如下复电：

你关于德军可能向切尔尼戈夫、科带托普、普里卢基方向挺进的意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为了预防和制止这种复杂情况的发生，已组成以叶廖缅科为首的勃良斯克方面军，并正在采取其他措施（另行通知）。我们相信能够阻止德军的前进。

这封电报落款的署名是斯大林和沙波什尼科夫。

8月中旬，西方方面军的一部和朱可夫的预备队方面军所属第24集团军，准备对耶尔尼亚和杜霍夫施纳地域的德军实施反突击。8月17日，苏军部队开始出击，达到了攻占有限地盘的目标，并在进攻的整个地段上压倒了敌军。；在耶尔尼亚地域的战斗中，德军损失惨重，不久便不得不把两个溃不成军的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一个摩托化旅撤出防线。这次战斗也是苏军首次使用一种新武器——“喀秋莎”多管火箭炮的有记载的战例。直到三十年以后，这种武器仍以它的现代化型号列入红军的军械中。

与此同时，古德里安向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建议说：“关于耶尔尼亚突出部，鉴于它现在已经没有意义，而且继续在造成伤亡，应予放弃。”这个主张遭到拒绝，借口是软弱无力的：“它对敌人比对我们更加不利得多。”古德里安对此十分痛心。后来他写道：“我的建议的主旨，即保全人的性命，

被一笔勾销了。”

在 8 月末和 9 月初，即在这次会战的第四阶段，在从托罗佩茨到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克的广阔战线上，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德军夺取托罗佩茨以后，苏军的西方方面军的第 16、第 19—第 20 和第 30 集团军发动了攻势，但是它们很快遇到猛烈的抵抗，因而只向前推进了几英里。从 9 月 5 日至 9 月 8 日，苏军终于停顿下来。9 月 10 日，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下令停止进攻，并命令方面军司令部占据防御阵地。

与此同时，德军第 4 集团军受命撤出耶尔尼亚突出部。古德里安后来说：“8 月份，我曾试图争取及时撤出部队以避免伤亡。但这时伤亡已经造成了。”古德里安遭到惨败。

参加这次战斗的是朱可夫的部队，特别是第 24 和第 43 集团军。德国人知道他们的困境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他们察觉到苏军沿铁路线从莫斯科向勃良斯克调动部队，而庞大的摩托化部队正向斯摩棱斯克方向机动。

据朱可夫回忆录说，这次战斗，苏军粉碎了敌军五个师，打死打伤敌军四万五千到四万七千人，击毁德军大量火炮。——译者注

当这次会战进入第三个月的时候，苏军再次转入防御。朱可夫及其战友们建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功绩。德军深知这一切的后果。斯摩棱斯克会战，使希特勒的闪电战丧失了大部分势头。正如亚历山大·沃思所说：——

亚历山大·沃思——英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41 年至 1948 年期间担任英报驻莫斯科记者。——译者注

“斯摩棱斯克防线”是一块盾牌，苏联各集团军在这块盾牌掩护下，得以重新组合并调集预备队。以保卫莫斯科，否则的话，莫斯科很可能会象希特勒原来计划的那样，在冬季来临之前被攻陷。

从德军的观点来看，苏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据守，是对他们的计划的首次打击。

由此而造成的耗误，使他们面临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由于最高统帅部运筹帷幄，在西方方向上配置了充足的预备队，使红军在兵力上已能够与德军相匹敌，因而能够发动一系列反击，遏止了德军对莫斯科方向的攻势。

布卢门特里特描述了这次会战的影响。他在谈到 7 月底的战局时说：“五十万俄军似乎已被合围，包围圈几乎已经封闭（只差大约六英里），可是切国人再一次成功地使大部分部队摆脱了困境。由于此次功败垂成，希特勒立刻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抉择：是否中止进攻。我军这对已经深入俄国四百多英里，离莫斯科还有二百英里。”

斯摩棱斯克会战迫使德国人就战略问题进行了后果不堪设想的辩论。布卢门特里特说：“我们进抵斯摩棱斯克以后，在杰斯纳河上停顿了好几个星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必须调集补给品和增援部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德军指挥部内部对于今后的作战方针的看法发生了新的分歧。人们无休止地进行争论。”正在乌克兰展开的战役迫使希特勒作出了决定。

9 月上半月，基辅战役开始。这次战役，红军遭受了惨重损失。错误不在于决定保卫这个重要的乌克兰城市，而在于部队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这主要是斯大林本人的失误。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西南方向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司令是布琼尼元帅。当基辅突出部的红军预备队已经精疲力竭之后，赫鲁晓夫和

布琼尼决定撤退，并尽可能地保全部队。9月11日，斯大林断然反对放弃基辅和在普肖河一线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基辅。此外，他还指出苏军要击败科诺托普敌军集团。当时斯大林解除了布琼尼的总司令职务，指派铁木辛哥接替他。

不久以后，德军完成了对基辅的包围，合围了数十万红军部队，夺取了大量武器装备。布琼尼、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在基辅陷落前乘飞机离开了该城。

基辅战役结束以后，希特勒必须决定是满足于这一年内取得的战果，还是再一次试图在1941年决一胜负。龙德施泰特认为，德军在夺取基辅以后应当在第聂伯河上停下来。

布劳希奇同意他的意见，可是希特勒为基辅的胜利所陶醉，想要继续向前推进。但由于红军拥有铁木辛哥、朱可夫这样一些人以及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德军的推进受阻。正如布卢门特里特写道：“德军在这一年的最佳月份——八九两个月受阻，这在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利德尔·哈特著《德国将军们的谈话》，第181页。——原书注

第七章 1941年的列宁格勒

1941年7月，希特勒下了这样的决心：必须把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使之变成无居民城市。他说：“这样，我们就不必在整个冬天为居民提供粮食了。”这位“元首”明确指出，这一种族灭绝行动预定由德国空军来执行。“这场民族大灾难……不仅将使布尔什维主义，而且也将使俄国民族主义失去它们的中心” 弗朗茨·哈尔德普《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私人战时日记》，1941年7月8日。——原书注

列宁格勒是彼得大帝1703年作为俄国“通向西方的窗口”而建造起来的。从那时起，二百多年来它一直是疆域广大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1917年11月，正是在列宁格勒（当时叫彼得堡）。布尔什维克们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列宁格勒拥有三百多万人口，是苏联第二大城市，不但是最重要的海港，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1941年7月初，西北方向（包括列宁格勒在内）交给斯大林的老朋友、能力较差的伏罗希洛夫指挥。A·A·日丹诺夫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M·B·扎哈罗夫少将则被任命为西北方向的参谋长。德军于6月发动突然进攻以后，不断向这个俄国以前的首都推进，在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列宁格勒的前途越来越严峻了。（见附图1）到7月初，西北方面军原有的三十个师只剩下五个满员的装备齐全的师了，其余各师严重减员，只剩下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到8月20日，德军已绕过卢加河防线，推进到赤卫队城（加契纳）周围地区。在赤卫队城和列宁格勒之间仅仅部署着为数不多的编制不全的红军部队，形势十分危急。当天，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不得不向西北方面军部队发出紧急呼吁：“列宁格勒在危险中，野蛮的法西斯军队正向我们光荣的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推进……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在列宁格勒的大门前用我们的胸膛挡住敌人的去路。” 利昂·古尔著《列宁

格勒被包围》中引用的材料，第 90 页。——原书注

第二天，德军的几个师推进到离城市更近的地方。德军第 1 军完好无损地夺占了楚多沃的铁路桥和公路桥，切断了通往莫斯科的“十月铁路”。八天之后，德军又攻占了托斯诺，向穆加车站、亚米若拉和伊万诺夫斯科耶挺进。经过激烈战斗，德军占领了穆加这个重要铁路交叉点，于是列宁格勒同俄国其他地区的最后一条铁路线被切断了。这时，德军第 16 集团军开始从东面包围列宁格勒，沿着涅瓦河左岸向拉多加湖方向推进。甚至在一些狭窄的地段，也投入了大批飞机，试图冲破防线。例如 9 月 6 日，近三百架德军轰炸机袭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第 1 师防守的一小段地域，给苏军人员和武器装备造成重大损失。

空袭之后，德军指挥部以强大的装甲部队投入夺取施吕塞尔堡（彼得要塞）的战斗，到 9 月 8 日，苏军第 1 师被切成两段。当德军进抵拉多加湖南岸，占领施吕塞尔堡以后，陆上封锁宣告完成。接着他们开始收紧对列宁格勒的巨大的钳形包围，炮击市区、派出一批又一批轰炸机，企图粉碎俄军的抵抗。

· B·帕夫洛夫著《1941 年的列宁格勒：封锁》，第 14 页—第 18 页。——原书注

在这个关键时刻，伏罗希洛夫完全慌了手脚。于是斯大林解除了他担任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职务，把他调到国防委员会。朱可夫大将被指派去接替伏罗希洛夫，再次成为受命前去稳定东部战场每一危险地段的“消防队员”。

7 月 10 日起由伏罗希洛夫担任总司令的西北方向，已于 8 月 30 日撤销。伏罗希洛夫于 9 月 5 日接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一周以后被解除职务。见 N· · 巴尔巴申著《列宁格勒保卫战》，第 592 页。

——原书注。

9 月 13 日晨，一架 N-2 型飞机在战斗机护航下，从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起飞。

飞机上坐的是朱可夫和由他亲自挑选的三名军官：M·C·霍律、· N·科科佩夫。N·N·费久宁斯基。他们在途中便着手拟订初步计划。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曾在朱可夫手下任职的费久宁斯基被任命为方面军副司令员。在列宁格勒着陆后，他五一行四人立即前往设在斯莫尔尼宫的方面军司令部。

据朱可夫回忆录记载，他是在 9 月 9 日晨离开莫份科前往列宁格的。——译者注

费久宁斯基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曾在朱可夫手下任摩托化第 24 团团长，后任第 82 师师长。——原书注

从 9 月 13 日抵达列宁格勒直到 10 月 7 日又被调往另一危险地区为止，朱可夫一直以继夜地紧张工作。领导在这座被围的城市周围修筑新的防御工事。制定突破德军封锁的详细计划。作为方面军司令员，他还使陷入困境的红军部队重新恢复了信心，鼓舞他们挡住了德军新的猛烈进攻。亚历山大·沃思这位杰出的、雄辩的观察家，曾亲眼目睹俄国战时的种种情形，他进一步证实朱可夫所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活动，明确指出他确实是在生死关头保卫列宁格勒的组织者。他写道：

据朱可夫回忆录说，他于 9 月 10 日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正式接管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权——译者注

1943 年，我在列宁格勒听到好几个人谈起当时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他们说，大约在 9 月 10 日，前线实际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伏罗希洛夫认为一

一切都完了。可是，斯大林于 9 月 11 日把朱可夫派到列宁格勒，朱可夫用了三天时间就把该城的防御充分组织起来了。

1945 年 6 月在柏林，朱可夫有一次对报界发表谈话，我出席了。朱可夫自豪地提到了这个事实，虽然他没有细谈。可是维辛斯基说：‘不错，正是朱可夫挽救了列宁格勒。’毫无疑问，正是在朱可夫担任司令员的短暂时间里（此后，他受命负责保卫莫斯科），列宁格勒周围的防线才得以稳固下来。

若干年后，朱可夫在对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工厂的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也确认说，他是“在德军突破到普尔科沃高地，零星的德军坦克冲进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

显而易见，斯大林授权朱可夫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恢复列宁格勒的防御，而不必顾忌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朱可夫毫不留情地执行了他的任务，使得他的一些下级内心颇为惶恐不安。

首先体验到朱可夫的毫不客气的态度的，就是伏罗希洛夫本人。作为移交指挥权的手续之一，朱可夫同伏罗希洛夫一起签署了敌情要图和作战地图，然后他俩一起来到电报机旁。同最高统帅部的交谈是简短的。在莫斯科，在线路的另一端接谈的是 A·M·华西列夫斯基将军。朱可夫发出一份简单扼要的报告：“我已接管了指挥权。请报告最高统帅斯大林，我打算比我的前任更积极地进行工作。”伏罗希洛夫没有同最高统帅部通话，而是很快地离开了房间。当晚，他和他的班子的大部分成员就动身飞往莫斯科了。

无疑，是朱可夫坚持要撤换关键性的人员的，因为他宁愿自己周围有一批他知道确实是精明强干的人。 B·B·贝切夫斯基著《城市——战场》第 92 页。——原书注

第二天，朱可夫开始派人把那些没有跟伏罗希洛夫一起回莫斯科的参谋行政人员一个个找来。B·B·贝切夫斯基是被留任的军官之一，他永远忘不了他向朱可夫作自我介绍的情形。贝切夫斯基写道：

我同新司令员的首次见面有些不可思议。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介绍是很平常的）以后。他用一种冷淡的、令人不安的眼光望了我几秒钟，然后突然用“你”这个称呼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不理解他的问话，于是再一次报告说：“方面军工兵主任贝切夫斯基上校。”

“我问你是什么人？你从哪儿调来的？”听他的声音，他显然是生气了。朱可夫那张大下巴颏向前伸了一下。他那不高的、但却粗壮结实的身子，在桌子上面向前探着。

“您真的是要求我报告履历吗，在这种时候。谁要听这个呢？”我这样想着，没考虑到这位司令员原来以为是别的什么人担任这个职务的。我惶惑不安地报告说。我曾经担任过军区工兵主任，后来又担任方面军工兵主任，至今差不多已经一年半了。而在苏芬战争期间，我担任过十累利阿地峡第 13 集团军的工兵主任。

“纳扎罗夫将军在哪儿，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纳扎罗夫在西北方向总司令部工作，负责协调两个方面军之间有关工兵方面的事宜，”我解释说，‘他昨晚同元帅一起乘飞机走了。’

“协调……乘飞机走了，”朱可夫重复了一句，“嗯，让他见鬼去吧！你有什么要谈的了说吧！”

贝切夫斯基打开他的地图，向新的方面军司令员说明了在德军突破红村、赤卫队城以及卡尔平诺以前做了哪些事情。他指出了普尔科沃阵地工程和在市内、在涅瓦河沿岸、在卡累利阿地峡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他叙述了一些敷雷小组和浮桥工兵部队目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朱可夫专心听着，没有问任何问题。然后他不知有意或无意地急速挥动了一下手臂。

以致一些纸页从桌子上掉下来，散落到地板上。他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开始察看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的城防要图。

“把坦克部署在彼得罗斯拉维扬卡地区做什么？”我正在整理掉在地上的一套地图，他瞥了我一眼，突然问道：“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吗，你过来；这儿有点儿不对头。”

“那是一些坦克模型，司令员同志。”我指着地图上的一支假的坦克部队的标识说，“一共五十辆，是马林斯基剧院道具车间制作的。德国人已经来轰炸过两次了。”

“两次！”朱可夫挖苦地说。“你们玩这种把戏玩了多久了？”

“两天。”

朱可夫不大高兴地对贝切夫斯基说，德国人很快就会看穿这个诡计，并开始向这些假坦克投掷木头炸弹的。他命令贝切夫斯基在第二天早晨以前再制作一百个坦克模型，把它们配置在他在地图上指明的两个地点。贝切夫斯基回答说，车间一夜工夫造不出那么多。

朱可夫抬起头，上下打量我一番，说，“他们如果造不出来，我就拿你去审判。你们的政治委员是谁？”

“团级政治委员穆哈。”

“穆哈？你告诉你的穆哈，倘若你们不能执行命令，明天就一起到军事法庭受审。”

我明天早晨要亲自去检查。” 这个姓氏在俄语中的意思是“苍蝇”，朱可夫在这里显然是语带双关的。——译者注

贝切夫斯基说：“听见这突如其来的威胁，我就象挨了一颗鞭子。”贝切夫斯基觉得朱可夫是在故意地考验他的忍耐力。这位新来的方面军司令员显然对于他的前任的成绩感到失望，自言自语地前南道：“他们在普尔科沃高地筑垒为什么动手这么晚？”朱可夫并未指望别人回答，接着便对贝切夫斯基说：“你可以走了。”

其他军官也都被召到朱可夫的司令部，而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的遭遇并不比贝切夫斯基好些。朱可夫扬言要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有些人则立即被撤职。

作战部长科尔科了上校就属于被撤职之列。科尔科了同朱可夫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然后就被打发回莫斯科去了。朱可夫来到列宁格勒的第二天晚上，便撤换了第42集团军司令员，一周以后，他解除了第8集团军司令员B·H·谢尔巴科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N·R·丘赫诺夫（师政委级）的职务。

士气和军纪问题是必须立即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朱可夫来到前线，发现第8集团军中军纪显著恶化。有些师长没有接到命令就把部队撤出战斗，也有些军官常常酗酒，有的士兵听见枪声就逃跑。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朱可夫和日丹诺夫发出曾告说，对于演职者，一律予以处决，并宣布以叛国或擅自撤退的罪名逮捕处决了若干名官兵，以儆效尤。

朱可夫接过指挥权时，战场形势的确是十分危急。由于施吕塞尔堡失守，列宁格勒同俄国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均被切断。德军在十二英里宽的一块地段上突破到拉多加湖沿岸，把被合围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同正在穆加以东、在沃尔霍夫河一带竭力阻止德国装甲部队向列宁格勒东部推进的苏军部队分隔开来。苏军第 8、第 42、第 55 集团军正被迫缓慢地、但却不可避免地退往城郊的环形防线或退往芬兰湾。苏军南部战役集群，即卢加战役的残余部队，由于德军坦克第 4 集群推进到赤卫队城和施吕塞尔堡而被包抄和合围。

结果一部被歼，一部且战且退，向东和东北方向突围。行动较慢的德军步兵集团军，即第 16 和第 18 集团军已逐渐靠近了先行的摩托化部队。这样，德军指挥部已经具备了近距离围攻列宁格勒的必要条件。

德军向列宁格勒发动最后进攻，意图显然有三。

首先，将由第 16 集团军的部队和坦克第 4 集群的摩托化第 39 军沿涅瓦河和沃尔霍夫河一线提供侧翼掩护，并在可能情况下发展成一次新的推进，以便在斯维尔河（拉多加湖以东）同芬兰军队会合。

其次，将由坦克第 4 集群其他几个摩托化军、第 18 集团军。以及第 16 集团军的支援部队（从赤卫队城到普尔科沃高地和乌里次克一线，约有八个师，对付苏军第 42 集团军；在科尔平诺到普希金和斯卢次克这个方向上，共有三个师，对付苏军第 55 集团军）从南部和西南部对列宁格勒本身发动一次锥形突击。

第三，德军将设法突破到芬兰湾，以便歼灭背靠芬兰湾（从奥拉宁鲍姆到科尔诺沃）守卫列宁格勒西部接近地和西南部接近地的第 8 集团军。

经过为变更部署和进一步进行准备所必需的数天延迟之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于 9 月 9 日发动了进攻。尽管苏军进行了拼死抵抗，第一天战斗结束时，前沿防线的一段六英里宽的正面被突破到一点五至二英里的纵深。

翌日晨，德军继续进攻，经过激战，守军被推到杜德尔戈夫高地。在西面，这村被攻破；在南面，赤卫队城陷落，尽管德军发动了此次战役中规模最大的空袭，但是，以科尔平诺为目标，向东北方向朝着普希金和斯卢次克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遏止。

此后整整三天，守军继续进行顽强抵抗，但渐渐不支，9 月 14 日，德军进抵普尔科沃高地。

在普尔科沃高地，堑壕和火力点已经修筑完毕，预定由民兵第 5 师占据阵地。可是，这时位于戈烈洛沃车站地区的普尔科沃右翼阵地，于 9 月 13 日落入德军手中，而第 5 师的两个团不得不在那里投入战斗。民兵们冲进了车站，企图在车站固守。可是，当天下午他们遭到德军机械化第 41 军的步兵师和坦克师的进攻，戈烈洛沃车站再度落入敌手。一小时以后，苏军这个师发动反击，又夺回了戈烈洛沃。当晚，苏军第 42 集团军司令员 Q·C·伊万诺夫中将由于担心普尔科沃的安全，带领一个团从被围的戈烈洛沃车站奔赴鲁尔科沃高地，只留下一个团驻守戈烈洛沃。该团团长 C·N·克拉斯诺维多夫受伤，由政委委员斯米尔诺夫（原维堡区区委书记）代理团长。9 月 14 日晨，争夺戈烈洛沃的战斗再次打响，而且战斗更加激烈了。政委两次率部队反击，但到傍晚，g 德军坦克第三次夺占了这个车站。朱可夫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 21 师的一个团派部队去恢复态势。

列宁格勒南面的筑垒地带这时大多都被突破。冲在最前边的德军装甲

部队已进抵离城市不到七英里的地方。9月15日，尽管苏军进行了猛烈的防御战（特别是在乌里次克，它在一天之内曾数次易手），但德军第18集团军还是在斯特烈尔纳和乌里次克之间突破到芬兰湾，把苏军第8集团军同列宁格勒隔开了。这一天是战斗极为激烈的一天，德军感到苏军的抵抗变得更加猛烈了。

为了阻挡德军突击集团在乌里次克和列宁格勒方向上继续进攻，朱可夫精心拟定出一项加强该城防御的计划。他当前的目标是使用空军和炮火突击打击德军，以阻止他们突破苏军防御；在9月18日以前，组建五个步兵旅和两个步兵师，为列宁格勒的近距离防御的四条防线配备兵力；使用第8集团军突击德军的侧翼和后方，并解放穆加和施吕塞尔堡。这项计划要求动员这个地区的一切人力物力，包括他的方面军的部队、列宁格勒市民以及苏联海军，来加强预备队，扩大防御纵深。在第42集团军的防区，朱可夫计划建立起能够阻止德军通过发动强攻来夺取列宁格勒的一道防线。他非常倚重海岸炮兵和波罗的海海军舰只的火力，因为随着战线缩小和越来越靠近海洋，它们将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在德军重新向第42集团军发动进攻的时候，朱可夫派他的副手费久宁斯基将军前往该集团军司令部。司令部离前线非常近，子弹在头顶上呼啸。一走进掩蔽部，费久宁斯基发现集团军司令员用两只胳膊支着头，一副疲惫不堪和一筹莫展的样子。他问伊万诺夫将军他的部队部署在哪儿。“我不知道，”这位将军回答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你同你的部队有联系吗？”费久宁斯基问。

“没有联系。今天的战斗打得很艰苦。在一些地段不得不向后退却。通讯线路都被破坏了。”伊万诺夫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费久宁斯基向朱可夫报告了情况，得到的命令是要他亲自接管这个损失惨重的第42集团军的指挥权。

9月16日，朱可夫为了防止德军从乌里次克向列宁格勒实施突破，向那里派去了一个新组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步兵师、一个民兵师和两个由水兵们和列宁格勒各防空部队的人员组成的步兵旅，以加强第42集团军。这些部队进入了这座城市的筑垒防线的外围防御阵地。这条筑垒防线从芬兰湾沿岸经利戈沃、肉类联合加工厂、雷巴次科耶，一直到涅瓦河。朱可夫命令各部队未经方面军司令部特别批准，不得从这条防线后撤。就这样，他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第二梯队，建立了有效的纵深防御。

贝切夫斯基描写了在朱可夫下达这些命令时方面军司令部里一片紧张忙碌的情形。

由于确实存在着（防线）被突破的危险，朱可夫司令员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们都十分紧张地工作着。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朱可夫同方面军工兵主任贝切夫斯基谈话时，脸上露出怒容，因为朱可夫派人去找他，但却没有找到。

贝切夫斯基回忆说：

我走进办公室，浑身湿漉漉的，沾满泥水。T·R·朱可夫和A·A·日丹诺夫正站在那里俯身看一张地图。司令员扭歪着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你到底还是露百啦！你到哪儿逛荡去了，害得我们找了你一夜？我猜想你大概睡得很香吧……”

一开始就有些不妙。

“我去执行你的命令去了，检查了环城公路沿线的防线和反坦克防御”
我答道。

“唔，怎么样？修好了吗？”

“七十个防坦克火炮发射阵地已经修筑完毕。壕沟已经挖好。设置障碍物和布雷区的作业也已完成。”

“第 42 集团军司令员了解这条防线的情形吗？”

“今天下午，我把这条防线的透明图送给了集团军参谋长别烈津斯基将军。费久宁斯基将军本人去视察部队去了。”

我觉得我的报告是明了的，可是他用拳头破了一下桌子，算是对我的回答。

“没问你把透明图交给了哪个人。我关心的是另一码事儿：你知道集团军司令员是否了解这条防线的情形？你懂俄国话吗？”

当贝切夫斯基向朱可夫报告说费久宁斯基正在外面接待室里等着的时候，这位方面军司令大发雷霆。

“你讲话经过大脑思考没有？……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来了……倘若安东诺夫的师今天夜间不能占据环城公路的防御，德国人就会冲进城里来，这个你明白吗，那时候，我就把你拉到斯莫尔尼宫前面，象枪毙叛徒那样毙了你。”

A·A·日丹诺夫作了个鬼脸儿。他显然不赞成司令员用这种语调讲话。日丹诺夫想缓和一下朱可夫的粗暴态度，便对我说。

“贝切夫斯基同志，你可能没想到该到哪儿去找费久宁斯基。他刚刚接管了这个集团军。而预定要占领新防线的安东诺夫的师，实际上也只是最近才编成的。如果白天德军发现这个师进入新防线，他们就会去轰炸。现在你明白问题在哪儿了吗？”

显然，我当时一直懵懵懂懂，听了这番话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找来。必须保证在清晨以前迅速地把民兵第 6 师带进我们修筑的新防线。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方百军司令员当天下达的这道命令。这个情况，我没敢报告。我只是报告说：

“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马上去同集团军司令员一起把部队带进已经修好的防线。”

“你到底明白过来了……”朱可夫又写道——“快把部队带过去，你要记住，倘若到上午 9 点不把这个师部署好，我就枪毙你。”

贝切夫斯基离开朱可夫的办公室，在接待室见到了费久宁斯基。贝切夫斯基一脸的不自在，一看就知道，他近来在方面军司令员手下吃了很多苦头。费久宁斯基忍不住要运弄他一番，问道：“挨训啦，主任？”当时，贝切夫斯基上校跟敦厚的费久宁斯基还不十分相熟，所以他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合适，甚至含有恶意，不禁反唇相讥道。

“有点儿，将军同志，司令员说，要是早晨以前不把第 6 师部署到环城公路，他就要处决我。我们走吧。显然你们集团军司令部里谁也不肯过问象把第 6 师带进防线这种小问题。可实际上透明图已经交到你们集团军手里了！”

“别瞎生气了，主任！”这位似乎了解朱可夫性格的集团军司令员露出笑容道，“你还算走运。这位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说要把我们跟军事委员一起统死哩！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走了。我们打定主意再等一会

儿，因为我们知道司令员是不会把你如起来的。”

费久宁斯基的笑容使贝切夫斯基放了心，他们一起离开斯莫尔尼宫，消失在夜色中。

清晨以前，第6师进入了阵地，一切顺利。

德军突破到芬兰湾，离列宁格勒更近了，严重地威胁着这座城市。他们离市郊不到四英里，离规模很大的基洛夫工厂不到三英里。9月16日激战在继续，斯卢次克和普希金落入德军手中。列宁格勒市内一条有轨电车线的终点站亚历山大罗夫卡也于9月17日被德军占领。同一天，德军部分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开始调往中央集团军群。这时德军似乎差不多已经胜利在望了。

当德军接近沃洛达尔斯克和乌里次克时，朱可夫发现他们的左翼拉得太长。于是他决定使用第8集团军的部队进行反击，并迅速把第10、第11、第125和第168步兵师以及民兵第3师集结起来。通过在内部调整部署，他建立起一支突击力量，同时重新编成了自己的预备队。

9月17日，德军六个师在北方集团军群空军联队支援下，企图从南面向列宁格勒突破。

朱可夫命令继续进行反击，指示第8集团军司令员收复沃洛达尔斯克居民点，并向红村方向突击。第55集团军则受命把德军从斯卢次克和普希金公园赶回去。第42集团军则要扩大它在乌里次克地区的战果，同时守住靠近天文台的普尔科沃阵地的中段。

然而。第42集团军未能守住马里次克，9月18日傍晚，该镇再次为德军所占领。双方继续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战斗。到9月23日，可以明显看出德军进攻普尔科沃这个方向的突击力量大大地减弱了，因为只有二十辆坦克参加进攻。第42集团军成功地打退了敌人的继续进攻。这样，9月下旬德军企图通过乌里次克或普尔科沃高地到达列宁格勒的计划终于破产了。第42集团军在利戈沃、下科伊罗沃和普尔科沃一线巩固下来了。

德军进攻兵力至此已消耗大半，并且由于从列宁格勒地区调走了一些部队而进一步被削弱。虽说较大规模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25日，但由于苏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德军的战果非常有限。实际上，德军北方集团军群靠它掌握的兵力再也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了，因而不得不在整个战线上转入防御。他们集中力量建立起一个包围圈，企图最终把守军饿垮。

在德军的攻势开始失去势头的时候，朱可夫把一些新的师、旅和营（这些部队是由水兵、防空部队、内卫部队和预备役人员仓促编成的）投入到赤卫队城和斯卢次克——科尔平诺筑垒地域。他还从战线上不那么紧张的地段抽出一些部队，部署到遭到威胁的地段，以加强第一梯队并建立起纵深防御。

列宁格勒方面军在据守这个沿海桥头堡的战斗中，以及在打退德军对红村、乌里次克、普尔科沃高地和科尔平诺地区的进攻的过程中，都得到了波罗的海红旗舰队的巨大支援。舰队航空兵同列宁格勒方面军空军配合行动，在战场上，在德军集结地域，对德军进行轰炸，并对付德军的空袭以保护苏军部队。靠近芬兰湾的前线各防御地段，得到海岸炮和舰炮的支援，这些大炮参加了对敌炮兵作战，参加了炮火反准备，以及从其他方面支援第8和第42集团军的作战。在赤卫队城筑垒地域和沿海桥头堡，使用了舰炮，从而弥补了机动炮兵的不足。

炮火反准备——军事术语。在敌军将要开始进攻而进行炮火准备之前，集中大量炮兵突然打击进攻之敌的主要

集团，以粉碎敌之进攻或推迟其进攻时间。——译者注

但是，德军指挥部没有放松它对列宁格勒的压力，在城市周围的某些地段，红军仍遭受了一些挫折。苏军第 54 集团军和涅瓦河战役集群从 9 月 10 日至 26 日发动的攻势作战未能获胜。

八、九月间，苏军在列宁格勒西南接近地上的防御作战持续了五十天。他们的抵抗，打乱了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进行正面突击以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到 9 月底，朱可夫和他的部队稳住了列宁格勒南部接近地的战线。直到 1943 年 1 月，朱可夫再次回到列宁格勒组织突破封锁时，这条战线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直到那时为止，卡累利阿地峡和斯维尔河上的战线也一直是稳定的。

虽说红军把德军阻挡在列宁格勒郊外，但这座城市及其保卫者们的命运仍旧前途未卜。武力占领的企图失败后，德军指挥部决定进行封锁，让列宁格勒人挨饿，然后再摧毁该城。

9 月 18 日，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列宁格勒周围的包围圈还没有收得象人们可能希望的那样紧……考虑到我军在列宁格勒的严重消耗，而敌军又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军队和大量兵器，所以直到饥饿发生作用，为我们帮忙以前，局势仍将是困难的。”

在朱可夫负责保卫列宁格勒的那段期间，希特勒作出了决定：如（对方）投降，将不予接受。这是对他早些时候作出的必须把这座城市“从地球表面抹掉”的决定的具体化。9 月 22 日，德国海军司令部发布了“la 1601/4 号：关于彼得堡市的前途”的秘密指令。指令说，“元首”已经决定通过封锁、连续空袭和炮击，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如对方要求投降，将予以拒绝。

德军千方百计地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他们从陆地封锁这座城市，连续不断地对它进行炮击和空中轰炸。9 月份，德军进行了二十三次大规模空袭，而且大多都是在白天进行的。第一次是在 9 月 8 日，然而 9 月 19 日和 27 日的轰炸更加猛烈，分别出动了一百八十架和二百架飞机。从 9 月 21 日到 23 日德军指挥部共出动四百架轰炸机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其目标是要摧毁喀琅施塔得要塞，消灭驻在那里的波罗的海红旗舰队的主力。

这些空袭未能实现其目标，但列宁格勒的保卫者们却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为这座城市输送给养的唯一动脉——经由拉多加湖的交通线，由于处在德军连续不断的炮火和空中轰炸之下，只能部分满足被围部队和居民们的需要。

朱可夫付出很大精力来拟订列宁格勒外围防御准备工程的详细计划，并监督计划的实施。方面军的部队和列宁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们，得以在该城南、东南部、北部接近地上建立起周密的防区。它包括主要防御地带、次要防御地带以及一系列暂壕阵地和筑垒地域。在第 23、第 42、第 55 集团军和涅瓦河战役集群负责防御的地段，以及最靠近城市的地区，都修筑了大量工事，这些工事对于保卫列宁格勒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俄国人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记录了详尽的统计数字，而他们的军事史学家们似乎很乐意列举这些数字。在列宁格勒周围以及市内，一共挖了九十三英里防坦克壕、崖壁和断崖；设置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铁丝网；挖了七千一百七十九条步兵班堑壕和三百八十九英里交通壕；修建了一百四十座钢制的和混凝土石块砌成的炮兵掩体；建立了四百八十七个装甲火力点；修筑了一千五百个防坦克障碍物和“菱形拒马”（用钢轨焊成），以及一千三百九十五个

土木火力点；在建筑物内部，修了八百零九个火力点；设置了一千零八十九个指挥所、观察哨和地下掩蔽部，以及许多其他防御设施。

平均每天约有四万五千人在修筑防御工事。大量的工作是由妇女们完成的，她们跟自己的孩子和老人们一样，每天都在忍饥挨饿。从 10 月 1 日开始，每个工人只配给十四盎司 面包；而儿童、残废者以及文职人员只配给七盎司面包。这些妇女们所作出的牺牲，也许除了身临其境的人以外，别人是无法深切地体会到的。 一盎司合二十八点三五克。——译者注

费久宁斯基将军举出了一件既令人感动又叫人哭笑不得的事例。有一天他去视察俄国妇女们挖的工事。他写道“车子开到一排新挖的堑壕旁，我走下汽车，我想让这些妇女们快活快活，就说；‘你们挖得不错嘛，姑娘们，很好！’

“有一位妇女已经不很年轻了，她身穿一件磨得露出织纹的旧外套，脖子上就象农村妇女那样围了一块黑头巾。她直了直疲惫的身子，两手拄着她的铁锹，脸上毫无笑容地回答说：‘我们挖得不惜，可是你们打得不好。你们让德国人一直打到列宁格勒城下啦’”

费久宁斯基承认这位老妇说得对。“我能怎样回答她呢？”他企图改换话题，便问：“你的丈夫在哪儿？”

她回答说：“不知在哪个地方，跟你们在一起……往后退呗！”她喘了几口气，然后又抡起铁锹干活了。 费久宁斯基著《闻警而奋起》，第 57 页—第 58 页。——原书注

朱可夫把列宁格勒划分为六个防区。每个防区都修筑了若干坚固的阵地，以营防御区域为基础。大个防御地区内，共建立了九十九个营防御区域。朱可夫还强调必须在全城设置路障。并命令在路障前面挖掘防坦克壕。

防坦克阵地则分布在整个防御纵深内。到 1941 年 11 月，在第 42 集团军的防区内，已设置了四十一个防坦克阵地区域。为了确保坦克陷阱的效能，朱可夫配置了若干门防坦克炮担任掩护，其平均密度是每英里正面拥有三十四门炮。

列宁格勒的空防也得到了加强。国土防空军司令部把它在这个地区的防空部队的集中指挥权交给了方面军司令部。防空兵器配置在城市的近接近地上。一部分兵器群甚至部署在停泊于芬兰湾的驳船上。在这座被围城市的上空，还布置了阻塞气球，以阻挡德军轰炸机。

希特勒已经下令把空降兵调到列宁格勒。为了保卫城市不受空降兵的攻击，朱可夫组织了有效的对空降兵防御，它是由工人民兵小组、军事化的消防小组以及共青团支队组成的。

列宁格勒人还准备在市区内消灭德军部队。工厂、桥梁以及公共建筑物都敷设了地雷；万一德军冲进城来，就炸毁这些设施，把敌步兵和坦克困在里边。老百姓也准备展开巷战，并从住宅成建筑物里打击敌人。这样，由于朱可夫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以及居民们自己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使得这座城市实际上变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在以后的许多年中，保卫列宁格勒的英雄事迹，仍然使来自各地的人们激动不已。

朱可夫 1966 年在《军事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高度赞扬了列宁格勒的保卫者们。他写道。

我们所有参加过 9 月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人，都曾不得经历许多艰难

困苦的日子。然而，我们的部队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计划。靠着苏军战士们、水兵们、军士和军士长们的前所未有的不屈不挠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靠着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敌人在通往列宁格勒的道路上遇到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防线。到9月底，在我方面军所有地段上，战斗的紧张程度明显减弱，战线得到了稳固。

在指挥列宁格的方面军期间，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不断地收到总参谋部关于其他地区战局的报告，有许多消息是令人深感不安的。当然，他所负责的区域，到9月第三周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德军的进攻力量由于遇到顽强的防御而衰竭，轴心国部队被迫挖掘工事来据守包围圈。

德军9月17日撤走部分摩托化和装甲部队一举，对于这座城市得以保全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人们只能去猜测。德军预定9月底对莫斯科发动他们希望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突击。无论如何，撤走上述部队正是为此而采取的准备步骤——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第4集群预定参加这次突击。朱可夫也即将被召到莫斯科这个处境危急的地区去。

朱可夫处在列宁格勒这个有利的地位，收到了关于双方都在通往俄国首都的接近地上进行疯狂准备的消息。当时保卫莫斯科的有苏军的三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

西方方面军编成内有六个加强集团军和方面军预备队，守卫着从谢利格尔湖到耶尔尼亚这段防线，它的任务是阻止德军沿这个主要方向，向莫斯科突破。

预备队方面军以其第31、第32、第33和第49集团军在西方方面军后面沿奥斯塔什科夫——谢利日阿罗沃——奥列尼诺——斯帕斯一捷门斯克和基洛夫一线占领防御。这四个集团军作为后备，用来打退任何突破西方方面军防御队形的德军，因而构成了苏军防御的第二战役梯队。这个方面军还有两个集团军，即第24和第43集团军，部署在西方方面军防区从耶尔尼亚到弗罗洛夫卡的防线上。

勃良斯克方面军编成内有三个集团军和一个战役集群，守卫着杰斯纳河东岸从弗罗洛夫卡到普蒂夫尔的地段。它的任务是阻止敌军向勃良斯克——奥廖尔方向突破。

9月底，这三个方面军总共约有八十万军队、七百七十辆坦克和九千一百五十门多人操作的花炮，其中不包括补充部队和后方勤务部队。其中，兵力和兵器最多的是西方方面军。此处坦克和花炮数字与朱可夫回忆录所载有出入。柴可夫回忆录说，截至9月底，这三个方面军总共的有八十万，七百八十二辆坦克、六千八百零八门花炮和迫击炮、五百四十五架飞机。——译者注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有一百多万人、一千七百辆（门）坦克和突击炮、一万九千门花炮和迫击炮。德军地面部队得到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指挥的强大的第2航空群的支援。

德军这次代号为“台风”的攻势在10月初取得很大进展。西方方面军的第19和第30集团军以及预备队方面军的第43集团军遭到德军从杜霍夫施纳以北和罗斯拉夫尔以东发动的突击的严重打击，德军成功地突破了红军的防御。他们急速推进，从南北两面合围了苏军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在维亚兹马的所有部队。

对勃良斯克方面军的守军来说，也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在这里，

第 3 和第 13 集团军看来面临着被合围的危险。古德里安的部队未遇到严重抵抗，向奥廖尔急进。于 10 月 3 日夺取了该城。这次进攻对于苏联人来说是非常突然的，以致在德军冲进这个铁路枢纽和工业中心的时候，电车仍在照常行驶。由于进攻的突然性，撤走工业设施的计划失败了。德军在各条大街上发现了一些已经拆卸的机器和满装工具和原材料的木箱。

勃良斯克方面军在奥廖尔没有足够的部队来打退这次进攻。这个方面军被德军分割成两部分，部队损失很大，不得不向东和东南撤退。同时，在图拉方向上也出现了严重局面。

这时指挥着西方方面军的 N·C·科涅夫上将（9 月 12 日，铁木辛哥被解除方面军司令员职务，被指派去负责西南方向），决定对突破他的防御的德军实施反击。为执行这个任务，他使用了 N·B·鲍尔金中将的战役集群，但这次作战未能成功。到 10 月 6 日日终，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在维亚兹马以西被合围了。

尽管德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但他们开始对这次战役的结局产生了严重怀疑。

在 10 月 6 日夜间到 7 日清晨，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积雪没过多久就融化了。”古德里安回忆说，“跟往常一样，道路很快变成了满是泥淖的水沟，我们的车辆沿着这种道路只能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进，而且对发动机的磨损很大。”使困难变得更加严重的是，冬装还没有运到，而且直到 1941 年年底，被冻得半死不活的部队也未穿上冬装。

另一个不祥的迹象是，俄军防御部队的顽强凶悍。古德里安看到他的最优秀的军官们的情绪受到了残酷战斗的严重影响而大吃一惊。他指出，虽然陆军最高司令部和集群司令部的人员兴高采烈，但人们可以看到前线部队的军官们都是疲惫不堪的。

古德里安说，“态度的重大差别正在于此，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越来越大，直到几乎无法弥合”。他补充说，然而战斗部队不晓得他们的上司已经为胜利的气氛所陶醉。

10 月 6 日德军坦克部队突破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以后，继续向莫斯科以西大约五十英里的莫扎伊斯克筑垒防线推进。这条在 1941 年夏季经过改善的防线，是由加里宁延伸到卡卢加、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和图拉的一系列筑垒阵地构成的。但是，不能指望守卫它的为数不多的部队，能够挡住向东挺进的大批德军。极其迫切需要的增援部队，正在从苏联远东和中亚开往前线的途中。

与此同时，德军从列宁格勒地区抽调几个师，派往莫斯科参加战斗。第 5 坦克师没有休整就直接开赴中央集团军群。第 19 和第 20 坦克师正在前往中央集团军群的途中。一个西班牙师于 10 月初被派往列宁格勒，但由于苏联游击队破坏了铁路交通，这个师迟到了一段时间。

在这个关键时刻，斯大林再次把朱可夫召来。直到 1966 年 8 月，朱可夫为纪念莫斯科会战二十五周年，开始在《军事史杂志》上发表他写的关于莫斯科会战的回忆录以前，有关这次他应召前往克里姆林官的详细情况，还没有人谈起过。虽说这篇回忆中讲到了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情形，但文章大体上证实了早先关于这次会战的报道。

10 月 6 日傍晚；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问他列宁格勒的情况怎样。朱可夫报告说德军已停止进攻。据俘虏的口供说，德军损失严重，现已转入

防御。但城市仍在遭受德军炮击和空袭。朱可夫报告说，苏军的空中侦察发现德军机械化和坦克纵队正从列宁格勒向南大规模运动，并发表看法说德军指挥部显然正在把这些部队调往莫斯科。

一天以前，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预定 10 月 6 日向拉多加湖地区发动进攻的计划被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撤消，同时下达了把一些装甲师调走的命令，并说一俟集结了足够兵力以后，将由步兵来发动这次进攻。

听了朱可夫的报告以后，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在莫斯科方向，特别是在西方方面军地域出现了严重局势。斯大林对朱可夫说：“把你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工作交给参谋长霍津将军，你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虽说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但事实上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电话给指挥第 42 集团军的费久宁斯基。“你没忘记你是我的副手吧？”朱可夫问他的朋友道，“你马上来吧！”费久宁斯基很快动身前来斯莫尔尼宫。他到达以后，才知道为什么打电话给他。朱可夫对他说：“你指挥这个方面军吧。用不着再向你介绍情况，因为你都清楚。

他们要我立即到最高统帅部去。”
费久宁斯基著《闻警而奋起》，第 60 页。——原书注

档案材料表明，费久宁斯基负责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一直到 10 月 26 日，然后他接替 M·C·霍津担任第 54 集团军司令员，而霍津则被提升到负责领导这个方面军的岗位。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略去了这些细节，只是说他把斯大林的指示传达给霍津将军，同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告别以后，便前往莫斯科了。保卫莫斯科的会战已在进行中，而朱可夫将在这次会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7 年朱可夫被赫鲁晓夫撤职以后，军事史学家们似乎不大愿意再指名提到朱可夫。

在一卷卷书籍中，几乎只是顺便提起他，或者只是在注释中对于委派给他的任务一笔带过。一本关于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史书籍《列宁格勒保卫战》，指名提到朱可夫的只有一处，而赫鲁晓夫当时不在列宁格勒，却被指名提到两次。提到伏罗希洛夫共有五处，而且书中还有一张他的照片。作者们避开了赞扬朱可夫组织列宁格勒的防御这个问题，在提到他的时候只用“方面军司令员”，或者干脆用“司令部”这几个字来代替。下边的一段话就是一个例子：

在评价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配量和作战编成时，必须指出，司令部创造性地汲取了以前历次战斗中取得的经验，没有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分布兵力兵器，而是把主力集中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上，即列宁格勒的西南接近地和南部接近地上。这个决定是非常及时和完全正确的。

巴尔巴申等著《列宁格勒保卫战》，第 97 页—第 98 页。——原书注

然而这个决定正是由朱可夫作出的。

第八章 保卫莫斯科

1941 年 10 月 7 日黄昏，T·R·朱可夫大将乘飞机在莫斯科中央机场着陆以后，立即奔赴克里姆林宫。当他来到克里姆林宫时，看见斯大林正独自一人呆在他的办公室里。斯大林正想着流行性感冒，身体显然不大好。

他向朱可夫点头致意，然后指着地图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斯大林吩咐朱可夫立即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解情况，然后随时打电话向他报告。

“我将等着。”斯大林说，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十五分钟以后，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办公室。朱可夫 7 月底前往担任在斯摩棱斯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重新就任总参谋长职务。

看样子他疲劳极了。他的健康不佳，不久便迫使他离职了。

他向朱可夫问好之后说，斯大林已来过电话，指示他为朱可夫准备一张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莫斯科接近地的地图（见附图 2）。

沙波什尼科夫说：“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就驻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8 月份曾经驻过的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对耶尔尼亚突出部进行了一次战役。”

在介绍了几个方面军的危急处境以后，沙波什尼科夫补充说，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和莫斯科近接近地上修筑阵地的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而且这些地方几乎没有部队驻守。他认为必须派部队占领这些防线，首先是莫扎伊斯克防线。

就在当天夜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一些部队和邻近的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已开始向这些防线调动。

朱可夫熟悉一下情况，立即带上地图前往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途中，他用手电筒照亮，继续研究了敌我双方的位置和行动。当他（目困）得打盹的时候，就要司机停下车子，下车到清新的秋天空气中跑二三百码的路。

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值班军官报告说，全体领导干部都在方面军司令员 N·C·科涅夫上将那里。朱可夫走进房间，科涅夫、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参谋长和作战部长正在几支蜡烛的昏暗亮光下开会。尽管房间很暗。朱可夫还是能够看见大家脸上的紧张表情。

朱可夫说明了斯大林派他来的用意。参谋长 T·K·马兰金中将回答了朱可夫提出的问题，并汇报了 10 月 2 日至 7 日的情况。

德军重新调整了在莫斯科近接近地的部署，使它的步兵兵力在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的战线上，超过了苏军。苏军最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向这三个方面军发动集中突击，因为防御中有缺口，而且手头没有预备队来填补这些缺口。

10 月 8 日凌晨 2 时 30 分，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当时还在工作。朱可夫报告说，当前，主要危险是部队不足。他说，莫扎伊斯克防线兵力薄弱，可能无法阻止德军装甲部队向莫斯科突破。必须尽快向莫扎伊斯克调动部队。

斯大林问朱可夫：“西方方面军的第 16、第 19、第 20 集团军和鲍尔金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 24 和第 32 集团军现在在哪里？”

“被合围在维亚兹马以西和西北地区。”朱可夫回答道。

“你打算做些什么？”

“我现在要去找布琼尼……”

布琼尼这时担任预备队方面

军司令员。——原书注

“可是，”斯大林问道，“你知道布琼尼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不，我不知道。我要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地区的某个地方去找。”

“好吧，见到布琼尼，你就从那儿打电话给我。”斯大林说。

朱可夫动身去找布琼尼。天正下着小雨，乡间田野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拂晓，朱可夫来到距莫斯科大约五十六英里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他看见两名通信兵拉着电线从普罗特瓦河桥上走过来。他问他们给那里拉线，他们的回答很唐突。一名战士冰冷地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朱可夫对两名战士说，他了解他们的职责，不回答陌生人的问题是对的。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告诉他们，他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和布琼尼元帅。那名士兵告诉朱可夫说他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并指给他应该怎么走。

十分钟后，朱可夫来到3·麦赫利斯（正集团军政委级）的办公室，参谋长A·Q·阿尼索夫少将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朱可夫很不喜欢麦赫利斯，因为麦赫利斯曾积极参与过清洗。

朱可夫走进来的时候，麦赫利斯正在电话上严厉申斥什么人。朱可夫解释说，他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奉斯大林之命前来找布琼尼。麦赫利斯告诉他，司令员昨天到第43集团军去过，但是方面军司令部同他失去了联系。他的司令部的领导干部们都担心他也许出事了。已经派出联络军官去找他，现在还没有回来。

无论是麦赫利斯，还是阿尼索夫都不能向朱可夫提供有关敌军的位置和方面军各部队状况的具体情况。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为麦赫利斯说，“现在，我正在收拢无组织地退却的人员。我们将在集合地点给他们补充武器并编成新的部队。”

于是朱可夫经由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和美登前往尤赫诺夫，希望到现场对情况作出第一手的估计。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和奥布宁斯克时，朱可夫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他想起在奥布宁斯克车站，他妈妈把他送上火车，让他去莫斯科的亲戚家学皮货手艺。那时他才十一岁。这一带乡村，他非常熟悉，年轻的时候，他几乎走遍了这个地方。这时当他经过奥布宁斯克时，他想到就要打仗了，仍然住在他的出生地斯特列尔科夫卡的母亲、姐姐和她的四个孩子怎么样了？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可是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会怎样呢？法西斯能查出他们是朱可夫大将的母亲、姐姐和外甥、外甥女吗？那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三天以后，我派我的副官去接他们，把他们从村子里接到了我在莫斯科的寓所。”

朱可夫来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一直走到市中心，没有碰到一个人。他走到区执行委员会大楼，看见了两辆汽车。有一位司机正坐在方向盘后面打瞌睡。

朱可夫回忆说：“我们不得不把司机叫醒，他说这是谢苗·米哈伊洛维奇的车子，布琼尼在房子里呆了大约三小时了。我进了区执委会大楼，见到了C·M·布琼尼。我们互相亲热地问好。看来，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老多了。”

听说朱可夫去过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布琼尼便说他两天多没跟科涅夫

联系了，而且在他去第 43 集团军视察期间，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不知道已经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朱可夫把司令部的位置告诉了布琼尼，并向他深刻地说明了西方方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它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部队被包围了。

“这里的情况也不比其他地方好。”布琼尼回答说，“第 24 和第 32 集团军已被切断，已经没有一个防御正面了。昨天我在尤赫诺夫和维亚兹马之间差一点落到敌人手里。敌人向维亚兹马方向调集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看来是想从东面迂回包围该城。”

“尤赫诺夫在谁手里？”朱可夫问道。

“现在不知道。在乌格拉河附近发现敌人一个小分队和大约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但没有炮兵。我想尤赫诺夫现在已落入敌人手里。”

“唔，”朱可夫问，“谁担负掩护从龙赫诺夫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的道路？”

“当我来这里时，”布琼尼说，“除了在美登看到三个民警外，路上没遇见一个人。”

朱可夫很有礼貌地，而且很得体地写道：“我们商定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应当立即口方面军司令部去，并从那里把情况报告给最高统帅部，而我则到尤赫诺夫地区，然后再到卡卢加去。”

在马洛亚罗斯拉维茨西面不远，朱可夫见到了筑垒地区司令。这位军官报告了防御工程的进展情况和这里的工人营的数目，以及各战斗部队能够用于保卫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接近地的种种手段。他们两人讨论了怎样组织侦察，怎样使筑垒地域作好战斗准备的问题。然后，朱可夫继续向美登方向奔去。

美登这个城市已被放弃了。朱可夫来到美登，只看见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朱可夫问她道：

“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站在那里，花白头发蓬乱不堪，瞪大两只眼睛望望他，没有回答。

“老太太，你怎么啦？”朱可夫又问。

老太太开始默默地挖起来，根本不理睬朱可夫的问话。

从废墟后面什么地方又走出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东西。

“请不要问她，”她对朱可夫说，“她不会回答你的问话的，她因为悲伤而疯了。”她对朱可夫说，前天德国飞机轰炸，扫射了这座城市。炸死炸伤了许多人。活下来的人都迁到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去了。这位老太太跟她的小孙子住在一起。空袭时她正在井边打水，她看见炸弹落到她家房子上，而她的孙子这时正在房子里。

这个女人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她想在废墟下面挖回点儿鞋袜衣服之类。她一边跟将军说话，一边流泪，泪水从她的两颊簌簌落下来。……

朱可夫同她告别，然后继续前往尤赫诺夫。朱可夫后来写道：“很遗憾，我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这位妇女，安慰其他因战争而受苦受难、充满悲哀的苏联同胞们。”

当朱可夫的汽车向尤赫诺夫开去，经过一片森林的时候，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红军士兵挡住他的去路。一名士兵走过来对朱可夫说不准再往前走了。朱可夫说出自己的姓名，并问这个士兵他们的部队驻在哪里。士兵回答说坦克旅旅部就在森林里，离这儿约一百码。朱可夫要他们带他去

旅部。

走进树林，朱可夫看见一名同样身穿蓝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军官，正坐在树墩子上。一看见朱可夫，这位军官立即起身立正，报告说：“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上校向您报告！”

原来，特罗茨基于 1939 年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曾在朱可夫手下作过战。这位上校当时担任坦克第 11 旅参谋长。该旅在巴英查岗山曾打败过日军步兵第 23 师，这个师是皇军禁卫军的一部分。朱可夫遇见老朋友自然很高兴。

特罗茨基报告说，德军已占领了尤赫诺夫，他们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乌格拉河桥。向卡卢加派出的侦察部队查明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正在进行战斗。

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 5 师和第 43 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特罗茨基指挥的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旅，已经在这个地区呆了两天了，但还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朱可夫吩咐特罗茨基派联络军官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向布琼尼报告情况，并要他把一部分坦克部署到前边去，组织防御，以掩护美登的接近地。朱可夫还指示这位上校，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把朱可夫对他下达的命令通知总参谋部，并向总参报告朱可夫要到卡卢加的步兵第 5 师去。然后朱可夫同他告别就动身了。

这时已经很明显的是，必须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起来，统一指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和科涅夫一起在克拉斯诺维多沃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开会讨论局势，最后认为这两支部队应立即重新改编为西方方面军，并向斯大林建议任命朱可夫为司令员。最高统帅部同意了这项建议。朱可夫很快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最高统帅命令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你已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10 月 10 日凌晨，朱可夫来到位于莫扎伊斯克西北约两英里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仍在那里。对此，朱可夫后来说：“从他们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匆忙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这一事实来看，从我跟国防委员会委员们的谈话来看，很容易判断出最高统帅对莫斯科附近出现的困难而又非常危险的局势是极为忧虑的。”

朱可夫在关于这次会战的回忆录中概括了 10 月初最高统帅部感到忧虑的一些问题。

他指出，西方方面军司令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部对于形势的估计有严重的错误。在德军正在为这次攻势制订计划的时候，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没有进行必要的防御准备。尽管最高统帅部曾发出警告说德军集中了强大的部队来对付他们，但他们忽视了侦察，没有把他们的部队配置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方向上。没有组织纵深防御，也没有把防坦克部队和方面军预备队及时调上来。没有趁敌人的主力在出发地域集结的时机，用炮火和航空火力打击这些敌人。当德军在维亚兹马地域突破苏军防御时，司令部没有作出安排，来撤退面临被包围危险的部队。结果使第 16、第 19、第 20、第 24 和第 32 集团军被包围了。

朱可夫正在方面军司令部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一起开会的时候，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从 7 月起兼任此职）确认已批准他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并问他是否有不同意见。

斯大林同意让科涅夫担任方面军副司令员，并赞成朱可夫的建议，把

加里宁方向的部队交给科涅夫指挥，因为这些部队离方面军司令部太远，需要有一个辅助指挥机关。斯大林告诉朱可夫说，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防线，以及正开往这一地区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也都交给他指挥。斯大林最后命令道：“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

埃里克森写道：“朱可夫——红军最能干的首脑之一，担负起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军的领导责任。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整个战线上的红军部队中，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兵力集中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上。单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最高统帅部确实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方面军。”

朱可夫的一位亲密同事 K·K·罗科索夫斯基写过这样一段话：

在这以前许多年，我就已认识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了。戎马生涯使我们多次聚首。多次久别，我们之间职务上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T·K·朱可夫始终是一个意志坚强、处事果断、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天赋的人，一个要求严格。坚持始终和目标明确的人。所有这一切品质对于一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首长来说无疑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品质正是朱可夫的特点。说真的，有时候他的严厉超过了可以容许的限度……我应当说，在莫斯科会战战斗最激烈的那段时期，我认为我们的方面军司令员有时候犯有末端采取粗暴态度的错误。 K·K·罗科索夫斯基著《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 年 11 月号，第 47 页。——原书注

人们必须记住，正是由于朱可夫具有这些品质，他不去考虑下级的个人感情，才使得他能够组织起莫斯科的防御。为了挑起挽救莫斯科和俄罗斯祖国这个极其沉重的担子，他每每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于是他在全军就有了这样的名声：他是一位严格、顽强、果断，甚至态度粗暴的司令员。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精力着手执行他的新任务。他同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后者此时担任朱可夫的参谋长）一起开了会，当场就一些问题作出了决定。首先，他们一致同意把方面军司令部迁到阿拉比诺。其次，派科涅夫带上几名军官前往加里宁，去协调一那个极重要的方向上的各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则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一起前往莫扎伊斯克，到现场视察防御状况。

10 月 3 日清晨，科涅夫奔赴加里宁。那里的情况极为严重，必须对部队进行改编和重新部署。他亲自接管了第 22、第 29、第 30 和第 31 集团军的指挥权。德军攻占了加里宁，但无法再继续前进。几天以后，即在 10 月 17 日，成立了加里宁方面军，科涅夫任该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和布尔加宁来到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司令部，筑垒地域司令鲍格达诺夫上校迎接了他们。当人们开始开会的时候，炮声和炸弹爆炸声清晰可闻。鲍格达诺夫报告说，加强有炮兵和一个坦克族的步兵第 32 师，正在鲍罗季诺的接近地同德军先头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展开激战。朱可夫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他的防御地段，接着就前往设在阿拉比诺的方面军司令部。

同时，朱可夫的司令部人员完成了他交给他们的许多战役组织工作。他们制订了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卡卢加一线建立牢固防线的具体方案，他们还要在那里建立纵深防御，并组建方面军预备队。

莫扎伊斯克防线，对于守卫它的红军部队来说，具有一系列有利条件。

它的正面，得到拉马河、莫斯科河、科洛察河、卢热河和苏霍德烈夫河的保护，这些河的河岸都很陡峭，对坦克的运动构成天然障碍。在这条防线上，公路网和铁路网四通八达，使部队能够在各个方向上实施广泛的机动。

苏军指挥部感到苦恼的唯一问题是部队不够，无法有效地占领这条一百三十六英里长的防线。直到 10 月 10 日为止，在这条防线仅仅部署了四个步兵师、三个后备步兵团、五个机枪营以及莫斯科炮兵学校、莫斯科军政学校、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学院和波多尔斯克机炮学校的学员们。虽然原来设想要部署一百五十个营来守卫这条防线，但实际只凑足了四十五个营，部队的平均密度是每个营负责守卫三英里宽的正面。

最高统帅部继续采取紧急措施来保卫首都。10 月 10 日，莫扎伊斯克防线司令部更名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并得到了五个新改编的机枪营、十个防坦克炮兵团和五个坦克旅。

10 月 11 日，莫扎伊斯克防线的部队并入第 5 集团军，由 列柳申科指挥。随着各方面军部队的撤退，后撤的部队开始集结在这条防线上。

朱可夫的使命是明确的，时间是宝贵的。他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有些人简直累得站都站不稳了。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莫斯科预备方面军的所有战斗部队和设施，应在 10 月 12 日午夜 11 时以前移交给朱可夫的经过改组的西方方面军。同时，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派去了他迫切需要的预备队。从 10 月 7 日起，从其他方面军和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抽调部队派往莫扎伊斯克的有。十四个步兵师、十六个重新编成的坦克旅、四十多个炮兵团、十个敷雷和喷火器连以及其他部队。朱可夫回忆录中所载数字为十一个步兵师。——译者注

与此同时，朱可夫面临着另一个问题：使被合围在维亚兹马的各集团军摆脱重围。

在这方面，他仅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

在南部的勃良斯克附近，红军展开激战，试图突破合围。但是仅有少量部队于 10 月 9 日在谢夫所克地区突围成功。古德里安写道：“可惜的是，已经突围的部队中看来包括俄军第 13 集团军司令部”

两天以后，德军机械化部队有很大一部分陷入泥淖而开不动了。苏军试图沿纳夫利亚河两岸冲出特鲁到切夫斯克包围圈。关于这次战斗。古德里安写道：

在摩托化步兵第 29 和第 25 师之间的地段，爆发了激烈战斗。敌人得以在我防御上打开一个缺口。仅仅由于第 5 机枪营及时赶到，才封闭了这个缺口。与此同时，奥廖尔东北姆岑斯克的坦克第 24 军的地域，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坦克第 4 师杀出一条路向该城市区挺进，但由于道路泥泞，该师无法迅速得到支援。俄军大批 T - 34 型坦克投入战斗，使德军坦克遭受沉重损失。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拥有坦克优势，但从这以后，情况发生逆转。

因此，迅速夺取决定性胜利的前景变得暗淡了。

两天后，俄军又继续奋力要在纳夫利亚河和博尔切夫科之间突围，约有五千人且战且走，冲过了德军防线。但是，10 月 17 日，德军得以歼灭被合围在勃良斯克以北的第 50 集团军的大部。

尽管如此，在 10 月的这些危急的日子里，苏军的顽强防御，暂时阻止了德军的攻势。

它为从侧翼组织莫扎伊斯克防线的防御，从而防止敌人夺取莫斯科赢得了宝贵时间。朱可夫命令在威胁最严重的接近地的道路上，建立许多防坦克支撑点和火炮支撑点，并且特别注意可能进行伏击的阵地。10月17日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以后，朱可夫负责的地段减少了一半，使他能集中力量来保卫通向首都的最直接的接近地。

10月月中，重新编成的第5、第16、第43和第49集团军，仍旧只有九万人，与保卫这条漫长防线所需的兵力相比要少得多。因此，朱可夫决定首先保卫比较重要的接近地——沃洛科拉姆斯克、伊斯特拉、莫扎伊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波多尔斯克—卡卢加这些方向，并用能够得到的大炮和防坦克兵器加强了这些地段。派遣能干的、有经验的指挥员去负责这些地段：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第16集团军和沃洛科拉姆斯克筑垒地域；И·А·戈沃罗夫指挥第5集团军，即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Р·И·戈卢别夫指挥第43集团军，其中包括马洛亚罗斯拉维茨筑垒地域；而N·Т·扎哈尔金则负责第49集团军，任务是守卫卡卢加筑垒地域。

在第一梯队的后方，红军工兵部队沿着敌军坦克最可能的接近路设置了障碍物和防坦克工事。预备队也调到主要方向上。方面军司令部再次迁移，从阿拉比诺迁到佩尔胡什科沃。朱可夫写道：“这样一来，便重建了西方方面军，打退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莫斯科的突击”。

10月13日，朱可夫所部被迫放弃卡卢加，并在莫斯科所有的主要接近地上进行浴血奋战。据方面军情报部门的情报，10月15日，已有五十多辆德军坦克推进到图尔基诺沃地区，大约一百辆坦克推进到洛托施带地区，一百多辆坦克推进到马卡洛沃和卡拉加托沃地区，大约五十辆坦克到达博罗夫斯克地区，还有四十辆坦克到达鲍罗季诺。德国陆军第13军向塔鲁萨方向进攻，夺取了塔鲁萨和阿列克辛两个城镇，从北面对图拉形成深远包围。

西方方面军在敌人日益增强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后撤退，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方面军司令部未能守住莫扎伊斯克防线。德军在西方方面军防御中部的纳罗—佛敏斯克和波多尔斯克方向上完成了纵深突破。第5、第43和第49集团军放弃了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带的主要防线。这样一来，就在莫斯科近接近地上造成了极其困难的局势。

这时，首都的紧张气氛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行人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行走，因为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都被征用，向前线运送部队去了。在整个城市，“黑雪”从一座座公共建筑物的烟囱上空纷纷日落下来。所谓“黑雪”乃是急急忙忙焚毁文件时烧焦的纸片。10月15日，星期三，莫洛托夫召见外交团，通知他们当晚随同政府一起离开莫斯科前往古比雪夫。但是，斯大林决定留在莫斯科。

目击过这些事件的新闻记者亨利·卡西迪回忆说：

我们已领到了前往古比雪夫的车票。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去取我的打字机。可是，首先要发一条消息。美联社曾要我写一篇关于列宁墓的文章。“陵墓关闭了。”我打出这么一句话，然后关上打字机。我觉得我发了这条消息，等于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瞥见的莫斯科会战的最后一个场面，是一名骑兵骑着一匹黄褐色小马，在高尔基大街和库兹涅佐夫桥大街的交叉路口的街角上，在一名警察面前拉住马，向前探着身子说话。我的异常兴奋的大脑想象他是在打听上前线

的路。我当时真想大喊一声。”顺着莫扎伊斯克公路往前走，离这儿不远啦。”

亨利·卡西迪著《莫斯科电讯，1901—1943》，第148页—第150页。——原书注

山现了惊慌失措的情形，因为到处谣传说德军坦克随时可能。冲进莫斯科市区。有人冲商店，抢劫运载罐头食品的卡车，有人烧毁党证，并摘掉了斯大林的像。

A·M·萨姆索诺夫在他的一本关于莫斯科会战史的书《莫斯科城下的大战》中写道。

就在市区内，出现了惊慌失措的场面；10月16日、17日和18日这三天特别明显。这几天是形势最危急的日子，也正是苏联人民的坚定和勇敢经受严峻考验的日子。

……在莫斯科人正以无比的气概表现出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随时准备参加英勇战斗的时候，可以看到极少数居民中种种惊慌失措的表现。在首都，发现有人散布恐慌情绪，有人放弃自己的工作，有人急忙逃离这座城市。甚至还有不折不扣的叛徒，企图利用已经出现的局势来抢劫社会主义财产。破坏苏维埃国家政权。

朱可夫证实了萨姆索诺夫的记叙。并且描述了政府为对付这种局面而采取的措施：

疏散是在10月16日夜间开始的。对所有这些措施，莫斯科人都是以充分理解的心情来对待的。可是正象俗话说的，人多难免出败类。发现有一些胆小鬼、制造恐慌者、谋私利者匆忙南开莫斯科逃向四百八方。他们散布恶毒的谣言，说放弃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动员起来打退敌军，也为了制止由于奸细分子的破坏而在10月16日在莫斯科出现的恐慌情形。国防委员会于10月19日决定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宣布戒严。

苏联报纸上公布的这项命令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所有敌人将立即送交军事法庭审判，所有奸细、间谍或煽动骚乱的其他敌人将予就地处决。命令中还说，在莫斯科以西六十二英里到七十四英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已交给朱可夫负责。

这段时期是朱可夫一生中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工作，以保全俄国的首都。从沃洛科拉姆斯克经莫扎伊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到谢尔普霍夫的防线上，防守的苏军兵力仍然是薄弱的，而且防线上的一些地段已被德军占领。为了阻止敌人突破到莫斯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选定了诺沃扎维多夫斯基——克林——伊斯特拉水库——伊斯特拉郊区——扎沃隆基——红帕赫拉——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线作为主要防线。朱可夫认为把西方方面军各集团军从莫扎伊斯克防线后撤，部署到新防线上是适当的。

朱可夫制订的计划考虑到苏军也许不能在莫扎伊斯克防线挡住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将撤到新防线上已经准备好的阵地。得到防坦克武器加强的后卫部队将发动有限的反击，以尽可能长久地阻滞敌人。为了保证军用车辆畅行无阻，其他车辆不得开往莫斯科方向或经过莫斯科。

这项建议，落款日期是10月19日，是由朱可夫、布尔加宁和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中将签署，并呈送给最高统帅部，当天就得到批准，同时秘密下达给各集团军司令员，由他们针对这项建议制订出详细计划。

10月19日广播电台宣布莫斯科实行戒严以后，所有仍留在莫斯科的市民们都集合起来，帮助组织城市的防御。在三天时间里，工人、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职员和学生们已经动员起来，组成了二十五个民兵营（兵力一万二千人）。到10月底，民兵营进一步增加到四个师，共达四万人。

此外，还建立了一百六十九个巷战小组和数百个坦克歼击组，两者总计共有一万人。

莫斯科的工厂开始生产修筑防御工事所必需的各种材料——菱形拒马、铁轨、水泥、砖以及其他材料。很快就动员了四十五万人参加修筑首都周围的防线，其中有四分之三是妇女。到11月底，莫斯科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的整个防御体系差不多已全部竣工。

莫斯科人民在严寒气候下艰辛劳作，建立起一个蔚为壮观的环形防御。在莫斯科附近和城内的各条防线上，修建了二百零一英里防坦克障碍物（不包括布雷区）；设置了一百五十八英里防步兵障碍物；修筑了三千八百个火力点，其中有一千五百个钢筋混凝土火力点；制造并架设了三万七千五百个金属菱形拒马。为加强莫斯科附近的防线，还敷设了爆炸物和木制障碍物。

战斗正在莫斯科西部接近地上激烈进行着，莫斯科市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困难。10月和11月，德国人派出越来越多的轰炸机轰炸首都。莫斯科人冒着空袭，对莫斯科市内和市郊的大型工业企业继续进行大规模疏散。八万八千辆铁路货车，满载着设备、金属材料和各种半制成品，满载着工人及其家属，奔赴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在新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工厂。

在开始向东疏散之前，莫斯科共有七万五千台金属切削机床；经过疏散，只留下二万一千台。战前，莫斯科的供电系统发电能力大大超过一千四百万千瓦；到1941年秋，发电能力不足上述数字的一半。没有撤走的工厂加紧生产各种兵器。例如，莫斯科的一家工厂每天能生产一千五百支什帕金式冲锋枪。

尽管局势非常严重，斯大林决定举行传统的十月革命节阅兵式。11月1日，朱可夫被召到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口答说，德军在最近几天内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们在10月份的作战中遭到了严重损失，现在正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但是德国军队能够，而且肯定将企图进行破坏。最后决定。无论如何要举行阅兵式。为了防备在庆祝活动中遭到空袭，从友邻的方面军调来了战斗机以加强首都的空防。

莫斯科的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传统的庆祝活动，在十月革命节前夕，在一个不寻常的地点——地下深处的“马雅科夫斯基”地下铁道车站举行。第二天，即11月7日上午，苏联公民们在飘着雪花的初冬雾中，观看了一次独具风格的阅兵式。一支支全副武装的部队从列宁墓前走过，直接开赴前线。

“这次十月革命节阅兵式无疑具有重大的国内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朱可夫写道。

在红场的演说中，斯大林设法鼓舞他的听众们，他提请他们注意，比现在还要艰难的日子他们都挺过来了。他让听众们回想一下1918年的情形，

那时四分之三的国土都在敌人手里。他说，当时俄国没有盟国，而红军还在草创时期。可是，1941 年的情形却不同了。苏维埃俄国有了盟国，同它一起组成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德国法西斯罪行累累，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在一年之内一定会垮台。斯大林最后列举了俄国的伟大先驱者和民族英雄的名字，他说苏联人打的是一场解放战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将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他们。

11 月上半月，苏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挫败预计德军将实施的对莫斯科的攻势。朱可夫继续加强莫斯科附近的防线，并调整了西方方面军的部署。关于朱可夫所起的作用，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作过详细的、有益的介绍。除了记载他负责的地段的作战情况外，别洛夫还描述了他和朱可夫一起出席的一次战略计划会议的情形。他对于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的记述是很有趣的：A·别洛夫著《莫斯科就在我们身后》，第 42 页——第 43 页。——原书注

11 月 9 日 15 时 45 分，我来到伏龙芝大街上的会合地点。天气阴冷，秋日早临的黄昏已经开始了。不久，朱可夫的车子开来了，我上了车。

我们从鲍罗维茨基大门进了克里姆林宫。有一段不长的路是徒步走的。我们静静地走着。司令员只是在一处停留一会儿，用手指着一个圆坑说：“炸弹坑。”

在离弹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通向地下室的入口。我们沿阶而下，来到一条长长的走廊。

别洛夫描写了这座地下建筑物中许多戒备森严的房间。走廊的尽头，一扇门开着，通向一间宽敞的、灯火通明的房间。在最左边的墙角处放着一张大写字台，上面摆着好几部电话机。

朱可夫把我介绍给站在办公室中央的斯大林。

如今，我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记起那些细小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初次印象使我感到惊讶和迷惑不解。

在那个年代，报纸上对于斯大林是写得很多的，说他坚强、英明，是一个天才人物……

自从 1933 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他的模样已经大变了。我百前站着的是一个个头不高、面容疲倦而瘦削的人。八年时间里他好象老了二十岁。可是，朱可夫的举止更使我惊异。他讲话言辞尖锐，有一种傲慢语气。给人的印象是，这里的高级首长也许是朱可夫。而斯大林也完全体察了这一点。他脸上甚至不时露出有些困惑不解的神色。

对于别洛夫所谓的朱可夫讲话的“傲慢语气”，人们很难无保留地予以接受。别洛夫也许是误解了朱可夫所特有的自信和他意识到他肩负的重任。而且，在同这位大将密切共事近一年时间以后，斯大林不可能不对他的无可否认的才干产生深刻印象。朱可夫关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预言性的警告，必定提高了他在最高统帅心目中的地位。在斯大林的老朋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未能阻止德军前进之后，挽救危局的重担就落在了朱可夫的肩上。不可低估的是，正是朱可夫使斯大林确信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是可行的。在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似乎没有理由怀疑斯大林不把朱可夫看作是在紧急时刻可以指望的人。

而在朱可夫方面，他也能把自己的首长看作是比较具有普通人的性格

的人物，而不是看成象苏联报刊描绘的从来不犯错误的天才。朱可夫后来在同继任的苏联领导人交往时，沿袭了这种“平等”态度（也许在军事问题上甚至还有优越感），而他后来遭遇的一些麻烦中，有些麻烦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态度引起的。

什捷缅科将军对朱可夫当时的情形作了有趣的描写：“在前面各章里，我对朱可夫元帅已经讲得很多了。但是必须补充这样一点，即他是一位有着杰出的指挥才能、胆略和独到见解的人。他实行他的决定是非常坚决的。为了追求这场战争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遇到什么障碍，他也不会停步不前。当朱可夫觉得在某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上自己正确的时候，他能相当尖锐地同斯大林抗争，而这是别人谁都不敢做的。”见 C·M·什捷缅科著《战争年代的苏军总参谋部》，第 383 页。——原书注

据别洛夫的记述，斯大林在听完朱可夫的反突击计划之后，批准了这项计划，同时拨出三个空军师来支援这次作战行动。他命令把反突击推迟二十四小时，以便使在朱可夫右翼作战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完成其准备工作。重要的是，作战行动必须在两个地段同时发动，以防德军以其预备队实施机动。

在会见时。别洛夫表示急需增加一批自动武器。他强调指出，德军在火力上明显超过苏军徒步作战的骑兵。斯大林答应给别洛夫一千五百支自动步枪和两个新的七十六毫米口径火炮连。

同时，最高统帅部把第 50 军配属给西方方面军，并把图拉的防御任务交给朱可夫负责。这就意味着方面军的防御地带又大大加长了。朱可夫开始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得到新的补充部队和坦克部队来加强防线。其中有些部队刚刚在乌克兰执行作战任务归来。

来自最高统帅部的部队，被集中使用在最危险的接近地上，特别是用在预计德军装甲兵团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和伊斯特拉方向上。战士们领到了暖和的冬装——短大衣、毡靴、絮得很厚的棉衣和有耳套的帽子。与此相反，衣衫单薄的德军已经被“严寒将军”折磨得瘦弱不堪了。

虽然西方方面军得到大量增援部队，到 11 月中旬已经拥有六个集团军，但都队分散在三百七十多英里的战线上。朱可夫希望确保受威胁较大的地段的安全，并掌握一支方面军预备队，以便在必要时实施机动。但是，11 月 13 日，斯大林打来电话，朱可夫不得不猝然改变计划。对于这次变故，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敌人现在情况怎样”？斯大林问朱可夫。

“敌人突击集团的集中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朱可夫答道。

“你认为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实施主要突击？”

“预计敌人可能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和诺沃彼得罗夫斯科耶地区向克林和伊斯特拉实施强大的突击。古德里安的集团军很可能试图绕过图拉，向韦涅夫和卡希拉实施突击”。

“我同 B·M·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斯大林说，“应先敌进行反突击以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必须从北面包围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一次反突击，从谢尔普霍夫地区向德军第 4 集团军翼侧实施另一次反突击。看来，敌人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莫斯科突击。”

“我们使用哪些兵力来实施这些反突击呢？”朱可夫问道，“西方方面军没有多余的兵力。我们仅有固守已经占领的防线的兵力。”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可以使用 K·K·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各兵团、坦克第 58 师、独立骑兵师和多瓦托尔指挥的骑兵军。在谢尔普霍夫地区，可以使用别洛夫的骑兵军、格特曼的坦克师和第 49 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斯大林提议说。

“现在不能这样做，”朱可夫答道，“我们不能把方面军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没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反突击中去。当敌人的突击集团开始进攻时，我们将没有办法来增援我们的各个集团军。”

“你们方面军有六个集团军，难道这还不够吗？”

朱可夫回答说西方方面军的防御正面大大加长了，加上弯曲部，目前长达三百七十英里。在他的防御纵深内，特别是防线的中央，预备队很少。

斯大林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就把计划报上来。”

朱可夫再次试图说服斯大林相信这些反突击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消耗掉余下的预备队，可是电话线断了——斯大林挂断了电话。

这次谈话使朱可夫很沮丧，这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没有考虑他的意见，而是“因为将士们曾宣誓要流尽最后一滴血誓死保卫的莫斯科处在极大的危险中，而我们却奉命把我们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一次极其没有把握取胜的反突击中去。而且，我们要是把预备队全部消耗掉，我们就无法增援防御上的薄弱地段了。”

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布尔加宁走进朱可夫的办公室，说：“晤，这次我受到了严厉斥责。斯大林对我说：‘你同朱可夫骄傲了。但我们将设法管束你们！’他坚持要我立即来找你，立即组织反突击。”

朱可夫对布尔加宁说：“嗯，有什么办法，就这样啦！请坐，让我们把 B·索科洛夫斯基叫来，并预先通知一下集团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和扎哈尔金。”

朱可夫著《德国的首次战略性失败》，载《莫斯科新闻》。1966 年 11 月 19 日，第 12 页。——原书注

两小时以后，方面军司令部向第 16 和第 49 集团军司令员以及其他主要指挥员下达了实施反突击的命令。

反突击实施了，但德军几乎在同时重新对莫斯科发动攻势。他们向莫斯科西北的加里宁方面军的第 30 集团军的左翼发动了突击，同时向西方面军的第 16 集团军的右翼和中部发动突击。三百多辆德军坦克同时发动进攻，而苏军只能调集到五十六辆坦克，其中许多坦克还是火力较差的轻型坦克。

对于红军其他部队来说，局势也是危急的。别洛夫说，第 49 集团军兵员不足，无法实施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它的右翼有三个师，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师（其中两个师已荣获近卫师的光荣称号），在最近的战斗中遭受了沉重损失。例如，近卫步兵第 5 师的步兵第 765 团只有一百二十三名战士，而步兵第 60 师只有五百名战士。

别洛夫写道，斯大林曾答应他为支援这次行动拨出的三个空军师，被转用到另一地段上。他的骑兵们还发现，他们的情报对德军兵力的估计过低了。在沿纳拉河进行反复争夺的激烈战斗中，别洛夫同自己的司令部失散了。别洛夫找到骑兵第 5 师师长 B·K·巴兰诺夫少将，向他询问关于战斗进展情况。巴兰诺夫说，他的师实际上已被德军大部队挡住去路。别洛夫用巴兰诺夫的野战电话同另外几个师联系，从每个师都得到了类似的回答。原来，在每个机械化骑兵集群对面，敌军不是两三个营，而是“至少有两个德军师部署在

我们前面”。朱可夫不得不下令脱离战斗，而且费了很大气力，才达到了目的，同时还不得不变更卡希拉地区的部署。

11月16日晨，德军突破了第30集团军的防御，开始向克林继续进攻，而且在克林没有苏军预备队来抗击德军。德军还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向伊斯特拉发动进攻，使用了四百辆中型和重型坦克，而苏军装甲部队的兵力是一百五十辆轻型和中型坦克。

这时，指挥第16集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开始感到敌军对克林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改善他的集团军的态势，并阻止德军的推进，罗科索夫斯基认定他的部队必须从伊斯特拉水库以西六七英里的一条防线上的阵地后撤到一条新的防线上。

罗科索夫斯基后来记述说。

水库本身、伊斯特拉河以及周围一带地区构成了一条非常有利的天然防线。我认为，及时占领这条防线，将能借助为数不多的部队组织起坚固的防御，并能把一些部队配备到集团军的第二梯队。从而建立一个纵深防御地域，同时能省下一定数量的部队去加强克林方向的防御。

经过全面的考虑，并同我的助手们一起仔细进行了研究之后，我把我们的设想报告给方面军司令员，并要求他允许我们后撤到伊斯特拉防线。

K·K·罗科索夫斯基著《在首都北部接近地上》，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2月号，第52页—第53页。——原书注

经过一系列几乎是不间断的作战和交火，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在兵员和兵器方面都遭到沉重损失。而且，剩下的部队也已精疲力尽。此外，罗科索夫斯基写道，“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疲劳得连站都站不稳了，只有在乘车从这一地段到另一地段的旅途中，才能打上一个盹儿。”

在这种情况下，罗科索夫斯基没有料到他的老朋友（原来还是他的下级），会拒绝他提出的后撤要求。他写道：“T·K·朱可夫大将听了我们的建议和要求，断然表示不同意，并命令我们拼死据守，决不许后撤一步。”

罗科索夫斯基非常失望，一不做，二不休，他决定越过朱可夫直接找总参谋长。

我认为后撤到伊斯特拉防线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不能同意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定，于是我直接找了总参谋长、苏联元帅B·M·沙波什尼科夫，向他详细说明我的建议是可行的。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收到了他的答复。他对我们说这项建议是正确的，他作为总参谋长批准实施这项建议。

由于我在和平时期在军队任职期间就熟悉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所以我确信这个答复肯定是经过最高统帅同意的，无论如何是报告了最高统帅的，得到总参谋长的许可以后，我们立即起草了要部队在当天夜间把主力后撤到伊斯特拉水库防线的命令。为了掩护这次后撤，在原来的阵地留下几支加强分队，等到掩护任务完成以后，他们只有在受到敌军压力的情况下才可后撤。

一个下级越级上诉，而且他的行动得到了上一级的批准，那位遭到否决的指挥员知道自己的权威受到破坏，这种情形在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都是一桩严重的事情。朱可夫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他给罗科索夫斯基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方面军的部队是由我指挥的。我撤销关于部队后撤到伊斯特拉水库对岸的命令。我命令在已占领的防线上进行防御，不得后撤，一步也不得后撤。朱可夫大将。”

罗科索夫斯基服从了。

《军事史杂志》的主编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尝试，想弄清这次争执的原委。他们要求朱可夫解释一下这段往事。

主编走访了前百方方百军司令员、苏联元帅朱可夫，要求他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时不准第 16 集团军后撤到伊斯特拉河对岸。他回答说，关于第 16 集团军后撤问题，不仅要考虑这个集团军本身的利害，而且要依据整个方面军的态势来作出决定，这个集团军一旦撤过伊斯特拉河，第 5 集团军的右翼就将暴露出来，而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佩尔胡什科沃方向将失去保护。”

德军开始向第 16 集团军左翼施加更大的压力，终于迫使苏军向东退却，德军还强渡了伊斯特拉河。

在伏尔加河水库以南，德军突破第 30 集团军的防御，以其坦克和摩托化兵团迅速推进，扩大突破纵深。同时，德军向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方向强攻，从北面合围伊斯特拉水库。

由于德军投入了六个师（三个坦克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摩托化师），对苏军第 30 集团军的摩托化步兵第 107 师和第 16 集团军的步兵第 126 师、骑兵第 17 师、坦克第 58 师以及坦克第 25 旅发动进攻，克林和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方向的形势变得极端危险了。

罗科索夫斯基写道：“所有这些部队，实力都很弱，兵员不足。摩托化步兵第 107 师只有大约三百人。我们的坦克第 58 师已没有坦克，而坦克第 25 旅只有十二辆坦克，其中四辆是 T - 34 坦克。”

在德军方面，尽管向前推进了，但军官们对他们自己能否取胜，忧心忡忡，出现了许多不祥的迹象。最令人不安的是，补给品奇缺，特别是冬装和在严寒条件下维护武器装备所必需的备品。严寒使得坦克的光学瞄准具不起作用，发动机必须经过预热才能发动（德军在坦克下面安装了火炉）。德军占领区的俄国人民的态度也不容忽视。古德里安记载了他同奥廖尔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公民的如下一段谈话：

作为表明俄国人民的态度的一個例证。我想引用我当时在奥廖尔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沙俄将军对我讲的一番话。他说：“倘若你们二十年前来，我们本来会伸出双臂欢迎你们的。可是现在太迟了。我们刚刚开始走上正轨，你们倒来了，又让我们倒退二十年，以致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从头做起。所以我们都为俄国而战，而且在这一事业中，我们大家都是团结一致的。”

11 月 23 日，古德里安去会见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冯·柏克元帅，要求推迟进攻日期。

理由是部队已经精疲力尽、没有冬装、补给系统运转不灵，以及缺少坦克和大炮。冯·柏克打电话向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报告。布劳希奇断然拒绝了古德里安关于转入防御直到明春的建议。古德里安得出结论说：“鉴于陆军总司令和陆军参谋长拒绝我的要求所采取的方式；必须认为不仅希特勒本人，而且他们也都赞成继续进攻。”

由于德军在几个不同的地段进抵到离莫斯科二十英里以内的地方，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态势急剧恶化。居住在莫斯科西北区的居民，能够清晰地听到炮声。11 月 22 日，德军几个师冲进了莫斯科北面的克林，并进抵到莫斯科西面的伊斯特拉。后者距首都大约十五英里，这是德军（在这次战争中）所到达的离莫斯科最近的地点。德国人后来回顾说，他们“能够通过一架高倍双筒望远镜望见莫斯科”，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亚历山大·沃思著《战争中的俄国》，第 254—第 254 页。——原书注

德军占领克林以后，转而进攻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负责守卫的罗科索夫斯基的第 16 集团军向后撤退。这时，方面军从其他地段抽调了一切可能抽调的力量。包括防坦克排、炮兵连和从莫斯科防空司令部抽调的高炮营，来加强防御。第 16 集团军一直坚持到从谢尔普霍夫调来的第 7 师和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来的两个坦克旅和两个防坦克炮兵团开到。这些增援部队使得罗科索夫斯基能够建立起一条坚固的防线。

在莫斯科北面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期间，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斯大林问方面军司令员。“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我。”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朱可夫口答说，“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和二百辆坦克。”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很不错。”斯大林说，“你打电话给沙波什尼科夫，商量一下把你所要的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它们将在 11 月底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我们还没有。”

朱可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决定把新编成的第 1 突击集团军集中在亚赫罗马地区，第 10 集团军将集中在梁赞附近。

朱可夫所以持乐观态度，部分原因是战线的其他地区最近发生了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

11 月 12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对齐赫文实施了反突击。11 月 17 日，南方方面军在罗斯托夫附近发动反攻，终于把德军坦克第 1 集团军赶回米乌斯河对岸。11 月 29 日，红军夺回了罗斯托夫。德军指挥部立即从战线的其他地段调抽若干个师到齐赫文和罗斯托夫去。此时正值德军对莫斯科的大规模强攻进入最关键的时刻。因此，苏军在齐赫文和罗斯托夫的反击，减轻了俄国首都所受的压力，支援了莫斯科附近的一次大规模反攻计划的实施。

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倒霉的日子始于罗斯托夫，那是一个灾祸将临的预兆。”

哈尔德日记 11 月 30 日的一段记载，充满了关于未来事态的种种不祥之兆。他首先列举了东线德军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到 11 月 26 日的伤亡数字：二万四千六百五十八名军官和七十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四名军士和士兵阵亡、受伤或失踪。东线军队缺员三十四万人，步兵兵力已消耗了一半。每个战斗连队的兵员仅有五六十人。

希特勒对于战局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当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第 1 军请求后撤到从塔甘罗格经米乌斯到巴赫穆特河口一线的时候，希特勒禁止它这样做。哈尔德写道：“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我军的状况，还一直在闭门造车，煞费苦心出主意。”统帅部里的紧张气氛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描写了这样的场面：

陆军总司令受命于 13 时去见元首。看来，这次谈话是十分令人不快的，从头到尾一直是元首在谈话，不停地训斥、辱骂，一想到什么就大声喊叫着下达命令。遗憾的是，陆军总司令屈从于元首的执拗，立即下令不得后撤到上述防线。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回答说，他不能执行这项命令，并要求要么撤消命令，要么解除他的职务。

第二天，龙德施泰特就被解除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的职务。

朱可夫继续在莫斯科附近积聚预备队，准备发动反击。他的两个新的集团军 8 经作好战斗准备。他把第 20 集团军部署在洛布纳、斯霍德纳和希莫克地区，指示别洛夫的骑兵军进入阵地。第 20 集团军也是由若干援增部队新改编成的。11 月 27 日，在得到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的增援后，朱可夫所部对德军坦克第 2 集团军发动反击，把它赶到卡希拉以南十八英里的地方。12 月 1 日，第 1 突击集团军的一部，在亚赫罗马地区把德军赶过了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俄国军队发动的这几次快速反击，阻止了希特勒军队在莫斯科南北两个方向的进攻，使他们的钳形攻势无法在俄国首都以东形成合围。

尽管遭到这些挫折，但德军指挥部还不认为它的攻势已经失败。冯·柏克元帅在 12 月 2 日发布的命令中说：“敌人把整团整师的部队从战线不那么危急的地段调到比较危急的地段，企图借此来缓和他们的困境。仅仅在一个地段发现有少量新的增援部队到达……敌人的防御处在危机的边缘。”

12 月最初几天，德军投入了第 4 集团军的若干个师，作最后一次拼死的努力，企图从纳罗—佛敏斯克向莫斯科突破。德军在阿普雷烈夫卡方向突破了防线，突破纵深达十二到十五英里，但是这些部队在战斗中被 K·戈卢别夫的第 43 集团军所消灭。

德军指挥部认为，必须首先除掉图拉突出部，然后才能着手实现其他目标。古德里安为达到这一目的，开始对这里施加更大的压力。12 月 3 日，德军切断通往莫斯科的铁路和公路，以军火工业而著称的图拉古城被合围。从 11 月 22 日起受命负责保卫图拉的 N·B·鲍尔金将军描写了 12 月 3 日这个关键的日子里发生的情形：

电话响了，是司令部打来的，朱可夫将军要我接电话。我感到这将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结果不出所料。“喂，鲍尔金同志，”朱可夫说，“这一回你第三次搞得自己被合围了，这是不是大多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把你的集团军司令部和指挥所迁到拉普特沃。

可是你是个木头脑袋，不肯执行我的命令……”

“司令员同志，”我回答说，“倘若我和我的集团军司令部迁走了，古德里安早就把这块地方占领了。态势会要比现在坏得多。”

一连好几分钟，话筒里劈劈啪啪响个不停，最后我终于又能听见朱可夫讲话了。

“你正在采取哪些步骤？”他问。我报告说，第 258 师步兵第 999 团已采取行动，以扫清莫斯科公路，而且正在对卡希拉附近的德军发动进攻。“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朱可夫问。“我可以请求您把格特曼坦克师的坦克沿莫斯科公路向南调动，接应步兵第 999 团吗？”“很好，我将这样做，”朱可夫说，“不过你也把你的本事拿出来吧。”

百亚佐夫（第 258 师师长）每隔一小时左右就打一次电话来。第 999 团一直战斗了十七个小时：终于又有电话打来了——欢欣鼓舞、心情激动的西亚佐夫报告说：“司令员同志，韦杰宁（团长）刚打电话来说，他的部队跟格特曼的坦克部队会师了。图拉—莫斯科公路可以恢复通车了。”

亚历山大·沃思著《战争中的俄国》引用的材料，第 256 页—第 257 页，N·B·鲍尔金著《生活的一页》，第 184 页—185 页。——原书注

对图拉的所有进攻都失败了。古德里安后来把他的失败归因于他的部队的疲惫、气候极端寒冷、缺乏燃料以及朱可夫的西伯利亚预备队及时赶到。

到了 12 月 5 日，西方方面军对面所有地段上的德军都遭到严重消耗，因而开始转入防御。苏军这时已做好对业已精疲力尽、冻得半死的敌人发动强大反攻的准备。对于德国人是怎样被挡在莫斯科的大门口的，朱可夫曾作过如下说明：

战后，有人不止一次地问我：苏军在莫斯科附近是怎样挡住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的，关于莫斯科附近的保卫战的经过，已经有过很多记载，而且基本上是准确的。不过，曾作过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我，也想谈谈自己的意见。

希特勒统帅部在计划实施象“台风”战役这样复杂的大规模的战略性战役时，严重地低估了为保卫莫斯科而战的苏联军队的力量和条件，过高地估计了它为突破我军防御并夺取苏联首都而集结的德军部队的的能力。

为实施“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而建立突击集团时，他们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敌人的侧翼突击集团，特别是在图拉地区作战的侧翼集团，力量很薄弱，其编成内没有足够数量的诸兵种合成兵团。正如实际情况所表明的，在那种条件下，把一切都寄托在装甲部队身上，是靠不住的。它们疲惫不堪，受到很大损失，丧失了突破能力。

德军统帅部未能及时完成对我方面军中央同时发动进攻的准备，尽管他们在那里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做。因为没有发动这种突击，使得我们有可能把所有预备队（包括师的预备队）随心所欲地从中央各地段调往两翼去抗击敌人的突击集团。德军遭到严重损失，没有做好冬季条件下的战斗准备，苏军的顽强抵抗，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

……敌人无法突破我们的防线，未能包围我们一个师，也未能打一发炮弹到莫斯科市区。到了 12 月初，敌人已经精疲力尽，而且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但那时西方方面军却从最高统帅部得到了两个重新编成的集团军以及另外一些部队（这些部队编成了第三个集团军——第 20 集团军）。这样就使得苏军司令部能够组织一次反攻。

对于俄国在防御方面取得这次胜利的上述评价，看来是苏联人士历来所作的公正的评价。朱可夫指出，苏军在莫斯科附近的反攻，是从防御战发展成的，它完全是苏军 11 月底和 12 月初对德军两翼反击的必然结果。而这次反攻的实施办法，是在战斗的过程中确定下来的。

直到 11 月底以前，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特别是西方方面军还都没有制订出进行一次大规模反攻的计划。直到那时为止，朱可夫和其他领导于部还都在全力以赴地制止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猛烈进攻。

11 月 29 日，朱可夫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把第 1 突击集团军和第 10 集团军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拨给西方方面军指挥。斯大林问朱可夫：“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朱可夫对斯大林说，德军已经极端虚弱。可是，如果不增加新的部队，西方方面军不可能排除敌人楔入名的防线的危险，一旦德军能够从北方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调来补充兵员，局势肯定会恶化。当晚，朱可夫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决定把这两个集团军和第 20 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师交给西方方面军指挥，并命令他提出这些部队的部署计划。

11 月 30 日拂晓前，斯大林打电话询问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于在整个方面军的战线上实施一次反攻有什么意见。朱可夫回答说，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发动这样的进攻，但是他可以扩大已经在方面军两翼展开的反击，

也许可以达到那个目标。接着，当天就制订了一项充分利用已经拨给方面军的几个新的集团军的作战计划。

朱可夫的计划的核心理是在新的集团军到达并在指定地域集中之后，于 12 月 3 日夜至 4 日凌晨开始反攻（实际上，由于必须反击德军在纳罗-佛敏斯克附近的突破，这次反攻推迟到 12 月 6 日才实施）。当前的目标是，向克林、索尔汉奇诺戈尔斯克和伊斯特拉发动突击，以粉碎方面军右翼的德军各主要集团，同时向乌兹洛瓦亚和博哥罗迭次克，即向古德里安集团的侧后发动进攻，以消灭方面军左翼的德军。

方面军中央的各集团军预定在 12 月 4 日深夜至 5 日凌晨开始进攻，以达到钳制当面敌军，阻止德军从这里调走部队的有限目标。作为这次反攻的先决条件，必须阻住莫斯科西北和卡希拉方向上敌人的推进。

11 月 30 日当天，朱可夫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他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未作任何改变便批准了。接着是朱可夫向他的部队分配任务。

B·N·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 1 突击集团军，在消灭了突破到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德军以后，在德米特罗夫-亚赫罗马地区展开。在第 20 和第 30 集团军协同下，向克林方向实施突击，尔后向捷里亚耶沃斯洛博达的总方向进攻。

第 30 集团军的任务是打垮罗加切夫和博尔谢沃地区的敌人，协同第 1 突击集团军夺取雷谢特尼科沃和克林，并进而向科斯特利亚科沃和洛托施带进攻。

第 20 集团军从红波利亚纳-自拉斯特地区出发，与第五突击集团军和第 16 集团军协同，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从南面夺取该城。尔后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突击。此外，第 16 集团军右翼向克留科沃推进，尔后向伊斯特拉方向突击。

在图拉地区进行防御的第 50 集团军，奉命向博洛雷沃-谢基诺方向进攻，尔后依据情况行动。别洛夫的战役集群从莫尔德韦斯出发，在第 10 和第 50 集团军民合下向韦涅夫实施突击，尔后向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新莫斯科斯克）和迭迪诺沃突击。

部署在谢烈布良内耶普鲁德-米海伊洛夫一线的第 10 集团军，将进攻乌兹洛瓦亚和博哥罗迭次克，尔后继续向乌帕河以南进攻。就这样，最高统帅部提供的新部队投入了对德军“北方”和“南方”集团各兵团的作战。

正在战线中部进行防御的西方方面军的四个集团军，即第 5、第 33、第 43 和第 49 集团军，被赋予的任务是钳制德军，使其无法自由调动，因为苏军这四个集团军严重缺员，无法执行更有决定意义的行动。

朱可夫写道：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 12 月 2 日上午，斯大林在电话上问我：“方百军司令部对敌人及其战斗力怎样估计？”

我回答说敌人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显然它没有预备队来加强它的突击集团了。

没有预备队，希特勒的军队就无法发动进攻。最高统帅说：“好吧，我还要再给你打电话。”我意识到最高统帅部正在考虑我军下一步的行动。

过了大约一小时，最高统帅又打来电话，询问方面军今后几天的计划是什么。我报告说方面军的部队正在进行准备，以便按照已获批准的计划发动反攻。

12月2日，斯大林在跟朱可夫通话时说，已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支援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打算让这些大部队同时发动突击。

两天以后，即在12月4日晚，斯大林再次与朱可夫通话，问他。“除去已经给了你们的，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朱可夫意识到再要求大量增加新部队，时间已来不及了。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国土防空军司令部的空中支援。他认为，要迅速扩大突击的战果，至少必须有二百辆配有乘员的坦克，而西方方面军只有有限数量的坦克。

“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斯大林回答说，“航空兵可以。我立刻打电话给总参。

请注意，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将转入进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战役集群将从耶列次地区发动进攻。”

朱可夫后来说，11月底和12月初，苏军组织这次作战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发动的反攻后来发展成那样大的规模。朱可夫写道：“据我的记忆，没有对这次反攻特地发布过命令或指令……莫斯科附近的这次反攻并非象在斯大林格勒那样，有一个明确规定的开始日期。”定于11月30日发动的反击，其目标是有限的，即向北突击大约三十七英里，向南突击大约六十二英里。但是很快就查明敌人已十分虚弱，既不能继续进攻，也不能组织坚固的防御。因此，当德军在方面军右翼，特别是在方面军左翼撤退的时候，朱可夫下令加紧进攻。12月6日凌晨，莫斯科大反攻开始了。

朱可夫对这次作战的描述是准确的，看来对于当时的局势（至少在开始阶段，局势仍是极微妙的）作出了诚实的估价。

12月6日，在经过集中的空袭和炮火准备之后，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采取行动。随着战斗的进展，证明主动权掌握在如今已是士气高昂的俄国人手。这时，早一天发动进攻的加里宁方面的部队已经在加里宁以南楔入敌军防御。

加里宁方向的攻势起初是成功的，但由于冬季道路无法通行和兵力不占绝对优势而受阻。西方方面军右翼向敌人施加了强大压力，大有分隔并包围从克林到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的德军集团之势。

苏军对克林的进攻，迫使德军指挥部开始从邻近地段调兵增援，但他们这样做，反而便利了红军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红波利亚纳和伊斯特拉的进攻。

12月13日日终，德军在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的抵抗被粉碎，丢下大炮和车辆向后退却。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向西退却的德军部队，遭到苏军飞行员的轰炸，损失惨重。

12月12日，即在这次反攻开始后不到一个星期，库利尔·D·卡利诺夫在方面军司令部会见了朱可夫。他写道。

朱可夫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疲劳到了极点。他两眼布满了血丝，深陷到眼窝里。

他瞌睡得似乎挺不住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嘶哑的。他仍然凭着他的非凡的毅力坚持着。

在他面前，桌上放着好几杯酃茶——酃得发黑。他喜欢喝茶，而且喝得过多。

库利尔·卡利诺夫著《苏联元帅们拥有发言权》，第

159 页。——原书注

朱可夫并没有疲倦到无法指挥部队的程度。他仍然保持着他在哈勒欣河和列宁格勒完成艰巨任务的那种精力和坚强意志。可是，卡利诺夫注意到，他对有些下级人员几乎失去耐心。他写道：

他把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场的时候，他在电话上跟别洛夫将军做过一次谈话。别洛夫有着顿河哥萨克那种倔强脾气，有一种无论什么事总喜欢自己作主，而不去询问上级司令部意见的倾向。当时别洛夫指挥的南部预备队集群，编成内有两个哥萨克骑兵师和近卫第 1 师。12 月 16 日到 18 日，他打垮了德军坦克第 17 师、步兵第 28、第 29 和第 30 师，解放了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和韦涅夫……

别洛夫相当有威望，而且很受斯大林器重。可是朱可夫不管这些，照样毫不客气地向他说出自己的意见。”我命令你一刻钟之内到我这儿来。”他冲着话筒咆哮着，“你不能来？……为什么不能来？这个我不管，我命令你到这儿来！……什么？……你要是不来，我关你的禁闭……，你听懂了吗？”

别洛夫准时赶到，会见了朱可夫。

同时，哈尔德的日记反映出越来越多的悲观情绪。12 月 12 日，哈尔德在电话上同冯·柏克元帅讨论了当天发生的事态。嗣后，哈尔德在日记中隐晦地写道：

“战局已进入十分危急的阶段。第 134 师和第 45 师不再能够继续作战了。没有补给品。

对图拉和库尔斯克之间地段的控制垮掉了。集团军群的命令规定分阶段地后退到图拉——诺沃西尔季姆一线。”哈尔德指出，在北方，积雪封锁了铁路线，阻碍了补给品的运输和部队的调动。

与此相反，朱可夫却在向斯大林报告好消息。朱可夫写道：“1941 年 12 月 6 日，在前几次战斗中已使敌人精疲力尽的方面军的部队，对敌两翼之突击集团发动了决定性反攻。

经过这次攻势，这两个突击集团均被击败，丢下武器装备仓皇退却，遭到了巨大损失。”

12 月 13 日，苏联新闻局宣布，德军要包围俄国首都的企图已经失败。苏联报纸还刊登了赢得莫斯科会战胜利的红军将领们的照片。他们是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罗科索夫斯基、戈沃罗夫、鲍尔金、Q·N·戈利科夫、别洛夫和 A·A·弗拉索夫。朱可夫的一张大照片爱在中央，周围是其他将领的较小的照片。

从朱可夫 12 月 13 日到 24 日发出的指令看，他的下一步的战役目标是使右翼前出到祖布卓夫—格查次克一线，使左翼前出到波洛特尼亚内伊扎沃德—科泽尔斯克一线。这个计划把方面军中央各部队构成后方梯队，配置在莫扎伊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一线，其目的是要造成以方面军左右两翼合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各主力兵团的局面。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解释说，西方方面军中央的各集团军（第 33、第 43 和第 49 集团军）没有参加反突击，而且在随后的反攻中进展缓慢，因为为了增援两翼，它们的兵力大都被调走。

只是在德军开始向鲁扎河和拉马河仓皇退却时，朱可夫才命令这三个集团军向前推进。

朱可夫还巧妙地使用了方面军的空军，因而使德军在这场战争中第一

次失去了空中优势。可供使用的苏军飞机，有四分之三用于支援方面军右翼部队的作战行动，而其余的飞机（包括最高统帅部配属给西方方面军的三个空军师）都用来援助别洛夫将军的骑兵部队以及第 10 和第 50 集团军。方面军空军指挥所，同设在佩尔加什科沃的朱可夫的司令部在一起，有助于保持紧密协调和控制。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了他的领导方法，和他为确保牢固地不间断地控制他的部队而采取的一套做法。有时候，他的方法是非正统的，是同苏军战术实践相反的。例如，他为把他的司令部所在地设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而辩护。他虽然承认这种做法是违背公认的安全准则的，但他认为最优先的考虑是同他的下属保持经常不断的密切联系。

西方方面军靠近首都，这对朱可夫完成他的使命也有一定助益。朱可夫可以使用政府通讯网和民用通讯网的全部通讯线路，使他和他的司令部人员能够同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以及方面军编成内所有集团军保持电话和电报联络。为了防备万一，还设置了紧急通讯系统，而且在必要时，方面军司令部和指挥所甚至能够同某一个师直接联系。

朱可夫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作战行动一旦开始、方面军司令员必须呆在他的司令部里，以便同他的下级指挥官、邻近的方面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保持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可是，有一天他认为他必须到第 16 集团军的一个师去看看。他离开的时间不长，但却给他招来了不少麻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斯大林得到的情报说红军放弃了离莫斯科很近的迭多夫斯克。他自然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不安，特别是因为近卫步兵第 9 师在 11 月 28 日和 29 日曾打退了德军在这个地区的猛烈进攻。他打电话给朱可夫。

“你是否知道迭多夫斯克被敌人占领了？”

“不，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

“一个司令员应当知道他的前线发生的事情。”斯大林生气了，命令朱可夫到现场去“亲自组织反冲击，收复迭多夫斯克”。

朱可夫表示反对，说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离开方面军司令部未必慎重。

“不要紧，”斯大林对他说，“我们会想办法应付。让索科洛夫斯基暂时代替你。”

朱可夫立即同罗科索夫斯基联系，要求他说明为什么不把撤出迭多夫斯克的事通知方面军司令部。但立刻弄清楚了，迭多夫斯克并未被德军占领，可能指的是迭多沃村。

“很明显是弄错了，”朱可夫写道，“我决定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是误会。可是，正象俗语说的，镰刀碰在石头上，硬碰硬。斯大林大发雷霆，要我立刻出发到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去，并设法把这个最不幸的居民点从敌人手里在口来。”斯大林还命令朱可夫带上第 5 集团军司令员戈沃罗夫将军去组织炮火，支援第 16 集团军。

虽然戈沃罗夫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这一趟，但朱可夫觉得再表示反对也没有用了。

朱可夫同戈沃罗夫、罗科索夫斯基一起驱车来到 A· 别洛鲍罗多夫的师。“师长对我们来到他的部队未必高兴，因为他当时正忙得要命，却不得不向我们说明关于敌人占领迭多沃村深谷那边几幢房子的情况。”

别洛鲍罗多夫说明，从战术考虑，夺回这几幢房子是不合适的。可是朱可夫不想告诉这位师长，他朱可夫不得不根据严重违反战术原则的考虑来行动。因此，他命令别洛鲍罗多夫派一个步兵连和两辆坦克把占领那几幢房子的一排德军赶走。

朱可夫打电话给他的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后者报告说，斯大林已经来过三次电话，问：“朱可夫在哪儿？”斯大林命令朱可夫立即返回方面军司令部。

在朱可夫打电话给最高统帅报告这次战斗的情况时，斯大林才随口问了一句：“唔，迭多夫斯克怎样了？”
朱可夫著《莫斯科附近的反攻》，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0月号，第75页—第76页。——原书注

在这次反攻期间，朱可夫有时发现不得不到各个方面军司令员那里去协调他们的行动，进行指导以及发布特别的指令。在反攻开始后大约一个星期，朱可夫发布了如下的命令：

……追击敌人必须迅速，以防敌人脱离战斗。必须广泛使用强大的先遣部队去夺占公路交叉点和隘路，并打乱敌军的行军队形和战斗队形。

……我严禁对坚固的抵抗中心实施正面进攻。先头梯队应毫不停顿地绕过它们，把它们留给后续梯队去歼灭。

朱可夫是在他的突击部队陷入代价高昂、劳师费时的正面进攻而无法前进之后发出上述命令的。许多苏军指挥员缺乏进攻作战的经验，使得情况更复杂化了。有的指挥员由于担心被包围，对于把部队投入战线上的缺口，有些犹豫不决。大规模装甲兵团不足，严重妨碍了朱可夫的突破计划的完成。由于缺少坦克，朱可夫向敌人后方派出了滑雪部队、骑兵和空降兵，封锁敌军的退路。尽管这些部队打得很好，但比起坦克来，总要逊色得多。

到12月16日，苏军部队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耶列次。在此后的几天里，别洛夫将军的部队和弗拉索夫将军的部队，在对德军的大规模进攻中，缴获了许多武器和车辆。

12月16日夜，古德里安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话，禁止他继续后退，并答应派来补充部队。奉命午夜去向“元首”汇报的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时希特勒讲的一番话：

请安静！全面退却问题，毫无考虑的余地。敌人仅仅在几个地方取得了重大突破。

关于修筑后方阵地的主张，完全是胡说八道。前线唯一的困难是，敌军士兵在人数上超过了我们。它的炮兵一点儿不比我们多。它的士兵同我们的士兵相比差得远。

12月19日，希特勒宣布他亲自接任陆军总司令，代替被解职的冯·布劳希奇元帅。

翌日，古德里安飞到东普鲁士，同“元首”讨论前线形势。希特勒的态度是不友好的，毫无同情心的。他对古德里安说，作为“元首”，他有权利要求德国官兵牺牲他们自己。古德里安回答道，只有在值得作出牺牲的时候，才可以要求作出牺牲。这位坦克部队司令官然后抱怨说冬装还没有运到。希特勒一听，立即愤怒地加以否认。等到把陆军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局长找来以后，他不得不承认古德里安说得不错。“严寒给我们造成的伤亡比俄国人的火力造成的伤亡多一根。”

1941 年圣诞节那天，红军对古德里安所部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切尔恩合围了德军机械化步兵第 10 师的部队。德军突围后，古德里安命令部队后撤到苏萨河—奥卡河一线的阵地。代替患病的冯·柏克元帅的冯·克卢格元帅，对此想不可遏，要求陆军最高司令部解除古德里安的职务。第二天，希特勒就这样做了。

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反攻期间(12 月 6 日至 25 日)，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摧毁或缴获了一千辆坦克、一千四百立十四门火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西南方面军的部队缴获或击毁了八十一辆坦克、四百九十一门火炮，还有其他兵器。数以万计的修军官兵阵亡。据现代苏联的资料说，德军阵亡和被俘人数约为三十万人。对莫斯科的威胁解除了。

由于朱可求的反攻取得了用以利，1942 年 1 月 1 日，方面军战线的态势如下：

第 1 突击集团军、第 16 和第 20 集团军正在把德军向后推到拉马河和鲁扎河一线（最高统帅部已把第 30 集团军调给加里宁方面军在西部，第 5、第 33、第 43、第 49 集团军则在鲁扎河、纳拉河和奥卡河一线，向莫扎伊斯克、博罗夫斯克、马洛亚罗斯拉维茨和康德罗沃方向实施攻势作战。在左翼，第 10 和第 50 集团军，以及别洛夫的集群正胜利地追击德军，向尤赫诺夫、莫萨尔斯克和基洛夫（莫斯科西南）挺进。

同时，加里宁方面军正向斯塔里家和尔热夫总方向上进攻，而重建的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正在西方方面军左翼稍后的奥卡河一线作战。

这时，朱可夫左翼的各集团军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他们已深深楔入德军防线，能够展开一次胜利的攻势。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新的部队。可是，方面军的预备队已经用完，朱可夫要求再拨给一些部队，最高统帅部没有同意。朱可夫说，如果当时我们能得到四个集团军的加强（加里宁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各加强一个集团军、西方方面军加强两个集团军），他本来能够收复这些方面军在德军 10 月攻势之前所占据的阵地的。

斯大林为红军在莫斯科附近的胜利所陶醉，认为德军没有作好冬季作战的准备，在苏德战场上的其他地段也会清退，因而想在从拉多加湖到黑海的整个战线上尽快开始总攻。

1942 年 1 月 5 日晚，朱可夫被召到莫斯科商讨今后的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委员、总参谋长 B·M·沙波什尼科夫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沙波什尼科夫扼要地通报了前线情况，谈了作战计划草案。很快大家就清楚了。斯大林打算把正在实施的反攻扩大到战线上的所有其他地段，目的是要消灭列宁格勒附近、莫斯科以西以及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敌军。

这项计划确实是很庞大的。计划规定，由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西北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

列宁格勒的部队、西北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任务是，粉碎北方集团军群，消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任务则是打垮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地区。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则负责解放克里米亚。这次攻势的开始时间应尽可能提前。

斯大林对沙波什尼科夫的汇报作了总结。他说：“现在，德军在莫斯科附近遭到失败后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发动总攻的

最好时机。”

对于作战计划作了说明以后，斯大林问：“谁有什么要说的吗？”

朱可夫意识到，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攻势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搞到所需的巨大人力物力。于是他发言说，几个方面军应在西部战略方向上继续进攻，因为这里获胜的条件最有利，敌人还没来得及恢复部队的战斗力。甚至为了达到这个有限的目标，一也必须补充人员和战斗装备。补充补给品，特别是增加坦克部队。他论证说，红军部队如果要在列宁格勒地区和西南地区发动攻势。就必须用强大的炮火在德军坚固的防御上打开最初突破口，否则的话，部队很快就会弄得疲惫不堪，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因此，朱可夫要求加强莫斯科以面的各方面军（即在战线中央的各方面军），并在这些地段上实施主要进攻，而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则应暂时坚守。

从朱可夫说明他的看法时，斯大林的几次插话，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大林早已作出了决定。而且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尽管如此，1939 年开始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在 1942 年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的沃兹涅先斯基发了言。他支持朱可夫的意见，表示反对发动总攻。斯大林反驳沃兹涅先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主张进攻，并说：“我们应当尽快消灭德军，使之不能在春季进攻。”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也支持斯大林的意见，他们缩小沃兹涅先斯基预见到的那些困难，说这些困难是能够克眼的。别的人都没有要求发言，于是斯大林宣布会议结束，说：“那末好，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

朱可夫不能不再次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把军事顾问们叫到最高统帅部来，不是为了讨论总攻是否可行，而是象他喜欢说的那样，是为了“提请军方注意”。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对他的朋友朱可夫说：“你的意见自提，这个问题最高统帅早已决定了。几乎给所有方面军都已发出了指令，各方面军将在今后几天内开始进攻。”

“那为什么还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我也不知道，老兄。”沙波什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朱可夫

著《莫斯科附近的反攻》，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 年 10 月号，第 79 页—第 80 页。——原书注

1 月 7 日傍晚，朱可夫的方面军司令部接到指令：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任务是设法合围莫扎伊斯克—格查次克—维亚兹马地区之敌。

当苏军攻势重新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命令他的部队坚守苏军在 10 月和 11 月曾筑有坚固防御阵地的拉马河一线。这些阵地完好无损，从而使德军有可能变更部署和重新集聚兵力。

1 月 10 日，经过九十分钟炮火准备以后，缩 20 集团军、第 1 突击集团军编成内的、由 N·A·普利耶夫少将指挥的骑兵军，以及坦克第 22 旅和五个滑雪营开始进攻，以求在沃洛克拉姆斯克地区突破敌军防线。经过两天激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普利耶夫的骑兵军同五个滑雪营和坦克第 22 旅一起进入突破口，向沙霍夫斯卡亚挺进。

1 月 16 日和 17 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占领了洛托施进和沙霍夫斯卡亚，切断了莫斯科—尔热夫铁路。

朱可夫认为，苏军恰恰应该在这里增加兵力，以便扩大战果，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丑月 19 日。他接到命令：立即把第 1 突击集团军撤出战斗，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朱可夫和索科洛夫斯基立即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提出异议，要求把第 1 突击集团军留下。

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朱可夫接着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回答说：“无条件撤出！”朱可夫又申述说，撤走第 1 突击集团军，将会削弱他的突击部队，斯大林回答说：“你那里军队很多。算算有多少集团军吧！”

朱可夫提醒斯大林说他的战线很长，而且所有地段都正在进行着激烈战斗，没有可能变更部署。他要求在已经开始的进攻结束以前不要把第 1 突击集团军从西方方面军右翼调走，以免减弱在这一地段上对敌人的压力。斯大林没有回答就放下了电话。

12 月 16 日，最高统帅部已经把第 30 集团军调给了加里宁方面军，一个月以后，现在又要把第 1 突击集团军编入预备队。这两次抽调部队，削弱了西方方面军的右翼，结果朱可夫不得不加宽第 20 集团军的正面宽度。由于方面军右翼被削弱，在它逼近格查次克时，被德军阻挡而无法前进了。

1 月 20 日，从战线中部进攻的第 5 和第 33 集团军解放了鲁扎、莫扎伊斯克和韦烈亚。

第 43 和第 49 集团军挺进到多马诺夫地区，并同尤赫诺夫的德军打响了。从三月 18 日到 22 日，为了截断敌人后方交通线，向维亚兹马以前二十四英里的热拉尼耶地区空投了空降兵第 201 旅的两个营和空降兵第 250 团。

第 33 集团军奉命扩大突破口，并在别洛夫的第 1 骑兵军、空降兵、游击队和加里宁方面军的第 11 骑兵军的协同下展开进攻，并夺取维亚兹马。1 月 27 日，别洛夫的骑兵军在尤赫诺夫西南二十一英里处突过了华沙公路，三天后同空降兵和游击队会合了。

2 月 1 日，第 33 集团军的三个加强步兵师，在 M·T·叶菲列莫夫中将的指挥下，前进到维亚兹马接近地，并在那里进入战斗。

维亚兹马的战斗值得特别谈一谈。第 33 集团军在从纳罗-佛敏斯克向维亚兹马总方向展开进攻以后，于双月底进抵到珊斯基扎沃德-多马诺夫地区。随后，决定在敌人能够调来预备队之前攻占维亚兹马，这样就会使敌人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叶菲列莫夫将军决定亲自带领突击集群，迅速而大胆地向维亚兹马冲击。但是，2 月 3 日到 4 日，当他的主力到达维亚兹马接近地时，德军向乌格拉河附近的突破口实施突击，切断了他的部队，接着，德军沿乌格拉河一线恢复了防御阵地。第 33 集团军的右翼部队，被阻挡在珊斯基扎沃德地区，而它的左邻、位于美登的第 43 集团军，显然未能执行朱可夫下达的要它援助叶菲列莫夫集群的命令。随后，别洛夫的骑兵在到达维亚兹马以后，它的后方也被敌军切断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最高统帅部采取了行动，虽然它投入的部队不是集中派去的。空降兵第 4 军奉命空降到奥泽列契尼地区以加强别洛夫的骑兵军，并同加里宁方面军骑兵第 11 军保持协同。但是，由于缺乏运输机，运了好几次，仅仅空投了空降兵第 8 旅，共二千人。

别洛夫集群、叶菲列莫夫集群以及空降兵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了两个月的作战。

2月10日，空降兵部队在游击队配合下，占领了莫尔珊诺沃—迪亚基列沃地区，消灭了德军坦克第5师的司令部，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朱可夫的司令部同别洛夫和叶菲列莫夫建立并保持着通讯联系，尽可能地向他们空投了弹药、药品和食品。还值得指出的是，许多伤员是用飞机撤回后方的。

4月，当德军决定拔掉这个“刺”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恶化了。春天开始解冻，使突击集团很难进行机动。于是朱可夫指示别洛夫和叶菲列莫夫脱离战斗。设法同西方方面军会合。朱可夫命令他们经过游击区，沿杰斯纳河沿岸的森林向基洛夫方向突围。在这里，第10集团军将在德军防线的薄弱地段为他们打开一个缺口。可是，叶菲列莫夫中将认为这条路线对于他的疲惫不堪的部队来说是太长了，于是用无线电向总参谋部请求准许他走一条最短的路线——渡过乌格拉河突围。斯大林同意了这个意见，否决了朱可夫的决定，并命令在第43集团军的地段组织相向突击。叶菲列莫夫集群的协同突击没有实施，因为德军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打散了。叶菲列莫夫牺牲了，他的炮兵主任·H·奥弗罗西莫夫少将也牺牲了。

与此同时，别洛夫的骑兵同空降兵部队一起准确执行了朱可夫的命令，绕过敌人的重兵集团，终于回到了方面军阵地。虽然许多重武器和很大一部分战斗装备都失掉了，但大部分人员仍然归队了。

朱可夫在评判1941年冬和1942年春的这些事件时说，最高统帅部的领导人当时对维亚兹马的情况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过低地估计了德军的力量，而且更糟糕的是，在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已遭到严重消耗的时候，他们下令准备在3月发动进攻。朱可夫说，情况严重到这种地步，每当他被召到最高统帅部去的时候，他就央求斯大林发给他们一些防坦克炮、冲锋枪以及最低限度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朱可夫把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一切，立即装上汽车，运往急需的部队去。

朱可夫描写了部队极端缺乏弹药的情形，列举了一些统计数字。朱可夫写道：对别人也许很难相信，我们当时不得不规定每门炮一昼夜发射炮弹不得超过一两发，而且这还是在进攻期间！”1942年2月14日，朱可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正如战斗经验表明，缺乏炮弹就不可能实施炮兵突击，结果，敌人的火力配系没有被消灭，而我军在向未被很好压制的敌人防御阵地冲击时，就会遭到很大损失，不能取得应有的战果。”

2月1日，最高统帅部认识到西部方向的任务艰巨复杂，必须保证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之间的密切协调，因而重新设立了西部方向总司令这个职务，并任命朱可夫担任此职，同时继续兼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1942年2月底和3月初，在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西部方向各方面军的时候，德军也已开始加强其部队。快到2月底时，德军的作战行动重创了苏联守军，并使在2月初德军发动反击时被合围的苏军第29集团军遭受沉重伤亡，只剩下大约六千人。他们历尽艰辛才突出重围，重武器全部损失了。

苏军部队已经疲惫不堪，要想粉碎德军的抵抗，越来越困难。朱可夫多次要求准许他的部队停止进攻，巩固已夺取的阵地，但均遭拒绝。斯大林继续坚持继续进攻，但不论是加里宁方面军，还是西方方面军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右翼，以及苏联南部的各部队也都在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斗。

朱可夫写道。“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在战略上毫无效果，但最高统帅部在3月20日的一项指令中，再次翼求各部队竭力去完成先前交给

它们的任务。可是，西部方向的各方面军得到的增援部队数量有限，因此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不过，在3月底到4月初，西部方向各方面军仍然努力执行了这一指令，设法粉碎尔热夫—维亚兹马地区的敌军，但鉴于未能奏效，道路不好和补给品没有保证，增加了部队作战的困难。最后，最高统帅部不得不下令在大卢基—韦利日—杰米多夫—别雷伊—杜霍夫施纳—第聂伯河—涅利多沃一线转入防御。这时尔热夫、格查次克、基洛夫仍然在德军手里。

尽管如此，从1月到3月的攻势期间，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向前推进了大约四十到六十英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总的战略战役态势，尤其是使莫斯科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

朱可夫指出，曾经发生过的种种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缩小苏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取得的胜利的重大意义。这一场血战，把德军打退了一两百英里。苏军未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其原因是缺少坦克。朱可夫说：“这场战争证明，没有坦克，要想实施坚决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进攻战役是不可能的。要超过敌人的机动能力、迅速迂回到敌人侧翼，突破到它的后方，包围和分隔敌军集团，这些只能借助于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

对于斯大林的贡献，朱可夫所作的评价，看来是公允的。他写道：

在整个会战期间，斯大林一直在莫斯科为粉碎敌人而组织人力和物力。应该给他以应有的评价。他领导了国防委员会并依靠了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在组织为作战所必需的战略预备队，和物质技术器材的保障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在莫斯科会战期间，他总是能够注意听取意见，但可惜的是，他有时作出了不符合需要的决定。把第50集团军重新编入预备队和命令所有方面军发动进攻就属于这种情况。

朱可夫指出，在莫斯科会战中，红军第一次使德军重兵集团遭到重大的战略性失败。

在这以前，也曾经取得过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它们绝对不能同莫斯科会战相比。在这里，苏军的顽强防御使它能够相当巧妙地发动反击，表明苏联军事领导人正日益成熟。

红军官兵经过战斗的磨炼，从一支退却的、防守的军队，变成了一支强大的进攻的军队。

朱可夫说，莫斯科会战是他记忆最深的一次战役。

这次会战对许多德军指挥官来说也是无法忘记的。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担任德军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流露出他的凄楚心情。他写道：

莫斯科会战使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遭到重大失败。它标志着希特勒和德国军队曾赖以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各国赢得辉煌胜利的闪电战术的完结，第一个致命的决定正是在俄国作出的。从政治观点来看，一切决定中最致命的决定，乃是决定首先进攻这个国家。因为这时我们与之交战的敌人比我们以前遇到过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在那无穷无尽的东线，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打胜仗了。

我国的很多领导人严重地低估了这个新的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无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既不了解俄国人民，也不了解俄国军队。我们的一些负责的高级军官。从来没有在东线作过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是在西线度过的。因此，对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困难，对于俄国军人的顽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他们对专家们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

布卢门特里特还伤感地描写了德军接近莫斯科郊区时的情形：

然而，当莫斯科几乎已经在望的时候，指挥官和部队的情绪却发生了变化。在那些星期里，敌人的抵抗更加顽强了，战斗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了。朱可夫元帅这时开始指挥掩护莫斯科的部队。他的部队接连好几个星期一直在防御纵深修筑一条防线，这条防线穿过伸展到纳拉河边的森林，从南面的谢尔普霍夫直到纳罗-佛敏斯克，从这里再往北延伸。在覆盖莫斯科西部接近地的森林中布满了巧妙伪装的支撑点、铁丝网以及密集布雷区。

……几天之后，朱可夫元帅就发动了俄国军队的大反攻。反攻于 12 月 6 日开始，起初矛头指向莫斯科西北的两个坦克集群。东线战场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我们要在 1941 年打垮俄国，结束战争的希望，在最后一刻破灭了。

……置身莫斯科郊外的每个士兵都懂得，这是一次生死存亡的战斗……1941 年，德军的选择只有两个，要求坚守，要末被消灭。布卢门特里特劳《莫斯科》，第 35 页—第 38 页，第 64 页—第 72 页。——原书注

朱可夫作为莫斯科的拯救者而声名大噪。战胜德国以后，斯大林高度赞扬了他的这位勇士。斯大林在 1945 年 5 月 25 日举行的一次庆功宴会上讲话时说：

祖国和党永远不会忘记苏军指挥员在我们的民族保卫战中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打了胜仗、拯救了祖国的将领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历史将在战场上材起的荣誉之碑而流芳百世。这些战场之中，有一个战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会战的战场。而朱可夫同志的名字，作为胜利的象征，将永不分离地同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

可是，朱可夫没有时间去休息。当冬雪消融，德军已为他们 1942 年的攻势制订出新的计划的时候，朱可夫又被派到新的危急地区去执行任务了。

第九章 斯大林格勒会战

1942 年 1 月，苏军给了德军以新的打击，突破了德军在拉马河和鲁扎河上的防线，解放了莫扎伊斯克和卡卢加。但是，《红星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写道：

将近 1 月底的时候，已经很清楚，我军的推进业已受阻。1 月 23 日，我同帕甫连柯一起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司令员向我们介绍了这次攻势的进程。他说，莫斯科保卫战已经结束，在某些地段上或许可能再夺取得一些地盘，但德军已经构筑工事据守，从实际情况看，直到春季来临之前，作战的方式将是阵地战。

朱可夫这时已担任统一指挥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总司令，而这两个方面军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重新向西大举推进。最高统帅部已将其预备队全部用到其他几个战略方向上，所以无法提供帮助。因此，西部方向总司令朱可夫不得不作出一项痛苦的决定。构筑工事来保卫 12 月和 1 月取得的战果，并利用这段暂息时间为夏季作战作好准备。

可是，尽管气候极端寒冷，而且缺乏补充兵员，但朱可夫仍然在战线

的某些地段上向奥廖尔和维亚兹马方向作了有限的推进。

德国的库特·阿斯曼海军中将作了如下的记载：

大约从 2 月 23 日起，整个东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暂时平静。俄军的突击力量看来也几乎用尽。曾使德军疲于奔命的长达几个月的冬季作战终于结束了。德国军队经过艰苦奋战并放弃了一些宝贵的地盘以后，总算熬过了俄军突击造成的严重困难。同 1941 年夺占的广大区域相比，损失的地盘倒不算大，但是，主要目标，即占领敌国首都莫斯科，已经不可企及了。德国军队再也没有能够到达它在 1941 年 12 月 5 日曾经到过的那样近的地方。

德军在莫斯科面前，在冬季积雪和春季泥泞中所作的巨大努力既已落空，为恢复中部战线的均势，部队又遭受一些损失，已使它不能再实施 1941 年那样大规模的作战了。

然而，希特勒丝毫不打算放弃主动进攻，虽然 1942 年可供使用的兵力限制了进攻的范围。

随着春季的到来，希特勒于 4 月 5 日发布了新的指令，赞扬他的部队“非凡的勇敢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作战”，并交给他们一项新的任务：一俟气候和道路状况变得有利，他们就突进高加索，夺取那里的油田，并继续向斯大林格勒推进。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版，第 4 卷《命运的关键》下部，第 3 分册，第 860 页。——原书注

丘吉尔写道。“斯大林格勒的诱惑使希特勒着了迷。这座城市的名宇本身就是对他的挑战。这座城市是质要的工业中心，也是妨碍他向高加索实施主要突击的防御侧翼上的一个强大据点。这座城市成为一块吸铁石。把德国陆军与空军的主力都吸了；过去了。”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版，第 4 卷《命运的关键》下部，第 3 分册，第 860 页。——原书注

德军在发动这次进攻之前，必须粉碎克里米亚的抵抗。自从 1941 年 12 月 1 日苏军四万人登陆，企图夺回刻赤半岛以来，克里米亚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战斗。苏军成功地占领了整个刻赤半岛，并收复了重镇城市费奥多西亚。苏军发动这次进攻，正值北方的塞瓦斯托波尔尔前线的战事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因此德军第 11 集团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单是苏军兵力之多，几乎已使德军招架不住了。

当时担任第 11 集团军司令官的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上将后来对俄国军队的登陆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这次登陆的背后，人们可以从极端无情地拼消耗的做法中，察觉到斯大林的严酷的意志。”

然而，对于红军来说，不幸的是，克里姆林宫没有很好利用它的胜利，德军第 11 集团军于 1942 年 5 月 8 日发动了重新征服刻赤半岛的新攻势。几天之后，德军取得了重大胜利。据德国方面公布的数字，共俘获苏军十五万人，缴获了大量坦克和大炮。甚至俄国人也承认，敌人几乎夺取了苏军的余部战斗装备和重兵器，随后又用它们来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尔的苏联守军。

这时，曼施泰因的集团军既已解除后顾之忧，能够去攻占塞瓦斯托波尔尔。完成它由于俄军突然攻入刻赤半岛而中断了的进攻。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战斗一直持续到 6 月底。7 月 1 日，塞瓦斯托波尔尔终于陷落了，克里米亚遂全部落入德国人手中。希特勒非常感激，晋升曼施泰因为防军元帅。朱可夫回忆录中提到的红军放

弃塞瓦斯托波尔的日期为 7 月 4 日。——译者注

5 月，俄国军队在哈尔科夫附近的灾难性的战斗中被击溃。在克里米亚之战的同时，俄国军队对哈尔科夫以北和以南强大的德军集团发动了一次雄心勃勃的钳形攻势。据说当铁木辛哥的西南方定的部队看来正在落入圈套的时候，西南方向指挥部要求斯大林允许他们停止前进，集中力量挫败德军的反攻。但是，斯大林固执己见，甚至对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的请求也听不进去。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 1942 年春季哈尔科夫战役勒间，他意识到红军部队正被径直引向灾难。他从战场上设法同斯大林联系，以便提醒他注意倘若他们继续进行这一战役，将会发生什么后果。华西列夫斯基接听了赫鲁晓夫的电话。听了关于中止苏军的这次攻势的要求后，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已经下了决心，并已下达了的。

赫鲁晓夫回忆说：“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想象出他讲这番话时的那种坚定的、单调而沉闷的声音。我早退他的关系很不错，所以在他挂断电话之后，我决定给他再打一次电话试试看。这一次，我急切恳求他帮帮忙，但他仍旧拒绝说：‘尼基诺·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同志已经下了决心，这件事就这样啦。’倘若不是华西列夫斯基，而是朱可夫在总参谋部该多好。我相情他会立即驱车到附近的别墅（斯大林的寓所）去替我们说几句话。”

赫鲁晓夫实逼无奈，便设法直接与斯大林通话，但这一次马林科夫把电话截了过去，不让赫鲁晓夫同斯大林讲话。赫鲁晓夫向马林科无申明，这次进攻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后就挂了电话。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184 页—第 186 页。——原书注

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中谈到：5 月 18 日傍晚，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打电话告诉他说，斯大林拒绝接受赫鲁晓夫等提出的立即停止进攻的建议，并请他再向最高统帅汇报一下这个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他已多次试图使最高统帅相信这一点，但斯大林正是根据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的与此相反的情报而拒绝接受他的建议的。他建议赫鲁晓夫直接同最高统帅谈谈。不久赫鲁晓夫告诉华西列夫斯基说，赫鲁晓夫通过马林科夫同斯大林谈了活，斯大林重申了继续进攻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暗示，当时任西南方向总司令的铁木辛哥是主张进攻的。见华西列夫斯基著《毕生的事业》中文版上卷，第 243 页。——译者注

最后在 5 月 19 日，斯大林意识到第 6、第 57 集团军和在克拉斯诺格勒附近作战的 A·B·鲍勃的战役集群面临着危险，才决定红军停止进攻。但这个决定为时已晚。在极其激烈的战斗中，苏军遭受惨重伤亡，阵亡人员当中，包括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 Q·R·科斯坚科将军、第 6 集团军司令员戈罗德尼扬斯基将军、第 57 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将军以及鲍勃金将军。

德军在哈尔科夫和在克里米亚的胜利把苏军来之不易的预备队消耗殆尽，削弱了它的南翼。这样一来，德军就能够将其攻势转向顿河方面，并相当迅速地实现他们的当前目标。苏联的一部战史书籍写道：

由于我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失利，苏德战场南翼的局势急剧地变得对敌人有利。德军夺取了巴尔文科沃突出部，从而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攻势占据了有利的进攻出发阵地。

最高统帅部决定转入防御，以便阻止敌军向东推进。

7 月月中，德军终于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从哈尔科夫附近的集结地

域向罗斯托夫和斯大林格勒实施突击。哈尔访怀着一种厌恶心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元首的做法使我感到惊讶。昨天，他刚刚以相当粗暴的态度拒绝了我的建议，赞成一项本来会导致在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北岸毫无意义地集结兵力的计划，今天却又批准了我的建议。接着他就神气十足地发布命令，指令部队在宽大的正面上渡过顿河，开展斯大林格勒会战。

7月21日。弗里德里希·鲍留斯将军的第6集团军正向斯大林格勒挺进，而俄国人则用火车和卡车从西北调运新的部队。尽管红军进行了猛烈反击，但几天之后，即在7月26日，罗斯托夫已危如累卵，斯大林格勒西面也展开了激战。

7月28日，红军从罗斯托夫撤退，然而，由于缺乏燃料和弹药，使得鲍留斯无法扩大他的战果。而且，装甲部队停顿在罗斯托夫附近，开始越积越多，希特勒为此而大发雷霆，大肆辱骂总参谋部，长篇大论地指责他人的种种过失。

7月30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宣布，高加索的命运将取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负，鉴于这次会战的重要性，可能不得不从另一集团军群抽调部队到这里来。

这时，轴心国约有三十个师向斯大林格勒进逼。其中包括意大利的第8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的第3集团军的各个师。但是，苏联人并未坐以待毙。7月10日，最高统帅部向作战地区派去新组建的预备队，其中包括第62和第64集团军。而方面军司令部则把它自己的预备队派到西南方面军的后方，占领了如下防线：沿顿河从帕甫洛夫斯克到克列次卡亚，再往南经过苏罗维基诺，直到上库尔莫西尔斯卡亚。

7月12日，这些部队加上从原西南方面军抽调的第2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组成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С·К·铁木辛哥元帅被任命为司令员，赫鲁晓夫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曾担任一段时间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和副总参谋长的В·Н·鲍京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

最高统帅部立即把坦克第1和坦克第4集团军调给该方面军，命令它们重新建立防御。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步骤，迅速从国内深远后方的基地抽调必要的预备队到斯大林格勒来。斯大林格勒会战即将打响，这场会战一直持续到1943年。

简而言打整个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保卫斯大林格以阶段和反攻阶段。在这里，我们将详细地探讨一下最高统帅部（特别是朱可夫）所作的贡献。

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在城市周围和市区的防御战，从1942年7月中旬一直延续到11月18日。7月23日，最高统帅派遣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来到斯大林格勒，帮助方面军司令部组织防御，并为反攻作准备。几个星期以后，他同朱可夫一起再次来到这座城市执行同样的使命。

战役早期阶段的特点。是红军竭尽全力来延缓德军的推进。战斗主要是在顿河河套地区进行的。苏军希望争取时间，以便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当时千千万万市民已经开始从事这项活动了。虽然防御还不是特别有效，但红军的抵抗，使德军不能用强攻办法占领该城。

从8月5日到8月18日，德军一方面从西面和西北方面向斯大林格勒

进攻，同时从南面进行迂回包围。从8月19日到9月3日这段期间，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北面突破到伏尔加河，形成了一个五英里宽的突出部的时候，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地区的战斗变得十分激烈了，为了防止被包围（同时也为了使德军不能向前实施突击），红军防御部队撤进了斯大林格勒市内。

在9月4日到9月13日之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南面也突破到伏尔加河，把守卫城市的第62集团军同战线上的其他部队分隔开来。最后，从9月13日到11月18日这段期间，双方在斯大林格的市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而苏军的炮兵大部部署到伏尔加河对岸去了。

讲到这里，必须清楚地交待一下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作用。为使读者能充分了解最高统帅部代表所拥有的权力和享有的便利，这样做是必要的。最高统帅部代表，同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在战场上作出的决定负主要责任。他们有权撤销当地司令员的决定，有权命令整个集团军实施应突击，并协订整个战区的活动。

介绍一下最高统帅部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关系，对于了解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和以后的战役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最高统帅部由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直接领导，由十二到十四名经过挑选的高级军官和斯大林的顾问组成。在战争年代，最高统帅部制定作战计划，直接领导战略性作战行动的准备、组织和实施。最高统帅部代表接连不断地到前线去，根据战略计划，在现场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密切地监督最高统帅部命令的执行，协调各个方面军的行动。总参谋长是最高统帅部成员，而总参谋部则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部，其任务是提供情报和拟制详细的作战计划。

在最高统帅部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1941年7月23日到1946年）朱可夫作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参与了这个机构的领导工作。朱可夫是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因病卸任后担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的。华西列夫斯基在1942年11月以后，担任斯大林的第二副手和总参谋长。他同朱可夫一起，经常在关键时刻亲临前线。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有时也暂时离开最高统帅部去指挥野战部队。1944年4月，H·Q·瓦杜丁大将牺牲时，朱可夫接管了瓦杜丁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指挥权。翌年2月，当H·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在柯尼斯堡郊外受重伤时，华西列夫斯基接管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指挥权。柯尼扬巴——今名加里宁格勒。——译者注

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把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下达给方面军司令员，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调整之后实施。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之间的通讯联系是密切的、畅通的，也可以说是受最高统帅部欢迎的。在苏联的历史书籍中，“统帅部”和“最高指挥部”有时是指斯大林，有时是指最高统帅部。斯大林经常把最高统帅部成员们召集到一起讨论已拟订出来的作战计划，听取对某一战略利弊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断。

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工作还包括确定人选。1942年8月9日华西列夫斯基和A·N·叶廖缅科之间的一次电话谈话表明了这一点。

华西列夫斯基：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同你联系一下，征求你对下列几个问题的意见。

第一，斯大林同志认为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问题统一起来由一个人负责是有利的、适时的，想让你负责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同时你将继续担任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戈利科夫中将将被指定担任你在东南方面军的副手。

莫斯卡连科少将将被任命为近卫第三集团军司令员，以代替戈利科夫同志。

第二，斯大林同志还认为任命目前在斯大林格勒指挥内务人民委员部步兵师的萨拉耶夫同志担任斯大林格勒城防司令是适宜的。你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

叶廖缅科：我的回答是，没有比斯大林同志更英明的了，我认为这个决定是绝对正确的、适时的。

华西列夫斯基：对于戈利科夫、莫斯卡连科和萨拉耶夫的任命，你的意见怎样？

叶廖缅科：我认为所有人选都是适宜的。他们几个人都是称职的人选。

华西列夫斯基著《难忘的日子》，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5年10月号，第16页—第17页。——原书注

8月中，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再决赶到斯大林格勒了解情况。8月23日，恰好正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签字三周年那天，华西列夫斯基来到第62集团军的部队中。敌军装甲部队把这个集团军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分隔开来，也正是这一天发生的事。在此后的两天中；德军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城市大部被夷为废墟。

华西列夫斯基不得不使用没有保密措施的无线电台同斯大林通话，直到重新建立起高频电话通讯为止。

8月24日夜，他再次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由于在斯大林格勒的全面失利，最高统帅严厉斥责了他和其他一些红军指挥员。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训斥他的指挥官们，指责他们“恃才傲物、冥顽不灵，全然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在此后的数周里，这位“元首”表现出厌烦、焦虑，最后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疲惫，并失去进攻势头时，他终于感到极端失望了。

9月24日，希特勒解除了自1939年8月起担任他的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的职务。任命库特·蔡茨勒将军代替他。哈尔德在他的最后一条日记中写道，他的神经，还有“元首”的神经都已极端疲劳，但希特勒“决心要在军队中推行他的意志。”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2年8月27日，我正在波哥烈洛耶—哥罗迪舍地域指挥进攻战役时，接到A·H·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处负责人）打来的电话。我从他同我仿谈话中得知，国防委员会前一天（8月26日）研究了我国南部的局势，通过了任命我为最高统帅助理的决定。我还了解到，国防委员会对于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局十分担心。

不久，最高统帅用高频电话和我讲话。询问了西方方百军的态势后，他说：“你必须立即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接着又补充说。“请考虑一下，任命谁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

通话就这样结束了。斯大林没有谈任命我为最高统帅助理的事。显然，他想在和我见面对面宣布这件事。最高统帅在电话上一般只谈当时急需谈的问题。他要求我们打电话时十分注意，尤其在没有通话保密设备的部队作战地区更是这样。

我没有回方面军司令部就直接飞往莫斯科了。

当天天黑以后，我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国防委员会有几位委员也在那里。波斯克列贝舍夫通报说我来了，斯大林马上就

接见了 我。

斯大林说，南方的局势很不利；德军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北高加索，形势也不太好。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我为最高统帅助理，并派我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去。目前，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马利谢夫已经在斯大林格勒。马林科夫将留下同我一起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回莫斯科。

斯大林问我：“你什么时候可以启程？”

我回答说，我需要用一昼夜时间研究情况，29 日就能飞往斯大林格勒。

“那好！”斯大林又马上问道。“你不饿吗？不妨稍微吃点东西。”

在喝茶的时候，斯大林简略地向我介绍了 8 月 27 日 20 时战场上总的情况。他简要地叙述了斯大林格勒的情势后说，最高统帅部已决定把第 24 集团军、近卫第 1 集团军和第 66 集团军拨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科兹洛夫将军指挥第 24 集团军，莫斯卡连科指挥近卫第 1 集团军，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第 66 集团军。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 1 集团军要立即调到洛兹省耶地域，预定 9 月 2 日向进抵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实施一次反突击，与第 62 集团军会合。在莫斯卡连科的集团军的掩护下，第 24 和第 66 集团军将进入出发地域，并迅速投入战斗。最高统帅说，否则的话，斯大林格勒就会丢掉。

我明白，斯大林格勒会战具有极为重大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敌军统帅部就能够切断我国南部与中部的联系，我们就可能失去从高加索向北运送大量物资的伏尔加河这条最重要的水路交通命脉。

除了新组建的准备用于尔后的战争的战略预备队外，最高统帅部正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都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增加飞机、坦克、火炮、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生产，以便及时用于粉碎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

8 月 29 日，我从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四小时后，就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卡梅申地区一个野战机场着陆。华西列夫斯基迎接了我，并当场给我介绍了最新情况。词拒交谈后，我们驱车前往设在小伊凡诺沃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方面军司令部。

B·H·戈尔多夫中将 在前沿阵地上。参谋长 N·H·鲁赫列汇报了情况。听着他们的汇报，我觉得他们对情况了解得不够，而且他们不完全相信能够在斯大林格勒地域挡住敌人。戈尔多夫中将当时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译者注

我给近卫第 1 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戈尔多夫当时正在那里。我要他在莫斯卡连科集团军司令员的司令部里等我们，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就要到那里去。

在近卫第 1 集团军路指挥所，我们见到了戈尔多夫将军和莫斯卡连科将军。他们的汇报和他们的言谈举止使我们放心了。我感到，他们很清楚敌人的力量和我军的能力。

我们讨论了局势和我军状况后得出结论，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的部队。最早要在 9 月 6 日才能做好反突击的准备。我立即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这一情况。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他没有不同意见。

既然华西列夫斯基奉命限期返回莫斯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于 9 月 1 日即飞离斯大林格勒。

由于缺乏燃料，莫斯卡连科的近卫第 1 集团军的进攻未能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于 9 月 2 日发动。翌日清晨。部队发起了进攻，但部队很快受阻。当天，朱可夫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命令立即向德军突击，不得有任何迟延。

朱可夫当即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说，他可以下令第二天一早（9 月 4 日）发起进攻，但所有三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没有充足弹药的情况下开始战斗，因为最早要到当天傍晚才能把弹药送到炮兵阵地上。朱可夫还说，他需要时间来组织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

斯大林反问道：“你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慢慢腾腾地弄好了再干？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从北面实施突击，敌人不要费很大气力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回答说他不同意这种看法，请求准予按原定时间 5 日发起进攻。

“嗯，那好吧！”斯大林回答说，“如果敌人对市区发起总攻，你应该不等部队作好最后准备，就迅速向敌人冲击。你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军的兵力从斯大林格勒引开，如果能得手，还应消除隔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部队的德军走廊。”

9 月 5 日拂晓，苏军炮兵和航空兵开始火力准备，但由于火力密度不够，因此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朱可夫从近卫第 1 集团军指挥所观察了这次行动，发现发起进攻的红军步兵部队遭到敌人猛烈火力的阻击，不可能向前推进很远。一两个小时以后已经很明显，德军阻止了苏军的前进，并以步兵和坦克实施反突击。

苏军航空兵侦察查明，德军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的庞大集群，正从古姆拉克、奥尔洛夫卡、大罗索什卡向北移动。德军轰炸机飞来，并开始轰炸苏军战斗队形。下半天，德军增援部队进入战斗，并在某些地段上把苏军推回到出发地域。

傍晚时，苏军补充了炮弹、迫击炮弹和其他弹药。朱可夫决定根据昼间战斗中查明的敌情，制订新的进攻计划，一俟苏军在夜间得以变更部署之后就实施。天黑以后，斯大林打电话询问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作战情况。朱可夫报告说，整整一天的战斗打得很艰苦，敌人从古姆拉克地域调来了一些部队。

“这就不错，”斯大林说，“这是对斯大林格勒的很大帮助。”

“我军稍有进展，”朱可夫报告说，“但在不少地方仍停留在出发地域。”

“怎么回事？”

“由于时间不够，我军没有来得及作好进攻准备，没有很好地进行炮兵侦察并查明敌人的火力配系，自然就不能将其压制住。当我军转入进攻时，敌人就以其火力和反冲击阻住我军的进攻。此外，敌航空兵整天都掌握着制空权，并对我军进行轰炸。”

“继续进攻，”斯大林命令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尽可能多的敌人调离斯大林格勒。”

第二天战斗更加猛烈了。

苏联空军部队在夜间轰炸了敌军阵地。除前线航空兵外，远程航空兵也整夜进行了轰炸。远程航空兵由戈洛瓦诺夫中将指挥，他同朱可夫一起呆在近卫第 1 集团军指挥所。

9 月 6 日，德军投入了新的部队，在许多制高点上设置了预伏坦克和强击火炮，并可靠地组织了火力支撑点。只有使用威力强大的炮兵火力才能摧

毁这些防御设施。可是朱可夫当时只有很少量的威力强大的炮兵。

交战的第三天和第四天，主要是炮火对射和空中轰炸。

朱可夫写道：“9月10日，朱可夫巡视了各集团军的部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以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突破敌人的战斗队形并消除其走廊的。”戈尔多夫、莫斯卡连科、马利诺夫斯基、科兹洛夫等将领同意朱可夫的这个意见。当天，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如下。

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够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由于敌人从斯大林格勒附近调来新的部队，以现有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需要补充部队和调整部署的时间，以实施较为集中的方百军突击。集团军突击不能打败敌人。

斯大林对朱可夫说，如果他能飞到莫斯科去当面汇报这些问题，可能更好一些。

9月12日，朱可夫飞往首都，四小时之后来到了克里姆林宫。

华西列夫斯基也被叫到克里姆林宫。他汇报了敌人从科捷尔尼科沃调来新的部队的情况，汇报了诺沃罗西斯克地域交战过程，以及在格罗兹尼方向上的战斗情况。

斯大林仔细听取了华西列夫斯基的汇报后说：“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取格罗兹尼的石油。好，现在听朱可夫谈谈斯大林格勒的情况。”

朱可夫重复了在电话上汇报过的内容，然后补充说，第24、近卫第1和第66集团军，证明是有战斗力的部队。它们的基本弱点是，没有足够的加强兵器，直接支援步兵所必需的榴弹炮兵和坦克部队也很少。朱可夫谈到斯大林格勒附近地区的地形：地形开阔，有一些峡谷，为敌人提供了良好的掩护。这对红军的进攻行动是不利的。德军占领了许多制高点，可以进行较远的炮兵观察，能向所有方向机动火力。朱可夫最后说，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是不能突破敌人防御的。

斯大林问道：“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

“至少还需要一个满员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军、三个坦克旅和四百门以上的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加强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华西列夫斯基支持朱可夫的估计。

斯大林拿出他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长时间聚精会神地看着。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离开桌子走到角落里低声谈论说，需要找个什么别的解决办法。

“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斯大林从地图上抬起头来问道。朱可夫从来没有想到场大林有这么敏锐的听力。他和华西列夫斯基又回到桌子旁。

“这样吧，”斯大林说，“你们到总参谋部去，好好想想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可以从哪里调什么部队去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部署，同时也想想高加索方面军的问题。明晚9点在这里会齐。”

第二天一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都在仔细研究怎样才能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以免把所有的预备队消耗在局部性战役中。下个月，他们就可编组好战略预备队，其中包括装备精良的大建制坦克部队。当时，苏联工业已大大增加了新式飞机和炮兵弹药的生产。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方案后，决定向斯大林提出

这样的建议：苏军继续以积极防御来疲惫敌人，然后再发动一次特大规模的反攻，从而改变南部的战略形势，使之有利于苏联。

朱可夫承认，对于反攻的具体计划，是不可能一天之内制订出来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应对罗马尼亚军队所掩护的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侧翼实施主要突击。概略的计算表明，至少要到 11 月月中才能发动反攻。朱可夫认为德军已经无法完成它为 1942 年规定的战略计划，他们的兵力兵器，对于实现他们在北高加索或顿河与伏尔加河地区的目标，都是不够的。朱可夫正是以这些情况为依据提出他的设想的。

德国人能够在高加索或斯大林格勒地域部署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无疑将不得不转入防御。苏联人也知道，德军著名的鲍留斯第 6 集团军和哥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由于被拖入斯大林格勒地域消耗兵力的浴血战斗，已经没有能力夺取该城。

朱可夫相信，对于苏方来说，前途是光明的。苏军战略预备队的编组和训练已接近完成。这些部队的编成内将有装备着中型或重型坦克的大建制的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

朱可夫回忆说：“到 11 月份，最高统帅部就将拥有用全世界闻名的 T-34 型坦克装备起来的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因而我们就能够给部队下达更为重大的任务。加之，我军高级指挥干部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东西，而且经过与强大敌人斗争的艰苦锻炼，已经成了指挥战役的能手。”

朱可夫还透露了苏军是怎样利用轴心国的弱点的：

总参谋部（根据各方面军的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强点和弱点。各仆从国军队与德军比较起来，装备差、经验少，甚至在防御中都缺乏战斗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军队的士兵和许多军官，都不愿意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奈斯库、霍尔蒂和其他法西斯头子派到遥远的俄罗斯土地上为外国干涉者卖命。

使德军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是，在伏尔加河和顿河地域，德军只有很少的战役预备队，总共不超过六个师，而且分散在宽大的正面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办到的。战线的布势对苏军也有利：红军部队占据着两翼的阵地，形成包围态势，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加强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次卡亚地域的桥头堡。朱可夫写道；

9 月 13 日傍晚。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说。我们已作好进行汇报的准备。

斯大林说他 22 时以前有事，要我们 22 时到他那里去。

22 时，我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

斯大林一边同我们紧紧握手，一边气愤地说：“千百万苏联人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丘吉尔却为二十架‘飓风式’战斗机讨价还价。他们的那些‘飓风式’根本不中用，我们的飞行员不喜欢这种飞机……”接着斯大林用极其平静的语调问道：“唔，你们有些什么决定？谁来汇报？”

“你让我们谁汇报都行，”华西列夫斯基回答，“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斯大林走到我们的地图前问道：“你们带的这是什么？”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这是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计划的初步草案。”

“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这个部队集群是怎么回事？”

“这是新的方面军。需要建立这个方面军，以便对斯大林格勒地域敌军

集团的战役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斯大林说。

我报告说，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计算过。四十五天以后我们就能得到必要的兵力兵器，并作好发动进攻战役的准备。

斯大林又问：“只限于沿顿河从北向南和从南向北突击，是不是更好？”

我解释说：那样的活，德寇能够迅速将其装甲坦克师从斯大林格勒附近转过来。抗击我军的突击。我军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就使敌人由于河流障碍而不能迅速机动，用其预备队抗击我军。

斯大林又问：“你们的突击集团调动的距离是不是过远呢？”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战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突破防御，合围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隔绝该集团与外部敌人的联系；二、歼灭被围敌人，并制止敌人解围的企图。以一部分兵力直接合围所要合围之敌，以另一部分兵力在战役纵深构成第二层合围圈，以对付前来增援之敌。前者叫合围的对内正面，后者叫合围的对外正面。——译者注

“对这个计划需要再考虑一下，要计算一下我方的资源。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不让敌人向卡梅申方向推进。”斯大林说。

这时，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报告说，叶廖缅科打来了电话。

斯大林同叶廖缅科作了简短交谈后，回来对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说，叶廖缅科报告，德军正向市区调动坦克部队，明天必然发动新的进攻。斯大林接着对华西列夫斯基下达指示说：“请现在立即下达指令，迅速把罗迪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调过伏尔加河，再看看还有什么部队可以在明天调到那里去。”

朱可夫写道：

斯大林接着对我说：“给戈尔多夫和戈洛瓦诺夫打电话，让航空兵立即采取行动。

戈尔多夫从拂晓就要发起冲击，牵制住敌人。你自己要飞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并要着手研究克列次卡亚和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情况。几天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往东南方面军研究其左翼的情况——关于我们的计划，以后我们再继续谈。在这里讨论过的问题，除我们三个人以外，目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一小时以后，朱可夫乘飞机飞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9月13、14、15三天，对斯大林格勒保卫者来说，是艰难的日子，十分艰难的日子。

敌人不顾一切，一步步通过市内的废墟，愈来愈逼进伏尔加河。似乎我们的人要支持不住了。但是，第62和第64集团军船英勇战士们，把废墟变成了堡垒。

罗迪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渡过伏尔加河来到斯大林格勒，对敌人突然实施反冲击，起了转折的作用。9月16日，该师在回了马马耶夫岗。戈洛瓦诺夫的远程航空兵对德军进行空袭，炮兵轰击了德军第8军，再次援助了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

在这里，朱可夫在其记载中巧妙地提醒读者注意，只有三个人（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夫人）了解斯大林格勒反攻计划的详细情况，其

目的是要驳斥那些后来声称在这次制订计划过程中起过主要作用的回忆录作者。

朱可夫指出，叶廖缅科曾到他那里去讨论局势，“由于斯大林要我对这次设想的大规模反攻计划严加保密，谈话时主要谈了加强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的问题。”朱可夫说这番话时，心里无疑想的是，战后包括叶廖缅科在内的一批野战司令员企图贬低派到现场去的最高统帅部代表。

下面可以看到，朱可夫一再谈起谁是斯大林格勒胜利的主要设计者的问题。

华西列夫斯基也给了叶廖缅科一记耳光。他写道，最高统帅部指示他，直到11月以前不要让叶廖缅科参与准备这次攻势的“实际工作”，“以便让他专心致志地从事他担负的工作——保卫斯大林格勒。”见华西列夫斯基著《难忘的日子》，《军事史杂志》1965年10月号，第20页。

为给野战司令员们说句公平话，这里应当指出，最高统帅部代表常常就某一作战行动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看来很自然的是，野战司令员对总的计划工作是有一定贡献的。

许多身居高位的人利用朱可夫两次失意的机会，想把他的名字从苏联战史中抹掉，只有明了这一点，才能充分了解朱可夫为什么要挖苦叶廖缅科和其他一些人。朱可夫是在想方设法重新取得他在苏联的一些最伟大的胜利中应有的位置。——原书注

朱可夫写道：

9月底，斯大林又把我叫到莫斯科讨论反攻计划。这时，前去研究东南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实施反攻的条件华西列夫斯基，也回到了莫斯科。去见斯大林以前，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见了面，讨论了他研究实施反攻的条件所得出的结论。

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最高统帅问朱可夫对戈尔多夫将军的看法怎样。朱可夫回答说，他在作战方面是一个将才，可是他同他的司令部人员关系处不好。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任命一个新的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提名罗科索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意这个人选。当时还决定将所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则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详细讨论了反攻计划以后，斯大林转过脸来对朱可夫说：

为飞回前线去，要采取各种措施，更多地消耗和疲惫敌人。要再去看看计划规定的预备队集中地域和西南方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右翼出发地域，尤其在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次卡亚地域。华西列夫斯基也要为了同样目的再去一次东南方面军的左翼，在那是研究计划中规定的所有问题。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到现场进行了研究之后，再次回到最高统帅部，他们的计划随即得到了批准。反攻计划图由他们两人签署，然后斯大林在上面批了“我批准实施”，并签上了他的名字。斯大林接着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去征求各方面军司令员对于未来的战役的意见，但要注意，不能泄漏这个严加保密的计划。

9月2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已更名为顿河方面军。朱可夫奉命亲自去给顿河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阐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某些方面。朱可夫的这次汇报是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一个小山沟里的掩蔽部中进行的，这里是莫斯卡连科的指挥所。

朱可夫写道：

我命令顿河方面军绝不可减少对敌的积极行动，以免敌军从顿河方面

军地段抽调兵力和兵器去攻击斯大林格勒。已经接管了方面军指挥权的罗科索夫斯基回答说，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极少，因而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取得什么重大战果。当然，他的意见是对的，我也有同样看法，但如果不积极帮助东南方面军（这时已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他们就不可能守住斯大林格勒。

1968年，罗科索夫斯基谈到了他被任命为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的一些情况。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一起飞到斯大林格勒地域。朱可夫告诉戈尔多夫关于最高统帅任命罗科索夫还基来代替他的决定。过一会儿，罗科索夫斯基找朱可夫说：“我要求你给我机会来指挥，全面地亲自指挥我的部队，这就是说，让我根据战斗的实际发展，来执行最高统帅部分配的各项任务。”

“简单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在这里无事可做了吗！”朱可夫问道。

罗科索夫斯基微笑着点点头，于是朱可夫便说：“我今天就飞回莫斯科。”

罗科索夫斯基对朱可夫表示了敬意，说：“朱可夫和我是老战友了。我们曾经肩并肩地一起经受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严峻考验。”见《文学报》，1968年1月31日，第1页—第2页。——原书注

10月1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进一步拟制反攻计划。

朱可夫坐在由A·E·戈诺瓦洛夫亲自驾驶的飞机的座舱里。在返回首都的途中，飞机突然转弯并开始下降。朱可夫以为飞机在改变航向。几分钟以后，戈诺瓦洛夫将军把飞机降落在一个朱可夫不认识的机场上。他问这位飞行员：

“为什么你把飞机降落在这个地方？”

“算我们走运，离飞机场很近，不然的话，飞机可能已经坠毁了。”

“怎么回事？”

“飞机结冰了。”

正在说话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朱可夫自己的飞机也着陆了。朱可夫立即改乘这架飞机飞往莫斯科中央机场。

朱可夫说，在复杂条件下急着飞行当然不能总是不出事故的。还有一次他差一点儿送了命。

那是几天以后，我从斯大林格勒飞往莫斯科。那天我们没遇上适合飞行的好天气，天正下雨。莫斯科通知说。城市上空雾层很低，能见度有限。但必须起飞——斯大林叫我去。

在飞向莫斯科的途中飞得并不坏。可是接近莫斯科时，能见度不超过一百一十码。

空军航行处通过电台给飞行员发来命令，要他飞往预备机场。那样的话；我们肯定就不能准时到达克里姆林宫了。可是斯大林正在等着我们。

我承担全部责任，命令飞行员在中央机场降落，而且我也留在座舱里。我们在莫斯科上空盘旋，突然看见在离飞机左翼十到十五码有一座大烟囱——我瞧了飞行员一眼，他镇定自若，把飞机稍稍拉高了一点儿，过了两三分钟就着陆了，飞机着陆后，我说：

“好险。看来我们幸运地避免了一次事故。”

他微笑了一下，回答说：“如果飞行员无视气候条件，在飞行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紧紧握着飞行员的手回答说：“这是我的过错。”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惜我把这位飞行员的名字忘记了。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可能就是别利亚耶夫这位可爱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飞行员。我坐别利亚耶夫同志的飞机，同他一起飞行了一百三十小时以上。可惜他在一次飞行事故中牺牲了。

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从 9 月中旬起就具有阵地战，或者说是“堡垒战”的性质。德国将军汉斯·德尔在他写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一书中写道：

实施大规模作战的时节终于过去了。战争从开阔的草原转入沟壑纵横的伏尔加高地，转入斯大林格勒工业区。斯大林格勒工业区修建在崎岖不平的地带，建筑物都是用钢筋混凝土浇注的，或是用石头砌成的。推进的距离不再用公里，而是用米来计算，总参谋部的作战地图乃是一张城市平面图。为了争夺每一幢房屋、每一个车间、每一座水塔、每一段铁路路基、每一面墙壁、每一间地窖，甚至每一块废墟，都要经过激烈战斗，战斗的激烈程度，甚至是大量消耗弹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无法比拟的。我军和敌军之间的距离几乎是无法计量的。”

德尔写道，德国航空兵和炮兵企图扩大这种“近战”地区双方的距离，但毫无结果。

他还说，“俄国人在利用地形地物和使用伪装方面胜过德国人，而且他们在街垒战斗和争夺单个建筑物的战斗中更有经验。他们的防御是坚不可摧的。”

汉斯·德尔著《斯大林格勒战役》，第 56 页。——原书注

10 月份，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六个满员的师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以加强第 62 集团军，因为，用朱可夫的话说，这个集团军编成内，“除后勤部队和司令部外，实际上什么部队也没有了”。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也得到了加强。

也是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命令其“B”集团军群和鲍留斯的第 6 集团军占领斯大林格勒。为了向斯大林格勒突击，德军指挥部把德军从两翼的防御阵地调来，派罗马尼亚军队接替他们，从而大大削弱了轴心国部队在谢拉菲莫维奇和斯大林格勒以南地域的防御。

10 月中旬，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保卫者发动了猛烈进攻，把部署在三英里正面上的三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投入战斗。10 月 14 日这一天，德国飞机出动了约三千架次，对苏军的轰炸和扫射，几乎没有间断过。

当天午夜，德军包围了捷尔仁斯基拖拉机厂，并在工厂的各个车间展开了战斗，仅在工厂的围墙前面就有三千名德军被击毙。

苏军也遭到重大伤亡，轰炸造成的伤亡尤为严重。有些部队损失惨重，以致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例如，10 月 15 日这一天，B·N·崔可夫指挥的第 62 集团军的两个师兵员损失达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直接插手处理了一些问题。

他通知华西列夫斯基说，他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的行动不满意。

据斯大林掌握的情况，叶廖缅科没有充分注意援助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而是——显然由于担心敌人可能渡过伏尔加河——继续去加强河左岸的防御地段。斯大林说，叶廖缅科为了加强这个地段，使用了最高统帅部专门拨给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

华西列夫斯基奉命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指示叶廖缅科到祖可夫那里去，详细了解真实情况，并就必须采取哪些步骤有效地援助第 62 集团军提出报告。仍在红军手中的那一部分城市，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

叶廖缅科立即渡过伏尔加河（他的司令部的一些人员在途中被击毙），来到崔可夫的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司令部。翌日拂晓，当这位方面军司令员同崔可夫告别时，答应给崔可夫提供他所需要的补给。可是，一天以后，崔可夫获悉，他将得到的不是一个月的补给，而是一天的补给。他提出了意见，数量才稍有增加。

尽管市内的一些房屋、建筑物，以及整个整个的街区都多次易手，但苏军仍拼死坚守。他们很快召集起后方地区的公民——裁缝、鞋匠以及车间工人和马房里的人手，组成了一些连队，并立即让他们投入残酷的战斗。这些训练很差的人，一到斯大林格勒，有的很快变成了巷战能手，有的则牺牲了。

最后，双方都已精疲力尽，战斗的激烈程度才有所减弱。

10 月 29 日傍晚，战斗缓和下来，第二天只有零星的交火。鲍留斯的第 6 集团军显然已没有能力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这时，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诺夫来到斯大林格勒，继续从事反攻的现场计划工作。在他们动身去前线之前，最高统帅部初步确定开始攻势作战的日期是：11 月 9 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反攻 11 月 10 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反攻。事实上，由于作战补给品、燃油、滑油的前送工作发生延误，以及为了取得必要的空中支援，不得不把反攻日期推迟几天。

部队在准备反攻的过程中，对于打乱敌人的战术后方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为此，需要有一项缜密的计划，来协调所有参加反攻的部队的行动。对于机械化部队和坦克部队在预定要迅速包围和歼灭战役后方轴心国集团的作战中将要承担的任务，也作了研究。

11 月 3 日，朱可夫同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 5 集团军的人员举行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指挥人员以及军长和师长们。朱可夫感到满意的是，所有指挥员都十分了解他们所承担的任务以及执行这些任务的方法。然后，他轮流同每一位指挥员讨论他的计划，再次审查了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协同作战的各个方面。他特别注意务必使所有指挥员彻底明了坦克师和骑兵师逼近预定突破地域时的作用，务必使他们知道，一旦突破到敌人防御纵深时怎样来扩大战果。

他审查了作战过程中侧翼的保护问题和部队的控制问题。会议参加者报告了各自的部队的状态、补给和兵器情况，以及所有主力部队的战斗准备情况。

11 月 4 日，他同西南方面军第 21 集团军的指挥人员也进行了类似的讨论（顿河方面军司令员也应邀出席）。11 月 10 日，则在第 57 集团军指挥所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人员一起开了会。

会议结束后，朱可夫在华西列夫斯基协助下，就部队战斗准备问题起草了一份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在这些会议上制订出的详细作战计划，都绘成地图送交最高统帅部。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最高统帅部口头报告说，在斯大林格勒地区，

敌我双方的实力总的说来是相等的，但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段，由于部署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苏军有着相当大的优势。没有发现敌军向斯大林格勒调动大量预备队，也没有发现敌军部队调整部署。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表示相信所有指挥人员都清楚地懂得了自己的任务，而且直到团一级的步兵同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的协同问题，已经安排就绪。一句话，他们预计反攻将获得胜利。

在对几个问题作了讨论之后，最高统帅部最后批准了作战计划和进攻时间。华西列夫斯基被指派负责协调所有三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指出，这个代号为“天王星”的最后计划，“以其任务之明确、设想之大胆和范围之广泛而引人注目。”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死后，关于这个规模、作用和效果如此巨大的反攻计划究竟是谁制定的，出现了种种含糊不清的说法。虽说这个问题在我国社会中并不特别重要，而且前一章已经谈过了有关计划工作的情况，但在这里我仍然要作一些补充。”朱可夫指出，当时要求每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提出各该方面军的作战计划，以及他愿意提出的其他任何建议，报送莫斯科的最高统帅部或最高统帅部在当地的代表。

但是，只有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才了解关于可能使用的预备队和物资器材的详细情况。

因此，只有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才能制订出大规模战役的计划。他重申：“在全面计划和保障这一次大规模战略性作战行动中起基本的、决定性的作用的，勿庸置疑是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他说，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分析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所有各种因素，预见到战役的发展进程和结局。“因此，不应该说反攻计划是哪一个人制定的。”

反攻将在一条二百五十英里长的正面上展开，钳形推进的目标是要合围一个半径约为六十英里的地区。一俟突破轴心国军队的防御，苏军将沿着两条向心线，朝着卡拉奇和苏维埃斯基前进，然后切断德军部队同它们的大部分预备队和补给基地的联系，截断其交通线。

预定对比较薄弱的罗马尼亚军队实施主要突击，发动时间选择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以加强主要突击的威力，同时又恰好在敌军进攻失败，但还未能在整个斯大林格勒地域成功地转入防御并调整部署之前，从而使敌军猝不及防。后来的事态表明，反攻所以取得全面胜利，进攻时机的选择乃是一个重大因素。

在这段时间里，朱可夫为完成反攻的最后安排而忙碌。11月11日，在会见了一些部队的司令员以后，他打电报向斯大林报告说，最高统帅部拨给叶廖缅科的两个步兵师，由于运输方面的问题尚未到达。他指出，他已命令在11月15日以前全部准备就绪。他还要求斯大林帮助尽快把一百吨防冻液运送给叶廖缅科的机械化部队，火速给一些部队运来棉衣和弹药。

11月13日晨，朱可夫回到莫斯科汇报进展情况。他发现斯大林情绪很好。朱可夫写道：

斯大林认真地听取我们的汇报。他不慌不忙地抽着烟斗，将着胡须。而且一次也没有打断我们的话，显然，他对我们的汇报是满意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意味着主动权将转到苏军手中。我们大家都相信，即将实施的反攻会取得胜利，它对我国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

在我们汇报过程中，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和政治局的一些委员来到斯大

林的办公室。

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来以前谈过的主要内容重新汇报一遍。

经过简短讨论后，反攻计划得到了最高统帅的全面批准。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提请斯大林注意，一旦德军统帅部发现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地域吃紧，就会被迫从其他地域，尤其是从维亚兹马地域抽调部队来支援其“南方”集群。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在维亚兹马以北地区准备和实施一次进攻战役，而且首先应粉碎尔热夫突出部地域的德军。这个战役，我们建议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部队参加。

斯大林说：“这很好，可是你们哪位负责这件事？”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事前已经商量好了。我说：“斯大林格勒战役在各方面都已准备就绪，华西列夫斯基可负责协调斯大林格勒地域部队的行动，我可以负责准备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进攻。”

斯大林表示同意这个建议，他说：“明早你们飞往斯大林格勒，再次检查一下部队和指挥人员的战役前准备情况。”

11月14日，朱可夫又回到斯大林格勒，来到H·Q·瓦杜丁的部队。他在这里只停留了三天，11月17日，斯大林再次把他叫回莫斯科，开始制订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进攻计划。

在发动进攻前两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斯大林指示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莫斯科去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斯大林把已被指定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负主攻任务的第4机械化军军长B·T·沃尔斯基写的一封信给华西列夫斯基看。沃尔斯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这次突击不仅毫无取胜希望，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沃尔斯基说。参加突击的其他首长也持类似观点，要求最高统帅立即过问这个问题，推迟这次战役并考虑取消它。

华西列夫斯基提请国防委员会注意，在制订进攻计划的整个期间，沃尔斯基对于进攻的胜利，对于分配给他的军的任务，从未有一次表示过怀疑。斯大林命令华西列夫斯基给他接通沃尔斯基的电话。作了简短的、克制的交谈后，斯大林宣布，不管怎样，沃尔斯基将继续指挥他的军，并将执行他的任务。在战役的头几天有了结果之后，再决定怎样处理沃尔斯基。对所有有关人员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沃尔斯基和他的军在战斗中打得很好。很英勇。

11月19日晨，震耳欲聋的炮声预示着苏军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反攻的开始。快到9点钟时，炮火力向轴心国防御纵深延伸，红军的步兵部队在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开始进攻。

瓦杜丁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在两个地段上同时突破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和骑兵部队的协同突击下，罗军防线很快土崩瓦解。罗马尼亚科将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突破轴心国部队阵地后继续向前推进，把扫荡任务留给后续的步兵部队。

同时，A·T·罗金少将指挥的坦克第26军，冲进彼列拉佐夫斯基（大城镇和铁路交叉点），重创罗马尼亚第5军。据苏联方面的资料说，这次进攻非常神速，以致罗军司令部的办公桌上还摊着文件和打开的卷宗，保险柜的钥匙留在钥匙孔里，军上衣还挂在衣架上。

抵达彼列拉佐夫斯基附近以后，第26军的部分坦克便向东南挺进，以便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会师。11月21日，德军企图阻止红军装甲部队的推进，但未能得逞，于是开始向顿河撤退。

第26军军长采取了一项大胆的行动——趁暗夜夺取了卡拉奇附近顿河

上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座大桥。凌晨 3 时，该军的先遣坦克部队，开着前灯，排成一行纵队沿奥斯特罗夫至卡拉奇的公路前进，穿过德军防线直奔渡口。这支部队被德军误认为是自己的部队，所以它畅行无阻地隆隆开到顿河桥头，很快过了桥，占领了这座桥的左岸，并发射信号弹向其余部队发出进攻信号。

第 21 集团军突破罗军步兵第 13 师和第 15 师的防线，派遣由坦克第 4 军和近卫骑兵第 3 军组成的机动集群进入突破口以扩大战果。这个集群还革命在坦克第 5 集团军的配合下，消灭敌军预备队及其司令部和后方地域部队，切断敌军向西和西南撤退的道路，阻止敌军后方预备队的接近。坦克第 4 军预定在 11 月 23 日在卡拉奇东南的苏维埃斯基地域，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会师，完成对敌军的合围。

据朱可夫著《回忆与思考》记载，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 51。第 57 和第 64 集团军于 11 月 20 日开始进攻。其中第 57 集团军和个向卡拉奇总方向进攻。——译者注

这个地区，溪流和河床纵横交错，道路恶劣，严重限制了装甲部队的机动能力，迫使它只能沿着精确规定的方向行动。德军利用这种状况来延缓红军坦克的推进。

出现了令人担心的情况：一些没有经验的坦克手停下来，开始原地射击，使坦克面临被摧毁的危险。一名年轻的指挥员 H·A·列刘杰夫把坦克集结起来，命令它们继续前进。这支装甲部队粉碎了轴心国部队的抵抗，冲进了格罗姆基，消灭了罗军步兵第 15 师的两个团部。

11 月 23 日，坦克第 4 军加快了前进速度，越过被坦克第 26 军夺占的顿河大桥，粉碎了敌军在卡梅申地域的防御，然后向苏维埃斯基突进。

苏军部队只用了四天时间便封闭了对德军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合围圈，共合围敌军二十二个师，约三十三万人。朱可夫和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深知，德军必定要设法突围，于是决定把合围圈的对外正面向西推进大约九十五到一百二十五英里，以防德军统帅部解救其被围部队。

据朱可夫回忆录记载，被合围的是德军第 6 集团军全部和坦克第 4 集团军之一部。——译者注

鲍留斯奉命坚持作战，同时德军统帅部则筹划进救第 6 集团军的行动。这一任务交给了冯·曼施泰因元帅。虽施泰因后来说，在 11 月末的那些危急的日子里，俄国军队如果向顿河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一次迅猛的突击，本来是能够消灭德军“A”集团军群和第 6 集团军的。

当时，坐镇加里宁方面军的朱可夫提议把被合围的德军分割成两部分。首先在萨莫法洛夫卡和科特鲁班集结最大限度的兵力，向前对大罗索什卡实施突击。待红军部队在这里会合后，即迅速集结起来，向北对杜比宁斯基和“135 高地”突击。

要实施这一作战行动，就需要增派部队。此外，突击部队沿途将受到主要是东西走向的深谷的限制。因此，最高统帅部没有采纳朱可夫的计划，况且这个计划也未得到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驻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各战斗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们的支持。可是，要求远在另一个方面军的朱可夫帮助指导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这个特殊阶段的作战，这件事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而且，德国领导人后来承认，如果当时俄国发动一次来势凶猛的突击，可能会把他们的一些集群置于死地。还值得指出的是，朱可夫对于最后被采纳的那项计划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11 月 28 日，朱可夫正在加里

守方面军司令部，同方面军首长讨论即将在那个地段实施的进攻战役。当晚，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要他就怎样歼灭按合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问题提出意见。第二天早晨，朱可夫打电报给斯大林提出如下建议。

苏军应向大罗索什卡方向上实施一次突击，向杜比宁斯基、“135高地”方向实施另一次突击，以便把德军分割为两部分。在其余地段上则转入防御，消耗和疲惫德军。在把敌军分割为两部分以后，应首先消灭力量较弱的那部分，尔后再集中全部兵力进攻剩下的敌军集团。

随后，朱可夫用保密电话与华西列夫斯基通话，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建议。华西列夫斯基同意朱可夫的意见。

为了制止敌军从其中央集团军群调动部队，斯大林和朱可夫于12月8日联名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下达了一项指令，指示他们在12月第三周肃清尔热夫突出部的敌人。

但是，四方面军未能突出德军防御，于是斯大林派朱可夫前往科涅夫将军的司令部查明毛病出在哪里，并设法予以纠正。

朱可夫到达方面军司令部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进行这次战役已不适宜，因为敌人已从其他地段调来部队加强了它的守军。

加里宁方面军也出现了问题；德军切断了M·索洛马京少将的机械化军与主力的联系。朱可夫迅速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来一个步兵军，帮助索洛马京的部队突围。四天以后，西伯利亚援军赶到，才救出了索洛马京的部队。

朱可夫写道，虽然苏军未能肃清尔热夫突出部的敌人，但苏军的攻势作战使德军统帅部不能从这个地段大量调动部队去增援斯大林格勒地域。为了守住热夫-维亚兹马的阵地，德军不得不调来四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

--原书注

12月9日，华西列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向最高统帅建议：把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来的近卫第2集团军投入战斗，同现有部队一起粉碎被合围的轴心国军队。这个战役命名为“指环”战役，原来预定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顿河方面军将消灭罗塞什基以西的德军四个步兵师；其次，顿河方面军向东南方向对沃罗波诺沃实施突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64集团军则向南对沃罗波诺沃实施突击，从而把包围圈南半部分的敌军孤立起来，并予歼灭之；最后，两个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将向古姆拉克总方向实施突击，以粉碎敌军的抵抗。

到12月11日，最高统帅部已经同包括朱可夫在内的各个成员交换了意见，研究了 this 建议。最高统帅部对计划进行了修订（或者说象苏联历史学家常常爱说的那样，“使计划更加明确了”），最后发出指令，要求进行一次分两个阶段的战役。第一阶段是向巴萨尔基诺和沃罗波诺沃推进，以粉碎西部和南部的德军集群。第二阶段将是由两个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和西北发起总攻。“指环”战役发起时间将通过电话向各司令部宣布，至少第一阶段最迟要在12月23日完成。

与此同时，12月12日，但军坦克第4集团军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格勒突击，一次又一次地实施反击，以便重新占领先前德军装甲部队夺占过的地盘。经施泰因说，这次行动是“同死神赛跑”。

到12月19日日终，德军坦克第57军越过了耶绍洛夫阿克赛河，继续向北推进到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条天然屏障——米什科瓦河。离合围圈的南

部正面只有三十英里的德军先头部队，成功地在河北岸占领了一个桥头堡。先头部队从这里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炮火的闪光。看来它们有可能获得成功，假如第6集团军能够从内线发动进攻，牵制苏军，阻止苏军在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前进道路上投入兵力的话。

但是第6集团军的进攻始终未能实施。

就在这个时候，苏军向顿河中游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迫使曼施泰因大量抽调赫尔曼·霍特将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去掩护罗斯托夫。或许正是这一行动决定了鲍留斯的第6集团军的命运。目睹过当时情形的坦克第4集团军参谋长F·W·冯·梅伦廷将军写道：霍特的最精锐的部队——坦克第6师被急忙调向西北，以便阻止如潮水般涌来的俄国军队。假如这个当时仍很完整的师继续归霍特指挥，他也许能够突破俄军的防御，并与地留斯会合。

苏军把新的部队投入战斗。例如P·R·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近卫第2集团军在大雪覆盖的草原上，以每天强行军二十五英里到三十英里的速度赶到了作战地区。当这些苏军部队参加战斗以后，德军撤退到科捷尔尼科沃，接着于12月29日又放弃该城，后退到科捷尔尼科沃西南大约六十英里的齐莫夫尼基，并撤过了马尼奇河。这里正是曼施泰因12月12日开始发动进攻的地方。

曼施泰因的突破尝试遭到失败之后，他和鲍密斯用这样一种想法来自我安慰，即陷入合围的德军，能够牵制大量苏军部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很有用的。赫尔曼·戈林曾经保证说，将向被合围的第6集团军空运足够的补给品，一直坚持到1943年春季——据认为那时德军将再次征服整个这一地区。然而，他的保证未能兑现。戈林答应每天向斯大林格勒空运五百吨食物、燃料和弹药，结果证明他是过分乐观了。事实上，到12月底，每天空运去的物资不到一百吨。12月中旬，忍饥挨饿的德军部队就已开始屠宰罗马尼亚骑兵师的马匹来充饥了。

朱可夫和最高统帅部这时正在进行准备，以便对被合围的第6集团军实施最后进攻。

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人精心制定的“指环”战役计划，这时（1942年12月最后几天）已准备就绪，只待实施。

12月底，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为了作战方便起见，斯大林提议把消灭被围德军的任务交给一个司令员来指挥。斯大林询问大家应该把这一任务交给哪位司令员，于是有人提议罗科索夫斯基。

斯大林转向朱可夫问道：“你怎么不吭声？”

朱可夫答道：“我认为两位司令员都很能干，如果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拨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那末叶廖缅科必然会感到委屈的。”

“现在不是谈论委屈不委屈的时候。”斯大林打断朱可夫的话说，“给叶廖缅科打个电话，向他宣布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当晚，朱可夫用高频电话跟叶廖缅科通了话，把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委任罗科索夫斯基执行最后消灭斯大林格勒德军的任务，并把叶廖缅科的第57、第62和第64集团军转交给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不出朱可夫所料，叶廖缅科很难过，于是朱可夫试图向他解释为什么要作出这一决定。

不久以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更名为南方方面军，并被派去进攻罗斯托夫的德军。

最高统帅部关于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拨归顿河方面军指挥的指令是 12 月 30 日下达的。

1943 年 1 月，顿河方面军的编成内共有二十一万二千人，约六千五百门火炮和迫击炮，二百五十余辆坦克和近三百架作战飞机。

关于最高统帅部和朱可夫在这次反攻中所起的作用，苏联历史学家们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首次作了精确而作尽的描述。比较有益的记载之一是 Q·沃罗比尧夫上校在《军事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指摘沃罗诺夫元帅早些时候发表的有关这次攻势的文章学术水平不高。在赞扬了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沃罗诺夫在全面制订这次战役计划方面所做的工作之后，沃罗比尧夫指责沃罗诺夫说。

现在让我们稍许谈谈 H·H·沃罗诺夫对最高统帅部 12 月 28 日指令的批评。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最高统帅部的那项指令，要求对部署进行很多调整，还需要增加许多部队、多消耗大量炮弹……我们很清楚，这个《莫斯科方案》。进程是极端缓慢的，而且必须投入许多兵力和兵器……不仔细地研究情况，不先同我们（最高统帅部驻战区代表）进行初步讨论，就通过了最高统帅部的决定，这种做法使我们感到惊讶……”

令人遗憾的是，回忆录的作者并没有举出事实性的论据来证明他的批评。

沃罗比尧夫接着对方面军的作战方案同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方案进行了比较，证明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并非象沃罗诺夫说的那样必须对部署进行许多调整。他证明，在第 65 和第 66 集团军的作战地区，方面军提出的计划和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只有一些微小的差别。

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其他集团军的配置也不需要作重大改变。

“实际上，最高统帅部对于方面军的计划所作的改动，是改变了第 65、第 57、第 64 和第 66 集团军的主力部队的突击方向。……从而减轻了部队的各项任务。而这样做是更符合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的。” Q·沃

罗比尧夫著《关于“指环”战役》，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2 年 11 月号，第 52 页—第 54 页。——原书注

沃罗比尧夫上校承认，最高统帅部犯了一些错误。例如，在 7 月至 9 月期间，在顿河河套和在耶尔佐夫卡——萨莫法洛夫卡一线发动反击时，最高统帅部无根据地用零敲碎打的方式使用它的战略预备队，因而不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招致了重大损失。

最高统帅部也没有为消灭被围的轴心国部队，为在德军防线上打开缺口之后扩大进攻提供预备队。

但是，沃罗比尧夫指出，最高统帅部关于粉碎被围德军的决定是适宜的、正确的。

他斥责沃罗诺夫竟声称这是采纳了他的计划和顿河方面军司令部的计划。沃罗比尧夫说，他非常希望对此作出澄清，因为这一争论“具有教育意义——它涉及到最高统帅部为一方，最高统帅部代表和方面军司令部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援引一系列文件之后。沃罗比尧夫说，“指环”战役是根据 1942 年 12 月 28 日最高统帅部指令实施的。他最后写道：“必须表示如下的希望：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们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特别是在探讨一些重大的问题时，不应当依靠他们的笔记和记忆。利用档案馆的文献来核对事实，将大大有助

于精确确定各种事件的真实情况。”

由此可见，沃罗比尧夫的批评乃是为达致历史真实，从而把功劳归于应该得到它的人——最高统帅部和包括朱可夫在内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又一次令人振奋的努力。

亚历山大·沃思指出，朱可夫是“这次战役的真正智囊”，尽管在苏联战后出版的历史书籍中，人们试图尽量缩小他的功绩。另一位卓越的军事史学家汉森·W·鲍德温在他的关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记载中写道，苏军的反攻“是最高统帅部提出的设想，其中特别是 T·K·朱可夫的设想……，他得到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和 H·H·沃罗诺夫的帮助。”

他准确地写道：

最高统帅部制订苏联的战略方针并指导它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说，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方式就象一个委员会，但朱可夫元帅——他很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最伟大的将领，他挽救了莫斯科，并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总参谋长和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是居于斯大林之后的最显要的成员。在整个战争期间，朱可夫自始至终都是最高统帅部成员，而且他在制订和实施苏联的战略计划方面所做的工作超过任何别的人。

汉森·鲍德温著《胜仗和败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战役》，第 435 页—第 436 页。——原书注

鲍德温重申：斯大林、朱可夫、沃罗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共同分享着制订斯大林格勒反攻计划的巨大荣誉。

令人感兴趣、但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战后时期苏联作家们开始大肆赞扬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中的作用。1957 年 11 月，朱可夫被撤职，一批所谓的历史学家试图趁机编造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神话，吹捧赫鲁晓夫，并且抬高他们自己。

直到 1963 年 2 月 2 日，马利诺夫斯基 为庆祝斯大林格勒胜利二十周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才重新提起朱可夫的名字，说他是在为斯大林格勒会战提出设想和制订计划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三名（另外两名代表是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诺夫）最高统帅部代表之一。

马利诺夫斯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曾先后担任过几个方面军的司令员，1945 年晋升为苏联元帅。1957 年 10 月朱可夫被撤职后，他接任国防部长。——译者注

不久，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新的历史书籍出版了，可以明显看出，作者们勇敢地试图把斯大林格勒反攻的功劳归于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最高统帅部的其他成员。B·莫罗佐夫上校在 1965 年 7 月 10 日的《消息报》上撰文评介一卷本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一书。他指出。这本书对于一些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人物在制订军事计划方面的作用，既没有夸大，也没有低估。他特别指出，该书的作者们对早些时候有关反攻计划的制订的记载，作了重大的阐明性的更正。

莫罗佐夫说，有些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企图造成一种印象：这项工作是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即赫鲁晓夫）完成的。但这部新历史书的作者们则更全面、更客观地评介了最高战略领导机构和某些个人所起的作用。

他说，作者们适宜地指名赞扬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赞扬了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以及各个前线司令部。

其他一些著作也重申，这次战略反攻的实施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同时考虑了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而战役的准备工作则是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进行的。

参阅 A·A·斯特罗科夫编《军事学术史》，第 409 页—第 411 页。——原书注

1968 年，朱可夫本人终于有了发表看法的机会。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我个人来说，保卫斯大林格勒，准备反攻，并参加有关我国南部各次战役问题的决策，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我在这里组织。反攻的过程中，取得了比 1941 年在莫斯科地域大得多的实际经验。当时在莫斯科，兵力有限，不允许实施旨在合围敌军集团的反攻。

“由于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反攻顺利地进行了总的领导，并在反攻中取得了大规模的战果，我和其他人一起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授予我第一号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对于我不仅是很大的荣誉，而且也表明祖国要求我更好地工作，使全歼敌人的时刻、彻底胜利的时刻更快地到来。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的还有：A·M·华西列夫斯基、H·H·沃罗诺夫、H·Q·瓦杜兹、A·H·叶廖缅科、R·R·罗科索夫斯基。很多将军、军官、军士和士兵也都受到政府的各种奖励。”

鲍留斯的第 6 集团军濒临覆灭的命运。

同历来一样，希特勒向被围的德军保证说，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准备重新组织空运，并扩大空运规模（此时空运已经中断）。陷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可以指望在 1943 年 2 月下半月被解围。救援的先决条件是恢复南方战线，因而第 6 集团军如能坚持到底，那么就能够把似乎是一场灾难的局面转变为德军的伟大胜利。

然而，已经毫无希望了，许多官兵都清楚这一点。一名德军军官在信中写道。

我看了地图以后吓坏了。我们已经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希特勒把我们丢下不管了。这封信能不能寄出去，就要看机场是否还在我们手里了。我们的位置是在城北，我的炮兵连里的官兵已经对事实真相到底怎样产生了怀疑，但他们不象我那样了解真实情况。看来这就是我们的结局。

汉内斯和我不想当俘虏。昨天我亲眼看见在我们的步兵重新占领一个支撑点之前，有四个士兵被俘了。不，我们是不打算被俘的。

当斯大林格勒陷落的时候，你会听到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那时你就将知道我不会回去了。

另一名军人写道：

在今后一段很长时间，也许是永远，这将是写的最后一封信。一位要去机场的同伴将随身带着这封信。因为最后一架飞离这一孤立地区的飞机，将于明天早晨起飞。

大概指的是古姆拉克机场，该地于 1 月 22 日被红军攻陷。——原书注

局势已是岌岌可危，俄国人离飞机能够起飞的最后一块场地只有两英里了，等到这块地方失守以后，就连一只老鼠也休想逃出去，何况是我呢；不消说，数十万其他官兵也休想逃脱。不过，一个人能有别人陪着一起毁灭，也算是一个难得的小小安慰罢。

包围圈越收越紧了。古姆拉克简易机场失陷之后，德军同外部世界最

后一条实际联系渠道被切断了。严冬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而且祸不单行，斑疹伤寒也在传播蔓延。

然而，鲍留斯拒绝了苏军 1 月 8 日要他投降的最后通牒。

到 1 月 22 日，红军部队已把德军推到城市郊区，把第 6 集团军压缩到宽仅四英里、长仅八英里的一块椭圆形地带，并用炮火不断轰击并空袭德军。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各部队开始投降。1 月 31 日，红军从各个方向发起最后的冲击，以夺取斯大林格勒市中心区。

亚历山大·沃思听到一名参加过谈判的年轻苏军中尉谈起过鲍留斯投降的经过。经过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弹幕轰击之后，苏军攻占了百货公司前面的广场。苏军得知鲍留斯呆在百货公司大楼里。这位年轻的中尉看见一位德军军官从百货公司大楼里发出了信号，便立即作出响应。他在炮弹仍旧不断轰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冲进了大楼。他被领进鲍留斯的房间，这时他发现鲍留斯穿着军服躺在一张铁床上。

“唔，一切都结束了。”中尉说。鲍留斯只是点了点头。中尉派人去叫来一部汽车，把鲍留斯带到了罗科索夫斯基的司令部。

两天以后，即在 2 月 2 日，第 6 集团军已被全部解决。轴心国官兵得以保全性命者仅九万人左右。

希特勒对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指挥后来遭到了各方人士的批评。批评者之一是从 1942 年起担任陆军参谋长，后来成为谋划暗杀希特勒的一名中心人物的蔡茨勒上将。他对希特勒的抨击是非常尖锐的：

11 月，我曾对希特勒报告说，假如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二十五万人，那么整个东部战场的脊梁骨就断了。事实证明了我的预言，因为斯大林格勒会战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

库特·蔡茨勒著《斯大林格勒》，收入弗雷丁与理查森合编的《致命的决定》，第 188 页—第 189 页。——原书注

1 月 8 日，给鲍留斯的最后通牒上没有签署朱可夫的名字，于是有些外国观察家便谣传朱可夫失宠了。这种传说是毫无根据的，斯大林有其他任务派他去执行：朱可夫被派往列宁格勒，开始准备苏军的另一次反攻。正当整个苏联为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朱可夫却在协调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为打破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十六个月的封锁创造了条件。

1943 年 1 月 18 日，朱可夫被晋升为苏联元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这一荣誉的第一位野战指挥官。《消息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红军首长们的精略》的社论，列举了新晋升的元帅和将军的名字，而朱可夫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被赞誉为实施了斯大林关于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和在列宁格勒打退德军的计划的“才能卓著的勇敢的首长”。

苏联最有希望的较年轻的将领中有许多人是在斯大林格勒第一次经受考验的，而他们在这次战役中的成就大小，肯定影响了他们在红军中的发展前途。他们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最重要的标准是在战争头十五六个月里表现要好。到 1943 年初，他们已充分证明他们没有辜负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信任。他们中的两位——朱可夫和沃罗诺夫荣升为元帅军衔。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大将。

1943 年 1 月 19 日的《消息报》报道，最高苏维埃当天发布的一项命令，晋升朱可夫为苏联元帅。沃罗诺夫上将晋升为炮兵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晋升为大将。该报还在头版上宣布，对

列宁格勒的封锁已被打破，朱可夫、麦列茨科夫、伏罗希洛夫和戈沃罗夫因为这一业绩而受到表彰。——原书注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较舞了苏联军民的士气。沃思描述了他在斯大林格勒参加的一次聚会的情形：

我想我们的主人等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已经开始吃起来了。菜肴摆了满满一桌子，还有很多伏特加酒。挨着我坐着的是一位红鼻子的上校，他已经喝了很多酒了。

“我们把他们解决了！”他大声喊道。“整整五十万！来，来！为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干杯！”……

他睡捶自己的胸脯，指着他的红星勋章大声说：“瞧！这是昨天我们伟大的政府奖给我的！朱可夫——我崇拜朱可夫，整个战役是他计划的，他和我们伟大的斯大林一起计划的。哈勒欣河战役，我们歼灭了日本人——那只能算是一次彩排，在斯大林格勒，可是真干哪，希特勒的一些最精锐的师在这里被歼了。是谁把他们歼灭的，是我们俄罗斯人民歼灭的；为什么斯大林格勒很重要，我问你，因为谁打赢了斯大林格勒会战，谁就打赢了这场战争。道理就在这儿！”

第十章 东进的破产

当地留斯将军带领他的第 6 集团军残部，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时候，苏联这次辉煌胜利的主要规划者 T·K·朱可夫，正在遥远的列宁格勒，为红军的下一次胜利拟订计划。

自从德军于 1941 年 9 月 8 日从陆地上完成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以后，一直到 1943 年初，英勇的列宁格勒人，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始终抱着这样的希望：援兵一定会来的，红军一定会想办法前来解救他们。

时间月复一月地过去，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许多人是在有史以来人类曾经遭遇过的那种最骇人听闻的处境中，因饥饿和体力消耗殆尽而死的。德军的包围差一点儿没有达到希特勒的疯狂目标。

1942 年 12 月 2 日，最高统帅部命令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们为突破德军的封锁作准备。这个代号为“火花”的战役，要求两个方面军各组建一个突击集团。一个集团是由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二突击集团军组成，另一个集团则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第 67 集团军为主组成。这两个在某些地段相距不到 10 英里的突击集团，将实施相向突击——沃尔霍夫方面军向西进攻，而列宁格勒方面军则向东和东南进攻。协调这两个方面军的行动的责任，交给了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

12 月 8 日，最高统帅部对两个方面军下达了更具体的指令，并派去增援部队以确保突破的成功。沃尔霍夫方面军所得到的增援兵力兵器，使得它的兵力增加了约百分之二十二，火炮增加百分之二十，迫击炮增加约百分之三十。列宁格勒方面军兵力增加了百分之十。

12 月 28 日，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制订出实施相向突击的最后计划。两个突击集团预定在靠近拉多加湖南岸的 2 号工人村，到往南大约六英里的 6 号工人村一线会师。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 B·Q 特里布茨海军中将，将以其驻

扎在涅瓦河上的炮舰支援这次行动。

到 1943 年 1 月阳，两个方面军都已作好实施战役的准备，但由于气候不好，最高统帅部允许它们把这次攻势推迟十到十二天。

1 月 12 日晨，当温度计的读数仍在摄氏零下二十三度的时候，红军的两千多门火炮和迫击炮打破了严冬的沉寂。在此后的几天里，特别是在 1 月 14 日到 18 日之间，苏军部队试图突破德军过去一年来苦心经营的防御，战斗异常激烈。

滑雪步兵第 12 旅实施了大胆的机动，它奉命越过封冻的拉多加湖向利普卡村进攻。

从背后突击德军。这一行动清楚表明了苏军指挥部的足智多谋。

1 月 18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部队终于在 1 号工人村和 5 号工人村会师，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被打破了。

朱可夫这时又可以被派到别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了。这个地方就是库尔斯克突出部。

这时德国人关切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季，他们应当怎样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写道：

很明显，在损失了如此众多的大兵团之后，不再能够得到大量部队去发动另一次象 1941 年和 1942 年那样大规模的攻势了。但看朱可能做到的是——如果德国方百拥有恰当的领导的话，能够把苏联消耗和疲惫到这种地步，使它对已经遭受的过分牺牲感到厌倦，准备接受一种僵持状态。在当时，这种想法绝不是异想天开。

曼施泰因认为，德军的指挥人员和作战部队仍比它们的红军对手优越：

这样，德军统帅部已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在东线争取打个平手了。假如它能够在战略防御（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范围内。给予敌人以若干强大的局部性的打击——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通过俘虏敌军，使敌军的实力消耗到决定性的程度，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苏军战线上形成了一个从奥廖尔以南的一个地点一直向南伸展到别尔哥罗德的巨大突出部。对于德军统帅部来说，这个宽大的突出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它可以作为向驻守在这一地段的两个德军推团军群侧翼发动进攻的出发地域。德军决定消除这个突出部，并且认为，如果能相当早地发动进攻，就能使红军各部队猝不及防，不得不把在冬季战役将近结束时遭到沉重打击的装甲部队投入战斗。

为了实施这次代号为“堡垒”的战役，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将要提供两个集团军，即坦克第 4 军和“战斗”特遣集团军，在它们的编成内共有十一个装甲或坦克一掷弹兵师，以及五个步兵师。为了提供这些部队，德军在顿涅茨河和米乌斯河的部队部署不得不削弱。中央集团军群将提供第 9 集团军，其编成内共有大个装甲或坦克一掷弹兵师，以及五个步兵师。这个集团军将不得不在奥廖尔一带的突出部集结，在那里，苏军能够从东面和北面向它的背后发动进攻。

还是在“堡垒”战役仍然处在计划阶段的时候（德军希望在 5 月上半月发动这次战役），苏军最高统帅部派 T·R·朱可夫到库尔斯克突出部研究局势。在他动身之前，斯大林把他召到莫斯科。

那时正是 3 月中旬，朱可夫在天黑以后到达，同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开会开到第二天凌晨 3 时。

当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离开以后，斯大林走到朱可夫跟前，问他是否吃过晚饭。朱可夫回答说还没吃过，于是斯大林对他说：

“那我们一起走，吃饭时顺便谈谈哈尔科夫地区的困难局势。”

吃饭时，总参谋部送来了标有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地段情况的地图。一位参谋汇报说，哈尔科夫西南，局势特别严重，德军部队从波尔塔瓦和克拉斯诺格勒转入进攻，向两个方面军的接合部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饭后，朱可夫便动身到前线去执行他的新任务。

大约早晨 7 时，他已来到中央机场，准备飞往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必须到现场去分析那里出现的局势并提供帮助。朱可夫一坐上飞机就睡着了，直到飞机在机场着陆感到颠簸时才醒来。

当天晚些时候，朱可夫用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情况。他要求最高统帅赶快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友邻方面军抽调一切可能抽调的部队，以阻止德军占领别尔哥罗德并向库尔斯克方向突击。

一小时以后，朱可夫从总参谋长那里获悉，斯大林已经命令坦克第 1 集团军、第 21 和第 64 集团军开到别尔哥罗德地域。3 月 18 日德军冲进别尔哥罗德以后，便不能继续向北前进了。一直到 3 月底，德军一再试图突破苏军防御，但未能得逞。

就在这时，斯大林任命 H·Q·瓦杜丁上将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3 月底和 4 月初，瓦杜丁和朱可夫一起几乎走遍了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帮助各部队指挥员估计局势，制订以后的作战计划。

4 月 8 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说：

看来，敌人在第一阶段最大限度地集中其兵力后（其中包括十三到十五个坦克师），将在大量航空兵支援下，以其奥廖尔—克罗梅集团从东北迂回库尔斯克，以其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集团从东南迂回库尔斯克……

应当预计到，敌人在今年的各次进攻中，基本将依靠其坦克师和航空兵。因为它的步兵实施进攻的能力比去年要弱得多了。

朱可夫建议苏军暂不要转入进攻，“最好等到在防御中消耗疲惫了敌人，并打掉敌人的坦克以后，再投入新锐预备队，转入全面反攻，以彻底粉碎敌人的主要集团。”

一两天以后。华西列夫斯基来到现场，朱可夫同他详细讨论了他给斯大林的报告。

朱可夫说，“我和华西列夫斯基对所有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拟定了最高统帅部关于其预备队的配置以及在库尔斯克地域建立草原方面军的指个草案，呈送给斯大林。4 月 12 日傍晚，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来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设想。朱可夫写道：

我们的结论是，必须在所有重要方向上，而且首先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建立牢固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据此，我们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了相应的指示。部队开始在冬季防线上挖掘工事。对于组训完毕的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决定暂不使用，并将其集结到更加靠近受威胁的地域。

在 4 月其余的日子里，苏军最高统帅部继续为即将发动的会战进行着极为紧张的计划和准备。

5 月初，朱可夫去北高加索方面军执行任务后返回最高统帅部。这时，总参谋部基本完成了夏、秋战役的计划工作。同时，最高统帅部组织了周密

的谍报侦察和空中侦察，十分可靠地查明。敌大量部队和军事物资正运往奥廖尔、克罗梅、勃良斯克、哈尔科夫、克拉斯诺格勒和波尔塔瓦地域。

朱可夫写道：“这证实了我们4月份的推断。在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认为德军可能在最近几天内转入进攻的意见占了上风。”

大约在同时，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了将军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建议对别尔哥罗槽—哈尔科夫地域的德军集团实施一次先发制人的突击。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以及总参谋部的一些成员不赞成这项建议，于是朱可夫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使朱可夫失望的是，斯大林犹豫不决，对于究竟是以坚固的防御迎击敌人，还是先改进行一次突击以挫败敌人的进攻，拿不定主意。斯大林担心会象1941年和1942年那样，苏军的防御经不住德军的突击，同时他不相信苏军能够粉碎强大的、坚固筑全进守的敌人。这种举棋不定的情形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经过多次讨论，最后斯大林才同意以纵深梯次防御消耗敌人，然后在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和奥廖尔方向上发起强大反攻来打击敌人。

德军的情况相当糟糕。5月初，希特勒决定把“堡垒”战役推迟到6月。他希望到那时，他的各个装甲师将配备新型坦克。可是，当新型坦克运到时，战役开始时间已推迟到7月初了。趁苏军尚未从冬季战役的损失中得以恢复之前，向它发动突击的大好时机终于永远丧失了。

曼施泰因著《失去的胜利》，第44页。——原书注

根据朱可夫的建议，最高统帅部开始迅速集装部队，以便阻挡德军的进攻。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将承受敌军的主要突击。作为预备队和反击部队，最高统帅部建立了由H·C·科涅夫上将领导的预备队方面军（后改称草原方面军），其编成内有几个多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一些坦克与机械化兵团。这些部队即将参战的地区的地形，是开阔的大草原，沟壑溪谷不多，非常适宜使用大量坦克。

五个坦克集团军、若干个坦克和机械化军以及一些步兵军和步兵师，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各方面军的第二梯队中。这些机动兵团不仅可以迅速调去堵住战线上可能出现的任何缺口。而且是一支可以在适当时机投入战斗的庞大的反攻力量。

最高统帅部指定西方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负责制订向奥廖尔一带德军发动进攻战役的计划，但战役的实施要等到德军最初的攻势被遏止以后。

自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实施防御的部队中，炮兵团的数目首次超过步兵团的数目，其比例是1.5比1。在最可能遭到敌人突击的方向上，火炮的配置也最密集。例如，在受威胁最大的地段——奥廖尔至库尔斯克的铁路线担任掩护的中央方面军第13集团军，其每英里正面上得到大约一百四十八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远远超过德军为发动进攻所能拼凑的数目。

在实施防御准备期间，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又获得了九千多门火炮和迫击炮。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中总共拨出九十二个炮兵团来加强这两个方面军。配置了大千多门防坦克炮，在比较重要的方向上共敷设地雷和炸药包约达四十万个。

斯大林命令朱可夫留在库尔斯克，负责协调中央、勃良斯克和西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而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指导沃罗涅日方面军。

7月4日下午3时，经过短时间的炮兵射击和空中轰炸之后，库尔斯克会战爆发了。据冯·梅伦廷将军记载，当天傍晚，德军掷弹兵和步兵在突击炮兵和工兵的支援下，突破到红串防御的前沿。梅伦廷写道：

在进攻的第二天，我们遭到第一次挫折，尽管我们作了种种努力，部队过是无法突破俄军的防线。“大德意志”师（一个很强的师，拥有约一百八十辆坦克），编成密集队形进行冲击，它的正前方就是沼泽，因而遭到俄国炮兵的猛烈轰击——工兵未能准备好适当的渡口，许多坦克成了红军航空兵的牺牲品——在战斗中，尽管德国空军占优势。

但俄国飞机作战英勇顽强。甚至在德军第一天攻占的地域内，俄国人不知从哪儿突一然昏出来，因而“大德意志”师的侦察部队不得不去对付他们。7月5日夜到7月6日底起未能渡过溪流和沼泽。

在左翼，坦克第3师对萨维多夫卡的进攻，就象“大德意志”师对阿列克谢耶夫卡和卢恰尼诺的进攻一样，未能获得成功。整个地区到处都是地雷，而且拥军在整个防线上的防御，都得到配置在居高临下有利位置的坦克的支持。

我们的突击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坦克第3师不得打退一系列反击。尽管德国空军对俄军炮兵阵地进行了若干次大规模轰炸，但俄军的防御火力丝毫没有减弱。

整个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打得很艰苦，而且一直没有间断过。经过一周激战之后，德国人得出结论。俄军的预备队是打不完的。到7月14日，比较精明的德国领导人，其中包括梅伦廷，都认识到，“德军进攻的时间表已经完全被打乱”。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梅伦廷写道：

进攻伊始，突破在很大纵深内布满地雷的俄军前沿防线，已经证明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困难得多。俄军发动的凌厉反击，并把大量的兵力兵器无情地投入这种反击，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令人不快的事情。德军的伤亡是不轻的，而我们的坦克的损失则是令人哀悼的“豹式”坦克（一种新型坦克）未能象预料的那样发挥作风这种坦克容易被击中着火，因为滑油和燃油供油系统没有充分的防护，坦克乘员的训练也不足。参加战斗的八十辆“豹式”坦克，到7月14日为止已所剩无几了。

7月13日，战斗正处于高潮时；希特勒召见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官，告诉他们说，盟军已于当天在西西里岛登陆，而且意大利人打得很糟。由于盟军可能在别的地方——巴尔干各国和下意大利登陆，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必须中止“堡垒”战役。

但是，谈何容易！事情毕竟正如梅伦廷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的处境，就象一个人揪住了一只狼的两只耳朵，怎么敢撒手放开它！”

军事史学家们一般都没有论述希特勒的这一决定立即造成的影响。曼施泰因也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他只讲了一句简洁的话：“在取消‘堡垒’战役的时候，东部战场的主动权终于转入俄国人手中。”

人们或许会认为，到希特勒下令取消这一战役的时候，德军的一些师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德军统帅部犯了一个特大错误，就是给了苏军时间，使它在4、5、6三个月重新部署和加强了他们的兵力。

在普罗霍罗夫卡周围的一次异常激烈的战斗中，德军装甲车辆和人员损失极其惨重。

据苏方的记载，仅在一天的战斗中，德军就损失了三百五十辆坦克和

一万名官兵。

突出部南侧的战斗也十分激烈，损失的严重程度便是证明。例如，坦克第 19 师坦克第 73 团，到进攻的第五天只剩下两个连了。步兵第 332 师损失了三千七百人，而坦克第 6 师也遭到重大伤亡，只剩下四十七辆坦克了。

就在这个时候，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以最高统帅部驻当地代表的身份，命令西方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发动攻势。三天以后，即在 7 月 15 日，中央方面军向奥廖尔方向发起了进攻。

德军统帅部面临着一项紧急的决定，即是否将正向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进攻的部队后撤到它们原来的阵地。如在原来的阵地巩固下来，德军能指望利用在奥廖尔桥头堡作战的部队之一部。因此，7 月 16 日，德军坦克第 4 集团军和“战斗”特遣集团军，在强大的后卫部队掩护下开始撤退。

与此同时，朱可夫命令近卫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1 集团军沿奥博扬—别尔哥罗德公路向前实施迅猛的反突击。7 月 18 日，他把草原方面军投入战斗，到了 7 月 20 日，沃罗汉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所有集团军向正在撤退的德军实施了向心突击。当日日终，收复了德军 7 月 5 日发动攻势前苏军曾经占据的阵地。

7 月底，近卫第 11、坦克第 4 集团军以及第 61 集团军的部队接近了奥廖尔—勃良斯克公路和铁路线，到 8 月初，战斗已在奥廖尔接近地上打响。后撤的德军部队和车辆密密麻麻分布在公路和田野上，一眼望不到边，并且在几条主要公路上造成令人沮丧的堵塞。

苏军的地面攻击机和轰炸机不停地向这些堵塞地点，向聚集在奥卡河各渡口的德军部队进行袭击。

当苏军接近奥廖尔的时候，他们发现这座战前曾拥有十多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工厂被炸毁，铁路车场被破坏。城市里只剩下高层公寓建筑物的零零星星的残垣断壁了。德军进行了顽固的抵抗，但红军部队终于在 8 月 5 日肃清了该城的残敌（见附图 5）。

随着库尔斯克的胜利和奥廖尔与别尔哥罗德的解放，莫斯科第一次响起了祝捷礼炮。

“俄国首次决定鸣放祝捷礼炮和放烟火来庆祝库尔斯克的胜利，这决不是偶然地、灵机一动地作出的决定。”亚历山大·沃思评论说，“因为俄国统帅部懂得，俄国打赢了库尔斯克会战，它实际上就已打赢了这场战争。”或者说，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示着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衰落，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则使它面临灭顶之灾。”

7 月 31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为苏军将领们“卓越而果敢地指挥作战和抗击德国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授勋：授予朱可夫元帅苏沃洛夫一级勋章；授予科涅夫大将库图佐夫一级勋章；授予布尔加宁中将红旗勋章。

荣誉和奖赏并没有使朱可夫放慢步伐。他继续亲自指挥关键性地区的作战。尼古拉·K·波佩尔在他撰写的、于 1960 年出版的《坦克转向西方》一书中，对于朱可夫视察在库尔斯克附近陷入困境的一支坦克部队的情形作了记载。虽说他的记载抱有偏见，但却是饶有趣味的。职业军人朱可夫同集团军政治委员、后来成了赫鲁晓夫的辩护士的波佩尔将军的关系，很可能是非常冷淡的。波佩尔是这样描写朱可夫抵达 A·格特曼将军的司令部的：

朱可夫元帅走下他的车子，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在他走向格特曼的帐篷时，很快地向周围扫视了一眼。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司令部。指挥

员们怀着担心和期望注视着朱可夫的到来。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朱可夫来到哪个部队，不管公正不公正，反正不狠狠训斥一些人，不把一些人撤职或降职是不多的。所以抱着期望，是因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拥有很大权威，能够使部队采取行动，能够在任何时候（因为他对情况了如指掌）迅速作出决定。

这一次，朱可夫大发雷霆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情况实际上发生了悲剧性的逆转。

列昂诺夫的坦克旅同主力部队的联系被敌人切断了。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在还没有把情况弄清楚的时候指责别人，而且暴跌如雷呢？有人说，一个司令员训斥下级是要使他们于得更好，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和多动脑筋。我不相信这一点。不到五分钟以前，格特曼还是果断而坚定的，可现在他不知所措了。

接着，波佩尔对朱可夫的指责变得尖刻起来：

粗暴——我们这一代的许多指挥员，都把它同朱可夫元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他一个人自我沉溺的东西。他认为他有权侮辱他的下级，他的这种看法就象传染病一样传播开来。有些指挥员就采取了象板着脸孔的军纪官一般的傲慢态度，有时这甚至成为他们的一贯作风，然而它是同我军的真正民主的性质格格不入的。

波佩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可以这样称呼他的话，他的道路是坎坷的。他对朱可夫的批评后来遭到指责。不过，在他的书出版的那个时候，党的方针号召人们谴责朱可夫的“波拿巴主义者”的倾向。

巴月 23 日，科涅夫将军的草原方面军的部队，在相邻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协同下，解放了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这一胜利，连同在库尔斯克和奥廖尔的辉煌胜利，标志着东部战线上德军的毁灭。苏军在战役中决没有用尽他们的资源，红军此刻在数量上已占明显优势。这时苏联空军的力量，是德国空军的两倍，而迅速改变着的局势，迫使德国空军不断地从一个战场调到另一个战场去应付新的危急局面。

在 1943 年最后几个月里，德军从南方战线全线退却，红军则全力追击。德国人曾希望沿第聂伯河据守，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苏军于 10 月强渡了这条河而毫无办法，只剩下河口的一块地方仍旧留在德国人手中。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接近地上的彼烈科普也被收复，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军被截断了。

11 月，红军攻克基辅，乌克兰的大小城市一个接一个被苏军收复。到 12 月初，经过了三个月的进攻，俄国中部和南部的德军被击退了二百多英里。接着双方都停下来，准备进行严酷的冬季战役。苏军于 1943 年 11 月 21 日进入基辅。赫鲁晓夫回忆了红军进报第聂伯河西岸，准备解放乌克兰首都的胜利时刻。为了指挥这一重大战斗，朱可夫从最高统帅部来到前线。

赫鲁晓夫写道：“为他和我修建了一所掩蔽部好睡觉，那一天我们坐在里面讨论局势，开开玩笑。到了第一天、第三天，我们再也用不着使用这个掩蔽部了。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211 页。——原书注

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总的计划，乌克兰的四个方面军于 1943 年 12 月底和 1944 年 1 月初重新展开进攻。1944 年初，朱可夫赶到乌克兰去协调瓦杜丁将军指挥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和科涅夫将军指挥的乌克兰第 2 方面军的行动。在卡涅夫和科尔松—谢市琴柯夫地域附近，在第聂伯河的弯曲部，由

威廉·施滕麦尔曼将军指挥的德军十个师和一个摩托化旅占据着一块大约八十英里宽的突出部地域。

1月24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部队向这个突出部发动突击，两天以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发动了进攻。这些部队突破了德军的防御，1月29日，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在兹维尼戈罗德卡附近会师，合围了轴心国的上述各师。据朱可夫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中的记载，此处应为“一天以后”——译者注

2月8日，朱可夫向施滕麦尔曼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他投降。但德国人拒绝了最后通牒，于是战斗重新激烈起来。

被合围的德军的处境一天天恶化，到2月10日以后，整个孤立地区都处在苏军炮火轰击之下。2月17日夜，德军最后一次企图拼命突围，只有部分德军冲出包围圈。

据苏联方面的数字，在科尔松—谢甫琴柯夫战役中，共击毙德军五万五千人，生俘一万八千二百人，而德国方面则声称，被合围在科尔松的五万军队中，虽施泰因成功地救出了三万五千人，虽然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大批火炮。不管双方的统计数字如何，战役的结局是红军和朱可夫、瓦杜丁、科涅夫三位将领的一次伟大胜利。

3月初，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发动一次由乌克兰第三、第2、第3方面军参加的大规模攻势，以便彻底解放乌克兰西部被称“右岸”的地区。最高统帅部开始变更这个地区的几个方面军的部署，给各方面军重新划分了战线。坦克第4集团军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调给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收复了罗夫诺和卢茨克之后，现在有可能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侧翼向科韦耳，然后继续向布列斯特、卢布林展开进攻（2月24日，最高统帅部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之间的地域，建立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

这次攻势的基本战略，是在从波列西耶到第聂伯河口的宽大正面上同时发起强大的突击，把敌人分割成一个个小的集团，然后分别歼灭之。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将向科韦耳—布列斯特地区进攻。而乌克兰第1方面军将从会彼托夫卡向切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策实施突击；并切断在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退路。

乌克兰第2方面军将从兹维尼戈罗德卡地域向乌曼、雅西突击，而乌克兰第3方面军则从克里沃伊罗格向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突击。乌克兰第4方面军将不参加西乌克兰战役，它将开始准备在克里米亚发动攻势。

苏军各方面军司令部开始调整其部队的部署，把部队集中到实施主要突击的地域。

尽管气候恶劣，公路网的状况很差，准备工作还是按期完成了。人们加紧努力向红军各部队运送人员、装备、弹药、燃料和食品，由于道路不好，有些师直到攻势开始之后才得到补给。

在最后准备阶段，红军遭受了一次严重损失。2月29日，在前往部队视察途中，瓦杜丁将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乘坐的汽车遭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伏击，瓦杜丁中弹负伤。

他继续活了一个半月，在4月15日动手术时死了。

3月3日，T.K.朱可夫接替瓦杜丁担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没有改变原先对各个部队下达的任务，唯一的变动是，他命令第13集团军以其主力防守目前的防线，而该军左翼的一个师则要在第60集团军协同

下向西前进攻。

8月4日晨，朱可夫的部队在他亲临战场指挥的鼓舞下，穿越几乎无法通行的田野发起了切尔诺夫策攻势。他们在一条大约一百一十英里长的正面上突破了德军的坚固防御，两天之内向前挺进了十五到三十英里。

3月5日，斯大林命令在莫斯科用二百二十四门大炮齐射二十响，向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致出。

从3月7日到11日，朱可夫的突击集团，艰难跋涉，穿过乌克兰泥泞地带的泥淖向前挺进，夺取了沃洛契斯克—切尔内—奥斯特罗夫地域，切断了利派夫—敖德萨铁路线，向前推进了六十二英里。

与此同时，P·R·马利诺夫斯基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也转入进攻，强渡了印古列茨河，突破了德军在河西岸的坚固防御。

一些狡猾的德军指挥官得以逃脱朱可夫的围歼。为了避免被合围，德军坦克第48军开始非常冒险地穿过了朱可夫的先遣部队的正面，向塔尔诺波尔撤退。赫尔曼·巴尔克将军采取了白天战斗，夜晚行军的办法。为了保证不间断地控制他的那个军，他把他的指挥部设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以便他能够在一个地方呆好几天，然后再向后方迁移很长一段距离。既然巴尔克觉得红军每次进攻都是针对大的城镇（也许是想通过夺取大城镇来引起斯大林的注意，这样就会根据特别命令，在莫斯科为他们鸣礼炮），所以他就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些城镇。

梅伦廷写道：

在俄军发动的战役中，（德军的）许多灾难的起因都是由于把高级指挥部设在大城镇，或者出于不适当的故作勇敢而把指挥部设在过分靠近前线的地方。结果指挥部常常被卷入战斗，使部队完全失去控制和指挥。巴尔克避免了这一错误，他注意把他的指挥部设在远离交通线的地方。

德军第48军终于能够在塔尔诺波尔西面集中，加入了这个地区的战线。

3月17日，座落在陡峭河岸上的古老要塞杜布诺（哥萨克塔拉斯·布列巴曾在这里作过战），被朱可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所攻克。翌日，苏军又占领了重要的铁路枢纽日梅林卡。3月19日，苏军通过侧翼迂回和正面进攻相结合，收复了卡梅涅茨，接着在第二天攻占了铁路枢纽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克。与此同时，科涅夫的部队正在夺取南布格河上的工业中心文尼察。

3月21日，朱可夫的突击集团继续进攻。春汛、深谷以及泛滥的溪流虽使部队前进速度减慢，但突击集团继续向德涅斯特河挺进。坦克第1集团军强渡了这条河，而其他坦克部队则渡过了普鲁特河，解放了切尔诺夫策。

这时，朱可夫的部队挺进如此神速，以致苏联新闻局有时不得不使用笼统的提法，例如3月27日就出现过这样的笼统报道：“解放了二百四十个地方。”每当攻占了较大的、比较重要的地方，都要在傍晚时分在莫斯科鸣放十二响到二十响礼炮。切尔托夫、普罗斯库罗夫、卡梅涅茨波多尔斯克、科洛梅亚等城均被红军接连攻克。

4月5日，《消息报》的一篇文章宣布。“苏联元帅朱可夫同志所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的辉煌战绩，已使红军进抵到喀尔巴阡山麓，把德军的战线截成两段，并使敌人失去了主要交通线。”这篇文章还说：“德军的南部集团不得不完全依靠通往罗马尼亚的公路。”

《消息报》概括了朱可夫的部队新近取得的胜利，指出：“发起攻势不

到一个月，乌克兰第五方面军的部队就击溃了德军二十八个师和五个师级集群以及一个罗马尼亚师。”关于敌军的伤亡数字和兵器损失也许有些夸大，即：二十万官兵、二千一百八十七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四千六百零二门火炮、二千六百七十六门迫击炮，以及大约五万四千辆卡车和牵引车。苏联新闻局4月3日发布的一项特别公报说，“朱可夫指挥的二十八天作战”解放了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三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乌克兰的三个区中心城市——文尼察、卡梅涅茨波多利斯克、切尔诺夫策，以及五十七个城镇。

但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批评了朱可夫在3月最后几天对于攻势作战的处置不当。它说，朱可夫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近卫步兵第18军地段的对外正面和坦克第4集团军地域的对内正面的部队。他在制止敌人使用苏军部队上空空域方面也是不成功的。侦察工作搞得不好，而且指挥所脱离了部队。正是利用了这些错误，3月28日被合围在塔尔诺波尔东南的斯卡拉附近的德军坦克第1集团军，集中了一支包括七个坦克师和三个步兵师的大部队，于3月底在良次科伦一切尔托夫地段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进攻，并于4月7日突出合围，进抵布查奇。空车作战方面的缺点，不能归咎于朱可夫。《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承认，春季的道路被洪水淹没，使得苏联空军无法迁移到其他机场，以便在合围地区实施有较的作战行动。由于前沿机场的问题，一些靠空运补给的大部队缺乏燃料和弹药。见《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4卷，第79页。——原书注

4月4日，德国人使用了从法国和南斯拉夫调来的一个坦克师和两个步兵师，在波德盖策附近向苏军近卫步兵第18军发动进攻，迫使它向前撤退。4月7日，这些德军部队在布查奇同坦克第4集团军会合，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突出了合围，甚至带走了大都分重兵器。

可是，这一段插曲却使得希特勒同冯·曼施泰因元帅之间产生了无可挽回的危机。

起初，希特勒不许坦克第1集团军设法突围，坚持要它拼死据守。但是。曼施泰因飞到贝格霍夫，来到希特勒的贝希特斯加登别墅。在他扬言要辞职的情况下，才终于获准为这一行动制订计划。然而一周之后，即在突围尚未实现之前。曼施泰因被解除了职务。

朱可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向西推进，在喀尔巴阡山麓击败了德军，并前出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边境。为了庆祝这一胜利，4月8日在莫斯科，使用三百二十四门大炮齐射二十四响，向乌克兰第1方面军致敬。

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继续进攻，夺取了敖德萨接近地上的重要据点拉兹德尔纳亚。切断了德军敖德萨集团退向罗马尼亚的主要道路。

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部队，在雅西以北强渡了普鲁特河，占领了多罗霍伊和博托沙尼。朱可夫的部队乘胜前进，夺取了重要城镇塔尔诺波尔。4月15日傍晚，莫斯科人再次听到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向乌克兰第1方面军致敬的礼炮声。

几周之前，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已开始准备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发动攻势，以便解放白俄罗斯共和国。在准备过程中，总参谋部人员讨论了怎样迷惑敌人的问题并决定想方设法使德国人相信，红军将向南，和向波罗的海各国发动大规模进攻。

1944年5月8日，总参谋部向马克丝第3方面军司令员下达命令，要他在方面军右翼的后面集中八九个步兵师，并加强以坦克和炮兵。为此，将向该方面军提供必要的部队。

还将配置大批假坦克和假火炮，并且布置一些防空阵地。战斗机将在基什尼奥夫以北经过仔细选定的地区进行巡逻飞行。为保证这些迷惑措施不露破绽，方面军司令员必须从空中检查一下部队集中情况。为了保密起见，这些计划仅仅告诉了为数不多的人。作战方面的伪装活动预定从6月5日起持续到6月16日。类似的指令也下达给波罗的海第3方面军司令员，要求他在切列哈河以东采取伪装和迷惑敌人的措施。

苏军还采取其他措施来隐藏自己的意图。例如，只有五个人了解白俄罗斯攻势的详细情况。他们是：斯大林的第一副手朱可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东诺夫将军、作战部长什捷缅科和他的副手。对于有关战役问题的通信，实行了严格控制，绝对禁止用电话和电报进行机密谈话。严格控制无线电通讯，在距战区前沿大约三十五英里范围内，甚至连低功率的无线电台也不得使用。

在对各方面军司令员5月上半月提出的各种设想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最高统帅部制订了白俄罗斯战役的一项初步计划。这个代号为“巴格拉季昂”（以1812年战争的英雄命名）的战役，要求消除维切布斯克—博勃鲁伊斯克—明斯克地域的突出部。前出到莫洛杰奇诺、斯托尔勃策、斯塔罗宾。预定用两个突击集团进攻守卫这个突出部的德军部队的两翼。A突击集团由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组成；B突击集团由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的编成内共有七十七个步兵师、三个坦克军、一个摩托化军和一个骑兵军。按计划，这次战役将持续四十到五十天，向前推进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英里。5月22日夜到5月23日晨在最高统帅部召开的有斯大林和各方面军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审查了这项计划。虽然对各方面军的具体任务作了更详细的规定或作了一些变动，但计划的总目标没有改变。5月31日，最高统帅部发出指令。提出了各方面军的具体任务。

——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向贝申科维奇和什文切尼斯突击，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配合作战，粉碎维切布斯克和列彼利地域之敌，然后强渡南德维纳河，向列彼利—恰什尼基地区推进。这次突击要求使用两个集团军突破戈罗多克西南的德军防御，夺取贝申科维奇。一部分部队将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右翼集团军一起推进，占领维切布斯克。

——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任务，是同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协同作战，粉碎敌维切布斯克集团和奥尔沙集团，并前出到别列津河。

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部队将实施两个突击：一个是用两个集团军向森诺突击，部队之一部向西北推进，同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配合作战，夺取维切布斯克，一个是用两个集团军沿明斯克公路向博里索夫突击。在攻占森治和奥尔沙之后，这些部队将使用它们的强大的机动部队消灭博里索夫集团，并在博里索夫地区前出到别列津河西岸。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奉命同白俄罗斯第1和第3方面军的部队协同作战，消灭莫吉廖夫地域之敌，然后前出到别列津河。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的任务是消灭博勃鲁伊斯克地域之敌军集团，然后推进到奥西波维契、普霍维奇和斯卢茨克。这一作战行动要求

各用两个集团军实施两个突击。一个是从罗加切夫地域向筹款鲁伊斯克和奥西波维势突击；一个是从奥扎里契向斯卢次克突击。

预定出动一千多架远程飞机袭击奥尔沙、明斯克、博勃鲁伊斯克、巴拉诺维奇、卢尼涅茨、布列斯特和比亚韦斯托克等地的德军机场，同时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进攻开始前一天夜间，远程轰炸机将袭击预定实施突破的地段的德军主要防御中心。

白俄罗斯的各游击队得到指示。加强对敌人的交通线的袭击，在取有利阵地、渡口以及桥头堡，并据守这些地方直至红军部队前来会合。

最高统帅部还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加强各方面军，特别是用部队和兵器加强白俄罗斯第1和第3方面军。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在结束了克里米亚半岛战役后，被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然后被派往白俄罗斯。最高统帅部指派华西列夫斯基协调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行动，指派朱可夫协调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5月15日，科涅夫接替朱可夫担任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朱可夫在白俄罗斯战役中的成就，可以归因于他的非凡的个人品质和军事才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年11月号一期的一篇文章描写了他的这些品质：

在准备一次战役的过程中，T·R·朱可夫总要和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一起研究问题，而且还同其他部队指挥员一起研究问题，亲自熟悉实际情况，特别是对敌人的战线实施突破的地段的实际情况。С·М·什捷缅科上将回忆了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在白俄罗斯战役中协调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期间的工作情况。

他写道：“最高统帅部代表深入了解了每个集团军的地段的地形。他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以便能对所有的作战方案共同加以研究，一再仔细地进行推敲。最后认识到，实施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任务的最佳方法是：合围博勃鲁伊斯克地域的敌人，然后歼灭被合围之敌。这一攻势的准备工作毫不迟延地根据已获批准的计划和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指示实施了，而最高统帅部则从它的预备队中派出部队来援助方面军司令部。”

什捷缅科上将在他写的一篇关于白俄罗斯攻势准备工作的文章中，也谈到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情况。他写道：“当时，最高统帅部的活动，象往常一样，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并非总是坐在办公室里。这时候，最高统帅部代表们已经在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军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在这些方面军中，同当地的司令部一起解决有关准备和实施具有重大意义的作战行动的问题。”

М·什捷缅科著《在向白俄罗斯突击之前》，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5年9月号，第44页。——原书注

什捷缅科说，战后，有些方面军司令员抱怨说，总参谋长和最高统帅部第一助理常驻在方面军，对于前线兵团首长产生了不良影响。什捷缅科说：

在一定程度上说，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觉得尽管有人提出这种批评，但最高统帅部代表在那种条件下所从事的活动本身就表明它是必要的。情势要求在方面军中必须有这样的人，他富有经验、拥有权威，能够同方两军司令部一起就最重要的作战行动，迅速作出决定，并帮助确保作战行动的实施。”

什捷缅科指出，朱可夫作为斯大林的第一助理，是有充分理由经常到方面军去的。

而华西列夫斯基通常则宁愿呆在他领导的总参谋部。“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最高统帅是不同任何人商量的。他显然认为那种情况是正常的，因此，几乎每次他们回来之后，他都要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再回前线去。”

到 1944 年 6 月 26 日，苏联人已经在其各个方面军集结了庞大的阵容，共有部队一百六十六个师和九个步兵旅，得到三万一千多门大口径火炮和迫击炮、五千二百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六千架飞机的支援。

与德军相比，苏军在步兵师和骑兵师的数量方面的优势为 3 比 1，而火炮和迫击炮的优势几乎也是 3 比 1。使德国人更加倒霉的是，苏军在坦克和自行火炮方面拥有四倍的优势，而作战飞机的优势比这还要稍大一些。白俄罗斯第 1 和第 3 方面军拥有四个方面军的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拥有全部坦克和自行火炮、飞机数目的四分之三。

到 6 月 22 日，苏军攻势的准备业已完成。即将发起进攻之前，一些先遣营进行了威力侦察，以便获得关于德军防御状况的最后情报。由于这一行动在某些地段获得成功，使红军一些部队的战术地位也得到改善，而且在许多地段上，这种侦察性的试探进攻发展成为总攻。

波罗的海第 1 方面军于 6 月 23 日将其各集团军的大部兵力投入进攻，但由于道路不好和敌人的顽抗而进展缓慢。

经过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之后，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部队也发起进攻。第 5 集团军和第 39 集团军首战告捷，它们在一条三十英里宽的正面上突破德军防御，突破纵深约达六英里。在奥尔沙地段。攻势进展稍慢，近卫第 11 集团军遭到猛烈抵抗，一天之内只前进了半英里到不足二英里。第 31 集团军的进攻未能奏效。沿明斯克公路进攻的苏军部队进展也很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炮火和空中轰炸未能压制住德军在这一地区的非常坚固的防御。也未能充分查明德军的火力配系。此外，苏军炮兵部队没有很好执行伪装纪律，以致被敌人发现，未能象它们原来希望的那样对敌军发动突然袭击。

尽管如此，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部队经过三天战斗，粉碎了南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一条长达十二英里的狭长地带的敌军防御，向前推进了十八到三十英里，并于 6 月 27 日晨攻占了维切布斯克和奥尔沙。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于 6 月 24 日开始进攻，然而由于气候不好和侦察不充分，有些大部队开头进展迟缓。南部突击集团进展比较顺利。当步兵部队在防线上打开突破口时，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博勃鲁伊斯克地域的战斗尤为激烈，德国人极力避免被合围，而俄国人则向这一地区倾泄炮弹和炸弹，以便把德军合围起来。苏联人承认，在 6 月 29 日攻占博勃鲁伊斯克之前，至少有五千名德军突出包围。经过五天战斗，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在一段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正面上突破德军防线，向纵深推进了六十八英里。

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部队于 6 月 23 日投入战斗，到 6 月 26 日，先头部队强渡了第聂伯河，在莫吉廖夫以北的河右岸占领了若干个登陆场。三天以后，苏军部队解放了莫吉廖夫，进抵到普鲁特河和第聂伯河汇合处。

这时，德军从南德维纳河到普里皮亚特河开始全线撤退。苏军最高统帅部向四个方面军发出新的指令，要它们挺进到明斯克，解放该城，并歼灭正在逼近的敌预备队，从而使德军不能稳固其阵地。

白俄罗斯的三个方面军向明斯克实施向心突击，7 月 3 日，苏维埃白俄罗斯的首都——一座已被夷为废墟的城市里的德军，被全部肃清。

在以后的日子里，苏军开始有计划地歼灭明斯克以东的德军各集团。7

月9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奉命消灭一直在破坏苏联交通线和作战行动的许多德军小股部队。

这时候，红军被赋予了新的任务：彻底解放白俄罗斯，并把德军逐出立陶宛和波兰。

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向问格夫区尔斯和考纳斯实施主要突击，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革命向维尔纽斯和利达进攻，并在涅曼河西岸夺取登陆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应向诺沃格鲁多克推进，前出到涅曼河，然后继续向比亚韦斯托克进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部队成向巴拉诺维契和布列斯特实施主要突击，前出到南布格河，并在河西岸建立登陆场。

这些任务绝大部分都在7月下半月完成了。由朱可夫指挥的攻打布列斯特的战斗，投入了一个坦克集团军和九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其中包括波兰第1集团军。在战役的这个阶段，朱可夫与波兰军队的领导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互相尊重和敬佩的感情。

7月20日，攻势开始，旗开得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突击集团在宽大的正面上前出到南布格河，在三个地点渡过渡河进入波兰领土，7月23日攻克卢布林，而朱可夫的几个集团军则于7月25日进抵到维斯瓦河。

维斯瓦河，即维斯杜拉河，又译维斯拉河。——译者注

苏军继续推进，于7月27日对德军布列斯特集团形成包围。翌日，这座在1941年6月经受了战争首次打击的要塞城市布列斯特即为红军所收复。

这时，最高统帅部下达了新的指令。命令四个方面军进抵东普鲁士边界和维斯瓦河。

朱可夫指挥下的两个方面军还被赋予了特别任务。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应向沃姆扎和奥斯特罗文卡进攻，约在8月10日前在纳雷夫河西岸建立登陆场，并巩固其阵地然后进入东普鲁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应向华沙总方向进攻，于8月8日前夺取波兰首都郊区的普拉加，并在纳雷夫河和维斯瓦河西岸建立登陆场。

虽然进攻速度减慢了，但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于8月下半月进抵到奥古斯图夫—沃姆扎一线，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各集团军，从纳雷夫河口直到普乌图斯克的地段上进抵纳雷夫河。此时德军恢复了它的战略正面，这个不利情况，加上苏军交通线过长，且部队已很疲惫，使苏军不得不中断这次攻势。

8月29日，斯大林命令所有四个方面军在耶尔加瓦到尤塞夫沃一线占领防御阵地。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则获准在9月份进行有限的攻势作战，以便在纳雷夫河上建立登陆场，解放普拉加，然后再建立防御阵地。

在这段期间。波兰地下军趁德军撤退和苏军向前推进之机，下令于8月1日傍晚发动总起义。虽然详细探讨华沙起义不属本书的范围，但应当指出，波兰首都的这次殉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争议最大的事件之一。不言而喻，它曾产生过深远的政治影响。关于红军是否能够或愿意前往援助华沙起义者们的的问题，争论一直继续到今天。因此，对这个问题至少得简短地谈一下。

乔治·凯南曾说，华沙事件是“表明苏联决心在战后控制东欧的最露骨的和明确无误的迹象”。见乔治·凯南著《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与西方》，第365页。——原书注

朱可夫是否有能力继续向前推进，把德国人赶出波兰首都呢？起义领

领导人布尔-科马罗夫斯基认为他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红军部队在进抵维斯瓦河东岸的当天便渡过了这条河。他认为，这一事实清楚表明苏军没有遭到德军认真的抵抗，维斯瓦河已不再是苏军向前推进的重大障碍。他还指出，红军侦察部队从其登陆场深入到波兰境内很远的地方，没有遇到抵抗，而德军部队显然正在仓皇地从华沙撤退。什捷缅科将军写道，

9月初，斯大林开始对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可能采取的作战方针表示关注。由于驻这两个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铁木辛哥病了，斯大林派朱可夫去弄清那些地段的情况。朱可夫刚一回来，斯大林就把他派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去“查明华沙的情况，并采取必要措施”。斯大林吩咐朱可夫亲自向波兰人交待任务，并帮助他们组织实施。

9月15日，朱可夫飞到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翌日晨，他和罗科索夫赔偿一起来到位于普拉加热莱纳区的波兰第1集团军司令部。这时波兰司令员已开始派遣步兵部队渡过维拉瓦河去援助起义者。他们同波兰司令员讨论了局势。什捷缅科没有详谈苏军给了什么支援，只是说“为保证顺利度过维斯瓦河，尽了一切努力”。几天以后，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部同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商量怎样援助华沙。9月20日，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向总参谋部提出了建议，但建议的内容不得而知。什捷缅科对他们提出的建议内容也含糊其词。他写道：“国家军（忠于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波兰地下军）领导人酝酿的政治阴谋……促使罗科索夫斯基表示坚决主张停止在华沙的作战行动。这个建议得互T·R·朱可夫的支持。”于是斯大林同意了，波兰第1集团军奉命在维斯瓦河东岸转入防御。

见什捷缅科著《走向胜利》，《旗帜》杂志，1970年6月号，第135页-第140页。--原书注

布尔·科马罗夫斯基著《秘密军队》，第199页。——原书注

朱可夫的说法则完全不同。对此，应当从苏军总是喜欢沿河岸把攻势停下来，以便稳固战线、调整部署的角度去看待。战后，朱可夫对驻柏林的美军装甲第7师的约翰·斯普鲁林准将说：“当我们进抵华沙时，我们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办法渡过维斯瓦河，如果不先把我们战线上的德军大大削弱的话。”

朱可夫说，苏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希特勒对共产主义怀着。狂疯的仇恨，所以他将不顾其他战场的需要，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对付红军。德国人对斯拉夫人怀有恐惧心理，德国的兵工厂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德国东部，而这一地区是普鲁士军人阶层的据点，所有这些因素促使苏联人认为，希特勒宁肯在西线放弃地盘，也不愿削弱他在东部战场的兵力。

古德里安在他的书中写道，维斯瓦河一线的战斗是激烈的，而“我们德国人的印象是，挡住敌军使之无法前进的是我们的防御，而不是俄国要破坏华沙起义的愿望。”

同时，不管能否做到，斯大林显然不愿意去帮助波兰人。他认为华沙的战斗，是“一批贪图权力的罪犯们的一次鲁莽而拙劣的冒险”。此外，斯大林断然拒绝让美英飞机在空投补给品之后使用苏联的空军基地。8月16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宣读了如下的声明：

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版，第6卷《胜利与悲剧》，上部，第1分册，第202页。——原书注

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武器，因为这

是美国和英国的事。但它决然反对美国或英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武器后，在苏联领土降落，因为苏联政府不希望同华沙的冒险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关系。

同一天，丘吉尔首相收到斯大林的一封信，信中说：“在已经出现的形势下，苏军最高统帅部得出结论，它必须同华沙的冒险行动脱离关系。”

丘吉尔著《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版，第6卷《胜利与悲剧》，上部，第1分册，第201—第202页。——原书注

9月中旬，苏联人终于开始向被围困的波兰人空投补给品，虽然红军仍然没有作出进军华沙的尝试。丘吉尔的结论是，“他们希望让非共产党的波兰人全部被消灭”。10月初，华沙的波兰军队投降了。这场战斗持续了六十多天，波兰地下军战死者几近半数，德军死亡一万人——这些数字表明了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当苏军在三个月之后开进华沙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已经变成废墟的城市，许多尸体尚未掩埋。

其他地方的事态正在迅速发展着。到1944年8月底，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曾经是德国的盟国的国家都退出了战争。

红军在夏季攻势中遭受了很大损失。10月份，朱可夫着手研究部队向西进军的问题。

这时，俄国对于希特勒会在西线放弃地盘以加强东线作战的担心有所减少，因为他们看到了西线德军防御的情形。盟军开始深入德国领土，夺取了亚琛，威胁着鲁尔区。虽然德军在西线集结了它的残余的装甲部队，将其投入一场伤亡惨重的反攻，几乎进抵到马斯河，但到年底时，盟军阻止了这次进攻，再次迫使德军后退。

1944年，朱可夫获得了苏联最高军功勋章——胜利勋章。这种勋章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3年设立的，作为对“卓越地领导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取得辉煌胜利”的奖赏。到最后，共有三人两次荣获胜利勋章，他们是：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斯大林。下列军事首长各获得一枚胜利勋章：戈沃罗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Q·N·托尔布欣、铁木辛哥、马利诺夫斯基、麦列茨科夫和安东诺夫。的确，得到这一荣誉的是一批为数甚少的出类拔萃的人。

以苏军的许多胜利为标志的1944年即将结束。9月5日，苏联人向保加利亚宣战，但在9月9日，即在保加利亚人向德国宣战之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停止在该国的一切军事行动。

10月3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部队越过南斯拉夫边界，开始解放边境附近的一些城镇。10月20日，苏军和南斯拉夫军队解放了贝尔格莱德，而乌克兰第2方面军正攻打匈牙利的德布勒森市。到12月底，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包围了布达佩斯，匈牙利临时政府向德国在战。

向德国本土突击的计划正在制订中，而T·K·朱可夫命中注定要在这一行动中起重大作用。当他同科涅夫一起于1944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七周年的活动时，他们听到斯大林宣布，将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去攻占柏林。

罗曼·科利科维茨写道：“斯大林专断地决定把苏军各种军事行动和夺取胜利的最美差使留给朱可夫，这使总参谋部的干部们感到沮丧，也使科涅夫很不开心，因为他也想参加征服柏林的战斗。”

罗曼·科利科维茨著《苏联军队和共产党》，第236页。——原书注

下一章 将要谈到科涅夫对这一决定作出了何种反应，而且在本书以后的章节里也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朱可夫的厌恶所造成的长远影响。

第十一章 第三帝国的衰亡

1945 年新年伊始，红军在东普鲁士、在布达佩斯城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山区、在濒临华沙一片废墟的维斯瓦河沿岸，摆好了准备进攻的阵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即将完成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势的各种准备工作。这次攻势的目的，是要使红军横扫波兰而直逼柏林。在此之前，即在 1944 年 11 月，已经为这次大规模突击制订了计划，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赫鲁晓夫承认，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援助，对于实施柏林战役是非常重要的。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225 页—第 226 页。

在战争期间，美国同苏联提供了四十万辆吉备车和卡车、一万一千多辆装甲车辆（其中包括七千辆坦克，足够装备二十多个装甲师）、一万四千多架飞机和大约二百万吨食品。见查尔斯·B·麦克唐纳著《巨大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美国武装部队》，第 514 页；罗伯特·休恩·琼斯著《通往俄国的路：美国对苏联的租借》。——原书注

朱可夫的后勤副司令员 H·A·安季品科中将对整个计划的制订过程作了极有价值的记载。

11 月 19 日，K·K·罗科索夫斯基离开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F·R·朱可夫到任接替罗科索夫斯基。安季品科描述了 1944 年 11 月最后一个星期朱可夫动身去莫斯科的情景：

快要动身时他才告诉我关于四个新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即将到达并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消息，以及所设想的我军在进攻前的配置和打算发起进攻的日期……

从 12 月 8 日到 10 日，即在进攻前一个月，由方面军司令员主持的战役摹拟导演，对于正确组织后方勤务，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所有集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各兵种的首长都被叫来参加这次导演。我也参加了。实质上，演练了这次战役的实际打法，这对于制订后勤保障措施提供了更大的帮助。

H·A·安季品科著《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5 年 3 月号，第 71 页。——原书注

安季品科还说，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前来增援的几个集团军必须隐蔽到达。这些部队不得在进攻地域下火车。因此，建立起两个基地区域：一个区域作为部队人员下车地点，而另一个区域，也是主要的区域，所有辎重都运到那里。

1 月初，红军部队作好了准备，即将实施突击，横扫中欧、东欧。同德军对阵的共有苏军七个方面军，从北到南依次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位于涅曼河一线；罗科索夫斯基（接替 M·B·扎哈罗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位于纳雷夫河一线；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科涅夫指挥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位于维斯瓦河沿岸；H·E·彼得罗夫

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 4 方面军位于桑河沿岸；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乌克兰第 2 方面军和托尔布欣指挥的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在匈牙利。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预定由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科涅夫的方面军以及乌克兰第 4 方面军之一部，在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部分部队的支援下，在华沙—柏林总方向上实施。波兰第 1 集团军也将参加这次战役。

朱可夫知道，这次进攻的目的地正是柏林，因而他很可能非常愿意指挥这个将担任主攻任务的方面军。实际上，也许他想了一些办法使自己被委派担任这个能够为他赢得很大荣耀的重要任务。劳特巴奇评论说：“朱可夫就要享受到把他自己的战略方针付诸战术实践的乐趣，而这是参谋军官们很难享受到的。”

据苏联的资料说，这次战役的政治目标，是要把波兰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并“帮助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战略目标是消灭掩护着德国一些极为重要的中心城市的“A”集团军群，前出到奥得河，并为最后进攻柏林创造条件。另外，这次战役还有一个意图，就是“把敌军部队从西欧战场吸引过来，以缓和美军和英军由于德国法西斯军队在阿登山区和争日山区的攻势而陷入的困境。”

这次攻势的方针是：向波兹南和布雷斯劳方向，对德军实施两个强大的突击。把防御之敌分割成孤立的集团，然后分别歼灭之。

最高统帅部给各方面军分派了具体任务。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任务是粉碎敌华沙—拉多姆集团，并在不迟于进攻的第十一天或第十二天攻占齐赫林到罗兹一线，然后开始向波兹南进攻。要以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和一个骑兵军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向库特带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朱可夫将派出这些部队之一部到西北方向去，以粉碎他的方面军右翼对面的德军防御，并协同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解放华沙。位于朱可夫方面军右翼的第 7 集团军预定从华沙以北地区实施辅助突击。这个集团军，与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左翼协同，将肃清维斯瓦河和西布格河之间的德军，然后从西北面包围华沙。

与此同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部队，在纳雷夫河至马林堡一线发动进攻后，应以其部分兵力从西边包围莫德林，以便准备强渡维斯瓦河，阻止德军逃离华沙。

科涅夫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任务是，与朱可夫的部队协同，粉碎凯尔采—拉多姆集团，并在进攻的第十天或第十一天占领彼得库夫—拉多姆斯科—琴斯托霍瓦—米肖维策一线，然后向布雷斯劳方向进攻。它以五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和四个坦克与机械化军从桑多米埃什登陆场向拉多姆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乌克兰第五方面军将使用得到六个炮兵师补充的三个集团军的兵力，突破登陆场中部的敌军防御。第二梯队的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将投入突破口，一个集团军进攻什特劳维埃次，并包围沃斯特罗维埃次集团，另一集团军用来加强主要方向上的突击。

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准备以其右翼的第 38 集团军向克拉科夫方向进攻，配合乌克兰第 1 方面军解放该城。该方面军左翼和中路的部队的任务则是继续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攻势。

苏军最高统帅部给朱可夫和科涅夫派去大量增援部队。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两者加在一起的兵力之大令人惊讶：一百六十三个师、三万二千一百四十三门火炮和迫击炮、六千四百六十辆坦克和自行火

炮、四千七百七十二架飞机和二百二十万人。在即将发动的攻势中，苏军拥有大大超过德军的优势兵力兵器：兵力 5.5 比 1、火炮和迫击炮 7.8 比 1、坦克 5.7 比 1、飞机 17.6 比 1。在各方面军的进攻地域，部队的平均战役密度为每一点三英里正面有一个步兵师。火炮密度达到每英里正面有一百零三门火炮和迫击炮，而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数量平均每英里为十九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的作者们在一段典型的克制性陈述中说：

在战线中段，战略态势是对红军有利的……在获得对敌军的巨大优势，并占领有利的进攻阵地的情况下，苏联武装部队牢牢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敌军尽管还拥有强大的力量，但已不能在苏军主要突击方向上建立足够的火炮和坦克密度了。所有这些为红军在波兰领土上的胜利进攻，并最后低放波兰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朱可夫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拟定了进攻的详细计划，决定对纵深两英里的地域进行两个半小时的火炮弹幕射击，为白俄罗斯第五方面军部队实施突击作准备。工兵部队则要在布雷区扫清通道，并设置障碍物以阻滞敌军的反击。他们修筑了新的道路，修复了原有的道路，并在维斯瓦河上架起桥梁。在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和普瓦维登陆场，储存了大量给养、弹药和燃料，各个医疗队准备了治疗和后送伤员和设备。仅在朱可夫的方面军，就建立了共有六万零三百张床位的一百八十所野战医院，在后方还另外准备了六万八千张床位。准备好了供输血用的血浆。在白俄罗斯第五方面军中，有三万二千五百人献了血，其中包括四千多名波兰人。在政治军事方面。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的代表进行了磋商，决定把米哈伊尔·罗瓦-齐米尔斯基上校的波兰第 1 集团军，置于朱可夫的战役指挥之下。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几乎没有提供每个司令员对于战役的全面实施所起的作用的细节。而且，由于这本书出版时，正值朱可夫失宠期间，因此，作者们写到他时，总是一笔带过。所幸的是，在他六十年代中期恢复名誉的同时，人们对他的领导作用作出了一些正直的评价。

一位党的发言人、过去曾担任过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军事委员的 K·Q·捷列金中将的描述便是一例。他写道：

朱可夫从担任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的最初阶段起，就尽力鼓励整个领导集体的高度创造精神和团结一致。巧妙地引导它努力完成任务。他以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从事战役的准备工作。他紧紧抓住所有各个方面，详细地拟定计划，进行计算，并与各兵种司令员、勤务主任、集团军司令员们进行核对；他还在地图上和沙盘上进行演试。

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朱可夫司令员密切地注视着战役的进展，他严格地控制、一丝不苟地要求执行计划和命令。要求有关负责人对缺乏组织和缺乏后勤能力负责。说真的，对于这些做法，并非所有军事首长都感到高兴的。

不应该忘记，即使最小的战役的胜利，也有赖于许多因素的配合。一个地段出了毛病，立刻就会影响到另一些地段……总的说来，我们方面军这个集体对 T·K·朱可夫的充沛精力、坚毅和果断一直是很敬重的。他的杰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后几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斯维特利申著《从士兵到元帅》，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6 年 11 月号，第 39 页。——原书注

1 月 12 日，攻势开始了。乌克兰第 2 方面军的部队，从他们在维斯瓦河沿岸的阵地出击了。第二天，经过短暂的、但很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后，

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5方面军的部队，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和普瓦维登陆场同时发起突击。当日日终，从马格努舍夫登陆场发起突击的部队强渡了皮利查河，楔入德军阵地约达七点五英里。从普瓦维登陆场实施的突击取得了更大的胜利：红军部队渡过了兹沃伦卡河（拉多姆和普瓦维之间维斯瓦河的一条支流），攻占了兹沃伦防御据点，与德军展开了争在拉多姆的战斗。

朱可夫派遣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进入在第8近卫集团军地段打开的一个突破口。此后数天，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赢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它占领了新米亚斯托，挺进到罗兹附近。1月16日，苏军攻占拉多姆，次日，朱可夫的部队，包括波兰第1集团军，解放了残破不堪的华沙。

关于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开头几次战斗的胜利，只是在不久前，人们才给予朱可夫以应有的赞扬。那是在朱可夫七十寿辰（这时他还获得了第五枚列宁勋章）的时候。

苏联《军事史杂志》写道：

.....在指挥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过程中，朱可夫考虑到敌人将其兵力平均地部署在整个战线上，因而决定实施三个突击：两个突击分别从位于马格努舍夫和普瓦维地区维斯瓦河西岸的登陆场实施，第三个突击则从华沙以北地区实施。战役的成败取决于能否迅速突破敌军战术防御地域和随后勇猛地向着纵深扩大战果.....

为了实现这次战役的一些决定性的目标。并加快实施的进程，朱可夫巧妙地使用了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例如，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开始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编成内有两个坦克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和第2集团军）、两个独立坦克军和五个独立坦克旅。根据朱可夫的决定，两个坦克集团军，作为迅速扩大进攻的基本力量，是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和第三天，也就是说，是在敌人防御被完全突破以后才投入战斗的。这样做，就能保存机动集团的力量，以便用于在敌方防御的战役纵深，进行持久的、激烈的战斗。在这次堪称典范的战役中，坦克军和独立坦克旅则用作集团军的机动集群，而坦克则用于直接支援步兵部队。在突破敌人的战术区域后，增援步兵部队的坦克不再归步兵师师长指挥，而是集中起来专门，组建成集团军机动分遣队以便追击敌人。这些分遣队起着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间联络环节的作用。

由于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正确使用了坦克部队，因而实现了一次异常高速度的突击。在突破敌军防御以后，坦克集团军的突击进度在二十四小时内平均达到二十八英里，有时高达四十三点五英里，而在脱离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以后，达到六十二英里。

随着华沙的解放，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此结束。在四至六天内，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三百一十英里宽的地段上。

向德军防御纵深突破了六十到一百英里，到达索哈切夫—托马苗夫—马佐维茨基—琴斯托霍瓦一线。

鉴于已经为进一步发展进攻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最高统帅部于1月17日更明确地规定了以后几周的任务。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继续向布雷斯劳推进，不迟于1月30日在雷希诺以南进抵奥得河，并在该河西岸建立登陆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奉命向波兹南突击，在2月4日左右攻占比得哥什—波兹南一线。朱可夫和科涅夫将其机动先遣队近于排成纵队前进的

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主力之前。当需要击退翼侧的反攻和歼灭留在突击部队后方的大的敌军集团时，就挑选一些独立部队去执行这些任务，并在完成作战任务后重返主力部队。

1月19日，科涅夫的部队攻占克拉科夫，并在三天后强渡了奥得河，开始在河西岸建立登陆场。1月18日，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歼灭了被包围在华沙以西的德军部队，翌日迅速占领大工业城市罗兹，以致德军来不及进行任何破坏，甚至连已经装箱准备运往德国的贵重机床和其他设备也来不及运走。在两天内（1月22日和23日），方面军前进了大约六十到九十英里。在方面军右翼，在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进行迂回包围以后，构成波兹南防线一部分的筑垒城市比得哥什被苏军占领。

朱可夫的回忆录提供了有关波兰战役计划的极有价值的见解。根据他的叙述，当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到达比得哥什一波兹南一线时，应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建立联系。关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推迟到该方面军进抵这一线之后再作决定。本章所有涉及朱可夫回忆录的部分均引自1965年6月一期《军事史杂志》。前已引用的关于莫斯科会战的回忆录，直至1966年夏秋才出版。关于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和柏林战役的回忆录，是朱可夫1957年秋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以后，首次公开发表的著述。

——原书注

朱可夫指出。“然而，在战役实施过程中，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大大提前完成了最高统帅部规定的进度，到1月23日，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已经攻占比得哥，并向施奈德米尔和德意志—克龙（瓦乌齐）展开进攻。1月25日，方面军中路部队包围了波兹南强大的敌军部队，而方面军左翼部队。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密切协同，前出到亚罗钦地域。”

1月25日中午，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他问朱可夫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朱可夫回答说，敌人军心涣散，目前已不能作有力的抵抗，他决定继续进攻，并前出到奥得河。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屈斯特林（科斯钦），在那里苏军将设法在取一个登陆场。方面军右翼将向北和西北方向展开，以对付欧东波美拉尼亚集团，该集团目前尚未对苏军构成严重的直接威胁。

斯大林表示不赞成，认为一旦朱可夫的部队前出到奥得河，脱离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距离就会超过九十英里。斯大林说：“目前不能这样做。应该等待一下，等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结束东普鲁士战役并在维斯瓦河沿岸重新部署好兵力以后。”

朱可夫问东普鲁士战役何时能够结束，斯大林告诉他，大约需要十天到十五天。斯大林补充说，朱可夫也不能指望乌克兰第1方面军从左侧给予支援，因为他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粉碎奥佩伦—卡托维兹地域的敌人的抵抗。

朱可夫力图说服斯大林本要停止方面军部队的进攻，因为以后要突破曼捷利茨筑垒地域将会更加困难。他还要求另外增拨一个集团军来加强方面军的右翼。斯大林答应再考虑一下，但是朱可夫的司令部当天未得到答复。

1月26日，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侦察部队到达曼捷利茨筑垒地域，并俘获一大批敌军。从俘虏口供中获悉，这个筑垒地域的许多地段尚无德军

据守，许多部队刚刚开始调到这里来。朱可夫决定方面军主力加速向奥得河推进，力求从行进间渡过奥得河，在河西岸建立登陆场。为了保护向奥得河挺进的方面军主力（近卫坦克第1、第2集团军、突击第5、近卫第8集团军、第33和第69集团军）不受东波美拉尼亚德军的攻击，朱可夫决定派遣第3突击集团军、波兰第1集团军、第47、第61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按此顺序）向北和西北方向展开。

朱可夫留下近卫第8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的部分兵力，用来消灭波兹南的德国守军。苏军领导人当时以为波兹南的敌军部队不会超过两万人，而实际上却有六万多人，以致在这个城市的战斗一直拖到2月23日才结束。

经过多次讨论后，斯大林终于同意了朱可夫的建议，尽管他不愿意给朱可夫增派部队。“最高统帅对方面军右翼的掩护问题表示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朱可夫写道，“随后事态的进程表明，敌人从东波美拉尼亚实施突击的威胁在不断地增长着。”

苏军的攻势进展很快。方面军主力在突破曼捷利茨防线后，到2月3日已前出到奥得河，并在其西岸的屈斯特林（科斯钦）地域夺取了一个小的登陆场。“在这时，”朱可夫写道，“敌人在方面军右翼的抵抗大大增强。空中侦察查明，在波美拉尼亚有大批敌军兵力到达和集中。陆军的侦察证实了上述情报。为了对付来自北面的紧迫威胁，必须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

朱可夫著《在柏林方向上》。载苏联《军事史杂志》，1965年6月号，第14页。

朱可夫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命令近卫坦克第1、第2集团军将其在奥得河的地段交给友邻部队，以急行军向北面的阿尔恩斯瓦尔德地域集结。他还把得到加强的近卫骑兵第7军以及大量的炮兵、工程兵部队和物资调往该处。

最高统帅部命令在朱可夫右侧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部队，于2月10日转入进攻，占领从格但斯克（但泽）到什切青的整个东波美拉尼亚，并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

2月10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部队发起进攻，但未能完成所受领的任务。2月24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19集团军到达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重新发起进攻作战。3月1日，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也转入进攻，帮助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部队加快了前进速度。他们于3月5日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基奥兹林（科夏林），然后即转向东面，进攻格丁尼亚和格但斯克。朱可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临时调给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以协助粉碎格丁尼亚地域的敌军。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严厉地谴责了8·N·崔可夫元帅。1964年春，崔可夫写了几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责朱可夫、B·D·索科洛夫斯基等人由于缺乏才能和主动性，延误了攻占柏林的时间。崔可夫指责说，如果朱可夫不是慢吞吞地行进，苏联本来会在欧洲夺占大得多的地区。

1965年3月，朱可夫的维护者开始谴责崔可夫和其他赫鲁晓夫分子的上述说法。安季品科将军谴责崔可夫歪曲事实和引用他本来无法看到的材料。曾在朱可夫的司令部中工作过的捷列金将军攻击了崔可夫的观点，并提醒读者注意，崔可夫的恩人赫鲁晓夫再也不能保护他了。1966年，朱可夫也参加了论战。他写道：

我认为有必要较详细地谈一谈某些回忆录的作者，特别是苏联元帅B·N·崔可夫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当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于2月初前出到奥得河后，方面军领导人为什么不要求最高统帅部准许它不停顿地继续向柏林进攻，

崔可夫在其回忆录中断言：“柏林在2月份即可攻克，而这自然会使战争早日结束。”

许多同志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意见反对崔可夫同志的这种观点。然而，崔可夫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并非来自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积极参加者，它们或者来自参与拟制最高统帅部和方面军关于停止进攻柏林并实施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命令的那些人，或者来自某些历史著作的作者。”必须指出，柏林进攻战役并非一切都象B·N·崔可夫所想的那么简单。

朱可夫接着指出，1945年1月26日，当德军显然已不可能凭借奥得河接近地上的工事阻止苏军进攻时，他和他的司令部人员曾向最高统帅部预先提出过建议，该建议的中心意思是：

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应在五月30日前到达别尔林亨（巴尔利内克）—兰次贝格（果祖夫—韦耳科波耳斯基）—格列茨（布鲁德齐斯克）一线，把后勤机构向前调动，补足储备品，并在2月2日凌晨强渡奥得河。随后，方面军部队应迅速向柏林方向运动，集中主力从东北、北面和西北包围柏林。

最高统帅部于1月27日批准了朱可夫的建议。

次日。苏联元帅科涅夫也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保证粉碎敌布雷斯劳集团，并于2月25—28日前出到易北河。与此同时，他打算以其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协同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占柏林。

科涅夫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宣布决定的方式提出的），使总参谋部突然陷入激烈的争论：怎样使科涅夫的计划与斯大林早些时候宣布的由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克柏林的意见协调起来。安东诺夫将军同意准许科涅夫的方面军参加突击柏林；但最高统帅部（在这里，朱可夫的影响占优势）虽然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建议在两个方面军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根据朱可夫的方针，最高统帅部只让科涅夫的方面军负责解放柏林以南地域，而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则在主攻方向上居于垄断地位。罗曼·科利科维兹著《苏联军队和共产党》，第236页—第237页。——原书注

朱可夫对这些细节略而不提，只说科涅夫的建议在1月29日也得到批准。接着，朱可夫继续回答崔可夫的断言，即倘若不是朱可夫顾虑重重，本来能够早日攻占柏林。朱可夫承认，这时德军在柏林的接近地上只有有限的兵力，但他一再表明，2月初敌人从东波美拉尼亚实施反突击的危险，开始对方面军侧翼和后方造成威胁。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正确，朱可夫引用德国元帅威廉·凯特尔和参谋长古德里安的话说，德军确曾计划从波美拉尼亚向苏军发动突击。

2月初，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中间地带活动的德军，是第2和第11集团军，包括十六个步兵师、四个坦克师、三个摩托化师、四个旅和八个战斗群。苏军的情报表明，敌军正向这个地域继续增加兵力。此外，在什切青地域还有德军坦克第3集团军，而德军指挥部可以将这支部队用于保卫柏林，也可用来加强东波美拉尼亚集团（实际上后来正是采取了后一种做法）。朱可夫反问道：“在北面存在如此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苏军统帅部是否还能冒

险用方面军主力继续对柏林实施进攻呢？”，

朱可夫写道：崔可夫认为进行这样的冒险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红军部队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已经前进了三百多英里，而从奥得河到柏林只剩下四五十英里了。朱可夫的回答是：苏军虽然也可无视这一危险，让两个坦克集团军和三个或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直捣柏林，但敌人倘若从北面实施突击，就会切断苏军掩护部队而前出到奥得河渡口，从而使整个方面军陷入危险境地。

朱可夫提醒读者注意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就是由于红军部队前出过远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说：“历史经验表明，有时确实需要去冒险，但不能随意妄为。在这一点上，1920年红军对华沙的进攻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红军没有充分保障就轻率地向前推进，结果不但未能取得胜利，反而造成了我西线部队的惨重失败。”

崔可夫在1964年和1965年写的几篇文章中断言，只要客观地估计一下波美拉尼亚的敌军实力，那么就可确信，敌人对柏林方向苏军的任何威胁，都完全可以由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部队予以消除。

朱可夫反驳道：“实际情况却驳倒了这一论断。”此外，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兵力十分不足，无法粉碎东渡美拉尼亚的德军。2月10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开始进攻，十天后只推进了三四十英里。与此同时，敌人却在施塔尔加德以南地域实施了反突击，迫使苏军后退，敌人向南推进了五到七英里。

最高统帅部对于东波美拉尼亚的德军部队不断增强（这时总数已达四十个师）感到不安，决定动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两个方面军的联合作战行动直到3月底才结束。朱可夫说。“这是多么艰苦的一仗。”

崔可夫估计，在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能够派出人至十个集团包其中包括三至四个坦克集团军，对柏林实施进攻。朱可夫不同意这种说法。

2月初，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八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中，留在柏林方向的只有四个不完整的集团军（即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以及第33和第69集团军）。有两个军（分别从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69集团军抽调的）正在波兹南地区作战，而方面军的其他兵力不得不转向东渡美拉尼亚方面以对付来自这个方向的威胁。另一方面，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2月8日至24日期间，正在布雷斯劳西北地区发动攻势，它的主力（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和第2空军集团军）都参加了这一战役。德军也向该处调集了大批援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进攻十七天之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推进了六十二英里，前出到尼斯河，但强渡该河的企图未能实现，因而苏军在该河东岸转入了防御。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苏军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过程中曾遭受重大伤亡。2月1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各步兵师平均人数为五千五百人左右，而近卫第8集团军各步兵师的人数则在三千八百至四千八百人之间。朱可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有七百四十辆坦克，或者说每个装甲族平均大约四十辆，但其中的许多装甲旅却只有十五到二十辆坦克。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因此，1945年2月，不管是科涅夫的方面军。还是朱可夫的方面军都

不能向柏林实施最后的进攻。“夸大自己一方部队的能力和低估敌人的兵力与能力同样都是危险的。”朱可夫写道，“这就是战争给予我们的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不可忽视的。”

他进一步指出，后勤方面的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进攻的二十天时间里，部队向前推进了三百多英里，而后勤供应自然落在后面。苏军部队急需作战物资，特别是燃料不足。同样地，航空兵也未能向前转移基地以支援前线的战斗。

朱可夫说，崔可夫没有分析在这种条件下后勤工作的整个复杂性，而是求助于一系列假设条件：“倘若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能够组织供应必要数量的弹药、燃料和给养；倘若航空兵能向前转移到奥得河附近的机场上；倘若舟桥部队能保证使部队渡过奥得河，则我军的四个方面军就能在2月初展开对柏林的进攻。”

朱可夫指出：“在讨论如此重大问题时使用这么多用‘倘若’，即使对回忆录作者来说，也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崔可夫所承认的下述事实，即供应紊乱，航空兵和舟桥部队掉在后面，就足以说明，在这种条件下要对柏林实行进攻，纯粹是冒险。”

德军对朱可夫的进攻作出了何种反应呢？2月初，古德里安上将曾经强烈要求希特勒推迟在匈牙利发动进攻的计划，而是从巴尔干半岛各国、意大利、挪威，特别是从库尔兰调集兵力，突击已经在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之间前出到奥得河的苏军先头部队。古德里安写道，苏军先头部队的两翼仍很薄弱，可以从南面的格沃古夫和古本一线和从北面的皮日利策和阿尔恩斯瓦尔德一线发动突击。他希望这样一次突击将会增强对柏林和德国内地的防御，并能赢得时间与同盟国进行停战谈判。

希特勒听完古德里安的建议以后，拒绝了这个建议。古德里安坚持己见，他说：“我说我一再建议撤出库尔兰并不是因为我顽固不化，你应该相信我。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积聚预备队，而没有预备队，我们就不能期望保卫首都。我向你保证，我完全是从德国的利益出发才这样做的。”

古德里安的话音刚落，希特勒气得身子发抖，跳起来大声吼叫道：“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难道你不认为我是在为德国而战吗？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为德国长期奋斗的一生。”他继续严厉训斥古德里安，直到他的怒气平息下来，戈林才把古德里安从房里领走。

当“元首”再次把古德里安召回会议室，古德里安又开始争辩起来，而这只能使希特勒再一次大发脾气。他站在古德里安面前，摇晃着拳头，直到古德里安的参谋长把这位将军拽走，“免得我挨一顿揍”

尽管赖因哈特·格伦的东线外国军队情报处估计苏军每天能使其在奥得河上的兵力增加约四个师，但古德里安却未能得到库尔兰的部队。“因此，倘若要使我们的突击取得效果的话，”古德里安确信，“就必须在更多的俄国军队到达和他们发觉我们的意图之前，以闪电般的速度发起突击。”

几天后，即在2月13日，在帝国办公厅举行第二次会议，希特勒再一次大发雷霆之后，终于同意必须对苏军实施突击，但没有向古德里安提供他所需要的预备队。进攻于2月16日开始，头一两天取得了良好进展。然而，对于德军来说，不幸的是，负责指挥这次突击的瓦尔特·文克将军傍晚向希特勒汇报后返回部队途中，因发生车祸而受了重伤。失去了他的领导，突击

停顿下来，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它的势头。
队领导人》，第 411 页—第 415 页。——原书注

古德里安著《装甲部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崔可夫描述了 2 月 4 日在第 69 集团军司令部开会讨论进攻柏林的计划的情形。崔可夫提到，在讨论过程中，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当斯大林得知会议正在讨论进攻柏林的计划时，斯大林要求与会者停止上述讨论，而是着手拟定粉碎波美拉尼亚德军的计划。崔可夫还说，朱可夫对此感到意外。

据朱可夫说，他这位从前的部下任意歪曲历史事实已非首次。朱可夫引用国防部官方档案说，根本没有召开过这样一次会议，因而也不可能有在电话里与斯大林谈话这样的事。朱可夫说，2 月 4 日到 5 日，他在第 61 集团军司令部，当时这个集团军正准备对波美拉尼亚的德军集团作战。是崔可夫故意歪曲史实，还是他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弄混了呢？是朱可夫的说法正确，还是他想进一步使作为战史学家的崔可夫信誉扫地而把问题弄得含糊不清呢？由于可以得到的证据有限，不可能作出确定的结论。

对苏军柏林战役的这一阶段，结合历史来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就能看出，朱可夫关于推迟向柏林突击的理由无疑是有根据的。《苏军东波美拉尼亚战役》一书恰好是在朱可夫失宠时期出版的。作者扎维亚洛夫和卡利亚金断言，在向柏林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突击以前，“必须首先粉碎从北面威胁柏林方向苏军的东波美拉尼亚的敌军集团，同时，彻底破坏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企图阻止我军向柏林方向突击的计划。除此以外，还必须消灭被孤立东普鲁士的敌军集团。”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这本书，一般说来，对待朱可夫是相当简慢无礼的，但它却支持他的上述说法。该书说，朱可夫决定把第 3 突击集团军和波兰第 1 集团军调到他的右翼，以对付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威胁。此外，“1 月底、2 月初，在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右翼和中央展开了最激烈的战斗。位于比得哥什以西波美拉尼亚统垒地域的德军的抵抗特别顽固”，不断反击第 47 集团军的部队，并在某些地区迫使他们后退。1 月 29 日，波兰第 1 集团军投入战斗，两天之后，第 3 突击集团军也被调来参战。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还支持朱可夫下达说法。由于德军退却时破坏了铁路、公路和桥梁，以致给再补给造成了困难。铁路和公路修筑部队投入工作，以尽快修复主要的铁路线和公路，而工程兵部队则奉命立即开始在维斯瓦河上架桥。

尽管出现了延误和挫折，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仍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苏联方面宣称，俘虏了敌军十四万七千名官兵、摧毁和缴获了一千三百七十七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五千七百零七门迫击炮和一千三百六十架飞机。这一历时二十三天的战役，使苏军和波军部队向前推进了三百一十英里，平均每天前进十二到十四英里。

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既已前出到奥得河，朱可夫便准备向柏林发动最后冲击（见附图 6）。4 月 1 日，他和科涅夫应召会见斯大林。安东诺夫上将和什捷缅科上将也在场。“我们刚向斯大林问过好，”科涅夫写道，“他就问我们。‘你们认为你们对最近的形势了解得很清楚吗？’”

朱可夫和科涅夫回答说，他们认为，根据他们在各自的方面军可以得到的情报资料，他们对局势已经了解得很清楚。

“给他们念一下这份电报，”斯大林对什捷缅科说。

作战部长念了一份电报，内容是英美军司令部准备实施一次战役，以使攻占柏林。

已经建立了由英国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指挥的主要突击部队。打算在鲁尔区以北沿着大部分英军部队与柏林之间的最短路线，实施主要突击。电报中列举了盟军司令部已经采取的几个初步措施，包括组织突击部队和集结军队。

电报最后附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使盟国认为，关于在红军能够到达柏林之前攻占柏林的计划是非常切实可行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

当什捷缅科读完电报。斯大林转过身来向朱可夫和科涅夫问道：“现在谁将要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同盟国？”

关于这次谈话，可以得到的几种记载，都只是报道了科涅夫的观点。1963年4月，对尼利厄斯·瑞安在莫斯科采访科涅夫时，听到了同样的叙述。苏联政府准许瑞安和约翰·埃里克森采访柏林战役的许多参加者，其中有科涅夫、索科洛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崔可夫，但这两位历史学家没有被准许采访朱可夫。见科尼和厄斯·瑞安著《最后一战》，第248页。——原书注

科涅夫首先回答，他向斯大林保证苏军一定能攻占柏林。

“所以说你就是这个脾气，”斯大林他笑非笑，然后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怎样才能为这一目的建立起一个突击集团呢？你的主力部队在你的南翼，因此你显然将不得不大规模地变更部署。”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回答，“你可以放心，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内重新部署完毕，为进攻柏林作好准备。”

这时朱可夫作了回答。他说，他已经为攻占柏林作好了充分准备，而且他指挥的无论兵力兵器部处于“饱和状态”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经把攻击的目标直接对准柏林，况且南柏林的距离又最近。

“很好，”斯大林说，“你们两人应该就在莫斯科这里，在总参谋部拟订出你们的计划，并在一两天之内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这样你们回方面军去的时候，就可以随身带上已经得到全面批准的计划。”

科涅夫不顾一切地想要分享攻克德国首都的荣誉。更确切地说，他想抢先攻进柏林来突出自己，使朱可夫相形见绌。他极不喜欢朱可夫。

现在在莫斯科，这两个意志坚强的人，每人都希望使斯大林相信，应该采纳自己制订的最后突击德国的计划。朱可夫认为，他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能够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攻占柏林，而科涅夫则在继续进行活动，以便推翻最高统帅部早些时候关于让他的部队去攻占柏林以南地域的决定。总参谋部的一些成员建议由两个方面军发动一次钳形攻势，可是这项建议既与朱可夫的正面突击的概念相冲突，也同科涅夫关于协同实施正面突击的建议相抵触。

当4月3日清晨再次召开会议时，斯大林听取了两位司令员的计划，然后走到挂图前，并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之间画了一条线，从而解决了僵持局面。这条线的终点是在柏林东南大约三十七英里施普雷河上的吕本。据什捷缅科上将说，斯大林这时宣布：“哪个部队先到达这儿，哪个部队就参加攻占柏林。”

科尼利厄斯·瑞安写道：“倘若斯大林把这条线从吕本再往前画，一直画到德国边界，标出一条科涅夫不可逾越的界线，那么乌克兰第1方面军显

然就不可能再参加进攻柏林的战斗了。”尽管“斯大林没说什么，但却默许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可以表现主动精神。”虽然一句话没说，却向科涅夫的方面军开放了到柏林去的绿灯。他觉得斯大林摸透了他的心思。正如科涅夫所说的，“斯大林心极不宣地号召进行一场比赛”，然后会议便结束了。

科尼利厄斯·瑞安著《最后一战》，第256页。——原书注

朱可夫对会议的叙述，尽管不如科涅夫那样生动，但却很可能是比较准确的。他说，对柏林方向的进攻和夺取这一城市的任务交给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从尼斯河发起突击，粉碎柏林以南的敌军集团，把敌中央集团军群的主力与敌柏林集团隔绝开来，从而保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进攻。但是，朱可夫写道：“就在最南统帅部的会议上，斯大林给苏联元帅科涅夫发山指示：倘若敌人在柏林的东接近地上进行顽强抵抗，以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进攻受阻，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准备从南面突击柏林。”

朱可夫的回忆录透露，他对向德国首都发动最后进攻感到担心。“对柏林的非同寻常的和极其复杂的进攻战役，要求所有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机构作好异常细致的准备。”他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他写道；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从未攻取过象柏林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柏林的总面积几乎相当于九百平方公里，城市地下铁道和众多的地下建筑物使敌人得以实行广泛的机动，市区和郊区都为进行顽强防御作了细致准备，每一条街道、广场、胡同、房屋、沟渠和桥梁都构成这个城市总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朱可夫曾命令航空侦察兵六次拍摄了柏林、柏林所有接近地和防御地带的照片。根据拍摄的照片、缴获的文件和俘虏的口供，编制了详细的地图和附有图表说明的报告，发给从司令部到连队的各级指挥员。此外，工程兵部队为朱可夫及其司令部人员制作了一台柏林及其郊区的精确模型。

4月5日至14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召开了战役准备会议，并利用地图和模型进行了军事导演。参加军事导演的有各集团军、军、师、方面军炮兵部队和后勤部队的首长。

进攻的日子临近时，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朱可夫决定采用他的另一项著名的别出心裁的办法，以“震慑和从精神上压倒敌人”。考虑到守敌在夜间更容易发生混乱和恐慌，他决定在黎明前两小时实施突击。将使用一百四十部对空探照灯照射敌人的阵地，以利红军的进攻和对红军突击部队的控制。

与此同时，德军正在奥得河沿岸疯狂地构筑防御工事。戈特哈特·海因里齐上将，在1944年复被从后备队中召回，任命为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官。他奉命把苏军阻挡在奥得河上，守住柏林。他特别擅长防御作战。1942年1月底，他曾担任在莫斯科附近固守的第4集团军残余部队司令官，在那里制订了一套极其成功的防御战术。每当他断定某一地段即将遭受苏军进攻时，他就命令部队在夜间向后撤退一两英里，进入新的阵地。通常几乎能够摧毁一切的红军炮兵的弹幕就会倾泻到已被放弃的前沿阵地上。海因里齐写道：

“他们的炮火准备毫无效果，而我们的战士，由于丝毫未受损伤，已经作好反击准备，苏军的突击就会丧失势头。然后我的部队将从未遭到攻击的阵地向前推进，并重新占领原先的前沿阵地。”

科尼利厄斯·瑞

安著《最后一战》，第70页—第74页。——原书注

1945年4月初，海因里希视察了他在奥得河沿岸建立的两条防线。德军部队预定要在朱可夫的炮兵即将进行弹幕射击之前撤出最东边的防线，以便使炮弹落在无人据守的堑壕里。最关键的问题，显然是要判断出苏军进攻的准确时间。苏军发动的几次佯攻，使海因里希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可是，这位承担了沉重责任的将军深信，苏军在4月中旬以前不会发起进攻。

4月15日（星期日）下午8时过后不久，海因里希作出了决定。在分析了从战场上得到的报告之后，他确信朱可夫将在次日凌晨发起突击。他给德军第9集团军司令官特奥多尔·布塞将军发出只有一行字的命令：“后撤，占据第二道防线的阵地！”德军在夜幕掩护下立即开始后撤，这一策略性行动整整用了大半个夜晚的时间。

这时，朱可夫急不可耐地想要发起他的强大突击。4月10日黎明前很久，他在厄斯特林（科斯钦）登陆场的小山头上的掩蔽所观察了德军阵地。在凌晨4时正，他发出命令：“开始，同志们，现在开始！”顷刻间，三颗红色信号弹出现在漆黑的夜空，朱可夫的一百四十部探照灯连同坦克和卡车的前灯一齐开亮，把德军阵地照得通明。苏联的一些回忆录作者对朱可夫使用探照灯是有争论的。有些人对这一别出心裁的作法持批评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则赞赏朱可夫的想象力。科涅夫写道，他在自己的方面军有意不使用任何人工照明。“我们乌克兰第1方面军决定采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我们当时正要渡过尼斯河，我们制订了实施较长时间的炮火准备的计划，目的是在确保两个阶段的作战：渡过尼斯河，并突破敌军尼斯河西岸的主要防线。对于尽可能地隐蔽渡河意图来说，照亮突破地段对我们是不利的。相反地，我们希望夜晚越长越好。”见N·C·科涅夫著《1945年》，载《国际事务》（莫斯科），1965年8月—1966年4月，第8页。

炮兵主帅沃罗诺夫军道：“我喜欢朱可夫的决定，即在开始进攻柏林之前，进行炮火准备，并使用步兵和坦克在破晓前发起突击，同时使用探照灯照得敌人睁不开眼睛。”见H·H·沃罗诺夫自《苏联人民的功勋》，载《苏联历史》杂志，1965年7—8月号，第21页。

曾在屈斯特林登陆场在朱可夫指挥下作战的崔可夫，极力批评人工照明，说它对战士的夜间视力造成了严重影响，“因而事实上弊多利少”。见B·N·崔可夫著《第三帝国的末日》，载《十月》杂志，1964年4月号，第145页。——原书注

接着，三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这是开始炮火弹幕射击的信号。炮声隆隆，大地震撼，所有村庄顷刻被毁，森林到处火光冲天。炮火之猛烈是东线战场不曾有过的。猛烈的炮击引起了风暴性大火。德军中的幸存者迄今仍在谈论突然刮起的怪异的热风，把灰烬和碎片吹遍原野。

在震耳欲聋的弹幕射击仍在继续轰鸣的时候，朱可夫的部队开始向德军阵地发起冲锋。指挥近卫第8集团军的崔可夫说，在开始突击的半小时之内，德军几乎没打什么炮，只有掩蔽在石头建筑物和孤立的掩体里的几挺机枪和自行火炮在射击。它们很可能是海因里希留在前沿阵地的守卫部队。

当苏军炮兵停止射击，德军出来迎击的时候，朱可夫遇到了麻烦。德率高射炮和防坦克炮开始向苏军队形倾泻致命的炮火，打得步兵从坦克上掉下来，装甲车辆着了火。

约翰·托兰采访了这场可怕的战斗的若干幸存者，其中包括格哈德·科

德斯（当时是个年仅十八岁的航空兵）。托兰根据他的采访，对当时这段战场上苏军的突击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科德斯现在能够看见更多的坦克轮廓了。发动机的隆隆声和履带的中咋声震耳欲聋，大地在颤抖，他拿起一支火箭筒。从后面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轰鸣：一排八十八毫米的炮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击中了第一批坦克。坦克烧起来，金属碎片和弹片象雨点般落到散兵坑里。至少有六辆坦克被击中起火，但其他坦克仍在继续前进。在微红的火光中，坦克更加醒目了，但它们在大口径火炮的毁灭性轰击面前束手无策。然而，红军步兵从浓密的大火中突然冲过来，他们必定有八百人之多。他们大声喊叫着向山顶上爬，科德斯觉得他们好象发了疯。

航空兵用步枪和冲锋枪开火，数以百计的苏军士兵应声倒地。其余的人继续喊叫着往上冲。又有一些人倒下了。最后，就象巨浪猛力撞在防波堤上那样，进攻者退下去了。

约翰·托兰著《最后一百天》，第402页，——原书注

朱可夫不肯相信他的部队已经受阻。他以怀疑的目光盯着崔可夫，突然发火道。

“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你的部队给挡住了吗？”

崔可夫以前曾经见过朱可夫发怒，这时回答道。“元帅同志，不管我们是否暂时给敌人牵制住了，进攻几乎肯定会成功的。可是眼下敌人的抵抗很顽强，把我们挡住了。”崔可夫解释说，从泽治高地打来密集的炮火，截击我们向前推进的部队。此外，地形对履带式车辆十分不利。在奥得河沿岸的沼泽地和灌溉渠，自行火炮和坦克都陷住了，遭到猛烈炮火的轰击。

科尼利厄斯·瑞安著《最后一战》，第360页。——原书注

朱可夫很快获悉，第一梯队的进攻强度已经证明是不够的。他知道用他的几个集团军压过去，也完全能够打垮防守的德军，但他不想把进攻速度放慢下来。因此，他决定改变战术，派遣轰炸机轰炸敌军炮兵阵地，并命令炮兵彻底摧毁那座高地。朱可夫原来打算在拿下泽洛高地以后，再把坦克集团军投入战斗，现在这位元帅决定让它们立即参加战斗。

这时朱可夫气得脸色发青。他既不想让几门居高临下的德军大炮拖延他进攻的时间，也不想让科涅夫抢先攻占柏林。他从掩蔽部走出来，从他的参谋人员旁边擦肩而过，转向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M·E·卡图科夫上将，厉声说：“喂！赶快上！”

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证实，由于他的几个集团军陷入困境，才迫使他动用坦克集团军并诉诸航空兵支援。德军也派增援部队投入作战，因而战斗变得更加激烈了。

4月17日，朱可夫的部队终于依靠数量的优势粉碎了泽洛高地的防御，开始向前推进。

德军又运来更多的兵力兵器，其中包括从柏林城防部队调来的高射炮部队，以致朱可夫的进攻速度再次减慢了。

与此同时，科涅夫的方面军却进展迅速。可想而知，朱可夫在进军柏林途中遇到麻烦，科涅夫对此是不会感到不愉快的。

4月17日，斯大林打电话对科涅夫说：“朱可夫现在遇到了困难。他仍在设法突破防御。”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科涅夫也没吭声。

斯大林终于问道：“能不能把朱可夫的机动部队调动一下，让他们通过

你们在你们的方面军地段上打开的突破口进军柏林呢？”

科涅夫回答说：“斯大林同志，那要花好多时间，而且会造成很大混乱。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调来坦克部队通过我们打开的突破口。在我们的地段上，形势的发展很顺利，我们的兵力足够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部转到柏林方向上。”

他谈了他的坦克集团军在哪里调转方向，并把措森作为调转方向的地点。措森，位于柏林以南约十六英里，是德军总参谋部所在地。

斯大林问科涅夫他现在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图。他回答说用的是1：20万比例尺的地图。

稍停片刻——他显然想在莫斯科从地图上找到“措森”这个城镇，斯大林答道：“很好。你知道德军总参谋部在措森吗？”

“是，我知道。”

“很好，”斯大林说，“我同意。把你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吧！”

科涅夫欣喜若狂，斯大林很可能注意到这一点。斯大林刚一挂上电话，科涅夫立刻用高频电台叫通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员，命令他们转到柏林方向。随后又下达了更具体的指令。

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奉命在4月17日夜间接强渡施普雷河，迅速向费特肖、霍尔森、巴鲁特、特尔托和柏林南部边缘推进。该集团军应在4月20日夜至21日清晨从南面突入柏林。

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奉命在4月17日夜间接强渡施普雷河，迅速向德雷布考、卡劳和卢肯瓦尔德推进，以便在4月20日前攻占比利茨、特罗伊思布里茨思和卢肯瓦尔德地域。波茨坦和柏林西南区则是4月20日夜间接至21日清晨攻占的目标。

若干年之后，朱可夫叙述了这件事，但他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恨情绪。他写道：

“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显出非常焦急不安，他担心我们部队的进攻受阻。因此，他命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用部分兵力从柏林市面实施突击，正如最高统帅部4月3H批准的作战计划中规定的那样。”可是，在1945年4月那些关键的日子里，当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经胜利在望，而他们的荣誉有可能在最后一刻被从他们手里夺走的时候，朱可夫的反应却是非常强烈的。

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高级记者帕维尔·特罗扬诺斯基中校提到了这件事，他写道：“突击受阻，斯大林斥责了朱可夫。情况非常严重，而且斯大林斥责人的时候，用词往往是不大客气的。”特罗扬诺斯基能够清楚地看出，“朱可夫——面部的一切特征都表明他是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一个不喜欢与任何人分享荣誉的人，当时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经过4月20日一天紧张的战斗，柏林接近地的德军防线被突破了。在战后审讯过程中，德军坦克第56军军长卡尔·维德林将军说：“4月20日，对我的这个军，很可能是对所有德军部队，都是最困难的一天。它们在先前的战斗中遭到惨重损失。已经极端疲惫，无法抵挡占优势的俄国部队的强大突击。”

朱可夫著《在柏林方向上》援引的材料，第19页——原书注

4月20日下午三四点钟，朱可夫的方面军编成内的第3突击集团军步兵第79军的远程炮兵，首先向柏林市区开炮。4月21日，近卫坦克第2集

团军、第 3 突击集团军和第 47 集团军的部队突破到柏林城下。朱可夫认识到，柏林市南街道狭窄，容易设置障碍物，那种能够充分发挥装甲部队威力的大面积推进的打法已不适用。因此，他决定把坦克集团军与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协同起来，开展一场肃清守敌的战斗，单凭部队的冲击和密集的炮火就能粉碎柏林的守敌。

与此同时，科涅夫正拼命地向他的目标疾进。4 月 20 日，D·C·雷巴尔科将军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攻克措森，继续向柏林方向挺进，其他部队则同科特布斯的德军民开了顽强的战斗。4 月 21 日，科涅夫的坦克部队续近了柏林防御圈，到达柏林南部边缘大约十五英里的地方。到了傍晚，在几个地点越过了柏林环形公路防线。

当天夜间，科涅夫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定。其中一个决定就是把炮兵突击第 10 军、突击第 25 师和高射炮第 23 师置于雷巴尔科的指挥之下，以加强在柏林南接近地遭到猛烈抵抗的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歼击航空兵第 2 军也拨归雷巴尔科指挥。

4 月 22 日，对两个方面军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朱可夫的近卫第 8、第 33 和第 69 集团军，科涅夫的近卫第 3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3 集团军以及第 28 集团军之一部，开始封闭对法兰克福和古本附近德军集团的合围圈。自巴尔科的部队从前面向柏林推进，省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则向柏林东南部推进，这两支部队之间只隔着一条大约七点五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于是很快就形成并逐渐收紧的两个包围圈：一个包围了柏林东面和东南的德军第 9 集团军，另一个在柏林以西，包围了防守柏林本身的那些部队。

科涅夫的部队在到达特尔托运河时遇到严重障碍——德军在运河北岸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配备着大量火炮、迫击炮、坦克和火箭筒。许多桥梁已被破坏，而其余的桥梁正准备炸毁。

4 月 24 日，雷巴尔科的部队，在大炮、步兵和轰炸机支援下，开始渡过特尔托运河。

调来的几个重炮旅猛轰运河北岸的一排建筑物，许多楼房当即被摧毁。在一段不宽的正面上，每一英里集中了九百六十六门苏军的大炮，一支支突击队，不等大炮停止弹幕射击，就开始强渡运河。在林奎斯特附近渡到河对岸的几支先头部队遭到德军坦克和步兵的反击，被迫放弃了他们攻占的登陆场。在运河其他几个地段上，苏军守住了登陆场。

到了下午，苏军工程兵已在河上架起浮桥。

当科涅夫在一座大楼的楼顶观察这一行动时，传来捷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在西奥多尔·布塞指挥的德军第 9 集团军背后会师了。

渡河行动从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从而使雷巴尔科的部队得以突破从南面掩护柏林市区的德军内圈防线。

斯大林发给朱可夫和科涅夫的 11074 号命令谈到。根据 4 月 23 日的情况，在柏林一带给他们划分的界线如下：“从昌本起，到托伊皮茨、米滕瓦尔德、马里恩多尔夫、安哈尔特车站。”

瑞安记载了两个方向军之间的这条新分界线的影响。

尽管科涅夫不能公开抱怨，但他确实有些垂头丧气。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朱可夫。

这条穿过柏林的分界线，把科涅夫的部队限制在国会大厦以西大约一

百五十码的地方，而国会大厦恰恰一直被俄国人看作是柏林市最值得占领的地方，苏联的旗帜即将在这里高高升起。

第三帝国处于垂死挣扎中，但是柏林守军仍在继续抵抗苏军的冲击。在柏林市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德军被赶到环城铁路附近。到4月30日，只有政府机关地区，紧挨着动物园的地区。和从动物园向西伸展到哈弗尔河的狭长地带，尚在德军手中。

苏军在进攻时很讲究方式方法，每次实施新的冲击以前，首先要进行轰炸和炮击。

步兵得到坦克和配备有喷火器和爆破器材的工兵部队的支援。红军步兵部队一小段一小段地向前推进，从后院、从地下室，甚至经过地下铁道或下水道渗透进去，攻占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楼房。德国守军也常常从后面或从地下冲出来。攻击苏军。

后来德军渐渐不支，撤进防空洞和高射炮塔楼里。德军炮兵于是不得不在露天广场、公园和铁路车场占据射击阵地。最后，残存的德军大炮都集中到了动物园。

威廉·威廉梅尔著《德军在柏林的防御》（手稿），第58—第59页。——原书注

斯大林曾经激励苏军部队说，看谁能在国会大厦上升起一面“胜利的旗帜”，所以柏林市内的每一支苏军部队都希望赢得这一荣誉。

4月30日清晨5时，苏军大炮向国会大厦开火。当天下午，朱可夫的部队冲进国会大厦墙壁的缺口，紧接着在大厦内部进行了激战。不久，苏军终于获得了胜利，在这座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建筑物上升起了红旗。

当朱可夫的部队在国会大厦上升起苏联旗帜的时候，希特勒正在帝国办公厅的地下防空掩蔽部里。他把他的各项事务作了安排，同埃娃·布劳恩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并且写下了遗嘱。在获悉本尼托·墨索里尼死讯以后，希特勒默默地吃过午餐。饭后，他和那些在场的人握手告别，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下午3点30分，他对着自己的嘴开枪自杀了。他的妻子服毒自尽。“两具尸体在院子里烧掉了，”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写道，“希特勒的火葬柴堆，和越来越响的苏军炮火的轰鸣，构成了第三帝国的悲惨结局。”

赫鲁晓夫说，有一天，他在基辅接到朱可夫的一个兴高采烈的电话：“不久我就要把希特勒这只可惜的野兽关在一只笼子里。当我把他送回莫斯科的时候，我要经过基辅，让你看看他。”赫鲁晓夫接着说：“我祝愿朱可夫成功。我知道，有了他在那里指挥方面军，我们的攻势便是交给了信得过的人。后来在德军投降以后，朱可夫再一次打电话对我说，“我毕竟不能兑现我的诺言了。希特勒这条毒蛇已经死了。他开枪自杀了。”

他们把他的尸首给烧了。我们找到了他的烧焦了的骸骨。”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19页。——原书注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通知柏林城防司令官卡尔·维德林将军说，他准许以小股部队突围，但绝对不准投降。“元首”死后不久，约瑟夫·戈培尔于预其事，下令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柏林，他将开始同苏军司令部谈判。已经下达的命令又被撤回，拟定实施的突围被取消了。这种踌躇不决的状况，在部队中造成极大混乱，致使柏林守军大部就俘。

戈培尔想同苏军谈判的企图失败了。朱可夫只愿意讨论无条件投降。于是戈培尔毒死了他的六个孩子，并命令党卫军卫兵对他和他的妻子开了枪。当天傍晚，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在他的设在霍尔施泰因的司令部接到

一封电报，“任命他继任“元首”。

5月2日清晨，B·A·格拉祖诺夫将军，在近卫第47师指挥所，打电话给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将军报告：“前线传来消息说他们看见德军部队排成了队列。”早晨6时，维德林将军，在他的司令部的两名将军陪同下，越过战线投降了。维德林说明他的身份是柏林城防司令。当问到戈地尔是否同意投降时，维德林回答说，投降的决定是他自己（维德林）作出的。

B·N·崔可夫著《第三帝国的灭亡》，载《苏联军人》杂志，1964年5月号，第5页。——原书注

当天下午3时，共有七万多人的柏林守军全部投降了。对德战争宣告结束。

5月9日，维德林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将军和校官被用一架飞机送往莫斯科。1955年11月死于苏联一所监狱中。见约翰·托兰著《最后一百天》，第551页。——原书注

斯大林在他的“五一”节演说中宣称，柏林最后一战，击毙德军一百余万，俘虏德军八十万。红军部队缴获或摧毁六千架敌机、一万二千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二万三千门野战炮以及不可计数的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美英军队在德国境内迅速推进。到4月22日，他们进抵到从汉堡经马格德堡、莱比锡、克姆尼茨、尼恩贝格到斯图加特一线——大大深入了议定由苏军解放的地区。在匆匆东进的过程中，美军碰到了逃避苏军追击的成千上万的德军官兵。各个战俘营很快便关满了人。

4月25日，美军第69师的一支侦察部队在离易北河两英里的勒克维茨村附近，遇见了一名苏军骑兵。当天晚些时候，第69师另一支侦察部队制作了一面粗糙的美国国旗，打着旗子走向托尔高附近的一座已被破坏的桥梁。当美军士兵沿着破烂不堪的桥梁向对岸爬去的时候，一名苏军士兵也开始向他们爬过来。他们在易北河上会师了，美军侦察队长和这个苏军战士都咧开大嘴笑着，温厚地相互拍着肩膀。

查尔斯·B·麦克唐纳著《巨大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美军》，第496页—第497页。——原书注

不久，美英军队领导人会见了苏军领导人。至少，在一个短时间内，东西方之间存在着真挚的情谊和美好的感情。

5月初，科涅夫元帅与奥马尔·N·布雷德利将军一起进餐。饭后，布雷德利赠给科涅夫一枚美国荣誉勋章和一辆吉普车。科涅夫也送给这位美国将军一份个人的礼物——他的战马。自从他1943年担任草原方面军司令员时起，这匹马一直伴随他转战疆场。这匹漂亮的顿河牡马，连同马鞍、马勒和马饰一块儿都赠给了他。

N·C·科涅夫著《1945年》，第220页—第228页。——原书注

欧洲战争结束了，剩下的任务是，由盟国代表们去起草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文件，并解决实现和平的问题。然而，正如全世界不久就认识到的那样，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第十二章 短暂的蜜月

在战败的柏林上空，战争的硝烟还远未消散，苏联同它的战时盟国之间的关系便日益紧张起来了。5月7日凌晨中欧时间1时41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法国兰斯市代表德国统帅部签署了德国全体海陆空军部队向西方盟国，同时也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国签字，而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少将以证人身份代表苏联签字——正如随后的事态表明的，他显然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去这样做。

当天晚些时候，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收到安东诺夫将军的一封信，电报说苏联人认定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不是苏联方面出席兰斯仪式的合适代表。他们要求签署一项更正式的投降书，仪式将在柏林举行，由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政府。

斯大林得知苏斯洛帕罗夫签署了投降书，气得脸色发青。5月7日，他打电话给炮兵参谋长H·H·沃罗诺夫，问道：“这位‘著名的’炮兵将军伊万·苏斯洛帕罗夫究竟是谁？”他斥责沃罗诺夫没有教育好炮兵军官，说已经叫苏斯洛帕罗夫回莫斯科，要严厉地处分他。见H·H·沃罗诺夫著《苏联人民的功勋》，载《苏联历史》杂志，1965年3月号，第24页—第26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将军觉得，这是苏方对于盟国方面在德国投降问题上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他对此深感不安。他立即复电向安东诺夫保证，他一直严格遵守关于不单独停战的规定。

并说他乐意在第二天，即5月8日，在朱可夫元帅指定的时间到柏林去。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天气不好，他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那么英美两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团团长可以代替他签字。后来他决定不到柏林去，而是派他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泰德去代替他签字。

美国将军斯巴兹和法国将军塔西尼也去柏林参加仪式。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约翰·迪恩，从莫斯科飞抵柏林出席。

由于苏联人预料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来，以索科洛夫斯基为首的朱可夫的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都到机场去迎接他。迪恩写道，当首先到达的阿切尔将军和迪恩将军走下飞机，而艾森豪威尔没有来的时候，俄国人“仿佛一声令下，下巴马上都牵拉下来”，但“他们很快便恢复常态，对我们非常客气”。

约翰·迪恩著《奇怪的联盟：关于我们在战时同俄国努力合作的情况》，第174页。——原书注

大约在11时，泰德及其一行到了。检阅仪仗队的仪式刚结束，便准许德国代表下了飞机。他们是威廉·凯特尔元帅、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通普夫空军上将。

在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塔西尼拿出一封戴高乐授权他代表法国统帅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信，结果把程序弄得复杂化了。

泰德表示反对，因为艾森豪威尔已经授权他代表所有西方盟国签署。如果法国签署，那么所有其他西方盟国也都应该作为单独的实体参加。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了好几个小时，才以下述方式获得解决：投降书上由朱可夫和泰德作为主要签署人，而塔西尼和斯巴兹中将则以证人身份签署。

迪恩写道：“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也许是在维辛斯基的怂恿下，朱可夫站在塔西尼一边。这是苏联第一次作出很大努力来争取在战后同法国建立较密切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这一天后来的活动中，变得更明显了。”

投降仪式预定在泰德住处的对面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工程学院的会议厅

举行。晚上 8 时左右，各方代表已经聚齐，但投降文件的最后定稿直到 5 月 9 日凌晨 0 时 30 分才准备好。维辛斯基建议对文件措辞作一系列修改，但没有哪一处修改跟 5 月 17 日在兰斯签署的那份文件根本不同的。但是每处微小的修改，都得把文件的俄文文本和英文文本重新打字，而且修改稿又得通过译员来仔细核对，以保证两种文字的意思一样。

投降文件终于准备就绪可供签署了。会议厅的一头：摆了一张长条桌子，盟国的主要代表在那里就座。朱可夫坐在中间。泰德对这种安排并不完全满意，因为他认为他应该分享中间的位置。但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理由是：柏林在苏联手中，这一点也许是一条充足的理由，说明朱可夫应当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并且担任主席。泰德坐在朱可夫右边，维辛斯基坐在泰德的右边。

苏联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回忆说，在举行仪式期间，维辛斯基烦躁不安，斯巴兹举止安样，泰德似乎抱着某种嘲弄的态度看待这次仪式，而塔西尼“仿佛就象因为迟到而感到不安，并且急于要把眼前的事情弄明白。”朱可夫喜气洋洋，但他的表情既温厚，又显出不祥的迹象。“我望着朱可夫宽大的、非常精神的脸膛，想起了在哈勒欣河同日军作战期间我同他的全面，当时他的官衔是军长。负责指挥驻蒙古的苏军。我六年没有见到他了，从来役梦想过我下一次见到他是在柏林，在他接受纳粹军队投降的时候。”

当会议厅里的嘈杂声沉寂下来时，朱可夫站起来宣布开会。宣读与会者名单，用了大约十分钟。

然后朱可夫又站起来，对站在门口的军官们吩咐道：“让德国代表团进来。”

凯特尔、弗里德堡和施通普夫走进来，后边跟着他们的助手。凯特尔大约只跨了三步就走到桌子前，举起他的元帅杖致敬，然后拉出中间的椅子坐下了。

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助理哈里·布彻海军上校说，凯特尔环视了一下房间，仿佛他在查看战场的地形。“他的神态同那一天我所看到的德国文职人员们的神态形成鲜明对照，所有文官看上去都是那种已被打败和吓倒的神态。”

泰德站起来问德国人是否接受投降的各项条款（投降书的副本早些时候已交给他们了）。

一名译员翻译了他的话，凯特尔回答说，他接受他手里拿着的那份文件中所写的各项条款。

西蒙诺夫对现场作了如下的描写，

仪式继续着。我看了看凯特尔，他把带着手套的两只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施通普夫似乎是平静的。弗里德堡一动不动，但他僵硬的姿态中有了一点什么东西暴露出他的极端绝望。凯特尔开头很平静，接着他转过头来看看朱可夫。他的眼睛不住地一会儿望着桌子，一会儿望着这位苏联元帅。奇怪得很，每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好奇的表情，仿佛他是在看一个长期以来使他感兴趣的人，如今能够在几步远的地方仔细看看了。

德国代表现在要签署文件了。

“凯特尔的脸色阴沉下来，”西蒙诺夫写道，“在他等着轮到他签字这段时间，他的表情严峻。但他立即把头向后一仰，仿佛是要抑制就要从眼睛里

流出来的泪水。”

“建议德国代表团到桌子这儿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朱可夫坚定地说。

还没等译员译完这句话，凯特尔似乎已经明白了，他的一只手在桌子上比划了几下，好象是要求把投降书送到他的面前。

可是，朱可夫继续站在那里，不客气地打手势，要德国代表团走过来。“让他们到这儿来签！”他厉声地说。

凯特尔第一个走上前来。他把几个副本拿过来，带着轻蔑的神情一一签了字。当他回到他的座位上时，弗里德堡（他在两周后自杀了）和施还普夫走到桌子前边来签了字。

然后朱可夫和泰德以盟国代表的身份签了字，而斯巴兹和塔西尼则以证人的身份签了字。

“德国代表团可以离开会议厅。”朱可夫宣布说。凯特尔立即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用他的权杖致敬，然后转过身，大步走出大厅，其他德国军官也跟他后面走了。

当大门重新关好以后，紧张气氛一下子消散了。所有留在大厅里的人都一齐松了一口气。欧洲的这场战争终于正式结束了。

朱可夫宣布，一小时以后，各国代表团再在这里聚会，欢庆胜利。

“那是一次令人永志不忘的宴会，”迪恩将军写道，“英美苏三国的友谊处于它的顶峰。朱可夫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且。

朱可夫还说，“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建树了当代任何一位将军所能建树的最辉煌的功勋。

他在西部的大踏步前进，帮助了我在东部的作战。”

筵席一直持续到早晨 6 时。迪恩将军写道，当天下午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心为“我窗外的广场上，成千上万苏联人表现出来的自发的友好精神”所感动，心里热乎乎的。a 我对前途抱着很大的希望。”

现在，等待盟国的司令官们去做的事，是一起开会，以使起草宣布成立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宣言，承担起共同管理德国的责任。

在成立管制委员会前夕，艾森豪威尔同布彻上校谈起他对未来的期望，布彻回忆说，艾森豪威尔谈到了苏联。他认为美、英同苏联的关系，目前正处在就象战争初期美英之间的关系所处的那种“保持距离”的阶段。后来美英两国代表们一起工作，建立起共同的谅解，而且它们终于“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精神上”成了同盟国。

艾森豪威尔觉得，苏联人同美国人接触越多，他们对美国的了解也会越多，美苏两国间的合作也就会更多。苏联人在同别人打交道时是直率的，因此任何转弯抹角的做法都会引起他们的疑心。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美国本着战争期间，导致西方盟国间精诚团结的那种友好合作精神，去同苏联人打交道，应该说是能够同他们共事的。

哈里·布彻著《我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三年》，第 843 页。——原书注

5 月 30 日，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向艾森豪威尔通报说，斯大林已任命 T·R·朱可夫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苏方成员。美国人认为这一任命意味着，可以不再拖延地立即在柏林建立一个联合军事管制机构。

因此，6 月 5 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卢修斯·D·克莱将军、美国驻德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等人飞往柏林，参加盟国接管德国最高权力宣言的签

字仪式，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成立会议。

艾森豪威尔坚持事先制订并为包括苏方在内的各方所接受的准确的时间表。美国代表团按时到达柏林，由于会议预定在下午才开始，艾森豪威尔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朱可夫的总部，并把美国政府颁发给朱可夫的总司令级荣誉勋章授给他。

“我认为朱可夫元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着军人风度的人。”艾森豪威尔写道。

于是他们两人之间便开始了曾持续若干年的友谊。艾森豪威尔著《远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492页。——原书注

但是，就在这一天，由于俄国人召集的、预定由朱可夫主持的这次会议，发生了令人气恼的拖延，因而造成了令人遗憾的紧张气氛。对于推迟开会时间，苏方没有作出解释。艾森豪威尔越来越烦躁，终于问罗伯特·墨菲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否认为这些人是故意怠慢我们？”

墨菲要求他的对手维辛斯基解释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当天议程上的三个宣言中，有一个宣有里包含的一项条款要求三大国保证在各自的辖区内拘留日本人。由于苏联尚未同日本宣战，他们不能公开同意进行这种合作。

“这显然是弄错了，”墨菲对维辛斯基说，“我可以肯定，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会同意删去这一条而不必询问华盛顿或伦敦的意见。”

维辛斯基只是回答说，他必须等待苏联政府的指示。大概是因为苏斯洛帕罗夫将军签署兰斯投降书一事惹出了麻烦，所以维李斯基和朱可夫特别小心谨慎。

下午过去一半的时候，莫斯科的指示来了，三位总司令便聚集在一起签署宣言，接着朱可夫在柏林又非正式地召开了三大国军事管制长官的首次会议。艾森豪威尔要求立即着手建立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还说他想把墨菲和克莱将军留在柏林从事这一工作。

朱可夫在同维辛斯基商量之后，婉言拒绝了这一建议，说每个占领国必须将其部队撤回到自己的区域，然后才可实施国际管制。这样，美国人被要求无条件地撤出当时他们在图林根、萨克森、波美拉尼亚苏联占领区所占据的全部地盘。墨菲再一次认识到，所有政治性决定都是由维李斯基而不是由朱可夫来作。既然朱可夫显然没有受权接受艾森豪威尔关于盟军立即进入柏林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朱可夫元帅为他的客人们安排了一次豪华的宴会，并且以为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推迟启程时间，参加这一庆祝活动。苏联人不惜一切破费，把他们的许多最优秀的舞蹈家、音乐家和表演者从国内调来了。可是，墨菲写道：

艾森豪威尔不喜欢这一天的整个日程安排，所以他坚持要按原定时间同他的司令部全体人员一起回法兰克福去。

大为惊愕并感到无法理解的朱可夫，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坚决要走。“我要把你扣起来，让你留在这儿！”朱可夫兴高采烈地说。艾森豪威尔留下来了，但他只喝了几杯酒，便起身告辞。他解释说。他事先不知道要举行这次晚宴，所以作了其他安排。

在回机场途中，艾森豪威尔很客气地邀请朱可夫到盟军总部去作客。就这样，我们怀着扫兴的心情，在离开几个小时之后便又回到了法兰克福。艾森豪威尔心里很不受用。

尽管朱可夫殷勤好客，为人也和善，但他觉得他受了人家的摆布，而

他对眼下前景的看法又感到糊涂了。
的外交家》，第 259 页。——原书注

罗伯特·墨菲著《军人中

墨菲声称，在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第一次会晤的过程中，苏联人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三项宣言完完全全符合苏联的意图。第一号宣言解散了德国全国政府的最后残余，把德国的最高权力交给各战胜国的总司令。

第二号宣言规定，在处理涉及整个德国的问题时，各战胜国必须协商一致，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每一位总司令在他自己的区域内将拥有最高权力。实际上，这一宣言赋予每个占领国以绝对否决权，结果造成了德国在东方战胜国的地区和西方战胜国的地区之间的无限期的分裂。

第三号宣言划定了各占领区之间的边界，并确认了关于把柏林划分为几个区、每个战胜国各占领一个区的伦敦协议。第三号宣言与 1944 年 9 月 12 日伦敦议定书和 11 月 14 日伦敦议定书，至今仍然是西方卫戍部队留驻柏林的主要法律根据。

在艾森豪威尔刚要离开会场时，朱可夫对他说，他刚刚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他把苏联的胜利勋章授给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元帅。这个奖赏，以前从未授给过任何外国人。朱可夫问艾森豪威尔愿意在什么时候把勋章授给他，艾森豪威尔建议朱可夫到法兰克福他的总部去主持仪式。朱可夫同意了，而蒙哥马利说，既然他在欧洲战役整个期间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之下，他也愿意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受勋。

6 月 10 日朱可夫到达法兰克福之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朱可夫先给艾森豪威尔授勋，然后给蒙哥马利授勋。在铂基底上镶着一些钻石和红宝石的胜利勋章，给出席这次仪式的为数不多的目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迪恩认为美国给外国人授勋这件事做得不大高明。不到一星期以前，美国政府授予了朱可夫一枚荣誉勋章，这种勋章几乎无法跟胜利勋章相比。在战争后期，美国当局才规定，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级勋章是总司令级荣誉勋章。可是，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前，已经把更令人羡慕的特别功勋勋章授给了一些英国军官。迪恩评论说；

一般地说，俄国人对授勋非常重视，而且他们对每种勋章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世界上最有研究的。他们把他们的最高勋章——胜利勋章授给了艾森豪威尔，而授给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如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勋章，并不是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勋章中最好的勋章，我想，他们对此也许会觉得自尊心多少受到伤害。

授勋仪式后，举行了午宴。在午宴上，为各国领导人、为盟国的胜利频频举杯祝酒。

朱可夫元帅首先为艾森豪威尔祝酒。

他说：“我要向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祝一杯酒，由于他的卓越才能，盟军取得了辉煌伟大的胜利。”他说他“曾怀着惊讶不已的心情”注视过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几次辉煌的战役。他对于艾森豪威尔大规模使用飞机、大炮、坦克和海军的情形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

我们苏联军官和将军们注视并研究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所有战役。我个人和我所指挥的部队，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怀着深深的敬意。我表示希望我们盟国的四位司令官在管制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协调一致。如果说我们在战时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我相信，在和平时期将能合作得家过去一

样好。我为艾森豪威尔举杯——为他的健康，为他的成功和今后工作顺利干杯。
哈里·布彻著《我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三年》，第 880—第 861 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回敬的时候说，虽然他举杯祝酒，主要是想代表盟军说几句赞美朱可夫元帅的话，但在最后讲祝酒辞以前，他要稍稍离开话题”讲几句。他指出，朱可夫对他的赞扬使用了过奖的词句。但是他说，他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有才能的军人和外交官们由于认识到团结才有力量，因而全心全意地服从他的指挥，“而不管他们自己国内对他们有什么说法”。

他宣称，那些曾经征战沙场的人们现在要和平，希望有机会让他们的人民过上好一些的生活。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曾会见了一些苏联高级官员，在要求和平“这一根本愿望上”，他发现他们是同西方盟国一致的。

他最后讲了许多赞扬朱可夫的话。他说：

没有哪一个人对联合国的贡献能够超过朱可夫元帅的了。他今天作为我们的贵宾光临，并且热情友好地向我们盟军成员颁发了苏联勋章。可是，朱可夫元帅——一位谦虚的人，大概低估了他在我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有一天，当所有在座的人都去见老祖宗的时候，苏联肯定将设置另一种勋章。那将是朱可夫勋章，而这种勋章将为所有钦佩军人的勇敢、远见、坚韧和决心的人们所珍视。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请你们为朱可夫元帅干杯。

艾森豪威尔送走朱可夫及其一行之后，怀着满意的心情回顾了这一天的活动。朱可夫的友好态度和明显的诚挚感情，使法兰克福的美国人深受感动，艾森豪威尔本人则怀着很大希望，要同俄国人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会造就一个较好的世界。

他写道：

从朱可夫和他的助手那一方面，唯一可以看得出来的便是持友好和合作态度的强烈愿望。回顾起来，那一天确实展现了同俄国人建立和谐的密切的关系的光明希望。但这一希望从未变成现实，而且终于在猜疑和互相指责中消失了。可是，就朱可夫元帅同我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言，这种友谊一直在继续增长，直到我 1945 年 11 月离开欧洲。这种友谊是一件私人的和个人的事，令人遗憾的是，它并不代表总的态度。

艾森豪威尔著

《远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 493 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访问柏林四天以后，哈里·霍普金斯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途中在法兰克福停留。罗伯特·墨菲回忆说，“霍普金斯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同斯大林会见的情形，他对苏美合作的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法兰克福，霍普金斯用明显的诚挚态度对我们说：“我们可以跟斯大林打交道！他会合作的！”

霍普金斯讲述了据认为是斯大林作出的一些让步，而他的乐观态度，促使人们认为丘吉尔关于苏联的意图的警告，似乎是夸大其词，甚至可能是歇斯底里的。他谈到他从莫斯科归来途中在柏林的停留，苏联人殷勤好客到几乎使人发窘的地步，甚至允许他从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带走一些书籍。

霍普金斯的下述看法也是有深意的。据墨菲记载，霍普金斯说，向朱可夫提出的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都是由维辛斯基回答的，显而易见，俄国军人无论军衔多高，都没有被授权回答政治问题。

艾森豪威尔对霍普金斯说，他决心尽快地从苏联占领区撤出、所有美国军队，霍普金斯诚恳地表示赞成。他还同意必须就保证进入柏林问题作出明确的安排，并答应一俟他回到华盛顿，就提请总统和马歇尔将军亲自注意这个问题。

6月14日，杜鲁门总统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在关于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苏军和美军互相调动的计划中规定“美军从空中和沿公路、铁路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自由地进入柏林”。丘吉尔也提出了类似要求。但斯大林在答复他们二人时，没有提及“进入”问题，因而华盛顿和伦敦必定都认为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是理所当然的。看来，华盛顿仍然认为“进入”问题是一个应当由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共同商定的军事细节问题。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飞回美国参加举国庆祝胜利的活动，并且受之无愧地好好休息一番。直到7月10日，即在波茨坦会议开幕前一周，他才回到他在法兰克福的总部。艾森豪威尔离开期间，克莱将军为在德国建立美国的军事管制机构奠定了基础。

克莱首先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决定向苏联人移交德国的一大片地区的具体办法。

这块地区是美军在战争最后几周期间占领的。6月29日，他飞往柏林同朱可夫会晤。遗憾的是，朱可夫只同意使用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向美国驻柏林卫戍部队运送补给，而且在当时美军仍然控制着苏联占领区很大的一块地方的情况下，没有得到进入柏林的书面保证。

克莱告诉墨菲，既然朱可夫办事很通情达理，看来我们最好作这样的设想（象美英两国政府已经设想的那样）：一俟各国占领区稳固地确立起来以后，所有占领国将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

1945年7月初，当西方盟国部队开进柏林，占领各自的辖区时，曾经出现过一些紧张的时刻。俄国人似乎不愿把德国首都的一半移交给他们的战时伙伴。

7月3日夜，英国驻柏林卫戍司令官L·Q·莱因少将被召到朱可夫的总部，被告知说，供英军通行的那条公路上的一座桥梁有危险。朱可夫建议他们走指定给美军使用的那条路线。进驻柏林英占区的部队的主力，预定7月4日进入这个城市，而且已经制订了举行壮观的人城式的详细计划。莱因将军怀疑苏联人故意想在深更半夜让这支部队改变路线，以便造成停顿和混乱。经他向朱可夫元帅提出强烈抗议后，这位苏军司令员才又同意走原来的路线了。

尽管如此，在第二天的行动中造成了很多延误，直到傍晚，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莱因将军命令威廉·欣德准将拒绝在第二天接管柏林英占区的军事管制职权。

7月4日，即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开会的前一天，美军准备进驻自己的辖区。弗兰克·豪利上校（不久升为准将）接到美军驻柏林第一任司令官弗洛伊德·帕克斯少将的命令，命令他在午在以前占领美国的辖区和它的六个区政府和市政厅。当豪利正向他的军事管制部队下达必要的命令时，又接到帕克斯将军的一个紧急通知，要他立即去巴贝尔斯贝格的帕克斯将军的司令部去。

当他到达的时候，帕克斯交给他一件由朱可夫签字的照会。“鉴于柏林将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来统治，而管制委员会目前尚未成立，所以在管制

委员会成立之前，将不把你们的辖区移交给你们。”

豪利认为这件照会是苏联人企图争取时间，赶在美军进驻之前完成对美国辖区的掠夺。他要求允许他立即执行帕克斯早先下达的命令，按照原订协议占领美国辖区。帕克斯批准了，但提醒他“不要惹起太多的麻烦”。

豪利在黎明时分苏联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开进城市。每支美军分遣队负责六个区之一。

每个区的区长腾出他的房子作为美国军事管制总部，并在门口挂上了美国国旗。

当苏联人一觉醒来发现美国人已经进驻美国辖区时，很快便作出了反应。苏联人向每个总部派一名军官去通知美军说，他们必须撤走，因为朱可夫曾下令说，他们不得接管这个区域。美军没有撤走，直到7月12日苏军全部撤出的时候，美军才全部占领了美国辖区。

7月7日，克莱将军和他的英国对手罗纳德·威克斯将军一起与朱可夫元帅会晤，为建立柏林管制委员会作出初步安排。同时，朱可夫开始准备下一次会议要讨论的一个章程。三国代表一致同意，移交英美管辖区军事管制职权的日期，应当在管制委员会开会时决定。

接着朱可夫谈起其他问题。他向美方代表宣布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为了维持柏林的生存，你们将要供应粮食和煤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提到希望美国人向这个陷落的首都提供粮食和给养。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早些时候曾说过，供养柏林人是苏联人的责任，因为他们控制着通常向柏林供应粮食的两个省——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此外，美军刚刚撤出了两个富庶的农业省份——图林根和萨克森。

克莱将军回答朱可夫说：“我们没有向柏林运送粮食的计划。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粮食可运。柏林所是要的一切，应当是要么从我们刚刚移交给你们的地区运来，要么从周围的勃兰县堡和东北的波美拉尼亚地区运来，从前一直是由这些地方供应的。”

朱可夫断然地说：“让我们现实一些，先生们。你们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呢？让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不打算向柏林供应粮食。我们的仓库几乎都光了。我们必须得到粮食，我们必须快一些得到粮食。”

克莱将军采取守势。“运输和组织工作有困难，”他说，“即使我们愿意，也难于把粮食和煤运来，因为易北河上没有大桥。”

坐在朱可夫右边的索科洛夫斯基尖锐地问道：“雅尔塔会议以来，你们都于什么来着？你们为什么不把桥梁修好使用呢？我们倒是这样做了。”

克莱回答说：“我们直到几天以前还不了解情况。”

索科洛夫斯基道：“事前没有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真是令人遗憾。”

克莱又申辩说，美英控制的地区没有多余的粮食和煤。

朱可夫微笑着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段对话。“先生们，我想知道的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运来供应物资。我以为，对于这个安排不能含糊其辞。”

威克斯和克莱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同政府商量一下。

弗兰克·豪利著《柏林司令部》，第57页—第60页。——原书注

第二次会议是7月10日举行的。法国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和以后的各次会议。朱可夫的章程得到通过，代表们决定，柏林管制委员会将在第二天举行首次会议。威克斯和克莱得到各自政府的通知说，向柏林供应粮食和燃料的责任问题，将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讨论。同时，代表们一致同意

（作为临时措施，并且在不违背波茨坦会议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的条件下），从7月15日起各自对自己的粮区提供小麦、土豆、食糖和盐，为期一个月。威克斯将军还同意每天向这座城市供应二千四百吨煤。

柏林管制委员会首次会议于7月11日举行，会议决定，美军司令官和英军司令官翌日将承担起管理他们各自辖区的责任。尽管在这些会议上偶而出现紧张场面，但朱可夫及其主要助手的热情和真诚态度给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留下了强烈印象。

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之间建立起来的个人间的谅解，常常有助于缓和柏林各占领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空中走廊问题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当局常常写信给美国军事管制当局，抱怨他们所说的美国飞机擅自在苏联占领区域上空飞行，苏联人授权同盟国使用一条狭窄的飞行走廊进出柏林，飞机不得超出这条走廊。在天气恶劣。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下，美国飞机常常违反关于走廊界限的规定。苏联人定期地提出所说的这些违章事件的详细清单，其次数非常多，以致无法对具体事例进行调查。

艾森豪威尔将军终于前往会见朱可夫。他对朱可夫说，他认为这些事件并不造成任何后果，所以不必如此重视。朱可夫表示同意，说这是一些小问题，但他说，不归他管辖的高射炮部队把每次越界事件报告给莫斯科，而莫斯科则要他要求艾森豪威尔的总部给予答复。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苏联权力过分集中的又一例子，但他对朱可夫说，朱可夫可以继续提出抱怨，而他将继续作出千篇一律的答复。朱可夫说，只要这样，就算达到了他的要求。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准确地概括了当时苏联人和美国人之间那种既有友好感情又互相敬而远之的奇怪现象。他写道：

我们与之联系的主要人物是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我们对他们二人都很赞赏，我们觉得无论在任何国家、他们都堪称伟大人物。他俩和他们的主要下属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因为他们不但有才能，而且态度坦率、直截了当。尽管存在着语言障碍——对于一个只能通过翻译与之交谈的人，是很难感到亲近的，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同他们建立了互相信任和谅解的可靠基础。

朱可夫元帅在讲述下面一番话时，显然是真心的。他说，世界和平完全有赖于俄国人和美国人能否把他们在战争时期所达到的那种合作和谅解继续保持下去，坚持到底。

但是，尽管我们对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抱有热情，而且我们觉得他们对我们报之以同样的热情，但我们之间在打交道时仍然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没有机会象朋友那样随便聚会，并逐渐加深彼此的了解。我们的接触都是在正式场合——要么是处理公务，要么是参加社交活动。

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著《我在莫行科的三年》，第22页—第23页。
——原书注

为了解决有关战后欧洲问题和关于日本投降问题，各盟国于7月举行了会议。据朱可夫回忆录说，有人曾考虑把柏林作为举行会议的地点，可是朱可夫对从苏联来的一些保安人员说：“柏林市内缺乏举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应有的条件。我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波茨坦和巴贝尔斯贝格。”

苏联官员们批准了朱可夫的建议，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表示同意。于是朱可夫的工程兵部队开始昼夜不停地工作，修整房屋和道路。到7月10日，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7月13日和14日，苏联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们到达波茨坦。其中包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线辛斯基、葛罗米柯、马伊斯基以及R·B·诺维科夫。

7月16日，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乘专用列车到达。

斯大林在前一天傍晚打电话给朱可夫说：“千万别搞什么仪仗队和乐队来欢迎我们。

只要你自己和你认为必要的人到火车站来就行了。”

第二天，朱可夫同维辛斯基、安东诺夫、库兹涅佐夫、捷列金、索科洛夫斯基、M。

C·马利宁以及其他军人一起来到火车站。

“我到车厢跟前迎接斯大林，”朱可夫回忆说，“他的情绪很好，迈步走近欢迎的人群，向他们招手致意。”他观察了一下车站广场四周，不慌不忙地坐上了汽车，随后他又把车门打开，邀请朱可夫同他坐在一起。路上，他询问朱可夫有关会议开幕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当斯大林到达他将下榻的别墅时，他问这座别墅从前是谁的别墅。有人告诉他说，这从前是德国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的别墅。

朱可夫写道：“斯大林不喜欢有过多的摆设。他看了看房间以后，就要求把用不着的家具撤去。”

当天，温斯顿·丘吉尔和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抵达波茨坦。这两位领导人前去拜访了斯大林。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回访了他们。

会议于7月17日下午开幕。会议预定一直开到8月2日。杜鲁门总统带着他的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前驻苏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五星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以及杜鲁门的译员查尔斯·傅伦。丘吉尔则由安东尼·艾登、克莱门特·艾德礼等人陪同。

快到7月底时，代表们休会数天。待到复会时，丘吉尔和艾登已不再是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了。他们的党在大选中败北了，于是克莱门特·艾德礼成了首相，欧内斯特·贝文担任新的外交大臣。虽然杜鲁门认为这一事态戏剧性地表明了民主制度下政权的和平更迭，但由于失去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智慧和经验，会议开得跟先前大不一样了。

在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德国应作为一个单位，由设在柏林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来管理。将在德国实行地方分权、消除纳粹影响并解除武装，但除了这些目标以外，对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的规定是含糊不清的。赔偿问题没有解决，但授权每个占领国从自己的占领区取得资财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规定苏联和波兰将得到法军、英军和美军占领区的军事工业设备的百分之十。苏联将控制柯尼斯堡和东普鲁士之一部，而波兰将接管东普鲁士的其余部分，并“管理”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一大片地区。

四大国一致同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道的”遣返，把德国人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迁回德国。可是，事实上，实施这一协议的过程却远不是人道的。

在会议期间，日本人曾两次要求斯大林居中调停以便在太平洋议和，可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事先告知丘吉尔和杜鲁门，便拒绝了日本的建议。他显然打算让苏军向日本开战。

朱可夫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谈到在一次会议后的宴会上祝酒的事。他写

道：

“我根本没料到，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我祝酒。我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当我感谢丘吉尔对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时，竟无意中把他称为‘同志’。马上我就觉察到了 B·M·莫洛托夫那困惑不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发窘。于是我便随机应变，举杯祝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样，我便不再有什么错误了。当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时，他和在场的人都为我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发笑。” 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 TobaPam 与同志一词相同。——译者注

6 月份，艾森豪威尔曾接到访问苏联的邀请，但是，因为他要回美国去一趟，所以不得不谢绝了。8 月第一周，当他返回欧洲时，华盛顿通知他说，斯大林已再次向他发出邀请，而且美国政府希望他能接受这一邀请。

斯大林建议艾森豪威尔及时到达莫斯科参加 8 月 12 日的苏联体育节。这位美国司令官很快接受了邀请，并获悉朱可夫元帅将陪同他前往莫斯科，将在他访问期间作为他的正式东道主。

艾森豪威尔抵达莫斯科后，下榻于美国驻苏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同他的朋友 W·艾夫里尔·哈里曼住在一起。他首先会见了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后者领他到作战室参观，并向他说明了苏军在远东的配置情况和在那里作战的计划。 哈里曼——当时是美国驻苏联大使。——译者注

举行体育检阅那天，艾森豪威尔及其一行前往红场。苏联报刊——显然是遵照苏联共产党关于不要过份强调这位将军的重要性的方针，仅仅刊登了一条简短消息，宣布他正在莫斯科访问。可是，当艾森豪威尔在那个星期日的早晨走向检阅台时，人群中爆发出自发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 he 登上检阅台。

大约有两万人到场观看了这次检阅。每个人都必须站着看表演，给美国大使及其一行安排的位置是在检阅场的一处混凝土看台上。可是，美国人刚刚到达，安东诺夫将军就来找艾森豪威尔说，斯大林邀请他到列宁墓的检阅台上去，跟他在一起。

安东诺夫说：“大元帅说，你要是愿意去的话，他还邀请你的两位同事一道去，如果你愿意带他们去的话。”哈里曼立刻对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一个破例的盛意——他从未听说有哪一位外国人被邀请登上列宁墓。艾森豪威尔接受了邀请，并请哈里曼大使和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陪他一道去。

他们三人在列宁墓上站了五小时，其间，斯大林不时地通过一名译员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斯大林几次谈到，苏联和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他还强调指出，美国人民能够做许多事情来帮助苏联。

“当时，”艾森豪威尔写道，“朱可夫元帅明显地深得大元帅的器重。我同斯大林的每次谈话，都有朱可夫参加，他们两人彼此交谈亲密而融洽。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相信朱可夫元帅的友好态度和合作意图。”

当斯大林提到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时，艾森豪威尔决定促请他赋予俄国代表更多的权力。从管制委员会成立起，这个问题一宜使他心里不安，而且问题的根源在于苏联政府不愿让朱可夫独立作出任何决定。对某些局部性的建议，朱可夫看来往往是赞成的，但他从未能自己作主给予答复。

艾森豪威尔对这位大元帅说：

当然，朱可夫元帅和我相处得非常好。这是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两个伟大强盛的国家，能够赋予它们的地方军事长官以足够的权力，就当地的具体问题和行政事务达成协议。

比较弱小的国家也许不能这样做，因而就会出现种种困难。可是，朱可夫元帅和我在达成协议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我俩通常总是能够克服我们所碰到的那些小障碍。

斯大林强调地表示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说：“如果派到哪个地方去的代表，光是当个跑腿的，那么派代表就没有意义了。他必须有采取行动的权力。”

艾森豪威尔著《远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520页—第521页。——原书注

检阅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正准备离开，这时人群向他们热烈欢呼。于是艾森豪威尔把手臂搭在朱可夫的肩膀上。作为回答，这位结实的元帅拥抱了艾森豪威尔。

这时广场上立即欢腾起来，人声鼎沸，这两位领导人站了好一会，向呼喊的人群招手。

结束这一场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离开检阅台，于是在大约十分钟以后，他们便离开了。

“这种场面决不是预先排练的，”迪恩将军说，“这同意识形态或政治抱负毫无关系。这由衷地表现了俄国人民各阶层的代表对艾森豪威尔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的热爱。这使我们在场的美国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也使我们感到放心。”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集体农庄。这位美国将军对农业很熟悉又很感兴趣，使他在苏联农庄庄员中更加受欢迎。参观完毕，他们回到斯帕索大厦，艾森豪威尔邀请朱可夫一起吃午餐。未经上级批准，苏联官员是不能接受邀请到外国人家里去的，所以朱可夫这时觉得很为难。既然他不能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必须得到批准，他就只好进去同他的朋友一起进餐了。

在此后的几天里，艾森豪威尔在朱可夫陪同下参观了各种有趣的地方。当他们一起出席哈里曼大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接着，朱可夫陪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儿子（随同父亲一起来莫斯科的年轻的陆军中尉约翰·艾森豪威尔）访问了列宁格勒。

艾森豪威尔的访问结束了，朱可夫陪着他一起回到柏林。飞往德国的旅途对艾森豪威尔是极有启发的，无疑对朱可夫也一样。艾森豪威尔了解到的情况有助于说明俄国人是怎样打仗的。艾森豪威尔写道：

由于他——朱可夫元帅，若干年来在红军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作为一位指挥若干重大战役的负责首长的经历，比我们时代的无论哪一个人所长。无论哪个在当时看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俄国战区，都要派他去指挥，这似乎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从他对于俄国军队的编成、部队作战地区的地形，以及他据以作战略性的决定的种种理由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军人。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战斗部队的兵力。朱可夫得知，美军的师的兵力保持在一万七千人左右。这位元帅说，苏军的师的兵力尽量保持在八千人左右，不过在一次长时间的战役期间，有的师减员到三四千人。

从交谈中，艾森豪威尔立即清楚地看到美国和苏联对战争的看法的一些差别。美国人是以人的生命来估计战争的代价的，而苏联人则关心对国家资源的总的消耗。艾森豪威尔觉得朱可夫似乎不大重视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对保持士气有重要作用的做法，即部队轮换、免费乘车、短期休假、娱乐设施，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战场冒险。

不过，这位元帅倒认为，破坏敌军的士气始终应当是高级指挥机关的一个目标。

对保护步兵的一些措施，例如保证步兵在作战前不要长途行军，以免消耗体力，过度疲劳等，朱可夫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他认为这些措施代价太高。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苏联人似乎认为，巨大的胜利不可避免地要求付出高昂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返回德国以后，他邀请朱可夫访问美国一事，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朱可夫很快接受了邀请，并要求克莱将军或艾森豪威尔将军陪同他前往美国。由于有一些紧迫的事务，艾森豪威尔不能成行，于是朱可夫要求将军的儿子杨，作为随从参谋同他一起去。艾森豪威尔对朱可夫说，约勤以这个身份同往将会感到荣幸，而他自己的专机 C - 54“向日葵号”将交给朱可夫元帅支配。

朱可夫对 C - 54 飞机是信得过的，因为他曾经坐过这种飞机飞越苏联。他说：“乘将军的飞机，还有将军的儿子陪着我，我知道我的安全将是万无一失的。”

不巧。这时朱可夫生了病。许多人表示怀疑他是否真的病了。他们猜测说这是一场“外交病”。但是，当艾森豪威尔晚些时候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见到朱可夫时，他注意到他看上去真的害过一场大病。这位元帅的访美之行推迟了，而且，既然冬季将临，他表示希望来春再去美国。然而，到了第二年春天，苏联人便不再有兴趣派他去美国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那一年最后一次见到朱可夫元帅；是在 11 月 7 日在这位元帅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八周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到达的时候，发现朱可夫元帅和他的妻子以及许多助手站成一排迎接客人。把艾森豪威尔沙进来以后，朱可夫立即离开欢迎行列，他、他的妻子和一名译员陪同艾森豪威尔进入另一房间，边吃喝边谈，一直谈了两个小时。

朱可夫元帅说，他认为他和艾森豪威尔正在帮助增进两个在政体上和文化上有很大差异的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但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他说：“只要美国和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一起，联合国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如果我们互相合作，不准发动战争，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无论谁都是不敢发动战争的。”

艾森豪威尔著《远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 530 页。——原书注

朱可夫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理想主义，而美国的制度的基础则是实利主义。艾森豪威尔回忆说：

他在阐述他对这种差别的看法时说（他首先为他提出批评表示歉意），他觉得我们的制度求助于人们身上一切自私的念头。他说，我们要让一个人去做事的时候，就跟他说：他挣的钱归他自己，他喜欢说什么话，就可以说什么话，在所有方面都允许他在一个伟大的民族综合体中。作一个大体上是自由散漫的、没有明确方向的实体来行事。

他要求我理解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正在试图用每个人对他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伟大的民族综合体的献身精神，采取代上述自私的动机。尽管我完全拒绝接受这些论点，并谴责必然导致独裁的种种制度，但我心里毫不怀疑，朱可夫元帅讲的这些话是出自他的内心的。

交谈中谈到的另一个问题，迫使艾森豪威尔处于守势。战时驻莫斯科的一位美国记者沃尔特·克尔曾经报道说，朱可夫的妻子比她的丈夫高，这对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据艾森豪威尔记载，“这个报道使朱可夫很生气，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人身的损毁和贬低。他和他的妻子并肩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现在可以看到你们有些记者的报道是多么荒唐。再说，我们没有儿子。我们有两个女儿。’”

朱可夫还对艾森豪威尔谈到一家美国杂志刊登的一张有损斯大林尊严的照片。“要是哪一家俄国杂志敢于刊登你的一张这样的照片，”这位元帅怒冲冲地说，“我要让这家杂志立即停止出版，它将被取缔。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艾森豪威尔将军解释了美国的新闻自由，但看来这对朱可夫毫无效果。朱可夫说：“你如果是俄国的朋友，你就会对此采取点什么措施。”艾森豪威尔只能阐述一下自由经营的好处，说国有制将导致独裁。艾森豪威尔最后说，美国的建国和发展靠的就是这种摆脱独裁统治的愿望。朱可夫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接着，他们两人就道别了。

过了近十年光景，他们才得重逢。

这两位战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消组占领柏林以后随之而发生的各种事件、问题、冲突以及激进情绪。但是，在历史上的一段光辉的时刻，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两个世界大国或许能够消释他们的分歧，从而使“在地球上，和平和对人们的友善态度”能变成现实。

第十三章 默默无闻……和再次出现

1946 年行将结束，新的一年似乎将使朱可夫更加飞黄腾达。1946 年 1 月五日，《红星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斯大林身穿军服、容光焕发的巨幅照片。在他右边稍后一点儿，是笑容满面、喜气洋洋的朱可夫。斯大林左边是伏罗希洛夫，两边还有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人。

1 月 2 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朱可夫被鲁别日诺耶化工联合企业等单位提名为候选人。在提名军人候选人的时候，《红军报》头版发表了一些文章，使用了这样一些标题为提名创造适当的气氛：《斯大林的英明使我们赢得了胜利》、《敬爱的领袖、导师和军事统帅》，读者们不应忘记《伟大的斯大林领导我们走向胜利》。

朱可夫的名字也多次在《红星报》上出现。据 1 月 9 日和 10 日宣布，第 660 号特别选区已推举朱可夫为最高苏维埃联盟院的候选人。

1 月 24 日，《红星报》刊登了朱可夫的长篇传略，说这位驻德苏联占领军总司令，是哈勒欣河、耶尔尼亚、列宁格勒、莫斯科、华沙和柏林各个战役的英雄。如今，“这位斯大林培养的著名军事首长已被选为最高苏维埃候

选人。”

几天之后，朱可夫会见了第 660 号特别选区的选民。对于这次会见，他可能是很高兴的。战斗英雄们纷纷发言赞扬他，高呼“乌拉”来称颂他。

朱可夫发表了讲话。他说，粉碎德国法西斯，苏联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苏联也必须起带头作用。他特别号召听众中的退伍军人要为苏联、为和平、为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安全而努力工作。

《苏联元帅 T·R·朱可夫会见选民》，载《红星报》1946 年 1 月 19 日第 2 版。

1946 年 2 月 10 日举行选举。2 月 14 日公布了选举结果。朱可夫在第 660 号特别选区当选。

3 月 18 日，新选出的最高苏维埃代表们在莫斯科开会，朱可夫离开他在柏林的岗位前往参加。朱可夫同另外两名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摆好姿势让摄影记者照相。这两个人是近卫军上校波克雷什金和近卫军少校 N·H·阔日杜布。他们是曾经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仅有的三个人。

4 月 10 日，朱可夫再次离开柏林，回国就任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之职。五一节那天，他同其他军政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列宁墓上。几周之后，即 5 月 25 日，他出席了为以保列斯拉夫·贝鲁特主席为首的波兰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过了不久，即在 7 月份，《真理报》突然宣布，朱可夫被调到敖德萨军区任职。

斯大林逝世之后，朱可夫在为斯大林举行葬礼那天，参加到为这位大元帅守灵的行列。这样，他又开始为苏联军事机构提供富有活力的领导。1953 年 3 月 6 日，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手下的副部长，而且朱可夫很可能同时负责指挥苏联地面部队。

从 1953 年底起，苏联军事理论和训练开始考虑新式武器对战略和战术的影响。随着朱可夫的晋升，苏联在军事理论著作方面显示出新的活力，因为俄国人开始认识到苏联军事理论和思想并不是一贯正确的。

然而，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公开发表的有关修正苏联的军事理论的著述，正是对于美国 1953 年和 1954 年开始出现的军事方面的“新面貌”早就应该作出的反应。

1954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预算咨文中要求“建立、保持和充分利用现代化空军力量”。在预计拨给陆海空三军的二百九十三亿美元的总额中，美国空军将得到一百一十二亿美元，约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八。战后多年来，国会拨款没有在三军中按大致相同的数目平分，这还是第一次。战略空军司令部变成了美国军事力量和国家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与此同时，苏联人决定发展他们自己的远程打击力量。1954 年就有证据表明，苏联正从事两种有四个喷气引擎的远程轰炸机和一种双喷气引擎的中程轰炸机的批量生产。

同时，苏联人正在研制一批空中加油机，扩大北极各地区供远程轰炸机用的机场和疏散设施，从而使苏联飞机能沿最短的航线飞到北美。

虽然朱可夫承认空中力量和核武器的重要性，但他继续强调大规模的、大面积的陆地作战，甚至在核战争中也是这样。他声言：“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本身不能决定武装冲突的结局。尽管原子武器和核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但在使用这些武器的同时，大批的军队和庞大数量的常规兵器不可避免地将被卷入军事行动。”

加特霍夫说，朱可夫在这里指的不是仅仅有大量士兵——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的红军往往就是仅仅有大量士兵。相反的，他指的是庞大的、现代化的、用核武器装备起来的地面部队和起支援作用的空军和海军，而这些都是苏联人今天所拥有的。

当有人问朱可夫，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一定得使用核武器时，朱可夫回答道：“无论是谁，包括我在内，现在都无法对此作出完满的回答，因为一切战争，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规模，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经济的条件下发生、进行和结束的。”

雷蒙德·加特霍夫著《苏联的形象》中引用的材料，第16页—第17页、第19页。——原书注

1955年1月，即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之前一个月，他在“武装部队领导于部”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对这些领导干部说，“必须在深入研究现代化军事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完善自己的知识。”

三个月以后，苏联《军事思想》杂志的一篇社论提到了这次会议，并且承认“苏联军事科学在解决当前许多重要军事理论问题方面太慢了。”因此，“在制订军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时，必须使那些对于实际作战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尖锐的、迫切的问题得到系统的研究”，并且“只能发表那些新鲜的、有创见的文章，这些文章应能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新问题，或者包含有价值的总结和结论。”这家杂志承认，“它害怕讲新鲜见解”，虽然，正如加特霍夫指出的，承认存在问题，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

此外，主编们承认他们“无根据地”扣压坦克兵元帅·A·罗特米斯特罗夫写的题为《论突然性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的文章，不予发表，“从而表明他们缺乏必要的胆量来提出对于正确了解现代战争特点有着重要作用的新的、切合时宜的问题”。

看来朱可夫的讲话还要求对军事问题作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军事史反映的是怎样应用完美无缺的斯大林主义军事科学，而且不承认有过什么失误。

朱可夫当权以后，苏联军事史终于承认它是有错误的，承认红军遭受过失败。

在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苏联的军事著述工作蓬勃开展。苏联军事理论家们——其中许多人在国防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开始详细阐述现代战争的理论和技术。这个过程虽说是缓慢的，但却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朱可夫本人也参加了这些讨论。他说：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特别是武装部队的技术水平和武器状况、部队的战斗力和熟练程度、最高统帅部、司令员和指挥官们的军事艺术，而最主要的是人民和军队是否认识到政府领导他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义目标……上述的各种因素，对于战争的特点和实施战争的手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就这样，朱可夫倡导了对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他坚持主张，苏联军事史一定要真实、客观，并且强调，在实际应用战略理论时，必须有较大的灵活性、个人的主动性和想象力。

与此同时，他开始成为苏联舞台上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这位职业军人就要步入充满危险的政坛，因为在这里，敌人往往是不能清楚地辨别出来的。

第十四章 军人政治家

朱可夫就军事政策和战时历史发表的许多演说、他在重要的招待会和其他场合的露面，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以及《真理报》和《红星报》对他的宣传，明确无误地表明，他是苏联高级政治领导人之一。一个职业军人升到这样高的地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伯特伦·D·沃尔夫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在斯大林的继承人当中，没有深军众望的人物；由于武装部队在这个‘和平共处’时代的重要性；由于赫鲁晓夫及其一伙在处决波斯克列贝舍夫和贝利亚时对军队的依赖。”

伯特伦·D·沃尔夫著《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幽灵》，第39页—第40页。
——原书注

1955年4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透露，当月他同朱可夫元帅自1946年以来首次建立了个人间的通信联系。他不肯透露他们之间通信的内容，也不肯说谁先写的信。然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这或许会“使世界局势有所改善”。

总统解释说，他当年在柏林同朱可夫一起工作时，他认为这位元帅“当时是热心致力于促进美苏之间良好关系的”。

美国报刊上对于是否可能利用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友好联系，来缓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出现了不少猜测。报刊援引总统的话说，他和朱可夫在柏林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两国能够融洽相处，如果双方认识到不这样做是愚蠢的。

也是在4月份，朱可夫在给海外记者俱乐部的一封信中，间接地呼吁艾森豪威尔同苏联和平共处。很明显，在涉及对美国的关系时，这位元帅已代替莫洛托夫充当苏联外交的发言人。

条件准备好了。问题在世界各地提出来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友谊能够为两大强国之间关系的真正缓和提供一个基础吗？在苏联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斯大林以后的领导人在国际关系方面是相当一贯地为实现缓和而努力的。苏联最高领导层很可能把朱可夫看作是同西方实现和解的一个工具。自从1941年以来，朱可夫在美国一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物。一些报刊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他的照片，报纸杂志发表讨好性的介绍文章。

在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时代的最初几个月里，有若干迹象表明他们为缓和紧张关系作出了努力。一方面驻俄国的外国记者发现，对他们的新闻报道的检查放宽了，同时，苏联政府开始同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当两架苏联战斗机在自今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国巡逻机，造成七名乘员受伤时，苏联人给予了部分赔偿。

温斯顿·丘吉尔注意到苏联国内这些新的事态发展，力促召开一次大国会议讨论相互间的问题。在东西方之间经过一番通信磋商之后，定于1955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一次首脑会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赞成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还没有出现具体的希望以前同苏联领导人会晤。促使他参加这次会议的“具体行动”，是在多年毫无

成果的谈判之后，俄国人宣布他们打算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但是艾森豪威尔对这次会议不抱很大希望。奥地利国家条约，全称是“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条约确认奥地利重新独立，并对有关战后问题作了规定。——译者注

赫鲁晓夫说，因为艾森豪威尔打算带国防部长威尔逊同他一起去日内瓦，苏联领导人决定让朱可夫参加他们的代表团。赫鲁晓夫写道：

朱可夫在战时一直是艾森豪威尔的朋友，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交情或许可以作为我们两国之间交谈的基础。我们希望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能有机会单独谈谈，希望他们能就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交换意见。可是，杜勒斯那个恶棍总是在艾森豪威尔身边转。看他走偏了，就拽他一把。

7月14日，苏联政府宣布，党的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将陪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出席会议。

值得指出的是，在自官得知苏联代表团名单之前，艾森豪威尔就说过，他将欢迎有机会同朱可夫叙叙旧，如果他参加会议的话。朱可夫也曾对记者说他确实期望在工作会议以外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晤。他微笑着说：“这么多年没有见到我的老朋友了，想见见那是很自然的。”但他没有详谈他想同美国总统讨论什么问题。

在会议期间，7月18日那天，艾森豪威尔同朱可夫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谈论了东西方缓和关系的前景，以及一些个人问题。朱可夫问起总统的儿子约翰。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说，这是一次“非常热情的会晤”。

下午会议结束后，大家在会议室附近吃茶点时，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再次会见。苏联新闻发言人·Q·伊利切夫说这次会见是“非常热烈的”。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也参加了谈话。据伊利切夫说，谈话是在友好气氛和“谅解的精神。中进行的。

当晚艾森豪威尔为苏联代表团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他写道：

晚上八点整，苏联人一起到达，他们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朱可夫、葛罗米柯以及他们的翻译特罗扬诺夫斯基。把这些人分分类，倒是一件比较容易的有趣的事，可以丝毫不动声色。布尔加宁是一种和蔼的、善于社交的类型，带一点儿轻松愉快的样子：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就参加国际会议来说还是新手，身体滚圆、态度和蔼可亲，但却显露出几乎不加掩饰的钢铁意志；朱可夫是作为一种友好的媒介出席的，但却显出惊慌的样子；莫洛托夫则认真地保持着他那“铁锤”的名声；葛罗米柯神情严峻，一副很难接近和不高兴的样子，对于整个活动不感兴趣。

.....他们的第一招就是让朱可夫出头。他们到达以后不久，我发现自己是同朱可夫单独谈话，其余的人都退到一边去了。我儿子约翰也参加了谈话。我们回顾了在德国的那些日子，回顾了我们十年前对莫斯科的访问。然后朱可夫说：“在俄国，有些事情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他没有解释这句令人奇怪的话的含义，接着就谈起他自己的家事。他说，他女儿前一天在俄国结婚了。他未能参加婚礼。我说他不该作出这种牺牲，他回答说宁愿同我——他的老朋友和战友在一起。我觉得这番话有点儿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我有点儿不大相信。知道他家里办了这桩大事以后，我派人去取来一对钢笔和一架手提式收音机送给他，要他带回去赠给他的女儿。这个表示似乎真的使他感动了。

艾森豪威尔著《变革的使命》，第518页。——原书注

在宴会上，艾森豪威尔设法鼓励他的客人们坦率地交谈。他指出，现代化武器能够轻而易举地毁灭整个北半球，接着便说：“打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拯救世界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外交。”他回忆说，当时大家都点头表示完全赞同，但却没有人讲出什么有份量的话。

7月20日，艾森豪威尔设午宴招待朱可夫。在场的其他人只有美国驻俄国大使博伦和苏方译员特罗扬诺夫斯基。艾森豪威尔解释了他希望通过这次会晤了解哪些情况。对此，他后来回忆说，他是“希望朱可夫元帅能够对苏联的态度和公开言论经常前后不一致给我作一些解释。”

艾森豪威尔说这次会晤的前半部分是“有趣的、有丰富内容的。”他们回顾了战争年代和战后不久发生的一些事件。但艾森豪威尔回忆说：

可是，当我们开始谈到引起这次会议关注的严肃的题目时，可以明显看出，同1945年相比，朱可夫已经判若两人了……，十年后在日内瓦，他成了一个压抑的、忧虑的人，他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向我重复了苏联代表团团长在会议上提出过的同样的论点……我的老朋友是在执行他的上司的命令。

7月23日，四大国宣布首脑会议开得很成功，并指示它们的外长今后再次到日内瓦去会晤，以便就德国的前途和欧洲安全问题进行详细的谈判。可是这次首脑会议本身既不能算是一次成功，也不能算是一次失败。苏联人表现出急于讨论有关欧洲的一些问题，但所提的各种方案太一般化和含糊其词。

然而，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毕竟正在取得一些进展。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国家条约在维也纳签字。盟国和苏联同意从保证保持中立的奥地利撤军。7月31日，苏联命令它的四万四千名占领军在10月1日以前从奥地利撤走，并宣布它的武装部队将裁减同样数目。

据俄国人的说法，国防部长朱可夫发布了命令，实施了苏联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的下述建议：四个占领国的部队在从奥地利撤出之后，将全部复员。朱可夫的命令是在恢复奥地利独立的条约生效刚刚四天后下达的。

1955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将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鉴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政权决定改选中央委员会。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闻名于世。赫鲁晓夫不仅攻击斯大林的军事天才是虚构，而且对军队司令员们大加赞扬。赫鲁晓夫特别把自己打扮成是朱可夫的忠实朋友，并说自己曾经为朱可夫辩护过。赫鲁晓夫还谴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缺乏个人的谦虚”，表现在“他不仅不去杜绝对他的颂扬，甚至还用种种办法支持和鼓励这样做”。

朱可夫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赞扬赫鲁晓夫和他的报告的为数不多的发言者之一。

朱可夫的发言，首先报告了裁军情况。他说，自1955年8月以来，苏联武装部队已经裁减了六十四万人。他保证说，1956年政府将把军费削减一百亿卢比，苏军将撤出旅顺港和波卡拉半岛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将予以拆除。此外，东欧各国打算将其部队裁减十八万人。

朱可夫攻击美国在外国领土上设置军事基地。他说任何一个通晓军事的人都一定明白，在离本国这么远的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不可能用作防御目

的。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基地的那些国家正在玩火，不管这些基地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受到报复性打击。他在报告中说，美国正在建立强大的战略空军力量和建造载有原子武器的航空母舰，同时让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的伙伴们担负提供地面部队的任务。美国军政要人关心的是首先在欧洲地区使用原子武器，使之尽可能远离美国的工业中心。

朱可夫对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辩论仍然记忆犹新，所以他表示主张发展重工业。他说，正是由于苏联经济力量的增强和重工业的成就，才使得有可能用第一流的军事装备重新武装陆海空三军。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军队继续致力于改写军事史，同时消除关于斯大林的“天才”的神话。会议过后不到两个月，有人把 1941 年苏联军队准备不足一事归咎于斯大林。

与此同时，东欧发生了一些事件，很快就把朱可夫和国防部卷进去了。在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波兰政府立即派出以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波兹南，并且指出这次事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反动的地下组织”的一次有准备的挑衅的结果。

苏联也作出了同样的反应，把这次动乱归因于“敌方的奸细”。

不久，波兰政权承认它犯了错误，并于 7 月 8 日解除了重工业部部长托卡爾斯基的职务，稍后又解除了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欧根纽什·希尔的职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报纸继续指责“外国雇佣的挑拨分子和异端分子”。东德报纸甚至宣布肇事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已经落网。

波兰共产党认为，波兹南的动乱，是要由波兰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苏联的干涉只会加剧一些波兰共产党人的敌对情绪，因为这些人觉得“波兹南的灾祸，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过去来自莫斯科的专横的命令”。这时已经变得明显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观点在预定从 7 月 18 日到 28 日在华沙举行的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七届全会上，无法轻易占上风。

于是布尔加宁主席和朱可夫元帅被派去参加这次会议。正如弗洛拉·刘易斯说的，去“收拾局面”。然而波兰党的政治局坚决拒绝让布尔加宁参加这次全会。会议开了十天，这是波兰党开得最长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布尔加宁被带往波兰各地参观。

波兰党七中全会的决议不顾布尔加宁的警告，制订了继续实行自由化的方针，虽然此后几个月在这方面没有取得实际进展。

1956 年 10 月 19 日，怒气冲冲的赫鲁晓夫前往华沙，以便尽一切努力来影响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他带去了“一批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朱可夫的缺席引人注目。虽然大多数记者报道说，他也到了华沙，但实际上他已飞到苏军北方集群司令部所在地莱格尼查，策划红军部队可能对华沙采取的行动。同时，苏联人派遣了一个海军中队驶过格但斯克湾开往格但斯克。

俄国人一到华沙机场，就同波兰党的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对抗。与此同时，在波兰的苏军可能是在 10 月 19 日，即在赫鲁晓夫抵达波兰首都的前两天，已开始向华沙进发。驻东德和俄国西部的苏军也赶往波兰边界。朱可夫作为国防部长亲自指挥了这些调动。对赫鲁晓夫及其同僚来说，把苏联的意志强加给波兰人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苏联军队来对付他们，但苏联领导人并不真正准备这样做。他们决定暂时让步，采取别的策略。

据加特霍夫记载，苏军曾进抵谢德尔采，在赫鲁晓夫抵达的第二天就撤退了。

也是在第二天，在波兰人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间政治和经济合作”的问题之后，从俄国来的这些不速之客便离开华沙回莫斯科去了。稍后，哥穆尔卡飞往莫斯科举行会谈。据报道，朱可夫在莫斯科警告他说：“我仍然弄不明白你要在波兰干什么。我要告诉你有一件事你不要干，甚至连提都不要提，那就是波兰退出华沙条约。”

可是，波兰人毕竟取得了局部的胜利。1956年11月13日，马里安·斯佩哈尔斯基将军取代索科洛夫斯基担任波兰国防部长兼波兰军队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回到苏联，在朱可夫手下担任国防部副部长。

11月18日，苏波两国签订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波兰》的条约，其中规定，苏联驻波兰的军队人数及其驻扎地点，将由两国间的特别协议来确定。此外，苏军向波兰基地以外的地方调动，“或者根据同波兰当局商定的计划，或者在征得（波兰）政府的同意的基础上实施。

在这段期间，朱可夫曾赶回莫斯科应付新的危机。波兰事件在匈牙利产生了显著影响。布达佩斯的学生起草了一项十六点决议，其中要求苏军立即撤走并建立以纳吉为总理的新政府……—

匈牙利内政部长先是禁止，后来又准许学生示威。很快在国会广场聚集了二十多万人。终于发生了流血冲突。工人区的一些人夺取武器，开始了游击战。

几乎可以肯定，正是朱可夫发布了命令，命令苏军坦克于10月24日凌晨开到布达佩斯的各条大街。在华沙有过一次痛苦的经历以后，俄国人现在迅速而猛烈地采取了行动。

10月25日，苏联坦克护送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来到匈牙利共产党总部。在头一天傍晚，纳吉在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已被中央委员会任命为总理。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对解除被人憎恨的格罗·埃话的职务起了重要作用。卡达尔·亚诺什接替他担任党的书记职务。

斯大林主义多数派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职务，10月27日，纳吉采取行动削弱他们的权力，成立了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新政府。匈牙利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这个政权将开始就苏军立即撤出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战斗逐渐停止下来。10月30日，苏联政府宣布，由于苏军继续驻在匈牙利只会使局势加剧，驻军司令部已奉命从匈牙利撤出部队。同时，苏联人说，他们准备就红军部队留驻匈牙利问题举行谈判。

头一天，即在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打电报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博伦，指示他向赫鲁晓夫及其包括米可夫在内的同僚们转达下述保证：

美国希望卫星国独立并不包含不可告人的意图。我们并不把这些国家视为潜在的军事盟国。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朋友和新的、友好的、不再分裂的欧洲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它们独立——如果很快给予它们独立的话，将对稳固整个欧洲——西欧和东欧的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艾森豪威尔著《为和平而斗争，1956—1961》，第67页。——原书注

当天晚上，朱可夫在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在匈牙利，局势已经好转。已经成立了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新政府。”可是他对局势的发展并不感到高兴。

苏联军队这时几乎完全撤出了布达佩斯，而纳吉开始重新组织政府，组成了以1945年曾经存在的各政党为基础的广泛的联合政府。但纳吉未能

象米高扬期望于他的那样去做。他采取的行动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因为他不仅要求苏军全部撤出匈牙利，而且宣告匈牙利中立，并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正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和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

在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的苏联领导人看来，纳吉的行动乃是背叛行动……

第二个对纳吉政府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就是在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之后法英在苏伊士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和苏联一起对法英进行了抨击。

西方在这关键时刻发生分裂，无疑鼓励了苏联采取行动。

赫鲁晓夫利用西方争吵之机，命令苏军坦克重返匈牙利。11月1日和2日，纳吉就苏联新的装甲师开进匈牙利领土一事向苏联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当苏联大使故作不知道军队调动一事时，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宣布经部长会议一致赞同宣告匈牙利中立，并且要求联合国讨论匈牙利的困难处境。

11月2日，苏联坦克取道罗马尼亚到达匈牙利，包围了匈牙利东部的一些机场、铁路车站和其他战略要地。苏联坦克师开始包围布达佩斯，并于星期日，即11月4日凌晨，攻入匈牙利首都。纳吉逃进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后来被处决），而前往苏联寻求帮助的党的总书记卡达尔，随同苏军坦克部队回到了匈牙利。

由于朱可夫立下了功劳，在他六十岁生日那天，苏联所有大报都在头版刊登了这位元帅的大幅照片和党中央委员会对他的赞扬：

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高度评价你在建设武装部队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方面的贡献。在伟大卫国战争的严峻岁月里，你卓越地、英勇地领导苏军为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进行了一些决定性战役。在和平建设年代，你不懈地为进一步建设苏维埃国家，为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贡献出你的全部精力和智慧。

紧接着在寿辰贺词下面，便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市的公告，宣布授予朱可夫列宁勋章和第四枚金星奖章。朱可夫是在苏联历史上获得勋章奖章最多的人，他成为获得四枚金星奖章的唯一的一个人。

1957年1月，朱可夫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印度。

仔细研究米可夫在印度的日程和讲话，就可以看出，这次访问的意义比西方观察家们当时所认识的更重大。1955年夏，尼赫鲁率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稍后，苏联政府表示愿以优厚条件向他提供武器，其中包括低价供应大十架到一百架喷气式战斗机。这是一个摆脱对英国军火工业的依赖——而且能节省开支的机会，无疑对许多印度军人具有吸引力，但尼赫鲁当时拒绝了这个建议。戴维·达林著《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第305页。——原书注

朱可夫在印度期间，很可能重申了这个建议，因为不久之后印度便转向苏联购买武器了。

朱可夫的访问还有别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用十八天的时间仔细视察了印度的武装部队。一位观察家写道，“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象印度政府对待朱可夫元帅那样，把自己的军事机构展示给一个关系密切的盟国。”

N·加利著《朱可夫在印度》，载《苏联研究所公报》，第4卷，第4期（1957年4月），第4页-第7页。--原书注

在苏联武装部队各兵种的军事专家的陪同下，朱可夫参观了军事训练中心、军事机关、海军基地、空军基地以及印度的主要兵工厂。他观看了野战演习、参谋演习，举行了会议，并在军事院校作了报告。他的视察方法、他的报告和他同印度高级军官的讨论表明，赋予他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来改善印度的武装部队。苏联专家撰写的报道的一些段落倾向于证实这种看法。

N·加利著《朱可夫在印度》，载《苏联研究所公报》，第4卷，第4期（1957年4月），第4页—第7页。——原书注

朱可夫此行是为了扩大苏联在亚洲的中立国家中的影响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1955年11月的访问，被说成是苏联在南亚的一个突破，而朱可夫此行，可以认为是对这一突破的巩固和延伸。

除了使印度共产主义化这个长远目标以外，苏联人还有一个更紧迫的当前任务，就是扶植出一个强大的印度军队，与巴基斯坦抗衡。因为巴基斯坦是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需要利用印度次大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民族的冲突。朱可夫之行是朝这个方向采取的又一步骤。

3月，这位军人政治家出席了战后在莫斯科召开的首次苏联武装部队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说。他的演说，跟往常一样，称颂党、攻击西方的侵略，而且提到了全世界所有敏感地点。朱可夫攻击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用热烈的词句描述了他最近对印度的访问，同时，他要求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的效果。他批评了那些“过早地发胖而变得动作迟缓的人”。关于未来的战争问题，朱可夫说他听到这样的论点：假如使用核武器，双方都会毁灭，因此，不应使用这种武器，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使用毒气那样。他说，然而这种论点是错误的，既然核武器正在代替常规武器，那么将来必然是会使用的。他宣称，苏联必须作好准备来防卫这种武器的袭击，并对任何进攻它的国家进行反击。

朱可夫的一生中从未改变他的这种立场，即国家的文职当局应当信任司令员，让他们去处理部队的事务，政治委员不要总是干预和干扰。现在，朱可夫既然当上了国防部长，职业军事人员试图获得更大的自由来履行他们的职务，不受过多的政治控制的妨碍，他们这样做就是很自然的了。

第十五章 “害群之马”：反党集团

1957年7月4日，苏联报纸宣布，马林科夫、卡问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谢皮洛夫被解除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选举了一些新的成员，其中包括朱可夫，进入主席团代替他们。

事情的发生，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到1957年4月，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们觉得他取得的权力过大了。赫鲁晓夫已开始向他们手中还掌握的权力发动进攻。莫洛托夫、卡问诺维奇和马林科夫认定，他们必须采取行动。

布尔加宁虽然不敢公开反对赫鲁晓夫，但他却让这些阴谋者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并答应他们，一旦推翻赫鲁晓夫成功，他就批准新成立的政府。

伏罗希洛夫似乎愿意参加，还有两个人也愿意参加，他们是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这是两位经济计划专家，同米高扬一样，都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个集团认为，他们在十一人的主席团中至少拥有跟赫鲁晓夫一样多的支持者。

6月18日召开了一次主席团会议讨论一些不甚重要的问题。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多数人在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表决中，开始反对赫鲁晓夫，对他的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攻击，指责他开始搞他自己的个人迷信。最后人们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表决结果是七比四。可是，赫鲁晓夫不接受这个决定。

据报道，布尔加宁对他说：“唔，我们是七票，你是四票。”

赫鲁晓夫反驳道：“在数学里，二加二确实等于四，可是这不适用政治。政治因这是两码事。”

按照党章的规定，主席团只要有四分之一的人提出要求，就可以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赫鲁晓夫要求召开全体会议，他坚持说，只有全体会议才能作出解除第一书记职务这样重大的决定。赫鲁晓夫知道，他在全体会议上能够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这时，朱可夫要求主席团会议休会，这个要求被接受了。接着他命令国防部门用军用飞机火速把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当晚就有许多中央委员赶到了。

6月19日上午，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三百多人举行会议。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重申了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但没有得到多少支持，甚至失去了他们在主席团的多数中的两个人——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朱可夫发表了有力的演说支持赫鲁晓夫。据波兰人士说，他把这个集团的策略同贝利亚的策略相提并论，‘说军队了解真实情况，就象贝利亚事件时一样。据报道，他还对全会说，红军“不允许任何人攫取权力”。表决时，赫鲁晓夫保住了他的职务。

此后，赫鲁晓夫便决定除掉他的敌手，把他们一古脑地称作为“反党集团”。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被赶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萨布罗夫被解除了在主席团的职务，别尔乌辛则被降为主席团候补委员。得胜的赫鲁晓夫立即让他自己的支持者，其中包括朱可夫，填补了空缺。而且他又把主席团的人数增加了四个，这四个新席位都给了他自己的人。仅在几天以前，在十一名主席团委员中，赫鲁晓夫有七个敌人，现在他的主席团有十五名成员，其中九名是他亲自选定的。

这次变动刚一宣布，朱可夫立即开始批判阴谋策划者。他对马林科夫、卡阿诺维奇、莫洛托夫的攻击极为严厉。7月2日，即在中央全会公告发表的前两天，国防部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党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积极分子大会的共有九百名共产党员，其中有国防部和军事学院的官员、各卫戍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及主要的党组织的书记。朱可夫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攻击了反党集团，强调指出，把这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赶下台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

接着朱可夫抨击这三个人没有遵循“我们党的列宁路线”，没有改正现存的缺点，助长了个人迷信的形成。他指责他们不相信农业能够迅速增长，不承认有必要加强集体农庄，而且他们“脱离人民群众，不了解人民的愿望，看不见在生活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事物”。“低估了群众的创造力”。

朱可夫在报告中说，这个集团，特别是莫洛托夫不赞成党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

接着，朱可夫赞扬了党的成就，特别是二十大以来的成就，并且保证说，军队“随时准备响应母亲般的党和政府的第一声召唤，为保卫我国政府的利益而勇敢战斗。”

在此后的几周期间，朱可夫忙于谴责反党集团。7月中旬，他前往列宁格勒参加海军节庆祝活动。他在向布尔什维克工厂的工人们发表演说时，首先称颂了列宁格勒的美德，并且讲述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保卫这座城市方面所起的作用。接着，他痛斥了反党集团。他指出：“社会上总会有害群之马”，这一次，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出现了这种害群之马。他说，“我说的是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

朱可夫详细地列举了他们的一大堆过失，所用的语言同7月2日在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语言类似。他说，他们抵制为改进农业而采取的措施，反对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立法方面的权力。更加严厉的谴责是他指责他们顽固地抗拒党为消除对个别领导人的迷信所作的努力，特别是他们抗拒揭露和谴责应对过去的破坏法制事件负主要责任的人。现在，他们自己的活动被揭露出来，人们才看清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揭露过去犯下的违反法制的行为。

朱可夫在列宁格勒的演说后来使他自食其果。卡尔·林登在他的一本研究赫鲁晓夫的专著中评论说：

……下述推断是合情合理的，即促使朱可夫在10月底突然下台的因素之一，就是在斯大林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上，他的做法有可能打乱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整体，必定会认为朱可夫的演说，可能是他试图夺取权力的第一步，…… 卡尔·林登著《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1951 - 1964》，第48页。——原书注

而且，这位元帅在谈论他个人在列宁格勒战役中的作用时。似乎也走得太远了。他说：

1941年秋天，在那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德军突破了普尔科沃高地，德军少数坦克冲到了肉类联合加工厂的时候，我正指挥着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部队。我看见列宁格勒人不怕流血牺牲，奋勇保卫他们的家园。后来，在我协调列宁格勒方百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作战行动，以突破封锁的时候，我再次对列宁格勒人的英雄主义精神感到钦佩。

把早些时候他关于他在战时的一些胜利中的作用的言论，同他这次公开宣称他在列宁格勒的胜利中的作用的作法结合起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试图建立新的个人迷信，否定共产党的“应有的”功劳。

有许多不详之兆，但就当时来说，朱可夫在政府中仍居于显赫地位。他接待外国代表团，出席同其他国家的部长们的会谈，苏联报刊接连不断地报道他的名字。苏联报纸每周数次刊登他的照片。8月6日，在他出席苏联和叙利亚联合公报签字仪式时，为他拍了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他在8月7日同赫鲁晓夫一起为一个东德代表团送行。8月14日，他和布尔加宁迎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从东德归来时也拍了照片。

对1957年夏天关于朱可夫的新闻报道，朱可夫是没有理由抱怨的。8月，一部关于他的印度之行的影片和另一部叫作《祖国的战士》的影片发行上映了。在后一部影片中，朱可夫颂扬了红军的作用。许多报纸报道了他同

中国。罗马尼亚以及印度的军事官员们的通信，他给坦克兵、水兵和工人们的贺信，以及他给国防部下达的命令。

上述种种大出风头的场面，几乎不能不使朱可夫对个人权力产生一种幻想。不过，这是一个不久就被猝然驱散了的幻想。

第十六章 一长制与波拿巴主义：朱可夫被撤职

1957年10月第一周。朱可夫乘“古比雪夫号”巡洋舰前往南斯拉夫访问。这次访问是一次友好访问，使人多少想起他的印度之行。他情绪很好。看起来他正置身于苏联军界阶梯的最高层，并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责任。此外，苏联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科学成就，这些成就将有助于缩小东西方之间的差距。

在航行途中，朱可夫挤出时间发表了一些讲话。他的讲话着重谈了刚刚发射成功的苏联“第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是很自然的。他在同“古比雪夫号”船员们的一次简短谈话中说：“就在我们启航的当天——10月4日，苏联科学家们成功地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苏联科学技术的一个伟大成就。”他本分地把这一业绩归功于党在这项科学研究工作中给予的正确领导。

《红星报》1957年10月9日，第1版。——原书注

“古比雪夫号”抵达扎达尔港。然后。朱可夫飞往贝尔格莱德，国防部长戈什尼亚克前往机场迎接。西方记者们注意到南斯拉夫的欢迎有些不寻常的方面：铁托没有中止他在斯洛文尼亚的休假来会见这位苏联英雄。欢迎的群众比较少，掌声也不热烈。

10月13日，铁托终于在克拉尼附近的他的家中接见了朱可夫。他俩一起到斯洛文尼亚的野外去打猎。当晚，铁托设宴招待这位来宾。

但是，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苏联报纸对朱可夫的报道不及他访问印度时的报道规模大。他得到的版面越来越少——而且是在报纸的不显眼的位置。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8月，赫鲁晓夫和铁托曾在罗马尼亚会晤，铁托听赫鲁晓夫说（后来又从哥穆尔卡那里听到这种说法），朱可夫获得的权力太大了，把军队置于党之上……两天以后，赫鲁晓夫给铁托打电话，请他劝朱可夫不要直接回莫斯科，而是到阿尔巴尼亚去“弥合一下南阿关系”。

10月17日，朱可夫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访问。此后几周中，他到各处访问并发表讲话。在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上将举行的宴会上，朱可夫谈到了紧张的中东局势。他说，苏联将支持叙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他谴责社勒斯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声称西方一味坚持组成政治集团，抱住强权政治的主张不放。

在结束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时，朱可夫打算从容地返回莫斯科，顺路将检阅克里米亚的苏军部队。可是，赫鲁晓夫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希望这位元帅直接飞往莫斯科，因为要筹备预定在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四十周年那天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检阅，有许多工作要做。

《赫对朱：秘密是怎样揭开的》，载美国《新闻周刊》，1957年11月11日，第18

页。——原书注

10月28日朱可夫登上一架飞机，飞往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武装部队的其他官员到机场欢迎他，但没有党的高级官员。

前一天赫鲁晓夫同莫斯科军区的高级指挥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大概是讨论了朱可夫的命运。赫鲁晓夫惧怕这位国防部长的力量和威望，原先打算提升他担任诸如部长会议副主席等其他职务，这样既可剥夺他对军队的控制权，又可避免公开摊牌。

朱可夫从机场直接前往参加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他拒绝向他提出的“提升”的建议，于是就摊牌了。辩论时间拖得很长，以致已经应邀参加伊朗大使馆的招待会的赫鲁晓夫等人不得不两次推迟他们到达时间。

朱可夫返抵莫斯科大小时之后，塔斯社发表了这次会议的一项公报。虽然这个简短的公告第二天登在《真理报》里页不显眼的角落，但世界各地的报纸都用大字标题转载了。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苏联国防部长职务。

在这一周过去一半的时候，记者们有机会在赫鲁晓夫出席土耳其使馆的一次招待会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对记者们说，朱可夫活着，而且很健康，将给他另外安排工作。“我们还没有决定到底给他安排什么新工作，”赫鲁晓夫说，“他将得到同他的经验和资历相称的职务。”他还说：“我今天见到朱可夫了。我跟他讲了几句话。

他身体很好。”

那天晚上赫鲁晓夫对记者们讲的一句话，确实表明朱可夫出了问题。“就生命来说，”赫鲁晓夫用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语调说，“一个细胞是必定要死的，另一个细胞会代替它。生命将维持下去。”当有记者问他国外有消息说苏共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的时候，他反唇相讥道：“这是你们自己编造的消息。”

其他苏联领导人说，朱可夫被撤职是“内部的事”，并且表明以后会作出解释，但不是现在。出席招待会的一些苏联人，都把有关朱可夫的问题给据回去了，他们说，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最近辞职跟朱可夫辞职没有什么不同。

现在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朱可夫的主要指责是，他试图削弱党的工作人员在武装部队中的影响和他无所顾忌地坚持为斯大林时期被清洗的那些红军领导人恢复名誉。

1957年11月3日，克里姆林宫公布了一系列文件。其中有《中央全会关于改进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决议尖锐地谴责朱可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

朱可夫还被指责在红军中搞“个人崇拜”。“在一些阿谀奉承之辈的帮助下”，这位元帅开始“在一些讲演、报告、文章、电影和小册子里被捧上了天”。他在战争中的作用“被颂扬得太过分了”。为了取悦朱可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遭到歪曲，苏联人民、许多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贡献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被贬低了。

中央全会还说，虽然党和政府记度评价朱可夫的功绩，给了他许多荣誉，包括让他在党内担任一些高级职务，但朱可夫丧失了“B·N·列宁教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他以为他在“我国人民及其武装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切胜利中是唯一的英雄”。

中央委员会会议说，朱可夫辜负了共产党对他的信任。“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在政治上不清醒的人，无论在对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的理解上，还是在他对国防部的领导工作中，都有冒险主义的倾向。”

决议最后宣布的对朱可夫的处分，对他的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被撤消了，将被分配“其他工作”。

这样一来，朱可夫便失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和党内的一切职务，仅仅保留了他的党籍，最后终于退休。

1958年3月，朱可夫正式退休。据报道，他的退休金是每月五千五百旧卢布（相当于一千三百五十七美元）。为什么他被赶下台以后过了五个月才退休，其中缘故人们只能猜测。也可能是他被允许留在克里姆林宫里，向接替他的人汇报情况。

在朱可夫被撤职四年以后，他显然不会再对赫鲁晓夫构成任何威胁。1961年夏末，柏林危机高潮时，赫鲁晓夫要求朱可夫重返部队工作，不过这显然是一个宣传姿态，因为对朱可夫的攻击仍然在俄国继续进行着。因此，朱可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尽管他的身体很好，而且他还比较年轻——至少比赫鲁晓夫要年轻。

1962年底到1963年初这个冬天，据说马利诺夫斯基要求大大增加军事预算，并就此在主席团内部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从而危及了赫鲁晓夫对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拨款。

赫鲁晓夫要求朱可夫支持他，但这位元帅拒绝参与。显然，为了报答朱可夫的援助，赫鲁晓夫甚至愿意为他恢复名誉。

1963年5月，苏联外交部要求美国大使馆邀请朱可夫出席美国武装部队招待会，可是朱可夫没有露面。

朱可夫住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中，打猎、钓鱼以及写回忆录度日。有时偶而在莫斯科大街上露面，一些好心人向他打招呼，表示良好祝愿。毫无疑问。他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恢复他在苏联历史中应有的位置。为他恢复名誉的大门仍然敞开着。赫鲁晓夫有一次对罗伯特·康西丁说：

“朱可夫元帅没有被开除出党，他仍然是我们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专家，我们相信，他将为人民的事业贡献他的精力和知识……”

然而，朱可夫大概意识到，赫鲁晓夫如果下台，他恢复名誉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

的确，赫鲁晓夫下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十七章 复出

1964年10月18日，苏联报纸宣布。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苏共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同意他关于解除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N·勃列日涅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A·H·柯西金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随着赫鲁晓夫的离去，朱可夫恢复名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1965年2月10日，他的名字自从他1957年被撤职以来第一次出现在他的一位前同僚——卡尔马诺夫少将的讣告中。4月间当苏联人准备庆祝战胜德国二十周年时，有谣传说朱可夫将参加庆祝活动。4月28日，塔斯社广播了科涅夫就朱可夫在战时所起的作用讲的一番话：

众所周知，朱可夫元帅曾经担任过种种重要职务。苏联政府高度评价他的贡献，朱可夫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首长，尽管他有些缺点，这些缺点已经在我们的报刊上提到过。

朱可夫元帅现在已经退休。他住在莫斯科，显然，他同全体苏联人民一样，将参加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此后，朱可夫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在报刊上出现。4月16日和4月30日，分别由索科洛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撰写的两篇文章中叙述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有些军事著作家，其中包括科涅夫，仍小心翼翼地不提朱可夫的名字，提到他的时候只是说“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

在莫斯科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庆祝活动的前几天，苏联新闻社播发了格奥尔基·朱可夫的一张胸前挂满勋章的照片。这位老英雄已经借此机会复出。

5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向六千名听众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演说。

当他开始作述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时，他说。“在那危急的局势下，党和苏联人民作出了巨大的、无比英勇的努力来加强军队，并把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使全国变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堡垒。”

接着，他谈到斯大林，他说：“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导下，建立了国防委员会。”这时，听众中爆发出一阵掌声，当勃列日涅夫想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掌声越来越响亮了。看来他有点发慌，念得结结巴巴，然后又退回去重念：“指导组织抗击敌军的各种活动”。这意外的掌声，是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以来，在克里姆林宫第一次自发地公开表示对斯大林的怀念。

勃列日涅夫念了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一些司令员的名字，当念到朱可夫的时候，听众也报以一阵掌声。

翌日，苏联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检阅。除了一个由一千人组成的乐队外，引人注目的还有俄国的新式导弹和火箭。站在列宁墓上的，有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等元帅以及其他苏联英雄。

人们欣喜地欢迎朱可夫再次回到公共生活中来。前驻苏武官曾对我说，当朱可夫穿着军服在欧洲胜利日那天在大街上出现时，女清扫工们都激动得哭起来。在当天早些时候举行的招待会上，同僚们都以出自内心的热情欢迎他。

得知朱可夫公开露面以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高兴，他说：“我想是该给他恢复名誉的时候了。他是个很好的军人，在柏林的时候，他竭尽全

力使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据一位著作家说、朱可夫的继任人马利带夫斯基元帅或许对朱可夫兼上列宁墓不大高兴。据报道，他在欧洲胜利日那天，对文职首脑们态度冷淡。猜测集中在这种不悦态度是否同朱可夫复出有某种联系。

5月9日，还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授勋仪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向战时的一些领导人颁发了纪念勋章。这种上面刻有“纪念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胜利二十周年”字样的勋章，奖给了朱可夫、马利诺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布琼尼、伏罗希洛夫、戈利科夫。罗科索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铁木辛哥等人。勃列日涅夫向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人颁发了刻有题字的金表，朱可夫当然也在受奖之列。

1965年6月，朱可夫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刊登在《军事史杂志》上，题目是《在柏林方向上》。它引起了一些震动，因为朱可夫指责崔可夫差不多是在撒谎。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其他几个部分，即关于莫斯科会战的三篇、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的两篇，都发表在《军事史杂志》上。此外，朱可夫关于保卫莫斯科的回忆录，从1966年10月22日至12月24日，在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上连载。随后，他又陆续在不少刊物上发表了文章。

1966年12月，莫斯科保卫战胜利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为朱可夫进一步恢复名誉提供了又一次机会。索科洛夫斯基关于这次伟大会战的文章中，叙述了朱可夫元帅在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的作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里切夫，赞扬了帮助拯救莫斯科的军事领导人，他列举的名单中居首位的就是朱可夫。包括许多受过勋的退伍军人在内的听众，听到朱可夫的名字时，都热烈鼓掌，叶戈里切夫不得不停止讲话等待大家安静下来。

同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鉴于朱可夫“对于武装部队的贡献，并为庆祝他的七十寿辰”，授予他国家最高奖赏——列宁勋章。

给予朱可夫的荣誉还表现在其他方面。雕刻家维克托·杜马尼安为他雕塑了胸像。

斯维特利申上校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发表在《军事史杂志》上。斯维特利申的文章是他亲自采访朱可夫，并根据这位元帅的私人文件和国防部档案写出的。它是苏联迄今为止发表的几乎是最全面的朱可夫传记。而且，这篇传记是客观、公正和真实的。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这篇传记，还是朱可夫恢复名誉以后发表的其他文章，都没有否认1957年对他提出的指责，即朱可夫试图削弱党对军队的政治影响。斯维特利申对于这件事一笔带过，只是说朱可夫“犯过严重错误，这些错误，195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已在其《关于改进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的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指出过了。”

1965年，一部极好的战史书《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简史）》出版了。

这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共六卷）的简编一卷本。美化赫鲁晓夫的照片和夸大的描写被删去，朱可夫作为俄国杰出的战时指挥员之一，重新得到肯定。

朱可夫的同僚们写的一些回忆录，对朱可夫恢复名誉也起了推动作用。正如我已指出的，在朱可夫同崔可夫就柏林战役展开争论的时候，安季品科将军和捷列金将军出来帮朱可夫说话了。当人们知道，他们为朱可夫的行动辩护是在朱可夫恢复名誉以前，那么他们的勇气就更加值得钦佩了。N·X·巴

格拉米扬元帅对待朱可夫也是很友好的。他在他的连载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战前年代，得到迅速擢升的所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中，朱可夫无疑是最杰出的、最有才干的人。”

朱可夫经常参加一些向军人致敬的公开的仪式。他参加了纪念苏联军队建军四十九周年和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讣告上签字，并参加了他们的葬礼。1968年8月3日，他的老朋友罗科索夫斯基长期患病后逝世。8月4日，他在老朋友的讣告上签字，这是一件使他心酸的事。

1968年，俄国出版一本很好的一卷本的苏联武装部队史，书名是《苏联武装力量五十年》。它是以M·B·扎哈罗夫元帅为首的一个委员会编纂的。撰稿人中有许多战时指挥员，其中包括朱可夫。该书多处提到朱可夫，朱可夫终于作为对德战争胜利的主要谋划者之一载入史册。

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69年3月28日逝世时，有谣传说朱可夫将代表苏联参加葬礼。

但是，不久前朱可夫元帅中了风。虽然他病愈了，但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进行这次旅行。

1969年8月14日，为纪念在哈勒欣河打败日军三十周年，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授予朱可夫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金星勋章。

1970年，已经卧病的赫鲁晓夫赞扬了朱可夫。

他作为一名司令员，我仍旧是非常尊敬他的，尽管我们后来分道扬镳了。他未能正确了解他作为国防部长的职权，因此，我们不得不对他采取行动，以防他实施他已在酝酿的某种计划。可是，即使在那时，我对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评价仍是很高的……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62页。

——原书注

一年之前，即在1969年，朱可夫关于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和柏林战役的回忆录，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书名是《朱可夫元帅指挥的伟大战役》。

与此同时，据宣布他的回忆录已在莫斯科出版。这部人们盼望已久的回忆录，第一版共印刷六十万部，数量惊人。1970年初，这部书在美国的俄文书店中首次出现。遗憾的是，这部书只写到1946年朱可夫离开德国为止。全世界无法了解这位老战士以后的情形。曾与朱可夫长期共事的布琼尼元帅（现已八十多岁了）对朱可夫的回忆录备加赞扬。

他说：

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和作者们，出了许多错误，特别是在记述战前年代和战争早期阶段，更是如此。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所作的贡献是，他作为这些事件的权威见证人和参加者，以他的著作粉碎了想要歪曲历史事实的一切企图，从而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貌。

这样，朱可夫在他的晚年复出，在苏联历史中取得了他应有的地位。这位首先是伟大的爱国者，其次才是一名党员的伟大军人之所以被恢复名誉，可以认为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试图把荣誉给予应该得到这种荣誉的人，并使苏联历史成为一部对于重大事件的更符合事实的记载的历史。朱可夫仍然得到各个阶层的许多俄国人的爱戴，特别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的爱戴。朱可夫是战场上的胜利的永恒的象征。

